關東憲兵隊

傅大中

偽滿史叢書

僞滿史叢書

關東憲兵隊

傅大中



吉林教育出版社

伪满史丛书　**关东宪兵队**　　　　傅大中

责任编辑：任毅馥　　　　封面设计：曲刚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787×1092毫米32开本12.625印张2插页256,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illegible]年12月第1版　　199[illegible]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56册　　定价：4.65元

印刷：长春市第五印刷厂

ISBN　7-5383-1347-8/K·38

目　　录

关东宪兵滥觞东北（1904—1931）

一　关东宪兵队的由来………………………………… 3

二　侵略中国东北的尖兵……………………………… 11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1931—1935）

一　侵略“南满”的宪兵派遣基地奉天宪兵队……… 27

二　侵略“东满”的宪兵派遣基地长春宪兵队……… 38

三　关东宪兵队编入关东军作战序列………………… 53

血腥的“东条宪兵”（1935—1939）

一　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宪兵队司令…………………… 69

二　政治镇压的基本手段“思想对策”……………… 88

三　政治镇压的组织机构“警务统制委员会”……… 101

四　政治镇压中的杀戮手段“严重处分”和“军法会审”…………………………………… 116

五　政治镇压的谋划机关“思想对策调查班”……… 125

六　政治镇压的别动队“长岛工作班”……………… 134

侵苏的秘密准备（1939—1941）

一　关东宪兵的侵苏预演——参与“诺门坎事件”………………………… 153

二　“满洲86部队”及其活动………………………… 163

三　研究统治远东占领地的办法及编成“野战宪兵队”………………………………… 180

四　强化对伪满的思想控制及编成
　　“思想宪兵队”…… 188
五　战时大屠杀的预谋
　　——“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计划”…… 208
六　关东宪兵队战时统制伪满警宪机关对策…… 212
“满洲秘密防御战”内幕（1941—1945）
一　特务、密探监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221
二　在“防谍”名目下的恐怖活动…… 233
三　进行秘密战的大谋略部队
　　“关东军特别警备队”…… 253
遍布全东北的关东宪兵网
一　监视伪满中央政权的新京宪兵队…… 261
二　控制“南满”的奉天、通化、锦州、四平、
　　鞍山宪兵队…… 284
三　围绕“白俄”对苏从事特务活动的哈尔滨
　　宪兵队…… 305
四　封锁长城的热河宪兵队…… 317
五　“镇守关东州”的大连宪兵队…… 331
六　配合关东军东线进攻的牡丹江、东宁、
　　东安、鸡宁、间岛宪兵队…… 343
七　布防在伪满北部边境线上的佳木斯、
　　孙吴宪兵队…… 371
八　协助关东军西线防守的齐齐哈尔、海拉尔、
　　兴安宪兵队…… 386
后记…… 401

关东宪兵滥觞东北

（1904—1931）

一　关东宪兵队的由来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明治维新以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就将挤入资本主义行列，参与瓜分世界作为基本国策，并将兼并中国东北作为其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就觊觎中国东北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然而，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贪婪地窥视东北，垂涎欲滴的时候，瓜分中国的急先锋沙皇俄国早已在北边动手。这样，东面的日本和北面的沙俄，近代在瓜分中国的活动中，于20世纪初在东北相遇，引起了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火并。

在日俄战争中，关东宪兵最初作为日本陆军的军事警察，打着维持日军军风军纪的幌子，随“满洲军”第一次踏上了东北这片土地。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宪兵来东北，目的并不是要监督军队，而是准备用来对占领地进行统治。因此，1904年9月，当日军攻占辽阳后，为保护已占领的旅顺、大连、金州三个地区，用6个大队的兵力编成“辽东守备军”，对上述地区进行警备时，则以44名日本随军宪兵为主，编成了占领地“军政署”，用其执掌占领地的行政事务。这时福永定少佐等宪兵干部，被任命为辽东守备军附。

翌年5月，随日俄战争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将辽东守备军撤销，在满洲军总司令部总兵站监下，设“辽东兵

站监”，并根据日本天皇的敕令，废止占领地军政署，在辽东兵站监下新设“关东民政署”，负责管理占领地的行政。这时福永定等日本宪兵，又转属到关东民政署，改以辽东兵站监附的身份，继续执掌占领地的行政事务。

1905年9月，日俄两国签定媾和条约，俄国因战败将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及长春至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包括支线和附属权）转让给日本。至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夺得了34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100多公里的铁路，及大量的殖民特权。

战后，日本将辽东半岛上的租借地称为“关东州”，将长春至旅顺口间的铁路称“南满铁路”。为对其进行管理，设置了“关东总督府”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关东总督府”是在日俄媾和条约生效后的1905年9月26日成立，初期属军政性质，置满洲军总司令隶下，首任总督由日本陆军大将大岛义仓出任，责任是管理“关东州”及监督“满铁”经营。另根据日俄媾和追加条约“每公里铁路可派15名军队护路”的规定，关东总督还管辖着1.4万余名兵力，负责对“关东州”及满铁沿线的守备。日本在东北撤军后，关东总督府转归日本参谋本部领导。

1905年12月，日本强迫中国清政府签定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中日“条约”正式接管南满铁路及所属财产和全部特权后，撤销了辽东兵站监，同时为维护撤军后日本在东北所得的利益，对护路军执行军事警察业务，将辽东兵站监的宪兵，正式改编成“关东宪兵队”，直属关东总督。这是关东宪兵队最早的组织形式。宪兵中佐福永定被任命为第一任关东宪兵队队长。队本部设在旅顺口，沿“满铁”在辽阳、奉

天、铁岭、安东、长春设分队。

日本夺取辽东半岛租借权后，国际上，遭到了欧美一些国家的反对。在国内，就对其如何统治，也出现了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派以陆军为首，坚决主张对"关东州"实行军政管理；另一派以当时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为首，强调协调国际关系，引进外资，主张采用民政的方式管理。两派争执的结果，伊藤博文为首的"文治派"获胜。于是，1906年9月1日废止了关东总督府，成立"关东都督府"，"关东州"的统治权，名义上转属到了日本外务大臣的名下。

"关东都督府"内设民政、军政两部，负责对"东关州"及"南满铁路"（包括附属地）进行统治和警备。"关东都督府"虽改为民政机关，但日本陆军提出："俄国在'北满'仍占据着'东清铁路'，并以护路为名仍驻扎着大量军队，虽被打败，但复仇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经营'满洲'必须从战略上考虑，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由于日本陆军的坚持，军方在"都督府"中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都督"一职，仍由日本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关东都督府官制"规定：都督负防卫关东州，保护南满铁路，监督关东州经营之责任。实际上改为民政机关的"关东都督府"，仍具有军政的性质。

1906年7月，日本在东北撤军后，根据日本陆军的意向，在"关东都督府"内设"陆军部"，在东北常驻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大队，作为保护"关东州"和"满铁"的武力后盾。同年10月26日，关东宪兵队被明文划归到关东都督隶下，其任务被规定为：对驻满师团及独立守备队执行军

事警察和司法警察业务，同时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内兼负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责任。这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关东州”统治机构的逐步建立，关东宪兵队的业务又一次地发生了变化，从对占领地的临时行政管理，转向了对中国人民进行镇压方面。这次改编后，关东宪兵队业务关系，人员培训等转归日本国内宪兵司令部领导，并统一与日本各地宪兵队编队，改称“第十五宪兵队”。

同年11月14日，关东都督府颁布命令，规定了第十五宪兵队各分队的配置及管区，情况如下：

队名	所在地	下辖分遣所
旅顺分队	旅顺	大连分遣所
辽阳分队	辽阳	大石桥分遣所
奉天分队	奉天	本溪湖分遣所
铁岭分队	铁岭	昌图分遣所
安东分队	安东	
长春分队	长春	公主岭分遣所
第十五宪兵队本部	旅顺	
注：大连分遣所1910年升格为分队。		

1907年10月7日，日本各地的宪兵队又重新将管区地名作为冠称，第十五宪兵队又改称为关东宪兵队。

1917年7月28日，关东都督府官制改革。民政部警务课升格为警务部，天皇发布敕令：“在南满洲执行勤务的宪兵

军官，可以任用为关东都督府警务总长、警视职务；宪兵准士官，下士官可以任用为警部职务；宪兵上等兵可以任用为巡查职务。”根据这一敕令，关东宪兵队长正式担任了关东都督府警察总长的职务。至此，宪兵不仅有了正式的警察身份，实际上也控制了日本在东北的警察权。

这次官制改革后，由于宪兵权力的膨胀和宪兵队长地位的提高，关东宪兵队长的阶级也由中佐提高为少将。

1919年3月，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运动，在这场反帝运动的冲击下，同年4月，日本改组了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废止了关东都督府，将其一分为二，民政部改为“关东厅”，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7月18日明治天皇根据“关东州”警察机构的状况，又颁发敕令，重新调整了关东宪兵队的隶属关系和权限，将其划归日本宪兵司令部直属，专门对关东军执行军事警察业务。根据这一敕令，关东宪兵队长不再兼任警务总长职务，名义上将一切行政警察业务都移交给了关东厅，直至“九·一八”事变前。

不久，根据天皇的敕令，关东宪兵队又重新进行了配备，其情况如下：

队名	所在地	下辖分遣所
关东宪兵队本部	新旅顺	
旅顺分队	旅顺	
大连分队	大连	柳树屯分遣所
		瓦房店分遣所

续表：

队名	所在地	下辖分遣所
辽阳分队	辽阳	大石桥分遣所
		营口分遣所
奉天分队	奉天	本溪湖分遣所
		连山阁分遣所
铁岭分队	铁岭	开原分遣所
公主岭分队	公主岭	四平街分遣所
安东分队	安东	长春分遣所
注：长春分遣所1919年6月升格为分队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宪兵(队)各时期兵力变更如下：

年份	军官	准士官	下士官	兵	计
1905年	30	3	85	240	358
1907年	10	4	43	159	216
1910年	10	5	40	133	188
1913年	10	7	36	129	182
1915年	10	6	37	128	181
1919年	11	6	36	128	181
1922年	10	10	32	126	178
1925年	10	9	32	126	177
1929年	10	10	32	126	178
1931年	34	32	243	381	690

"九·一八"事变前，历任关东宪兵队长及任职情况如下：

	姓　　名	阶　　级	任　职　时　间
第一任	福永　定	宪兵中佐	1905.12—1906.5
第二任	冈本清作	宪兵少佐	1906.5—1909.3
第三任	安嶋政伍	宪兵中佐	1909.3—1910.10
第四任	中岛矩真	宪兵中佐	1910.11—1913.8
第五任	藤田耕一	宪兵中佐	1913.8—1915.8
第六任	山田鹿太郎	宪兵中佐	1915.8—1917.8
第七任	隈部亲信	少将	1917.8—1919.8
第八任	前田　升	大佐、少将	1919.8—1920.8
第九任	峰幸　松	大佐、少将	1920.8—1925.
	小山介藏	少将	1928年前后
末　任	二宫健市	少将	"九·一八"事变前后

"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及任职情况如下：

	姓　　名	阶　　级	任　职　时　间
第一任	二宫健市	少　将	1931.9—1932.8
第二任	桥本虎之助	中　将	1932.8—1933.8
第三任	田代皖一郎	中　将	1933.8—1934.8
第四任	岩佐禄郎	中　将	1934.8—1935.9
第五任	东条英机	中　将	1935.9—1937.3

续表：

	姓　　名	阶　　级	任 职 时 间
第六任	藤江惠辅	中　将	1937. 3 —1938. 3
第七任	田中静一	中　将	1938. 3 —1938. 8
第八任	城仓义卫	中　将	1938. 8 —1940. 3
第九任	竹内宽	中　将	1940. 3 —1941. 3
第十任	原　守	中　将	1941. 3 —1942. 3
第十一任	加藤泊治郎	少　将	1942. 3 —1943. 1
第十二任	大野广一	少　将	1943. 1 —1943. 8
第十三任	三浦三郎	中　将	1943. 8 —1944.10
第十四任	大木　繁	中　将	1944.10—1945. 8

二　侵略中国东北的尖兵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首先以“关东州”为基地，以“满铁”为桥头堡，以关东军为后盾，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蚕食活动。关东宪兵队以“保护侨民，维护日本权益”为名，在附属地内外，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的阴谋活动。

大肆搜集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报

当时，盘踞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宪兵分队，根据其所在地的特殊性，都有不同的情报活动重点。

奉天分队，因地处东北政权所在地，以搜集军、政要人的行动、东北政权的方针、政策及对日施策方针为主。

大连分队，地处东北海上门户，以出入大连港的船舶为目标，搜集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国在东北的经济活动情报，并以苏联总领事馆为重点，搜集苏联的情报。

长春分队，由于设在“满铁”最北端，与苏联势力范围“北满”接壤，因此，监视苏联的动[redacted]是该分队情报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redacted]岭和宽城子两地的中国驻军，搜集其活[redacted]。

此外，当时的吉林地方政权——副司令长官公署，设在“日本权益区”外的吉林市，长春宪兵分队为刺探其情况，长期派一名叫藤井喜作的宪兵曹长，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潜伏到吉林市活动。藤井每周返回长春一次，向分队报告所搜集到的情报。藤井在吉林市活动了很长时间，直到“九·一八”事变。

宪兵的情报活动，以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为主，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政治情报，不仅有东北政权的内外方针、政策；东北重要人物的谈话，对日态度；甚至连重要人物之间的亲疏关系、矛盾等等，也均在搜集之列。

经济情报，因是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占领东北市场的活动，故这类情报不仅有东北的财政、金融情况，也有市场行情，各地物价指数，工业生产，农业年成，抵制日货等情况。

军事情报，因是为武装占领全东北而进行的准备活动，故这类情报尤为详细。日本宪兵不仅搜集了东北军在各地的配置情况，甚至连其编制、番号、人员、装备、官长姓名、出身、部队调换防、士气、军风军纪等，也都详尽地做了搜集。

1929年东北“易帜”前后，关东宪兵队也比较注意搜集东北民众的思想倾向、对日感情，反日团体、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情报。当时东北一些主要城市都发生了“收回国权，反对日本侵略”的民主示威活动，关东宪兵队认为这些运动后面，不是有反日团体在活动，就是受东北政

权操纵，因此各地宪兵四处活动，试图找出背景关系，对东北政权施加压力。

1930年，海城一家中日合资工厂的工人，为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发动了罢工，辽阳分队则认为这是一起有背景的反日活动，遂一面向关东军和日本政府报告，一面派去大批宪兵侦察，调查东北政权背后指使的“证据”。

关东宪兵队除重点搜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外，对东北的铁路、交通、航运、山川、湖泊、物产、气象、风土人情、地方县城都做过大量的调查，并搜集了中国方面出版的大量书刊、报纸，作为情报活动的基础资料。

关东宪兵队搜集情报的主要方式，是将懂汉语的宪兵派到中国人中间，利用交朋友，收买地方官吏等办法获取。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宪兵队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东北的耳目，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进行特务活动的据点。1930年前后，关东军参谋部为武装占领全东北作准备，曾多次派遣军官团考察“满铁”以外的几条重要东北铁路，和黑龙江、松花江航运情况及大小兴安岭的地形。对此，关东宪兵队曾派去专人协助军官团活动，向军官团提供了各铁路的运行时刻表，松花江汽船航运表及各地日侨的分布情况。每次军官团活动，均以长春宪兵分队为据点，由长春分队为其作进入“北满”前的准备工作。

参与干涉中国内政

1925年，在全国反帝反奉运动的影响下，奉系军阀集团

内部手握重兵的郭松龄，在11月23日宣布倒戈反奉，率奉军精锐7万余挥师北上，直奔张作霖的老巢奉天。这一事件成为了东北近代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

事件发生后，张作霖惊慌失措，立即派人去旅顺，以出卖东北部分主权为条件，请求关东军支援。由此，日本帝国主义立即插手干涉。日本政府声称：满蒙与日本有密切关系，“满蒙发生事件，日本不能袖手旁观”。接着，日本内阁也根据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州长官和“满铁”总裁的建议，通过了“扶张抑郭”的决议。同时命令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速对郭军施以警告”，将驻屯军做适当配置，全权处理“沈阳事件”。

12月8日关东军发出警告，声称“满洲之帝国的臣民有数十万，经营事业有极大的投资，铁道附属地之权利极关重要，如遇不幸或遭到危害，日本将采用武备”。并以禁止两军在“满铁”沿线30里以内作战为名，阻止郭军的行动。翌日，关东军又将第10师团司令部，从辽阳迁至奉天。13日，日本政府又作出征兵的决定，准备将驻朝鲜龙山的3500名日军调往奉天，帮助张作霖把守奉天城。

整个事件期间，关东宪兵队的活动也紧紧围绕着“扶张抑郭”的政策进行。

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宣布倒戈的消息刚一传出，当时的宪兵队长峰幸松立即将掌握的郭、张两军的情况，向东京日本宪兵司令部报告，请示对策。同时命令下属各分队，严密监视郭、张两军的动向。

11月26日，郭松龄反奉消息传到奉天后，引起了奉天城

内的骚动，关东宪兵队当即从附近分队抽出14名宪兵，与第一批31名补助宪兵一起增援奉天分队。奉天分队在分队长藤井熊太郎的指挥下，以保护侨民为由，协助张作霖对奉天城进行了警戒。

12月6日，奉军一部被郭军消灭的消息再度传入奉天，奉天城内又发生大乱，关东宪兵队又从各地调入百余名宪兵（内有60余名补助宪兵），不仅对附属地加强了警戒，在附属地外的一些重要场所，也布设了日本宪兵。张作霖的大帅府，这时也受到了日本宪兵的保护，奉天分队在大帅府东西两侧的满铁公所和满铁医院内，设置了临时分遣所，40余名宪兵分批昼夜围绕大帅府巡逻。同时，在通往大帅府的小北门和小西门之间，也派出了游动宪兵。到12月9日，各地增援到奉天的宪兵，已超过了150人。

郭松龄倒戈期间，张作霖的兵力多在作战前线，奉天附近兵力空虚，奉天宪兵分队长藤井熊太郎为从武力上援助张作霖，还将奉天周围的日本在乡军人，组成“义勇军”，发给武器，准备帮助张作霖固守奉天城。

12月8日，郭军进入新民，在即将渡过辽河捣毁张作霖老巢奉天的前夕，关东军第10师团开到奉天附近。这时关东宪兵队长峰幸松等人，也从旅顺赶来奉天，在城内设立了临时宪兵队本部，准备直接指挥宪兵，配合奉天周围的决战。

另一方面，郭军出关后的行动，一直受着各地日本宪兵的跟踪监视。12月13日郭军进逼营口时，辽阳分队营口分遣所的宪兵，以保护侨民为由，一直跟在郭军后面搜集情报，并把郭军的行动随时向关东宪兵队本部报告。事后得知，营

口宪兵分遣所的活动，对日本干涉郭松龄的反奉行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参与武装占领全东北的准备活动

参与皇姑屯事件 1927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两次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政。在东北加紧推行侵略政策，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对，东北的各大中城市都相继发生了反日民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受形势所迫，在对待日本的蚕食政策上，表现出了抵制、推托的态度，使日本对东北的一些要求迟迟难以实现。日本帝国主义将其称之为“满蒙悬案”。张作霖的态度首先为关东军少壮派军人所不满，认为张已成为实现日本愿望的障碍，故欲除掉，另选他人取而代之。因此，谋杀张作霖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东北的一个重要步骤。

1928年6月4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在返回关外途经皇姑屯时，被炸身亡。关东宪兵队亦参与了这一阴谋活动。

战前，有关关东宪兵队参与这一活动的情况无人知晓。战后，日本有关方面在征集战前宪兵的侵华活动回忆时，涉及到了这一事件，并逐渐披露了关东宪兵队参与这项活动的一些情况。

“皇姑屯事件”期间的关东宪兵队长是小山介藏少将。直接参与者有奉天宪兵分队长，日本陆军宪兵少佐三谷清等人。

1928年5月末，奉系军阀在国民党“二次北伐”和全国反奉运动的打击下，通电退回关外。在张作霖即将动身撤离北京之前，奉军有关部门曾向三谷清少佐提出，与日本守备队共同警备皇姑屯至奉天间铁路的要求，后又明确提出，在6月3日夜至翌日晨独自守备位于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点上的老道口铁桥。三谷清少佐最初伪称同意，实际上这时他已参与了河本大作等人的阴谋活动。河本大作向三谷清透露了关东军炸张意图，请求宪兵充分谅解。并提出派独立守备队东宫铁男等人去执行任务，请求三谷清予以协助。

三谷清的伪称同意，迷惑了奉军的有关部门，这样当6月3日晚，奉军警备部队开赴老道口铁桥去执行守备任务时，三谷清少佐以关东军司令官有命令为由，强硬地拒绝了奉军警备队接近铁桥。接着4日晨5点23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过桥时，发生了爆炸。

关于河本大作与三谷清的密谋，1953年4月11日，河本大作在太原的供词中有所交待，他说：这场谋杀准备能如此作得周道，“我事前取得了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的充分谅解”。

三谷清少佐不仅是“皇姑屯事件”的参与者，也是这一事件的少数策划者之一，河本等人为把谋杀的责任嫁祸到北伐军身上，事先在爆炸现场附近安排了3个中国人当替罪羊，将他们妆扮成肇事者。事发后这3个中国人两个被当场杀害，一个逃走。据有的材料证实，这3人身上携带的炸弹和一些伪装物品，均是由三谷清事先提供的。

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在奉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席上奉

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提议，“为解除各国疑虑，要对其真相进行调查”。关东军司令官等人，以“中国领土上发生的事件，日本单独调查，将惹起国际上的注意”为借口，阻止调查。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清，深怕真相败露，也强烈地反对调查，并拒绝为日本派来的调查团体提供方便。

关东宪兵队长小山介藏在事发后也从旅顺赶到了奉天，他在了解了事件的真相后，以“监军护法官”的身份对关东军的作法表示了异议。但鉴于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世界各地，从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出发，也不好过分追究。故对奉天宪兵分队参与这一事件的三谷清等人，以“没认真勘查现场，报告事件真相”为由，给以20天至30天的禁闭处分。

参与万宝山和中村事件 1931年初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有意制造的一起大规模反华事件。万宝山地处长春以北30公里的地方（现吉林省德惠县万宝乡），并非“满铁”附属地。

1931年初，当地汉奸郝永德将从地方政府租来的500垧地，转租给流落到东北的朝鲜人耕种。朝鲜人为耕种水田，在万宝山附近截流伊通河，筑堤引水，占用了沿渠中国农民的许多熟地。另由于引水挖渠，也给当地农民世代耕种的旱田带来了水灾的隐患，因此遭到了当地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

由于日本领事馆对朝鲜人采取了怂恿态度，致使同年3月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当时驻在长春的宪兵分队，在分队长齐藤美夫的指挥下，立即派兵赶到万宝山，用武力压制中国地方官民，协助朝鲜农民开渠引水。当时长春分队还派

出宪兵，到长春附近的日本侨民中煽动宣传，说："日本政府保护的朝鲜人，受到中国政府的不当压迫，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已经濒于危机，要团结起来保护住呀！"配合关东军大肆制造武装占领东北的舆论。

同年6月上旬，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等人，潜入兴安岭山脉进行军事地理侦察，尔后，又以考察农业为名，转道秘密潜入洮南一带的军事禁区，刺探东北军情报，被当地驻军兴安屯垦第3团抓获，并从携带的物品中缴获了间谍活动的证据。兴安屯垦军将中村等人秘密处死。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关系空前紧张，日本帝国主义正千方百计地寻找武装占领东北的借口。中国方面最初否认杀死中村等人的事实，后被"满铁"情报网探悉，于是中村事件成了日本军部、议会、政党、右翼团体煽动战争的最好托辞。关东军也做好了战争准备，提出要独自派兵去洮南调查，并派出2个大队在四平街待命，准备占领洮（南）索（伦）铁路，另派1个大队，准备占领洮南。

关东宪兵队也利用这一事件，在东北各地大造反华舆论，同时，根据关东军的要求，在全队进行了动员。并临时抽出20名宪兵编成"搜索队"，准备开赴洮南搜索。正当关东宪兵队在各地进行煽动宣传时，"九·一八"事变爆发。

无视中国主权，任意欺凌中国军民 1928年以后，由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中日间在东北的纠纷也不断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宪兵队在处理纠纷时，采取了"尽量袒护日本人，不惜扩大事端，压制东北地方政权"的对策。

关于日本宪兵在这个问题上的活动方针，当时的长春宪

兵分队长齐藤美夫，战后曾做过详细的供述。他说："当管辖区域发生中日纠纷时，宪兵要先放制人，采取断然措施处理。如属中国人理亏，要不顾事件扩大，抓住弱点，施加压力，迫使中方认错。"齐藤还交待：宪兵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处理纠纷的机会，乘机挑衅，扩大事态，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口实。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关东宪兵队在处理中日纠纷时，不论在附属地内，还是在附属地外，都无视中国地方政权的存在，任意欺凌东北军民。

例如：1929年9月，长春的日本农民在田间劳动时受到了枪击，长春宪兵分队长认定是附近中国农民所为，当即派兵闯进附属地以外的中国村庄搜查，根本不理中国地方政权，就将村中自卫团缴械，将20余名团员绑到长春分队，严刑拷问。中国地方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向宪兵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日本宪兵才被迫将拘禁的人员和武器通过日本领事馆，交还给中国当地政府。

同年10月，满铁长春站信号所遭到袭击，长春宪兵分队又认定与当地中国农民有关，于是10余名宪兵又闯进了附近的中国村庄，将10余名有"嫌疑"的中国农民绑架到宪兵分队，擅自施以酷刑，严加拷问，后因没有证据，不得已交给当地屯长领回。

当时，各地的日本宪兵，不仅对东北民众敢于任意欺凌，对军警也同样不放在眼里。1928年9月，驻铁岭的2名日军士兵与当地公安人员在街上发生口角，铁岭宪兵去调解时，故意偏袒日方，强硬地命令中方公安人员"打仗的不

要”，致使日本士兵更加肆无忌惮地大打出手，中方开枪将1名日本兵大腿打穿。纠纷达到这种程度本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事后日军出动了1个中队，架起机枪包围了中方公安队，将40余名公安队员缴械。关东宪兵队也自恃占理，将7名有关者押到铁岭宪兵分队，进行了刑讯，然后交给了日本领事馆处理。

1930年2月，驻长春宽城子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在演习时哨兵遭到枪击，日方认定是附近巡逻的2名中国铁路警察所为，故宪兵未经任何调查，就将这2名中国警察抓到长春宪兵分队，进行严刑拷问，逼其承认。后中方路警向宪兵提出了强烈抗议，宪兵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将其释放。

配合日军进行军事演习　“九·一八”事变前夕，各地的关东宪兵队分队，都积极联络，组织日本警察、在乡军人进行战时应变联合演习，准备协助关东军武装占领全东北。

1930年前后，长春宪兵分队组织当地日本警察和在乡军人演习的内容有：日本企业、侨民在事变时的避难措施；战时对日本人、中国人的紧急处置办法；非常情况下对中国人的镇压对策等等。

不仅如此，“九·一八”事变前夕，各地宪兵队还积极配合关东军在各地的军事演习。1929年以后，关东军在各地的演习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经常践踏中国农民种的庄稼，各地宪兵分队不断接到中国农民要求赔偿损失的控告，对此，关东宪兵队本部曾明确授意各分队：“没有预算，不能按正常手续办理。”据此，各分队对中国农民索赔

的要求，经常以“军队无演习场，踏踩农田实为不得已”等理由，采取抵制的态度。

相反，在演习期间，各地宪兵经常以警戒为名，对附近居民进行迫害。例如：1930年5月，日本陆军大学60名学生来到东北，准备参加关东军在公主岭和长春两地间的演习。这些学生中，有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生大尉，当时长春宪兵分队负责对其进行警卫。为了保护好天皇御弟，长春分队对公主岭和长春两地间的演习场所、旅馆、车站、市区加强了警戒，并在附属地内拘留了大批的“危险分子”。为发现可能用于行刺的手枪和炸弹，又在两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结果弄得百姓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从事对苏阴谋活动

关东宪兵队作为日本陆军的组成部分，从它成立起就一直担当着对苏的情报活动。“九·一八”事变前，这一活动主要是由长春和大连两个分队执行。

大连分队的活动是以苏联领事馆为目标，以旅居大连的白俄为主要对象，搜集苏联的情报。大连分队还一直利用满铁本社的大楼，窃听苏联领事馆的电话，监视苏联领事馆内的活动。

长春宪兵分队，由于地处满铁最北端，被认为是对苏情报活动的前沿分队，因此分队内一直由一名叫久见濑之助的宪兵军曹，负责操纵大批中国人密探，搜集苏联的情报。

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大批的俄国人流亡到

中国东北，他们多是十月革命的对象，对十月革命抱着敌视的态度。由于他们失去国籍，在东北把他们称之为“白俄”。当时日本政府对这些人有规定，只要交纳500日元，即可申请去日本。长春宪兵分队则负责审查申请去日本的白俄。

当时从东北去日本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从长春至大连，再从大连乘船去日本；一条是从长春经安东入朝鲜，再由朝鲜去日本。无论走哪条路，都须先经长春宪兵分队审查，然后用电报向大连分队或安东分队通报，最后将申请人的详细审查情况及长春宪兵分队的意见，用书面向旅顺宪兵队本部报告。当申请人去日本时，由宪兵队本部将对申请人的审查情况报告给日本宪兵司令部，以便日本国内掌握。

1918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遭到了16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日本帝国主义也参加了干涉行列，派出3个师团出兵西伯利亚。关东宪兵队也派出42名宪兵，随第7师团和关东兵站监侵入西伯利亚，以保护侨民，维持军风纪为名，对苏联从事谍报活动。

1919年4月，由于进入西伯利亚的日军日益增多，日本宪兵司令部为统一领导侵苏日本宪兵业务，将随各师团侵入苏联的日本宪兵统一编成了“浦潮派遣宪兵队”，在哈巴罗夫斯克、赤塔和哈尔滨设立了“沿黑龙江”、“后贝加尔”和“北满”3个宪兵队，并在贝加尔湖以东的主要城市和“北满”设置了11个宪兵分队，负责为侵苏日军搜集政治、军事情报；维持占领地治安；扶植白色政权；与白卫军联络及与各国占领军交涉等业务。关东宪兵队42名派遣宪兵在改编中被编入“北满宪兵队”。

1920年6月，联合干涉失败后，英美等国家的军队相继撤出苏联，日本受形势所迫，撤军也势在必行。同年11月，日本以防止撤军后，“革命波及朝鲜和满洲为借口，将浦潮派遣宪兵司令官隶下的“北满宪兵队”划归关东军司令官指挥，准备在日军撤出西伯利亚后，利用“北满”与苏联接壤的条件，继续对苏联进行情报活动，为将来武装侵略苏联作准备。后来“北满宪兵队”被编入到关东宪兵队中，对苏联进行情报活动的任务，自然也转成为了关东宪兵队的业务。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

（1931—1935）

一　侵略“南满”的宪兵派遣基地奉天宪兵队

奉天宪兵队的演变

辽宁宪兵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中国东北的第一个宪兵据点，也是后来奉天宪兵队的前身。它在关东军攻占“南满”过程中，起着宪兵派遣基地的作用。

9月18日夜，事变发生后，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清立即召集部下，进行了紧急动员。随后，他将分队宪兵分成三部分，配合关东军的进攻，采取了紧急措施。其中一部派到“满铁附属地”内，组织日本警察和在乡军人，对附属地进行了警戒；一部派到奉天城内各地，侦察中国方面的动向，封锁新闻报导，防范中国人民起义；一部派往作战部队，了解战斗进展情况，准备向旅顺宪兵队本部报告。

关东宪兵队长二宫健市在事变后不久，即收到了奉天宪兵分队的报告和要求增援的请求。二宫根据奉天分队报告的情况，也当即采取了措施，将满铁沿线铁岭以南的近百名宪兵和正在旅顺宪兵训练所受训的25名学兵派到奉天增援。随即，二宫健市将关东宪兵队本部从旅顺迁至奉天，直接指挥宪兵的活动。

20日，在各地增援的宪兵陆续抵达奉天后，二宫健市将

奉天的宪兵进行了整编。撤销了原奉天宪兵分队，编成辽宁和奉天附属地2个宪兵队，分别任命三谷清宪兵少佐和川岛铁太郎宪兵少佐为两队的队长。

附属地宪兵队编成后，办公地点设在原奉天宪兵分队内。初期主要是在附属地内活动。为防止中国人报复，在各町组织、训练自卫团，警戒附属地。同时，还在日本侨民中大量召募警察，施以训练，一方面用以协助宪兵，维护附属地治安，一方面准备随时派往占领地，协助关东军，维持占领地治安。到11月份，奉天附属地宪兵队在奉天周围组织了3千多人的自卫团，召募训练了近千名日本警察。附属地宪兵队在事变初期，实际上成了日本警察的临时训练所。

辽宁宪兵队编成后，则开往附属地外，重点配合关东军对奉天周围的占领活动。首先三谷清队长将辽宁宪兵队分成河本（大次郎）和松浦（克已）2个分队，带河本分队先占领了故宫前的东北无线电信所，赶走中国职员，辟为本部和分队的办公场所，随即将河本分队改称“城东分队”。同时，命松浦分队占领东北海军司令部旧址，设立据点，改称“城西分队”。不久，三谷清又派出一部分宪兵，占领了城外西关的边业银行，设立“城北分队”。不久辽宁宪兵队改称“奉天宪兵队”。

随着关东军对奉天周围地区的占领，二宫健市又决定在工业区、兵工厂、皇姑屯3地设置宪兵分遣队，分别划归城西，城东分队和附属地宪兵队管辖。

10月14日，随朝鲜、台湾、日本各地增援的宪兵陆续抵达东北，关东宪兵队本部又将奉天的宪兵组织进行了调整。

将奉天宪兵队改称“奉天城内宪兵分队”，将奉天附属地宪兵队改称“奉天城外宪兵分队”。其机构人员重新配置如下：

奉天城内宪兵分队：

分队长：宪兵少佐三谷清，下设城东、城北、兵工厂3个分队。人员45名。

奉天城外宪兵分队：

分队长：宪兵少佐川岛铁太郎。下设附属地、商埠地2个分队及皇姑屯等分遣队。人员47名。

10月中旬，随关东军向洮南集结，准备攻击黑龙江省，奉天城外宪兵分队又在洮南设置了临时宪兵分遣队。本来在夺取黑省的问题上，关东军最初准备操纵汉奸张海鹏来实现，但张海鹏投敌后曾一度态度暧昧，迟迟未出兵黑省。设置洮南临时宪兵分遣队的目的，一则是监视张海鹏的行动；二则是在关东军直接攻取齐齐哈尔时，担当随军配属宪兵的任务。

10月20日，奉天城外分队又派兵去新民，设立了新民临时宪兵分遣队。任务是沿新民至锦州段铁路，搜集、刺探情报，准备配合关东军攻占锦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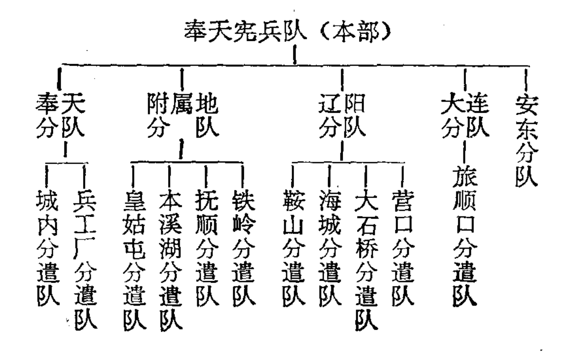
在“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奉天的2个宪兵分队，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南满”的宪兵基地，人员不断地得到补充，同时又不断地派往各地。1932年关东军占领了“南满”的所有大、中城市后，关东宪兵队又对“南满”各地的宪兵机构进行了调整。一部分脱离与奉天宪兵队的隶属关系独立。

4月13日，关东宪兵队本部将奉天城内、城外2个分队

合并，重新编成“奉天宪兵队”。下设城内、附属地、商埠地3个分队及兵工厂、皇姑屯、新民屯、洮南等6个分遣队。这时，由于三谷清少佐转走，川岛铁太郎少佐被派到“北满”，奉天宪兵队长由朝鲜平壤转来的增冈贤七担任。

1932年5月5日，关东宪兵队将铁岭、抚顺、本溪湖3个分遣队划入附属地宪兵分队隶下，将洮南等分遣队转出，奉天宪兵机构变为3个分队、5个分遣队。人员115名。

同年6月，根据日本陆军省军令，关东宪兵队改称“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脱离与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隶属关系，转归关东军作战序列。6月15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将东北的日本宪兵进行了整编。将满铁干线上的奉天段以南的宪兵分队和安东分队统编成“奉天宪兵队”；将奉天段以北的各宪兵队（分队），统编成“长春宪兵队”。另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新设了独立宪兵队和分队。至此，奉天宪兵队失掉了“南满宪兵基地”的地位，变成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的一个常设机构，兵员为150人，略相当于“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宪兵队的总人数。改编后奉天宪兵队的机构配置如下：



1932年10月5日，奉天宪兵队又进行了改编，将奉天分队改为“城内分队”，将旅顺口分遣队升为分队，辽阳分队降格为分遣队，撤销皇姑屯分遣队。其机构仍为1个本部，5个分队，10个分遣队。兵力150人。

1933年8月，奉天宪兵队又进行改编，根据辽中地区形势的变化，营口分遣队扩大成分队。同时，旅顺分队再降格为分遣队。撤铁岭、辽阳、海城、大石桥4个分遣队。随着东边道地区讨伐的深入，将讨伐中临时设置在山城镇和通化的2个派遣宪兵队改为宪兵分遣队。在这次改编中，奉天宪兵队本部在关东宪兵队中率先设置特高课组织，专门从事思想镇压活动。奉天宪兵队所辖机构仍为1个本部，5个分队，分遣队减少为8个。人员略有增加为166人。

同年11月，根据关东军军令，奉天宪兵队机构又略有变化，热河宪兵队管辖的大虎山分遣队被划入隶下，使奉天宪兵队的兵力增至为180人。

1934年3月27日，根据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奉天宪兵队又在铁岭、海城、大石桥3地开设宪兵最基层机构分驻所；接管了承德宪兵队划出的山海关、锦州两分队，升格了旅顺分遣队，至此奉天宪兵队机构，兵力膨胀到顶峰时期，下辖8个分队、8个分遣队、7个分驻所。总人数超过250人，控制着“南满”的绝大部分地区。

“九·一八”事变之际奉天宪兵队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宪兵队积极配合了关东军对辽

宁各地的占领活动，组织日本领事馆警察，在关东军占领区内，以维持治安为名，大肆搜查、逮捕东北军失散的官兵，盘查行人，对占领地实行统治。

在奉天市区，日本帝国主义为迅速控制事变后城内的局势，由辽宁宪兵队出面，在20日发布“安民告示”，称：“本省城迩来秩序甚乱，我等进城实为负维持治安之责任，对各界良民一视同仁，保障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对良民重操旧业及正当行为者，予以保护，对有意传播流言蜚语，破坏维持治安者，严惩不殆。”

同时为了防范中国人民起义反抗，宪兵开始在奉天城收缴武器，这一活动主要以东北军高级官员的住宅为目标，宪兵随意闯进搜查。奉天（辽宁）宪兵队仅在事变后的5天中，在城内就收缴了各种型号的长短枪近500支，及大量的军需品。

此外，奉天宪兵队还负责逮捕、看管未来得及逃走的东北军政要人。奉天省主席臧式毅，即是三谷清指挥宪兵逮捕的。以后他被软禁在大西关五纬路的一家住宅楼上，由宪兵昼夜轮流看守。其他一些被捕的东北军政要人，被捕后多被宪兵关押在商埠地内。

当时，宪兵对这些人的看管甚严，在其关押地周围布设了重重岗哨，对经过关押地的人，无论是谁宪兵都蛮横地进行盘问、搜查，唯恐有人劫持。对此，曾发生了一起外事纠纷。一天，美国驻奉天的领事乘车经过关押地，突然两个穿着便衣的日本宪兵窜出拦住了汽车，对汽车和美国领事进行了搜查。美国领事拿出名片说明身份。这两个宪兵数日警

戒，无所事事，觉得闷得慌好容易碰到个外国人，故决定要戏他一下，拿他开开心。于是日本宪兵开始从鸡蛋里挑骨头，先说“美国人用中国姓名其中有诈”，接着又说“名片与身分不符”他不是美国领事。这位美国领事让两名日本宪兵刁难、戏弄得大发雷霆，口口声声指责日本宪兵侵犯领事外交权。宪兵则以干扰军务将该领事拉出汽车，打了几个大嘴巴，骂了一顿“混蛋”“八嘎”后，将其赶走，美国领事哪曾吃得过这一套，立即跑到关东军司令部，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了强烈抗议。

此时，正值事变爆发不久，欧美等国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正在磋商制裁日本的办法。关东军也十分顾忌各国的反应，这件事得罪了外交官，关东军哪敢不管，于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立即指示司令部涉外的第三课进行调查，负责安抚。并命令在奉各部队搜查肇事者。不久，查明此事是负责软禁东北要人勤务的宪兵所为。于是关东军的幕僚们对宪兵的宿怨都想借机发泄，纷纷要求处罚宪兵。就此，关东军司令官给关东宪兵队长二宫健市以禁闭5天的处分。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的中心城市后，各地的抗日运动开始蓬勃兴起，辽东辽西一时成为了抗日义勇军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奉天宪兵队的活动，又转向了镇压反抗斗争方面。

同年4月，以唐聚五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在辽宁东部的桓仁县成立。短短的几个月后，迅速发展成了十几路人

马，数万人，在东边道①和三角地区②破坏铁路焚烧车站，切断敌人的通讯设施，袭击日伪军，一度给日伪统治以极大的打击，使伪满政权在这一带的统治一直难以确立。同时，自卫军的活动还直接威胁了沈阳、大连等日伪统治的中心城市。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消除这一心腹之患，不得不从1932年10月开始从黑龙江等地，调回大批军队，以第2师团为主力，在混成第14旅团及大量伪满军的配合下，在上述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讨伐。奉天宪兵队根据关东军的命令，派出半数以上的宪兵组成随军宪兵队，为讨伐队搜集情报，审讯俘虏，封锁交通，协助讨伐部队作战。后在讨伐的中心山城镇和通化两地，设置了临时宪兵派遣队，直接指挥宪兵活动。不久，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日伪军的联合讨伐下失败，日伪军讨伐队撤出了这一地区。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命令，山城镇、通化两临时宪兵队留在当地，对抗日义勇军余部继续进行镇压。1933年后，这两个临时宪兵派遣队，改为宪兵分遣队，划入奉天宪兵队隶下。

1932年，"九·一八"事变1周年纪念日之前，东北各地的抗日爱国组织都群情激愤准备在这一国耻日之际，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中在辽阳和沈阳之间活动的几支抗日武装，曾联络了数百人，从8月下旬开始向沈阳移动，准备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从三面攻占沈阳城，

① 清代建制。伪满主要指辽宁和吉林东部的宽甸、桓仁、通化、抚松、靖宇、辉南、柳河、长白等县，伪满有时也称"北部东边道"。

② 指辽东半岛普兰店以北、沈大铁路和沈丹铁路以东以南地区。

消灭奉天省伪政权，鼓舞“南满”人民的抗日士气，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但这一行动被奉天宪兵队通过密探得知，据此，奉天宪兵队专门制定了特别警备对策。奉天宪兵队长增冈贤七从各地调集了大批的宪兵，并联合了200余名日本警察，埋伏到了义勇军过往的途中，并派出大批密探，跟踪打探消息，结果这部抗日义勇军在进攻沈阳城和兵工厂时，中了奉天宪兵队布置的埋伏，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奉天宪兵队在加紧镇压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的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加紧了侦察镇压。1932年10月，商埠地宪兵分遣队在奉天小西关马泡沿胡同，将中国共产党奉天特委11名成员逮捕。翌年，抚顺宪兵分遣队，又侦察到了中共抚顺县委的活动，掌握了抚顺县委是中共奉天特委的下级组织，正在抚顺煤矿工人中活动，准备在煤矿工人中组织工会，发展会员，通过领导工人从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入手，最后发动武装暴动的情况。于是，1933年4月，奉天宪兵队将抚顺县委领导人刁和乡等人逮捕。

1933年下半年后，奉天宪兵队的活动方针

1933年下半年以后，随着热河失陷《塘沽协定》签字，关东军在各地的血腥镇压，义勇军的失败，东北境内大规模的武装抗日行动逐渐减少，大量的反日活动由公开转移到了地下。日伪在各地的基层政权也逐渐确立，伪满铁路已大部全线通车。在这种情况下，奉天宪兵队又将其活动重新作了

调整如下：

第一，加强对华北方面的监视。“塘沽协定”签字后，北宁铁路恢复通车，为了防范各种反日势力潜入伪满活动，切断关外东北军残部与张学良的联系，奉天宪兵队首先将工作重点放在对华北方面的侦察和警戒上，在管区内的各个都市、口岸都布设了警戒网。

1933年初，关东宪兵队派往华北的密探报告：张学良可能要利用东北与华北恢复通行，派密使潜回东北，指导残留在各地的东北军进行抗日活动。于是奉天宪兵队指挥管内的警察、密探在各交通要道、都市口岸布设了警戒网，日夜准备捉拿密使。2月中旬，华北密探又传回情报，说该密使准备从北平出发，经天津上船，从辽东半岛上的庄河或孤山登陆，然后潜入奉天。于是奉天宪兵队又组织各地警察对庄河、孤山一带的海岸和安东奉天铁路加强了警戒。为防止密使与东北军旧部接头，根据密探提供的情报，奉天宪兵队还对已经投敌编为伪军的于芷山部进行了监视。并将1名有过反满言论的团长，确定为与密使接头的重点嫌疑者，命令山城镇宪兵分队密切跟踪监视。在这次搜捕张学良密使的行动中，大连、本溪湖等地的日本警察署，也配合宪兵的活动，先后逮捕了17名怀疑与密使有联系的人，后把这些人都以“反满抗日思想犯”的罪名，解到奉天宪兵队秘密杀害。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很多逃离东北的东北军政要人，怀不同的目的返回东北。这些人也一直都是奉天宪兵队监视和看管的对象。例如，伪满司法部长张焕相等人，从返回东北一下火车就开始受到奉天宪兵队的审查，到他出任伪职之

前，一举一动都受着宪兵的监视。

第二，维护关东军推行的各项政策，排除各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障碍。

第三，搜索和逮捕各类反满抗日组织和武装团体的首脑人物，从根本上破坏抗日组织的实体。

第四，加强搜集情报工作，特别是军事情报和与苏联方面有关的情报。

围绕以上活动内容，奉天宪兵队本部为提高各地宪兵在新形势下的活动能力，专门创办了每周一期的“警务会报”，通过报导各地发生的情况和宪兵应采取的对策，具体指导各地宪兵的活动。“警务会报”曾在一段时间内，指导了各地宪兵对反满抗日人士的动向、系统、活动等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些调查，对1935年以后关东军指挥日伪军警大规模镇压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抗日运动，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　侵略“东满”的宪兵派遣基地长春宪兵队

长春宪兵队的建立

长春宪兵队，是新京宪兵队的前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东满”而设置的一个宪兵基地。它在事变过程中，起着向侵略东满的日军配属宪兵、布设宪兵点和增援东满宪兵中转站的作用。关东军占领东满后，随着哈尔滨、牡丹江等宪兵队建立，长春宪兵队逐渐转变成固定的宪兵机构。伪满州国成立后，改称为“新京宪兵队”。

长春宪兵队最初是由奉天以北的宪兵分队、分遣所合编组成。“九·一八”事变初期，设附属地、城内、公主岭、吉林4个分队和4个分遣队。以后又在敦化、通辽、洮南等地增设了4个分队和西安（辽源）1个分遣队。1934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迁到长春后，又在长春南岭设立了分遣队，在磐石设了分驻所。

1935年以前，（长春）新京宪兵队及属下各机构，随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变化，数经调整，变化较大。其主要部分，是长春（附属地）和吉林两个分队。

“九·一八”之际
长春宪兵分队的活动

长春宪兵分队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最活跃，它是长春宪兵队活动的主体，在配合关东军占领吉长两市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长春宪兵队本部编成后，它改为“附属地分队”归长春宪兵队指挥。

9月18日夜，关东军在沈阳动手后，23点40分长春分队接到奉天方面的通报，随即开始了行动。首先分队派人与关东军驻长部队，铁道守备队，附属地日本警察署，日本领事馆进行了联系，共同商量了应变对策。

在驻长日军开始行动后，长春分队也迅即开始了行动，除向进攻南岭和宽城两地中国兵营的日军各派2名宪兵担任向导外，还向附属地外派出5名宪兵；向长春铁路办事处，第3旅团司令部，日本警察署各派去1名宪兵。同时指定3名宪兵负责各地的联络，2名宪兵留守分队值班，与旅顺宪兵队本部保持联系，并在分队房顶设立了观察哨，观察各地的动静。

19日，多门第2师团集结到长春，准备进攻吉林市，长春分队又派出了3名宪兵配属到多门师团司令部，准备协助关东军占领吉林省城。

“九·一八”事变之际，长春宪兵分队活动概要如下：

第一，密切注视吉林事态的发展，不断将吉林的事变情况向旅顺宪兵队本部报告。

根据关东宪兵队“阵中日记”载，从19日凌晨1时到20日上午8时，32小时之内，长春宪兵分队11次向旅顺宪兵队本部报告吉林事变的发展情况。这些情况的内容多属军事方面。即：

“驻长春日军鉴于奉天事件，夜袭南岭步兵营”（19日凌晨1时电）。

“驻长旅团在大队长的指挥下，率2个中队正在袭击南岭的中国炮兵；其余部队凌晨4时可望进抵奉天支援”（19日凌晨2时电）。

“根据司令官的命令，由步兵第3旅团长春步兵联队和公主岭骑兵联队担当守备长春的任务，其它部队正在解除宽城子中国军队的武装，凌晨4时左右可能完成，尔后向奉天移动”（19日凌晨3时30分电）。

“长春驻屯部队自凌晨1时半以来，一直进行着攻击中国军队的行动”（19日凌晨3时50分电）。

“宽城子中国兵营上午10时半被攻克，南岭兵营正在攻击之中，独立步兵第1联队已于上午9时抵达南岭增援。骑兵第2联队解除公主岭附属地外中国公安队250人武装后，来长春增援”（19日上午11时20分电）。

“南岭兵营正由步兵第4联队和骑兵1中队攻击中，对长春城内之其它中国军队，要求他们自行解除武装，否则将予以进攻。日军死伤13人，敌死伤24人，被俘340人。日军士气旺盛”（19日中午12时20分电）。

“南岭兵营于下午4时10分攻克，现正在起火，日军损失轻微。我方要求解除城内兵营600人武装”（19日下午5

时电）。

“19日夜11时30分，城内中国军队全部被解除了武装。宪兵掌握了对中国警察的指挥权。目前情况平稳，一部军队正在附属地警戒，主力在联队集结”（20日夜0时0分电）。

其它方面的报告有：

“长春附属地平稳，吉林市日侨正在总领事馆集结避难。一部份家属已乘19日上午11时开往长春的火车离去。吉长两市目前用信鸽保持联系”（19日上午11时20分电）。

“19日上午8时50分，哈尔滨东部和南部的铁路列车在窑门被护路军扣留。吉长线铁路运行正常”（19日下午5时20分电）。

“长春城内支那（中国）军队已被全部解除武装，城内公安局虽未解除武装，但已在宪兵队长指挥下执行警察任务，为做保证，扣留1名警察为人质。宽城子中国警察仍持有武器，拟明日将其归宪兵分队长指挥”（19日下午8时电）。

“20日晨7时，在宽城子及城内设宪兵临时分驻所，已派去下士官以下5人。昨夜以来长春附近平稳”（20日上午8时电）。

第二，为军事行动做向导

袭击长春南岭兵营的日军，是关东军第2师团步兵第3旅团第4联队的一部分。该部是在事变前的4月中旬从日本仙台调入长春。由于来得时间短，还未来得及掌握长春附近的情况，对长春南岭驻军的情况了解得更少。加之夜间行动，地形不熟困难重重。长春宪兵分队为配合攻击南岭中国

驻军的行动，在凌晨派出2名熟悉南岭中国驻军情况的宪兵和1名马夫，分别带领2支部队隐蔽向南岭的炮兵19团和步兵670团接近。

袭击炮兵团的日军，在向导宪兵的带领下，在中国军队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冲入营内，当即破坏16门火炮。当时南岭炮兵团仅有火炮36门、追击炮6门，在还未来得及正式投入战斗前，就被这支刚踏上异国他乡不久的军队偷袭，损失了1/3的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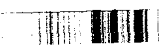
攻击宽城子中国兵营的日军，是步兵第4联队主力，也在宪兵的引导下隐蔽接近了中国兵营，但中国驻军已经发现了日军的行动，没有达到偷袭的目的。

第三，对占领地实行警备。

日军步兵第3旅团占领长春后，主力集结待命，准备随第2师团进攻吉林。长春作为日军的占领地被军管，由部分日军和独立守备队对车站，附属地等重要场所实行了戒严。长春宪兵分队根据第3旅团长的命令，负责搜集情报和在占领地维持治安。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张学良等东北政权的首脑人物对事变也没有明确态度，因此使东北各地呈现出了无政府状态。吉林各地也是一样。日军占领长春后，对长春的警察虽没象对军队那样立即解除武装，但警察自身已经呈现出了分离溃散的状态。使满铁附属地外的城内、宽城子等中心地区，社会秩序开始发生混乱。

面对这种情况，长春宪兵分队立即组织了日本领事馆警



察和在乡军人，编成“义勇团”，对占领地实行了武装警戒。并派出“义勇团”对火车站、发电厂、第一水源地、第二水源地进行了重点保护。

为了迅速恢复城内和宽城子两地的社会治安，长春宪兵分队还在城内和宽城子临时设置了宪兵分驻所，负责指挥日本警察和“义勇团”的活动。并准备收编中国警察用以维持社会秩序。

第四，控制长春市政，实行法西斯统治。

9月19日晚9时，坂野宪兵分队长带6名宪兵到长春市公安局，对公安局长修长余等人进行了训话，说：“此次突发不测事件，甚为遗撼，但应迅速恢复治安，安定人心。在这次事件中，奉天、公主岭及其它地方的巡警均被解除武装，但鉴于长春公安局长及其他方面的诚意，日军旅团长决定对军队以外的武装不予以解除。因此，局长及巡警应体察此意，严饬部下绝对保证不对日军及日侨采取任何反抗行动。”尔后安抚一番，命令中国公安人员以后听从日本宪兵的指挥，照常执行维持治安的任务。

同时，长春宪兵分队长严令长春公安局长修长余，“对在押的政治犯要严加控制，不准这些人乘事变混乱之机出去，扰乱社会治安”。宪兵同时还严令长春县刑务所，对收容未判刑的一切犯人，一律不许释放，也不许进行审判。由长春公安局负责对其长期羁押”，并要求修长余作出保证，不得出错。

电信、电报是当时重要的通讯工具，19日上午9时30分，长春宪兵分队2名宪兵带领30名日本兵，占领了商埠地

的电报局和电信局，强行关闭一切业务、切断了长春与省城吉林及各地的通讯联系。直至吉林伪政权成立后的9月30日，才根据多门二郎的命令，恢复了部分业务。但宪兵在解除电报、电信禁令的通告中规定：来往的电报、电话必须经由宪兵检查。吉长两地的长途电话只准许用日语，不得使用汉语。电报不得使用密码。

关东军占领长春最初，长春宪兵分队主要是忙于军事行动和控制社会治安，一时无暇顾及其它行业。长春局势得到控制后，宪兵立即把手伸向了各行各业，首先伸向了金融业。9月27日，长春宪兵分队长命令“东三省官银号”、“永衡官银号”、“边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长春支行”等银行的经理，“停止一切金融活动，封存现金、帐目、等候宪兵检查”。随即12名宪兵被派到各银行，监督银行职员清点现金，盘查、结算各项业务。2天后各家银行共点出现金400多万元。对此，多门二郎命令：“各银行将现金封存，切实保管，随时准备接受检查；官帖在稳定物价、开展银行业务方面可以保留，但需在日军准许的范围内使用；永衡官银号在开启四道街的金库时，必须由宪兵在场监视”。

9月29日，各银行在保证遵守多门的命令后，在宪兵的监视下，重新开始营业。

第五，占领长春城内兵工厂。

长春城内的省被服厂，是吉林唯一的一家军用被服厂，原归吉林省公署管辖。9月25日，长春宪兵分队3名宪兵携长春市公安局长一同去到该厂，关闭了车间，查封了仓库，

收缴了护兵的武器弹药，接管了该厂的全部资产。

长春宪兵分队在配合关东军占领吉林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长春宪兵队成立后，长春分队改为其属下分队，其活动龟缩回长春市周围。

配合关东军占领"东满"

"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北部境域辖至松花江以东的广大地区，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段由此通过。由于中东铁路关系，东北地方政权在哈尔滨专门设置了"东省特别行政区"，以铁路为界，道里划为东省特别行政区，道外划归吉林省。鉴于哈尔滨及吉林北部地区的特殊情况，日本帝国主义顾忌与苏联的关系，最初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因此，1931年9月21日关东军占领吉林省城后，即着手扶持熙洽组织吉林伪政权，准备通过操纵汉奸，达到占领吉林北部的目的。

但是驻扎在哈尔滨及吉林北部的广大东北军将士，不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东北军抗日将领李杜、冯占海、张作舟的率领下，陈兵于哈尔滨附近，不接受熙洽伪政权的指挥。这样在"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吉林省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为搜集哈尔滨附近的情报，长春宪兵队从本部和下属分队派出8名宪兵，秘密潜入哈尔滨周围，在哈尔滨特务机关成员宪兵大尉原松一的指挥下，四处活动搜集东北军行动、东北要人动向及苏联方面的情报。并把这些

情报通过哈尔滨特务机关，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

1932年1月，关东军占领锦州和辽西广大地区后，调回头来准备北犯“北满”和“东满”。下旬，关东军先唆使伪吉林剿匪军司令汉奸于琛澂做先锋，制造事端进攻哈尔滨。至此，哈尔滨保卫战爆发。

战斗中潜入到哈尔滨的宪兵不断将哈尔滨的情况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关东军司令部为取得国内直接出兵哈尔滨的赞许，将宪兵收集到的情报不断向国内报告，声称：“中国军队在哈尔滨近附的战斗，已经危害到了日本侨民的安全，必须派兵保护”，大肆制造紧张气氛。据此，1月28日，参谋本部发来电报，称：“为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命令第2师团出动攻击哈尔滨”。

另关东军进犯哈尔滨的前一天夜里，长春宽城子一带依赖于中东铁路附属设备的水电停止了供应，对此长春宪兵队认为，事件发生在进攻哈尔滨的前夜，定是苏联或中共所为，目的是阻止日军行动，而且，随关东军进入哈尔滨，类似破坏变电所、送电设备、供水设备、阻碍铁路运行等情况，还将继续发生。对此命长春分队倾举全力侦察，并将这一现象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作了报告。关东军司令部接到长春宪兵队的报告后，也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派兵对中东铁路及附属设备进行了警戒，并从满铁抽调了大批铁路技术人员、火车司机、线路维修工等，准备代替中东铁路职工，确保利用中东铁路向哈尔滨运兵的需要。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定都长春，改长春为“新京”。长春宪兵队亦随之改为“新京宪兵队”。从此，新京

宪兵队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管区成了伪满的中心，根据形势的变化，新京宪兵队又重新制定了行动大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对伪满中央所在地的控制。对此，该大纲规定：

“1　宪兵要确保对管内满洲国警察的指导权，指导督励警察机关及密探侦察兵匪、匪贼的活动，以期彻底扫灭，尽快确立治安。

2　要尽量排除旧东北政权的策动，警惕密使，便衣队唆使匪贼的活动及利用书信怀柔要人或收买要人充当密探等活动。对煽动民众反满抗日的活动，要努力殳除，防患于未燃。

3　努力警防反满抗日之宣传文书、不满檄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策动。对此，应指导满洲国警察检查信件。检查时由宪兵指挥，满洲国警察出面具体执行。

4　指导督励满洲国警察彻底进行户口调查，尽量发现没收枪支弹药及爆炸物品。

5　严密监视满洲国方面的官吏，并协力对此进行肃正工作。

6　协助对管内满洲国驻屯部队的改革，对反叛者施以严密的监视警戒。

7　尽力侦察镇压外国人扰乱满洲国的活动，剔除政治、经济方面的谋略活动。

8　注意满洲国经济之动态，尽量发现扰乱经济者，协助确立满洲国经济体制。

9　保护日本在满的利益，管理不良日本人。

10　逮捕管理不法鲜人。

11　支持改善教育，援助普及建国精神。

12　尽量处理没收排日、反满的记事、报纸、杂志及旧政权时代之排日教科书等。

13　防止间谍、密使、便衣队、匪贼及其它不法分子潜入。对此，应加强与日满警务机关联系，对各站上下车旅客、及旅馆、饭店等可疑地方，实行检问搜查。"

（二）镇压共产党及监视苏联的活动。大纲规定：

"1　建立严密的谍报网，由宪兵指导、督励满洲国方面警察，侦察、镇压共产党的策动。

2　侦察镇压苏联对日满两国的赤化策动。

3　尽力侦察苏联对铁路及附属地各种设施进行的破坏活动，镇压以扰乱满洲国治安为手段进行的反对日满两国的活动，尤其应注意赤化分子及北铁①员工的策动。"

（三）指挥警察，协助关东军对"新京"进行警备。大纲规定：

"1　建立周密的谍报网，搜集有关作战和警备上的各种情报，以期治安维持之完璧。

2　在军行动区域，有关治安警察业务，宪兵区处关东厅及外务省警务机关。

3　对重要建筑物、交通、通讯、电源、水源等重要

---

①　指中东铁路

设施负责警戒，但不能防碍军①的行动。

4 监督指导满洲国警察的活动，努力发现逮捕潜入到满洲国内的密使、间谍及便衣队。监视满洲国要人周围的人，警防刺探满洲国要人行动及策动要人从事反满抗日等阴谋活动。同时严加警防、镇压向满洲国运入武器弹药的活动。

5 厉行巡察工作，侦察管内居民的民心动向，对认为有价值的警备资料，须与军方联系通报。”

伪满初期，新京宪兵队根据以上行动大纲，将其活动渗透到了管内的各个领域。并将重点放在监视伪满官吏和侦破反满抗日团体两个方面。

新京宪兵队的管区是伪满的心脏地带，伪满军政首脑机构大部都设在新京。而在伪满政权中任职的官吏，历史上大都与东北政权有联系。伪满初期，由于张学良及东北抗日人士暗中活动，在伪满政权中任职的一些官吏，也确实有一部分人，脚踩两只船，与张学良保持着秘密联系。这些情况关东军和关东宪兵队都略有所闻，对此关东军认为：“这些要人们的态度，对创造期满洲国政权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命令新京宪兵队进行监视、调查。

新京宪兵队在其监视调查活动中，在吉、长两地的宪兵分队内，专门以特高宪兵为主编成了“特务班”，负责对伪满要人进行监视调查。“特务班”对伪满要人的侦察，主要是通过拆查他们的信件，在他们周围收买、安插坐探等方

---

① 指关东军

式，刺探他们对伪满的态度，侦察他们的行动，看是否还与张学良有联系。在对伪满要人的监视中，“特务班”宪兵还特别注意这些人是否与苏联有接触。

吉林宪兵分队“特务班”，在伪满初期对吉林伪政权包括熙洽在内的汉奸官吏监视的最具体，汉奸们的重要举动在关东军司令部内都有登记。

“特务班”一旦发现蛛丝马迹则要倾举全力侦察，毫不留情地镇压。例如：1932年8月，吉林宪兵分队得到情报，在吉林市周围有反满抗日组织在秘密活动。吉林宪兵分队经过侦察掌握：抗日组织是由张学良派来的密使所领导，正以“吉林五义慈善会”名义，秘密联络省城周围的大刀会及东北各地的慈善会、救国军，准备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采取行动。吉林宪兵分队还侦察到：“抗日组织还准备在满洲国军队、公安局、自卫团、各官公署内发展基层组织，然后在蛟河南部的山中成立‘武圣道德会’，训练别动队。从9月1日开始行动，先由别动队攻占蛟河，袭击吉敦铁路，扰乱治安，引诱日满军讨伐。9月15日，乘日满军兵力空虚之际，以主力袭击吉林省城，恢复失地，驱逐日本军。”

吉林宪兵分队将侦察到的这一情报，立即向关东军作了报告。关东军就此加强对各地及吉敦铁路的警备。不久，吉林宪兵分队逮捕了该组织的18名主要成员，使这一活动流产。

吉林宪兵分队在审查这一事件中发现，这次反满抗日行动是由原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提供资金，派人组织的，故

怀疑与吉林伪政权内部的某些“要人”有关，于是开展了秘密调查，企图搜出暗中参与这一活动的伪满要人。但一直没能找出确凿的证据，最后也只得不了了之。

伪满初期，新京宪兵队为确立日伪对吉林地区的统治，也将活动的重点放在侦察破坏反满抗日团体方面。

1932年前后，一部东北抗日义勇军根据张学良的命令，以“救国军”的名义，在东北各地发行抗日货币和有价证券，筹集抗日经费。伪满吉林省和新京市，也都发现了抗日货币。对此，新京宪兵队派出大批人员深入到各地，进行秘密侦察，结果从吉林、新京等地搜出了30多万元这类货币，并逮捕了很多参与这一活动的人员。同年8月，将这些人中的20余名主要成员，以“扰乱满洲国财政”为由，移交给伪满方面审判。

“九·一八”事变初期，新京宪兵队对各类宗教团体也大加镇压迫害，对“吉林基督教青年会”即是一例。

“吉林基督教青年会”是由美国人主办的一个宗教团体，会址设在省城吉林市。“九·一八”事变前，该团体就受到了长春宪兵分队派往吉林的特务宪兵的监视，被视为“排日运动团体”。“九·一八”事变后，吉林宪兵分队成立伊始，即将其作为外国人策动反日活动的据点，进行了严密监视。伪满成立后，新京宪兵队决定对其进行取缔，但由于该会系宗教团体，又涉及到国际关系，故宪兵一时不好将其查封。于是采取了压迫、迫害的办法，先唆使伪满警察，以“该会有反满抗日活动嫌疑”为名，将该会的主要外籍成员逮捕后驱逐出伪满境，尔后威胁中国籍会员交待反日反满活动，迫

使大量中国会员脱离该会。该会后在日本宪兵的管制下，接受悬挂伪满国旗，允许日本人入会等条件后，才勉强未被取缔。

三　关东宪兵队编入关东军作战序列

关东宪兵队扩编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热河，也把战火烧到了华北的平津。随着战局的扩大，日本不断地从国内和朝鲜等地抽调军队补充关东军。日本宪兵司令部也不断抽调宪兵，补充关东宪兵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短短9个月，关东宪兵队人员从事变前的197人，增至到500多人，组织机构也不断膨胀。其增援情况如下：

第一次增援，1931年10月8日，从朝鲜宪兵队抽调以宪兵少佐植原春三为首的23名宪兵和2名宪兵补（朝鲜人）进入东北。这批宪兵后多被编入吉林宪兵分队。植原春三担任了第一任吉林宪兵分队长。

第二次增援，1931年10月9日，以宪兵大尉美座时成为首的35名宪兵进入东北。

第三次增援，1931年11月，以宪兵大尉梅村园次郎为首的9名宪兵，随日军第8师团铃木混成旅团进入东北。这部宪兵随铃木混成旅团参加了进攻齐齐哈尔的行动后，多被编入齐齐哈尔宪兵队，梅村园次郎出任第一任齐齐哈尔宪兵队

长。

第四次增援，1931年11月16日，以宪兵中佐长尾吉五郎为首的25名宪兵进入东北。

第五次增援，1931年12月，以宪兵大尉武藤喜市为首的9名配属宪兵，随日军第10师团松本混成旅团进入东北通辽。这部宪兵后多被编入哈尔滨宪兵队。

上述增援宪兵陆续进入东北后，除部分配属到第8、第10师团外，大部被配属到满铁沿线及哈尔滨、吉林、锦州等占领地。

1932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发布临参24号命令，颁布了“满洲派遣部队编制改正要领”。据此，关东宪兵队被划入关东军作战序列。6月15日，关东宪兵队完成改编，人员增为507人，设关东宪兵队司令部1个，宪兵队本部4个及分队、分遣队近40个。

奉天宪兵队本部，下设5个分队，10个分遣队。

新京宪兵队本部，下设3个分队，7个分遣队。

哈尔滨宪兵队本部，下设4个分队，4个分遣队。

齐齐哈尔宪兵队本部，下设3个分队，3个分遣队。

“九·一八”事变后新京、奉天两个宪兵队的活动前面已经述及。哈尔滨宪兵队于1932年5月编成，其人员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川岛铁太郎为首的16名宪兵，这部宪兵“九·一八”事变后开始被编入奉天商埠地宪兵队，1932年2月，被配属到关东军第2师团，随第2师团进入哈尔滨市；另一部分是混成第8旅团的8名配属宪兵，他们在宪兵大尉武藤喜市的带领下，2月24日随第8旅团进入哈尔滨。

关东军占领哈尔滨后，混成第8旅团解散，武藤等8名配属宪兵先转归为第2师团。不久第2师团调访，第10师团接防，以上两部宪兵同时转属第10师团。1932年5月，关东宪兵队划入关东军作战序列前，由这两部宪兵联合编成哈尔滨宪兵队，川岛铁太郎被任命为代理哈尔滨宪兵队长。

1932年5月30日，奉天独立守备队步兵第2大队长岛本中佐，由步兵科转入宪兵科后，被任命为第一任哈尔滨宪兵队长。川岛铁太郎转任齐齐哈尔宪兵队长。

哈尔滨宪兵队成立之初，在哈尔滨市区设第一、第二两个分队，由川岛铁太郎（兼）和武藤喜一郎分别任两个分队的队长。第一分队设在哈尔滨新市街，第二分队设在傅家甸。第一分队在埠头区还设置了分遣队。

同年6月16日，关东宪兵队转归关东军作战序列后，哈尔滨宪兵队进行了第一次改编，重设新市街、傅家甸、海林、依兰4个分队和呼兰、海伦、一面坡、埠头区4个分遣队。

10月5日，关东军推进到中东铁路以北地区后，哈尔滨宪兵队又改编成新市街、旧市街、傅家甸、宁安4个分队和埠头区、海伦、佳木斯、一面坡4个分遣队。

1933年9月4日，哈尔滨宪兵队又改编为新市街、傅家甸、穆稜、佳木斯4个分队和埠头区、一面坡、海伦3个分遣队。

翌年9月4日，关东军控制了“东满”广大地区及中东铁路沿线后，哈尔滨宪兵队又进行了一次大改编，在中苏北部国境和东部国境，增设了一些新的分队、分遣队。这次改

编哈尔滨宪兵队隶下机构改为新市街、傅家甸、掖河、绥芬河、佳木斯5个分队，埠头区、一面坡、横道河子、穆棱、密山、东宁、依兰、富锦8个分遣队及黑河、虎林、北安等数个宪兵分驻所。至此，哈尔滨宪兵队人员，从建队初期的二三十人，增至到200余人，控制了滨绥铁路以北，北（安）绥（稜）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

哈尔滨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建立较早的一个宪兵机构，也是规模较大的一个，后来“东满”的一些宪兵机构，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哈尔滨宪兵队分衍组成。

齐齐哈尔宪兵队，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较早的一个宪兵机构，组建于1932年5月。1931年11月，以梅村园次郎为长的派遣宪兵，随关东军第8师团铃木混成旅团进入齐齐哈尔，后以这部宪兵为主，组建了齐齐哈尔宪兵队，派遣宪兵长梅村园次郎出任第一任齐齐哈尔宪兵队长。

齐齐哈尔宪兵队组建初期，设齐齐哈尔、克山两个分队，以后又相继设立海拉尔、三河、满洲里、牙克石、白城等分队、分遣队。

1935年前后，关东宪兵队又先后在牡丹江、延吉、锦州、海拉尔、承德、佳木斯、东宁等地设置了独立宪兵队本部。其中“东满”的牡丹江、东宁、佳木斯等队，多是从哈尔滨、新京宪兵队抽人编成。“西满”的海拉尔等队，多是从齐齐哈尔宪兵队抽人编成。“南满”的承德、锦州等队，多是从奉天宪兵队抽人编成。其各队情况如下：

延吉宪兵队，是由1932年关东宪兵队派往延边地区的

"间岛派遣宪兵队"扩编而成。最初设龙井、图们、百草沟（汪清）、明月沟等分遣队。1938年朝鲜军将珲春地区交给关东军管辖后，延吉宪兵队又增设珲春分队。管辖区域为"间岛地区"的珲春、延吉、图们、汪清4县及东边道北部的安图等地区。

承德宪兵队，成立于1933年2月。1932年初，日军攻占辽西重镇锦州后，3月1日以第8师团派遣宪兵为主编成了锦州临时宪兵队。翌年2月关东军占领热河后，以第6师团配属宪兵林清大尉等17名宪兵为主，编成了热河宪兵队。锦州临时宪兵队改为热河宪兵队锦州分队。不久热河宪兵队改称为"承德宪兵队"。

承德宪兵队成立之初，设承德、锦州、古北口、赤峰、凌源、山海关等分队及平泉、林西、朝阳、阜新、北票、大虎山等分遣队。承德宪兵队首任队长为日本陆军宪兵少佐谷本邦夫。1936年8月，锦州宪兵分队升格为本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派去副官稻田弘义担任队长，管辖锦州、山海关、阜新、锦西4个分队及葫芦岛等数个分遣队。

关东宪兵队在1935年前后在各地设置的宪兵队还有：

海拉尔宪兵队，下辖海拉尔、满洲里2个分队和三河、牙克石、扎赉诺尔等分遣队。

北安宪兵队，下辖北安、黑河（孙吴）等分队及逊克、瑷珲等分遣队。

东安宪兵队，下辖东安、鸡宁、宝清、勃利等数个分队及虎头、饶河、林口等分遣队。

牡丹江宪兵队，下辖牡丹江、一面坡、穆稜、绥芬河等

分队及掖河、杏树、宁安等分遣队。

东宁宪兵队，下辖东宁、大肚子川、老黑山等分队、分遣队。

佳木斯宪兵队，下辖佳木斯、汤原、富锦等分队及鹤岗、依兰、同江等分遣队。

1935年以后，由于东北抗日运动的不断发展，关东宪兵队的编制、配备也不断随之发生变化，到1936年前后，总人数增加到1400人左右。

关东宪兵队由“敕令宪兵”转为“军令宪兵”

1932年6月8日，日本陆军省颁布“关东军勤务令”，将关东宪兵队划归关东军作战序列。至此，关东宪兵队脱离日本国内宪兵司令部的领导，转入关东军系统。“关东军勤务令”中规定：“关东宪兵队司令官，隶属于关东军司令官，在关东军行动区域内，执掌保安及军事警察业务。在关东州及南满铁道附属地内，有关行政警察、司法警察事宜，根据宪兵令执行”。

关东军与关东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两个工具，1932年6月以前，虽都同属于日本陆军指挥，但分属于两个不同系统，关东宪兵队的各项业务归日本宪兵司令部直接领导。

关东军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急先锋，在侵略东北的活动中，经常表现出日本陆军“下克上”、独断专行、超职越权的传统。关东宪兵队则以“监军护法”的身份，作为关东军

的军事警察，监督着它的活动。因此，由于业务性质上的关系，两者历来抱有宿怨。关东军一些少壮派军官把关东宪兵队视为紧箍咒，称宪兵为“紧箍军队的先生”。关东军和关东宪兵队的宿怨，在“皇姑屯事件”后又进一步加深。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曾一度在日本议会引起喧然大波，部分对陆军独断专横不满的议员，借题发挥，质问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在关东军警备区内发生炸车事件，关东军为什么没人负责？”日本内阁中也有人借机攻击陆军，提出追查事情真相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白川义则命令日本宪兵司令官峰幸松来东北进行调查。但峰幸松的调查活动，同样也遭到了关东军的强烈抵制。由于关东军不合作，使日本宪兵司令官的调查毫无进展，无耐峰幸松只好去关东宪兵队去了解情况，关东宪兵队将全部内情合盘托出，向宪兵司令报告了“皇姑屯事件”的真实情况，对此关东军少壮派军人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使两者的关系达到了空前紧张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关东宪兵队首脑机关亦判断出是关东军制造的事件。因此，20日关东宪兵队长二宫健市即从旅顺赶赴奉天，听取了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清的报告后，当即带船本喜代治和大谷敦两副官去柳条沟爆炸现场勘察。二宫在勘察现场时说：“这明显是人为制造的活动，如果真要爆炸铁路，将不是眼前这种情景。眼前这种情景，想必是缺乏战场经验的人创作”。

二宫宪兵队长对关东军当时的态度，并不是以公正、严明的军事警察官身份监视关东军的行动。而是顾忌仅1万余人的关东军，如出于一时盲动在异国他乡挑起争端，“会给

帝国的军队带来危害”。因此，为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关东宪兵队决定追究关东军的责任。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事态发展很快，日本各界都站到了关东军一边，受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利益决定，关东宪兵队也采取了和关东军合作的态度。但两者的宿怨并未就此了结。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陆军兵务课长安藤利吉奉命来奉天，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安藤之行同样受到了关东军的敌视，不得已也只好去访问关东宪兵队长二宫健市，好歹知道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同年10月，日本军事参议院参议官白川义则大将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今村均大佐来到奉天，二宫健市又去奉天大和旅馆，向白川大将详细地报告了事件的真相。同时，二宫健市还在受到关东军压力的情况下，将事态发展的动向及关东军的活动向东京日本宪兵司令部作了报告。二宫的活动不久被关东军得知，关东军一些少壮派军人对二宫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情绪，把二宫当成特务看待。二宫健市也认为，关东军中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少壮派军人妄自尊大，“把关东军司令官当成牌位”，对他们独断专行、下克上的行为表示愤怒。

另外，“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宪兵队与关东军在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上，也屡次发生分岐，使两者的积怨不断加深。例如：关东军占领奉天后，在搜查张学良官邸时，发现了秘密金库，由于打不开，关东军少壮派军人决定用工兵爆破。关东宪兵队得知这一情况后，从政治需要的角度考虑，反对关东军爆破，提出：“张学良是东北的主权者，留在其官邸的财物，关东军应负责予以保护”。但关东军根本不理

关东宪兵队的意见，终于炸开了金库，掠夺了其中的财物。

这件事在关东军与关东宪兵队之间又发生了冲突，关东宪兵队随即派出船本宪兵大尉赴现场调查，并把工兵中队长传讯到宪兵队，进行审查。关东军司令部得知这一情况后，攻击关东宪兵队超职越权，强硬地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爆破金库乃属军事行动，宪兵无权干涉"。这件事宪兵和关东军一直打到日本陆军省，后经法务部长大山文雄从中调解，才逐渐平息。但关东军司令部就此表示出强烈意见，提出"关东宪兵队不协助关东军行动，其存在有害无益"。

如上所述，关东军与关东宪兵队在侵略东北过程中，虽因具体方式或步骤上有分岐，宿有矛盾，但随着"九·一八"事变后形势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也趋于缓和，侵略中国的共同利益促使他们日趋走向合作。

事变发生后，在奉天的东北政权重要人物大部分携眷逃走，关东宪兵队扣押的重要人物，仅有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等极少数人。对臧式毅，二宫健市十分赏识，认为："在重大的事变关头，东北政权的要人绝大部分携眷潜逃，唯独臧式毅作为省长，能为省民的安全决意留下，其人品值得敬佩"。二宫健市从建立占领地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认为启用臧式毅这样的人，在占领地推行日本政策，可以笼络民心。于是他去关东军司令部，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面陈了起用臧式毅的见解。由于三宅光治不具体负责此事，召来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二宫把举荐臧式毅的意见向板垣陈述后，板垣最初表情大为不快，很不客气地向二宫说："请宪兵不要干预军司令部的人事事宜"。面对关东军少壮

派军人目空一切的气焰，二宫健市宪兵队长怒目而视，拍案而起，板垣则丝毫不让，手握军刀逼上前来，二人大有马上动武的架式。这时惊动了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经三宅的调解，二人才逐渐平息了怒气，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起用臧式毅，并握手言和。这件事曾在关东军参谋中广为流传。同时，也成了关东军与关东宪兵队开始合作的一个契机。

1932年6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全东北，对殖民地统治的任务日趋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陆军省颁布了"关东军勤务令"，又进一步调整了关东军和关东宪兵队的关系，其中规定："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指挥下，在关东军行动区域内，执掌保安及军事警察业务"。同时仍执行"宪兵令"中的"在关东州及南满洲铁路附属地执行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业务"。

这样关东宪兵队变更了隶属关系，成为了关东军指挥下的一个机构，转为军事行动区域的配属宪兵。同时，关东宪兵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主要执行"监军护法"任务，转入重点配合占领军行动任务。这在日本宪兵制度上，称由"敕令宪兵"向"军令宪兵"转变。

关东宪兵队隶属关系变更后，其人事安排权仍归日本陆军省和宪兵司令官掌管。但因工作性质的变化，与关东军之间的宿怨就此了结。关东宪兵队开始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

令，按照“战地宪兵作战要务令”进行活动①。

1932年9月，“日满协定书”签定后，关东军根据“协定书”中“共同防卫”的条款，将东北视为关东军军事行动区。关东宪兵队则以关东军的行动为依据，把一切政治镇压活动都解释为“执行作战要务”，并随着伪满形势的变化，不断强化其权力，使其最终发展成了一支庞大的法西斯政治镇压机构。

关东宪兵队统一指挥东北日本警察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关东军在日本国内的地位也日趋显赫。1932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谋求统一日本在东北的多头政治，在派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时，还任命他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造成了以关东军为中心，统一日本在满政治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也与

---

① “战地宪兵作战要务令”中规定宪兵任务是：
1 保护军机；
2 逮捕搜查间谍；
8 防范敌军的宣传谋略；
4 收集治安上必要的情报；
5 检查及取缔有害通信和有害言论；
6 压抑有敌意的住民；
7 取缔非法及犯罪活动；
8 监视军营小商店及送货商人等从属者；
9 监视旅馆、邮局、停车场等．

部附三浦三郎等人策划，拟以宪兵为主，对日本在东北的警察机构进行统一指挥。不久，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以"满洲应以治安为第一"为由，提出了统一指挥东北日本警察的方案。同年10月，关东军司令部根据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提议，在奉天召开了第一次全满警务会议，会上制定了"在满警务机关业务统制要领"，规定："关东局警察机关及外务省警察机关，有关治安方面的警察业务，要受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指挥"。同时决定，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临时兼任日本驻满大使馆和关东厅警察部长。

1932年12月23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根据关东军制定的"要领"，制定了"在满警务机关业务统制规程"，在"要领"的基础上，详细地说明了宪兵对日本警察统制的具体办法。其中关于统制要领有以下三项：

"（一）有关在满的治安警察业务，各宪兵队长区处管内的领事馆警察部长、关东厅警察署长；宪兵分队长区处领事馆及关东厅的警察署长、分署长。

（二）宪兵分遣队长以下之宪兵，有关治安业务，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可与当地警察机关协议，临机采取处置措施。

（三）间岛、珲春地区，有关治安警察业务，由朝鲜军派遣宪兵长区处当地警察部长、署长、分署长。"

关于区处统制的重要事项有以下四项：

"（一）在满铁附属地内，有关一般的治安警察业务，由关东厅警察担当。宪兵担当与关东军有关的特殊事项。

（二）在满铁附属地以外的满洲国领域内，其治安警察

业务，由领事馆警察和宪兵共同担当。但领事馆警察在执行其原本业务以外的治安警察业务时，须在宪兵队长、分队长的区处下进行。

（三）在未配备领事馆警察的地方，由宪兵代行领事馆警察业务。

（四）为保障各警务机关的协调，在发生临时事件时，由宪兵队长、分队长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关系”。

这一“统制规程”，进一步强化了关东宪兵在东北的警察权，和在警务方面的指导地位。为后来组织警务联络委员会和警务统制委员会，制定了依据。但是，当时东北的领事馆警察和关东厅警察，势力也都很大，它们分别隶属于日本的外务省和拓务省，总人数在5000人上下。对关东宪兵队的统制，表示强烈反对，并派代表赴东京陈情，东北各地的日本警察也发起抵制活动，大连的满铁总部和关东厅也对关东军及关东宪兵队的统制展开了抨击。对此，关东宪兵队视其为是反军运动，进行了立案侦察，并逮捕了数名日本警察，送交法院审判。这样才将不满暂时平息，但宪兵与日本警察之间的冲突、相互指责仍持续了很长时间。

1934年底，关东局和日本驻满大使馆同时制定了“特别职员任用令”。以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岩佐禄郎根据“特别职员任用令”，同时兼任关东局和日本驻满大使馆两个警察部长，至此，关东宪兵队才实际上统一了日本在东北的警察机构。

血腥的“东条宪兵”

（1935—1939）

一 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宪兵队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制造傀儡政权，推行掠夺式的殖民政策，逐步控制了东北的政治、经济命脉，将中国东北变成了殖民地。

但是，东北各族人民，不满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不屈服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更不甘当亡国奴。于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燃起了抗日烽火。

"九·一八"事变后，最早作为东北抗日主导力量的是以东北军旧部为首的抗日义勇军，他们与各地蜂拥而起的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反日义勇军（统称抗日义勇军）等抗日团体一起，第一次把东北的抗日运动推向了高潮。据关东军参谋部统计，1932年下半年，东北各地的反日武装，达到了21万余人。

面对这种形势，关东军采取两面作战的手法，一面由各防卫军网罗、拼凑伪军，组织对东边道、吉林、三角地区、辽西、辽北、延边等地的抗日义勇军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一面以主力攻占热河，斩断华北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

1932年3月，关东军以4个师团的主力，纠集张海鹏、于芷山、程国瑞等10万伪军，从三路攻陷了热河。接着，关东军为实现"以战迫和"达到伪满国境以长城划界的目的，

又大举向长城各口发动进攻。5月下旬越过长城，占领了秦皇岛、抚宁、北戴河、密云、丰润、唐山等华北22个县，直逼平津。5月31日，迫使南京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塘沽协定”。①关东军初步达到切断华北与东北联系的目的后，调过头来，开始用主力对东北境内的抗日义勇军，展开了残酷的镇压。

这样，到1934年8月为止，东北境内的抗日武装，在日伪军警的联合讨伐下，从20余万人锐减到了3万人，影响较大、人数较多的几支抗日义勇军都被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境内初步达到了维持统治秩序的目的。这期间，东北的县城大部被日伪“接收”，一些主要的道路，也开始了正常通车。

但是，日伪方面不久又发现，东北境内的抗日武装虽然减少到了3万人，但质量确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不但没因讨伐减少，而且正在发展壮大。随着东北军旧部被消灭、投敌，国民党在东北民众中的影响正在下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逐渐在东北的抗日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发来了指示信，指出：“东北地方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

---

① “塘沽协定”规定了中国军队撤至延庆（北京西北）、通州（北京东）、芦台（天津东北）线以西、以南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日军退回长城外，划冀东22县为“非军事区”等条款。至此，南京政府实际上默认了伪满洲国国境以长城为界的事实。

并提出：为实现这一任务，要“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虽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组织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做斗争”。指示信中还特别强调了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中共满洲省委在5月接到中央的来信后，立即在哈尔滨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后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为题，作出了拥护中央的决议。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信和满洲省委的决议精神传达到了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中央1月26日指示信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运动，又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以杨靖宇为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在磐石县成立。翌年1月，在伊通县成立了江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3月，以王德泰为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在延吉成立，同年，在“五卅运动”纪念日之际，第二军第二独立师也宣告成立。11月，在辉南、濛江（靖宇）县成立了第一军第二独立师。1935年“一·二八”上海事变纪念日之际，以赵尚志、冯仲云为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2月，以李延禄为军长，以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和密山赤色游击队为骨干，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以后，以周保中为首的第五军，以夏云阶为首的第六军也相继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继义勇军失败后又在东北大地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

这期间，国际政局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35年7月25

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通过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反帝斗争与反法西斯斗争结合起来，吸收抗日民族力量，扩大民族解放斗争阵线”。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同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对于共产国际反法西斯决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苏联对中国进行的巧妙工作，目的是要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都拉向抗日一边，消耗国民政府的势力，使中共的势力得以积蓄，最后在中国全土实现“赤化”。对此，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

关东军将在东北的镇压重点，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人及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上。

1935年8月，关东军制定了“昭和10年秋季治安肃正计划”，以奉天、安东、吉林、间岛、滨江5省区为重点，第一次将讨伐的重点对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提出用3个月的时间，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压缩到指定区域，彻底消灭。

关东军在讨伐中针对共产党的活动提出：“要搞清楚匪情的思想根源，抑制讨伐后其施展的机会，要根绝民众与匪贼的联系”。同时还提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抱有政治倾向的反满抗日团体，“不但要进行彻底的讨伐，而且要消灭其根据地，将其全部消灭。对一时消灭不了的，要想尽各种手段，杀戮其领导人，或使用相互离间等办法使其溃散。”

1935年“秋季治安肃正”结束后，关东军没能达到3个月消灭共产党的目的，接着又进行了“冬季治安肃正”。“冬季治安肃正”从1935年11月开始，翌年3月结束。讨伐的重点除秋季讨伐的奉天、安东、吉林、滨江、间岛5省区外，又增加了伪三江省。

在冬季讨伐活动中，关东军针对大量的抗日人员，采取分散潜入城市，躲避讨伐的情况，要求宪兵配合讨伐要特别加强对潜入城市的抗日分子进行逮捕。关东宪兵队在总结秋季工作的经验中也发现，“虽然配合讨伐逮捕了大量的反满抗日分子，但重要人物并没逮到”。因此提出：日满警务机关在配合1935年冬季的治安活动中，要将重点放在新京，哈

尔滨、奉天、吉林等大城市，要不失时机地搜查逮捕潜入城市的抗日人员，使其来年春天不能东山再起。

同时，关东军也明确地向日伪警务机关提出要求，要他们"在大城市中，专心破坏逮捕共产党系统的中枢机关，研究各党团的组织系统以及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作出以哈尔滨、新京、吉林、奉天、大连5大城市为中心的相互协作的工作计划，反省秋冬两季工作方法，改善逮捕手段，为1936年春季即将开始的更大规模镇压做好准备。"

1935年秋冬两季关东军指挥日伪各机关对东北抗日武装的军事讨伐和政治镇压，给东北的抗日运动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也被迫退出了部分游击根据地，人员也相应地减少了很多。城市中，由于地下组织蒙受了巨大损失，其活动也不得不被迫转入地下。

关东军及日伪警务机关鉴于中国共产党活动方式的变化，根据其经验也调整了行动方针，放弃了"速战速决"消灭共产党的奢望，采取了长久之策，准备用3年的时间，彻底肃清东北的共产党及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将后来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调任为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由他主持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政治镇压活动。

东条上任后不久，1935年秋季"治安肃正"结束，在关东军即将制定新的讨伐计划时，他向关东军司令官提出了在政治镇压方面的施政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一）要在日满警务机关中，设置"思想对策"（与军事讨伐相对而言的政治镇压）的专门机构，专门从事"思想对

策”工作。加强对共产党的特殊工作。东条英机在施政纲领中讲道：“由于思想对策活动过去主要由特高课负责，而逮捕由司法课执行，因此发生了很多疏漏和矛盾。有鉴于此，设立思想对策专门机构，应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指挥，对思想对策业务，要赋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监督满洲国警务机关的权力。”

（二）要把滨江、三江、吉林、间岛、安东、奉天6省及哈尔滨、新京、吉林、奉天、大连5大城市和中苏共产党、反满抗日民族运动的策源地作为思想对策活动的重点，将配置到各地的临时宪兵机构固定下来，改为常设机构。在讨伐时如需向军队配属宪兵，则由设在讨伐地的宪兵机构担当。由此使讨伐及思想对策重点地区都有足够的兵力，充分发挥宪兵的作用。

（三）“思想对策”的目标，第一是共产党，第二是反满抗日的政治和民族团体，第三是其它类的抗日团体。宪兵和警察应按以上顺序分配力量。

（四）配合军队讨伐而执行的“思想对策”，仍按过去的方式进行。

（五）关于日满各机关从事“思想对策”工作所需的经费，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统一管理，重点使用。

（六）加强对反满抗日根据地的监视。东条英机认为：“扰乱满洲国的根据地是苏联和南京政府”，因此，他指出：“日满机关应对此采取积极防范措施，加强对华北、华南等地的情报活动，侦察各方面的动向，以此辅助满洲国的治安恢复工作。”

根据东条英机的意见，1936年初，关东军在制定1936年至1939年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时，着重考虑了宪兵的作用问题，决定改警务联络委员会为警务统制委员会，进一步强化宪兵的权力，由宪兵统一指挥日满警宪，担当政治镇压工作。

关东军制定的“昭和11年4月至昭和14年3月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是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残酷镇压东北抗日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东宪兵队根据这个大纲，在1936年4月10日发布了“昭和11年4月至昭和14年3月警宪实施之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明确提出了要在1936年4月后的3年内，领导日满警宪参加“治安肃正”和“思想对策”工作。这个“大纲”的内容概要如下：

（一）行动纲领

在“治安肃正”活动中，宪警要“运用警察力量，肃清匪化地区，断绝匪团的生存之路，使其衰弱、溃灭，最后不使一个抗日分子存在”。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要纲”要求“各地日满警务机关，要根据不同情况，对不同性质的抗日团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系统、政治背景、战略战术、活动地点、兵力情况等等，进行彻底的调查，努力发现其中弱点，加以利用。”

在“思想对策”活动中，“要纲”提出：“要警防、镇压满洲国境内的各种有害团体，对共产党团、反满抗日团体的活动，以及来自国外的思想扰乱行为，不仅要坚决地镇压，而且要铲除其根源。”

此外，“要纲”中具体说明了组成“思想对策”工作的专门机构警务统制委员会的事宜，规定了警务统治委员会的

任务、权限及组织办法。

（二）警宪配合讨伐的具体活动安排。

警宪的活动安排与关东军的活动安排一致，第一年度从1936年4月开始，1937年3月结束。

关东军在第一年度中的主要活动地区为：

“1．国境地区，尤其是能进行特别封锁的地区；

2．国防及工业上的重要地区；

3．铁路沿线（包括预定线）、县城和主要城市附近两日行程内的地区；

4．抗日运动比较开展的地区及可以压缩的游击区；

5．省县城附近的地区；

6．除前五项外，第一年度关东军将讨伐的重点置于滨江、吉林、间岛、三江（主要是抗联活动的饶河、汤原等县）等省。”

关东宪兵队统制日伪警宪的具体安排是：

在“治标工作”①中，配合各防卫区的讨伐部队、守备队行动，及时与之取得联系，掌握各管区内的治安情况；处理投降者；在夏季以后的适当时机，协助军队一同进行讨伐工作。

在“思想对策”活动中，肃清在满的思想团体，特别是共产党及反满抗日团体；切断苏联和华北方面与共产党和反满抗日团体的联系。

第二年度计划从1937年4月开始，1938年3月结束。

---

① 主要指讨伐。

关东军的主要任务是：

“1．强化上年度的肃正地区；

2．根据上年度的肃正情况，除特殊地区外，仍继续进行肃正工作。同时指导满洲国各机关，作好在全满进行肃正工作的准备。”

关东宪兵队及各警宪机关的安排是：

“治标工作”，继续贯彻上年度的计划，协助关东军讨伐；在适当时期，指导日满（伪）警宪独立进行讨伐。

“思想对策”活动与上一年度计划相同。

第三年度计划从1938年4月开始，1939年3月结束。

关东军准备在这一年中对所谓的特殊地区进行彻底的讨伐，最终在全伪满确立治安基础。关东宪兵队与日伪警宪的活动，则围绕着确立治安秩序进行。

（三）关东宪兵队统制日伪警务机关的具体任务：

1．各宪兵队长在“治安工作”上，必须统辖管内的日满警宪机关，担当扑灭抗日运动，进行思想镇压，和协助军队讨伐的三重任务。

2．统辖日满警宪的方式，是要使各机关在原有的系统内充分发挥其作用，只是在必要的时候，统一指挥。

3．在“治安肃正”工作中，警宪的活动要与军队的讨伐同时进行，这样通过“治标”等工作，一面协助讨伐，同时利用讨伐机会，开展“思想对策”业务。

4．直接配属到讨伐部队的警宪，可以采取两种形式活动，一是与讨伐部队共同行动，一是在讨伐有关的地区内活动。



5．警宪从事“思想对策”业务的主要目标，是共产党和政治的民族的反满抗日团体，及防范苏联和中国的扰乱活动，因此，必须发挥警务统制委员会的作用，争取收到更大的效果。

6．满洲国的警察机关，必须在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除参加讨伐和从事思想镇压活动外，还要利用遍布在东北各地的警察网，搜集抗日活动的情报，为日满军警的讨伐活动提供根据。对此，要充实县城和市镇的警察网，对各种情况进行侦察，逮捕潜伏的抗日分子及“通匪者”和思想可疑者。

7．在国境地区，要加强警察工作，通过强化警察机构来封锁国境线，特别是在伪满的东部国境，要建立特务警察网。

（四）“要纲”具体规定了警宪配合“治安肃正”的有关工作。

1．在治安肃正地区，除警察网外，还须强化保甲、自卫团、铁路爱护村等组织，“加强官民合作的警备联络，使之弄清抗日分子的活动，配合军警讨伐。”

2．为配合“治安肃正”地区的逮捕工作，要对户口进行调查，使抗日分子无法潜入。同时，“要通过加强官民的联系，达到分离抗日组织与民众关系的目的。”

3．讨伐期间，从事侦察任务的各警宪组织，要将其侦察活动与军队的行动紧密配合，尽量搞清抗日武装的组织机构及活动真相，为讨伐服务。

4．为破坏抗日武装的后勤补给线，警宪机关的活动要

与讨伐部队相配合，侦察粮食、武器的补给、运输途径。对粮食来源要具体侦察清楚“是袭击时掠夺；变相赠送；居民代购；匪人自行购买；强迫居民交纳；掠夺采伐工人；还是自己耕种收获所得”。对于武器弹药的来源，要搞清楚“是袭击满军、警察队、自卫团时掠夺；叛乱或逃亡者交送；满军、自卫团中通匪者供给；地方有力者中的通匪者供给；密买民间的或掠夺的；从枪炮业中密买的；国外供应的；还是自己制造的”等情况。

5．在讨伐中，为收到更大的效果，根据以往的经验，要加强对过路行人的盘查。因此，在城镇、车站、码头、火车、船舶、汽车等重要场所，要设置固定的检查站，并根据地区和时间的不同，灵活行动，争取收到更大的效果。

（五）“要纲”中还特别提出了镇压共产党的具体办法，即把镇压活动分成“准备侦察”和“一齐逮捕”两个阶段。所谓“准备侦察”阶段又包括“侦察”和“培养”（即长期跟踪监视）两种方式。“一齐逮捕”又分“地方、地区一齐逮捕”和“综合一齐逮捕”。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颁发的这个“要纲”，是1936年4月以后指导日伪警宪活动的纲领性文件。但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设想。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也随关东军计划每年又制定出年度计划。一般年度计划都分成三期，第一期大致从当年的4月初开始，8月底结束；第二期从9月初开始，年底结束；第三期从年底开始，翌年3月末结束。每期中又具体地分成前后两期。警宪活动的重点一般都在前期，即由宪兵、警察先围绕着指定的讨伐区域，开展“控

制群众”、“进行匪民分离”、“修筑警备道路”，侦察抗日武装等活动。后期则由日伪军警展开大规模的武装讨伐。

1936年4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讨伐，主要集中在两大地区。一是伪满的三江、滨江两省及松花江以北部分地区。在这一地区以方正、依兰、勃利、桦川、富锦、宝清6县最为残酷。因这一地区除抗联第一路军外，其他各军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所谓的“北边振兴计划”和“开拓事业”，从1937年开始，调集了关东军第4师团及数以万计的伪满军警，进行了所谓的“三江大讨伐；另一地区是在所谓的“东南部地区”。“东南部”是伪满的一个区域概念，即包括今辽吉两省东部的丹东、新宾、通化，凤城、宽甸、抚松、临江、集安、长白、安图、桓仁、抚顺、本溪、海龙、辉南、柳河、金县、复县、岫岩、庄河、靖宇、桦甸、和龙、安图、汪清、延吉等县，这一地区主要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活动的区域。日伪曾在这一地区组织了无数次讨伐，规模比较大的有1936年在东边道北部的伪军独立大讨伐和1939年开始的野副三省联合大讨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逐渐将讨伐的重点移至到了所谓的“两南国境”热河一带。

1935年以后，当关东军把镇压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开展大规模血腥屠杀之际，日本帝国主义除调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外，还从日本、朝鲜、台湾等地调来了一批有政治镇压经验和殖民地统治经验的宪兵干部，充实到了关东宪兵队内。这些人陆续抵达东北后，担当了关东宪兵队内的各级重要职务，与东条英机一同组织策划了1935年以后的

血腥屠杀活动。这批人中的主要人物有：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宪兵大佐狄根丈之助，他来东北前是日本名古屋宪兵队长，来东北后作为东条英机的左膀右臂，与东条英机一同主持了关东宪兵队的镇压活动。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高级部员，第二课课长兼治安课课长，后来的关东宪兵队警务部长，宪兵中佐齐藤美夫（也称斋藤美夫）。该人1929年以前担任过长春宪兵分队长，对东北的情况特别熟悉。二次来东北前曾在日本澁谷，麹町和朝鲜的咸兴任宪兵分队长。1935年前后再次来到东北，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内专门负责政治镇压工作。该人是“东条宪兵”中的一个关键人物，1935年以后的很多屠杀措施，都是出自于他手。齐藤美夫后被调任华南派遣宪兵司令，将在东北的政治镇压经验移植到了华南。日本投降前，他又担任了伪满宪兵训练处处长，承担了训练伪满宪兵的任务。

延吉宪兵队长，宪兵大佐加藤泊治郎。他是第一任延吉宪兵队队长。1936年日伪政权在东边道利用伪军进行大讨伐期间，将他调任奉天宪兵队队长。该人对镇压、破坏殖民地的民族运动，素有一套“谋略”。他曾在延边地区利用朝鲜族汉奸组织过“民生团”和“间岛协助会”等组织，通过制造民族矛盾，给延边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和抗联武装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加藤泊治郎后来还担任过关东宪兵队司令、日本宪兵司令和华北宪兵司令，把在东北的政治镇压经验，也推广到了华北，同时又进行了发挥，“华北特别警备队”就是该人的设计。①

从日本、台湾、朝鲜等地陆续充实到关东宪兵队，在1935年以后政治镇压中起到作用的宪兵干部还有：关东宪兵队警务部长、宪兵大佐梶荣次郎、总务部长四方谅二、总务部第一课长田中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高级部员白滨宏、思想对策课课长宇津木孟雄、锦州宪兵队长堀口正雄、奉天宪兵队长镰田浩、新京宪兵队长橘武夫、齐齐哈尔宪兵队长星实敏、以及矶高麻吕、膳英雄、玉岗严等人。这些人构成了“东条宪兵”的主体。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这些人后来大部被派到中国关内各地和南亚战场充当宪兵头目。在这个意义上讲，“东条宪兵”不仅残酷地屠杀了东北人民，在亚洲各地也都犯下了罪行。

东条英机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后，即着手对关东宪兵队进行了改编，除前述不断调入大批宪兵干部外，也开始扩编。东条担任关东宪兵司令之前，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内没有部、课的建制，东条到任后，为提高司令部的工作效率，将司令部的机构改为二部四课制，即总务部、警务部、庶务经理课、第一课、第二课和第三课。

总务部长一般由少将或大佐担任，其地位相当于副司令，在司令部内被认为是司令官的最高辅佐官。总务部长的人选，比较注重资历，不一定要求是宪兵出身。历届的总务部长，多系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这种选拔条件，主要是从把握宪兵活动大局，执行政策等方面的需要考虑。总务部直接

① “特别警备队”即特务机关，宪兵和兵站警备队联合编成的武装谋略部队。日本帝国主义先在华北编成。日本投降前夕，又引入了东北。详见本书第五部分。

领导庶务经理课和第一课。

关东宪兵队历任总务部长有：

姓　名	阶　级	任　职　时　间
矢野机	少　将	1935.9 —1935.11
藤江惠辅	少　将	1935.12—1937.3
二宫普一	少　将	1937.4 —1937.12
城仓义卫	少　将	1937.12—1938.6
菊地武雄	少　将	1938.7 —1940.8
长友次男	少　将	1940.8 —

警务部长一般由宪兵大佐担任。是宪兵业务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对人选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按惯例警务部长的人选一般都由关东宪兵队内能力最强的大佐中挑选。警务部长堪称是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业务上的最高辅佐官，根据司令官的命令、意图领导司令部的业务。参与制定关东宪兵队的活动方针、政策等。因此，警务部长都是关东宪兵队在东北推行法西斯统治，指挥血腥镇压的关键人物。警务部直接领导第二课和第三课业务。

关东宪兵队历任警务部长有：

姓　名	阶　级	任　职　时　间
狄根丈之助	宪兵大佐	1935.8—1936.3
梶荣次郎	宪兵大佐	1936.4—1939.2
齐藤美夫	宪兵大佐	1939.3—1940.7
长友次男	少　将	1940.8以后

根据日本陆军省的建制，关东军司令部内有部、课机构，部长、课长的职责在军制上都有明文规定，对外代表着关东军，有明确的权限和责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内的部、课不属日本陆军省的正式建制，它是根据1935年后东北的特殊情况，根据东条英机个人的意愿设置。因此仅在部内业务上负有责任，对外没有权力。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部、课长，在对外行使权限时，都必须以司令官的名义进行。

经东条英机改组后的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制及业务分担情况如下：

总务部长：藤江惠辅

庶务经理课，课长宪兵少佐稻田弘义，编制18人，担当业务有：

1．人事、赏罚；
2．有关司令官秘书事宜；
3．人马卫生；
4．收发文件；
5．保管机密，秘密图书；
6．队下武器事宜及部内武器保管；
7．管理机密费；
8．保管印鉴；
9．会计、经理、供给；
10．管理雇佣人员；
11．管理出差、旅行、休假；
12．管理值宿等。

第一课，课长宪兵少佐四方凉二，编制4人，担当业务

有：

1．宪兵队的配置与编制；

2．人马补充；

3．动员；

4．教育；

5．对有关宪兵制度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警务部长：狄根丈之助

第二课，课长宪兵中佐齐藤美夫，编制14人，担当业务有：

1．有关警务方面的庶务事宜；

2．思想对策（主要负责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事宜；

3．军事警察（日本军队内的军事警察和司法警察业务）。

第三课，课长宪兵少佐宇津木孟雄，编制5人，担当业务有：

1．思想对策（主要负责镇压反满抗日地下组织）；

2．管理宗教、出版物，日本移民及朝鲜人等事宜；

3．有关防谍、外事警察等方面业务。

第三课掌管的防谍和外事警察业务，由1名宪兵大尉具体负责，直接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

改编后关东宪兵队各部门的关系是：

司令部各课如要将其业务向各地宪兵队传达时，将其业务以司令官或警务部长命令的形式，下达给各地宪兵队长。

各地宪兵队长对属下领导，有关庶务方面的事宜，通过队本部副官领导；有关警务方面的业务，通过特高课长

（1943年以后改为战务课）领导。各地宪兵队本部设课附和系等军官，如所担当的业务须下达到各分队时，以特高课长或副官的名义，命令各分队长执行。

各分队长对分遣队、分驻所的领导，除直接指挥外，有时也命令担当各项具体业务的分队附，对分遣队长、分驻所长具体指导。

经东条英机着手改革后的关东宪兵队，这架法西斯机器，更加有效地运转了起来，它在1935年后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对殖民地进行统治等方面，都犯下了滔天罪行，同时，它的活动也给东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恐怖。

二　政治镇压的基本手段“思想对策”

所谓“思想对策”，是相对武装讨伐而言的政治、思想镇压活动。这一活动从1935年开始，一直进行到伪满末日，曾给东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伪满期间，由于各时期宪兵活动的重点不同，“思想对策”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异。

具体说来，1939年以前的“思想对策”，重点是对着抱有政治倾向的反满抗日组织、团体，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这期间“思想对策”的内容，多是赤裸裸的逮捕、镇压、屠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思想对策”的内容，更多地表现在控制民心动向，监视社会舆论、侦察、破坏反满抗日活动的萌芽上。“思想对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宪兵、警察对异民族进行统治的一种独特方式，它起着军事镇压所起不到的作用。

一般思想对策

1935年秋，关东军在制定讨伐计划时，第一次向日伪警务机关提出了“思想对策”的要求。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指：“企图扰乱满洲国治安的非法分子”和“企图妨碍满洲国王道政治的分子”。对“非法分子”和“妨碍王道政治分子”，

当时曾解释为“潜入国内（东北）的南京政府的反满抗日地下工作者和原东北军阀系统的煽动分子，以及国内或来自国外苏联、中国共产党的赤化工作人员等”。

根据这一解释，关东宪兵队当时把“思想对策”的目标确定为如下种类：

“（一）反满抗日分子、团体。

1．南京政府、东北军阀系统的煽动分子、党团（蓝衣社、励志社、除奸团、力行团等）；

2．向苏联、中国提供日满政治，军事情报者（军事分会派遣人员等）；

3．利用宗教和其它团体名义从事反满抗日的工作者；

4．政治匪等。

（二）思想方面的团体

1．受中国或苏联共产党的指令，企图在思想上扰乱满洲国治安者；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在满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工作班；

2．共匪（红军）；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前身)；反日联合军等。

（三）其它

1．土匪（职业匪）；

2．通匪者，受匪贼唆使，为匪贼提供资金、武器、弹药、粮食者；

探听、搜集日满军讨伐情报者。”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关东军和关东宪兵队初期所提出的“思想对策”，其对象相当庞杂，除中国共产党、

反满抗日团体外，连土匪，各式各样的武装也都包括在内。甚至连防范苏联的策动、谍报活动等，也作为“思想对策”活动的对象。这期间所进行的“思想对策”，在日伪的一些文件中，均称“一般思想对策”。

特别（特殊）思想对策

1935年秋季讨伐后，关东宪兵队发现，“思想对策”工作因对象过于庞杂，虽然配合讨伐活动逮捕了大量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党团分子”，但很多主要的人物没捕到，“没有触动应该逮捕的主体”。另对很多逮捕对象的性质，面貌也搞不清楚。没能达到“思想对策”所要镇压“思想匪”和“政治匪”的目的。对此，关东宪兵队的首脑人物提出：“必须对过去的思想对策工作进行一番认真地研究和改进”。并提出了要求，即：“第一，在逮捕前，首先要判明案件的系统研究总结过去同类案例的逮捕经验，合理地进行分析判断。第二，要采用灵活的搜查逮捕手段，尤其是在来不及进行布置的情况下。第三，随着逮捕人数的大量增加，要认真研究、改善审讯的手段和方法。第四，要对案件进行综合判断，恰当地进行处理。”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也提出：1935年以后的思想对策工作，重点要“消灭反满抗日分子、党团及思想上的党团。”这样，“思想对策”的对象开始日趋集中，土匪等被从中剔除。

在1935年的秋季讨伐中，关东宪兵队首脑机关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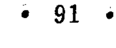
“思想对策”的主要对象“政治匪”，尤其是中共领导的抗日团体中的大量重要成员，都在讨伐中以分散活动的巧妙办法，跳出了讨伐圈，潜入到了城市，并在城市中有重新汇合开展活动的趋势。对这种情况，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分管“思想对策”业务的第三课认为：“抗日武装团体的成员秘密潜入城市后，不论从组织形态，还是从活动内容来看，都已改变了过去的方式，变成了思想方面的秘密党团”。因此，要消灭这类秘密党团，也必须改变“思想对策”工作的方针，“采取高于这些秘密党团活动的手段，这样才能达到彻底消灭他们的目的”。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针对1935年秋季讨伐后“思想对策”工作出现的新情况，也调整了其活动方针，提出：“要对这些转化成秘密党团的思想匪和政治匪，进行周密的侦察，掌握其组织的分布情况及背后的联系”。并告诫日伪各警务机关：“对其进行周密的侦察，是使思想对策工作深刻彻底化的一种手段”。

为完成这一侦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专门制定了“特别工作计划”即“特别（特殊）思想对策”工作。并将这种“特别(特殊)思想对策”工作与“一般思想对策”工作分开，从1935年冬季开始在全伪满推行。

我们从1935年11月25日吉林地区警务联络委员会制定的“特别思想对策工作计划”中，可以大致看出日伪推行的“特别思想对策”活动的概貌。吉林地区的计划如下：

“第一，方针。为实现思想对策之目的，吉林地区各警务机关，为扩大成绩必须实施特殊的措施。



第二，一般要领。在吉各警务机关，要各自发挥其特殊作用，在进一步扩大其谍报网的同时，逐渐完备其防谍方面的措施。为顺利地实施该计划，吉林宪兵分队长要根据本计划，对各机关施以必要的统制，以期收到更大的效果。

第三，重点。鉴于管内之特殊情况，为清除思想上、政治上匪势猖獗的根源，要将其重点指向内侦、密查。要将其警察重点放置于可能是反满抗日地下工作分子领取资金或成为联络机关的南方系银行、大商店等，以及经常出入这些商店的人身上。同时也要密切注视可能成为此等分子潜伏地的外国（含中国）系宗教及类似团体。尔后，以其余力搜查逮捕因讨伐而潜伏在管内都市及各村庄的匪首，及协助匪贼活动的通匪者和隐匿的武器。以此彻底确立治安之基础。

第四，视察。各机关的高等警察勤务人员，除对上述对象进行工作外，对特殊旅馆、剧场等进行视察时，要事先作好周密的准备，待看准特殊对象时进行。同时，对视察圈外的不逞分子及外国谍报网，也应努力搜索破获。

第五，密探网。在吉各警务机关，按其所属系统在预定分工的范围内，向其重点对象派遣秘密工作员深入其内部。为保险，此等密探之间要相互保密，以此构成二重以上之侦缉网。同时各机关要排除竞争等弊端，为大局要虚心、坦怀。

第六，通信检查。对认为是与重点对象有关的通信物，要实施周密的系统的检查。

1．电报。电电会社吉林支店在检查电报之际，除依据吉林特务机关的指导外，对吉林城内及新开门外电报局受理

的外国人及南方系人之收发电报，要将其全部译文（包括收发人住址、姓名）进行记录，在完成一般监视的同时，要努力发现暗号、隐语之电报。

2．普通信件。吉林市内各邮局及京图、奉吉线上列车办理之普通信件，应按前项标准，由各担当机关进行检查。

3．挂号信件。对挂号信件也要根据以上标准实施检查。但在情况不允许的条件下，要将发信人的住所、姓名记录在案，以后发现可疑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

4．秘密电台。各机关要相互协力搜查民间秘密电台，但发现后不可立即处置，要请求委员长的指示。

第七，盘问检查之配合施策。为使列车上及交通要地的盘问检查更为有效，要使用新投降的有势力的匪贼，操纵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住民宣抚，教化住民因循姑息之惰性，使其善化明朗。养成协助官宪之风气，以此发现视察圈外之匪徒等不逞分子及谍报网，除去扰乱治安之诸因素。

第八，其它。基于本计划，各警务机关应制定其具体详细计划，并按此实施。”

根据吉林地区警务联络委员会制定的这一“特别思想对策”计划，永吉县警务局、吉林警察厅、吉林省警务厅、新京宪兵队吉林分队、吉林领事馆警察署、吉林铁路局警务处、吉林铁路局警务段、黄旗屯警务段等警务机关，在吉林市周围的旅馆、当铺、古玩店、大烟馆、寺庙、车站、交通要地、及火车上布置了大量的密探和游动警察，搜捕因讨伐而潜入到吉林市隐蔽的抗日人员。

此外，吉林地区警务联络委员会还指挥各警务机关，在

吉林市内的外国公司、神罗学院、天主教堂、文光中学、英国医院、基督教青年会、交通银行、功成玉银行、中国银行、红万字会、万国道德会、在家里、回教寺、吉林戏院及伪满官吏身旁安插了密探，秘密对其进行监视，试图从中找出“思想的，政治的匪势猖獗的根源，找出苏联、中国对满洲国进行策动的事实。”

日伪警务机关所进行的“一般思想对策”和“特别（特殊）思想对策”，到1936年4月，自称收到了相当的成果，半年中“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抗日人士。在这种情况下，日伪警宪的部分下级机关认为：“治安状况已经好转，在满抗日武装团体和思想匪团，不仅绝大部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且，就连最有影响的共产党，其活动也被迫处于了静止状态。”

持久思想对策

1935年关东军指挥日伪各机关，在秋冬两季对东北抗日运动的武装讨伐和政治镇压，确实给东北的抗日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抗日武装的数量也减少了很多。中共满洲省委、奉天特委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东北的抗日运动也确实开始呈现出低潮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各级组织开始忙于整顿和恢复组织工作，其活动也被迫转入到地下。这时，在日伪统治的城镇中，已经看不到动员人民起来抗战的标语和传单了，荷枪实弹的日伪军警昼夜在城镇中巡逻，东北各地到处都呈现着恐怖的气氛。

对于这种局面，关东军及关东宪兵队的首脑机关，有着

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眼前这种局面只不过是暂时现象，1935年秋冬两季的军事讨伐和政治镇压，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而且，东北的抗日运动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随着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东北的抗日运动正在向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集中。

面对这种情况，关东军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奢望，提出要用3年的时间，采取长期作战的办法，来扑灭东北的抗日烽火。于是，在1936年4月，又重新推出了“持久思想对策计划”。在“持久思想对策计划”中，关东军向关东宪兵队及日伪警务机关明确提出：“重点是镇压在满共产党，灭绝其根源”。对此，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提出：“共产党在屡次逮捕镇压的情况下，尚能坚持隐蔽活动，其潜伏的共产党员和武装团体的联络方法、手段远远凌驾于日满警务机关的侦察手段之上，对此，各地警宪机关不仅要根据各自的特殊情况认真努力钻研，制定出适合于本地区的工作方法，而且在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内部，也要加以认真研究”。东条英机还提出：“为完成灭绝在满共产党的任务，要提高担当此工作的思想警察的修养，并要对他们开展教育。”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狄根丈之助1936年5月在伪第一次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会议上，讲了“持久思想对策”的意义、目的和要求，他说：“在满共产党的活动，虽然经过日满军警的不断努力，表面上已呈现出稳定状态，但仍需要加以注意”。“由于最近国际关系的紧迫，东京事件[①]的

① 指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旨在使日本法西斯化发动的一场武装政变。

反映，苏联对满政策的积极化，以及去年莫斯科第七次国际共产党代表大会做出的反帝反法西斯决议，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的组成全国统一抗日联合军的倡议，中、满共产党的合作正逐渐趋于活跃。又鉴于中国南北政情的不安、满洲国治安状况等因素，共产党的策动不仅仅是依靠所谓的游击区和游击运动，而且也渗透到满洲国境内的热河、锦州、黑山等地，积极试行其潜伏性的赤化运动。”

狄根丈之助提出，这些因素是进行“持久思想对策”的重要依据。他以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干事长的身分，向日伪各警务机关提出：“要发挥开创精神，剔除这种策动”。并提出如下要求：

“1．关于游击区的活动，由于逮捕了一部分人，已经查明了一些局部情况，但对其系统、背后关系，上层组织还没掌握，因此也不具备进行彻底逮捕的条件。在满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在各种关系上都较内地（指日本）复杂，因此希望各机关要认真复查各种情报，弄清其组织系统，要以其周密的计划，彻底地进行逮捕。

2．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令等，是具体体现他们动向的材料，也是制定对其搜查逮捕具体对策的依据，因此，希望在获得这些东西方面，多花费一些精力。

3．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华北移动及华北方面的情况，要特别注意与之接壤地带的赤化。同时，对于华北方面的学生运动，① 由于参加运动的学生的回乡及通信等，也将逐

① 指“一二·九”运动。

渐波及到满洲国境内，他们中也可能有极其秘密的组织支部，因此希望加强对其侦察。

4．关于对共产党的'侦察培养'工作，日满警务机关间的协调、联系，目前还能保持圆满，但随着侦察的进展，相互争功，排挤他人，缺乏联络的情况也可能发生，这样就可能破坏珍贵的密探网，因此，希望各机关加强协调，绝灭这种弊端。

5．关于逮捕共产党，要按指示规定的那样，在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在逮捕前要秘密地搜集其系统及证据，订出周密的逮捕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在逮捕高级官吏、要人及外国人时，必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在满军中进行逮捕时，要与有关机关保持联系防止发生动摇。"

"思想对策"与"防谍"

关于"防谍"，关东军及关东宪兵队对其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内容在各个时期差别也很大。最初"防谍"仅仅是关东军维持自身及军事行动安全的一项措施。到1935年下半年，随着日本对全东北的占领及收买中东铁路，竭力排斥美英等国在东北的势力，关东军及关东宪兵队认为："美、英等国与日本的矛盾，苏联对东方的赤化政策，及满洲事变后中国的对日态度等，都必然地要对日本采取敌视态度，势必要在满洲国内设立谍报谋略网，扰乱满洲国的思想，破坏日满提携等等。"

鉴于这种认识，关东宪兵队在制定"思想对策"纲领

时，也把“防谍”作为“一般思想对策”业务，即把“防止外国势力的策动”纳入到了“思想对策”业务范围中，在司令部第三课专设1名军官，具体负责这项业务。

到1936年下半年，日伪警务机关在执行“持久思想对策”计划时，由于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搜捕反满抗日组织的指令中枢机关及这些组织的隶属关系上，因此，对被捕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特别审问，结果发现一部分反满抗日组织与外国(主要是苏联)有联系。1936年12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总结1936年第二期治安肃正成果时也发现，哈尔滨、齐齐哈尔、海伦、黑河、洮南、海拉尔、满洲里、牙克石等地，都有为苏联服务的谍报机关在活动。尤其是在齐齐哈尔市内破获的以张惠民为首的秘密谍报网（详见本书第六部分第八节），使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受到很大的震动。鉴于这种情况，关东军和关东宪兵队开始对“防谍”有了新的认识，并设想：“在满洲国，一定还有大量的外国谍报组织存在，正在以极隐蔽的手段活动”。根据这一新认识，关东宪兵队正式把“防谍”作为对策提了出来。并要求日伪各警务机关，加强对“防谍”的认识，提高业务能力。

这时，在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干事会内，也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议“思想对策”和“防谍”业务上的关系，将“思想对策”和“防谍”业务分开进行的要求。这样，根据情况的变化，关东宪兵队及日伪警务机关正式使用了“防谍对策”这一名词，与“思想对策”并列，共同作为了思想镇压和政治镇压的手段。接着，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也开始逐渐充实“防谍”的组织机构，制定了“战时检阅规定”“来

往外国人视察内规”“军机保护法”“国境地带法”等一系列规定，并从“1936年第三期治安肃正工作”开始，明确向各地警务机关提出：“间谍大部分是由苏联的远东机关所派遣，由苏联在满机关操纵，重点应对苏联加以防范”的指令。

东条英机上任后，以“思想对策”为名目推出的政治镇压手段，给东北的抗日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据1936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统计，自1935年9月实施“一般思想对策”开始，至1936年4月日伪制定“持久思想对策”为止，日伪警宪机关共逮捕了6 586次，逮捕了11 890人，投降了6 467人，加上讨伐中逮捕和投降的12 425人，半年内共“消灭”抗日武装及反满抗日人员30 782人。1936年4月开始实施“持久思想对策”后，仅1个月的时间，又逮捕了2 244人。在1935年9月到1936年1月实行的“一般思想对策”中，仅以“严重处分”① 名目杀死的就有540人。

另据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旬报”1936年4月至6月报导的“思想对策成果”，共有5 541人被捕，1 200余人被判刑，768人被“严重处分”。

日伪警宪机关进行的“思想对策”，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破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1936年6月13日的“六·一三全满一齐大逮捕”，使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齐齐哈尔、锦州、海拉尔、满洲里、牡丹江等地的基层组织都程度不同地遭到了破坏，300

---

① 即不经任何法律手序，宪兵即有权批准杀人。详见本部分第四节。

余人被捕。

1937年4月15日的“四·一五全满一齐大逮捕”，在这次逮捕中，由于中共哈尔滨特委遭到了破坏，使哈尔滨、呼兰、滨县、海伦、大连等地的组织受到牵连，也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

1938年3月15日的“三·一五大逮捕”，使中共北满和吉东省委在下江一带的地下组织，又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经过这几次大逮捕，中共东北地下党在沦陷区的基层组织，基本被破坏殆尽，使党组织不得不转移到抗联中。

三　政治镇压的组织机构“警务统制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进行镇压的组织形式，根据需要也几经变换。最初，关东军先利用汉奸及日伪军警组织了“清乡委员会”、“治安维持会”，并以其名义对“九·一八”事变后蓬勃兴起的抗日运动进行了镇压。关东军则通过“顾问”（对伪军）、“参事官”（对伪政权）、“警务指导官”（对警察）等形式，对伪满地方政权及军警进行操纵。自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35年下半年以后，关东军通过对伪满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后惊叫：“治安工作又发生了恶化”。关东军调查到：“1935年9月满洲国境内的各种匪数为3.8万人，而上一年则为2.8万人，无形中增加了1万人”。另日伪机关根据京（长春）图（们）铁路遭到袭击不断增多这一现象，判断这是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系统在活动。日伪警务机关也意识到，共产党所进行的破坏铁路、袭击城市的活动，不同于其它的反满抗日团体，而是旨在振奋民心，制造影响，吸引其它反满抗日团体，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对此，日伪政权中的一些人物哀叹：“满洲国建国以后，毫无安宁的日子”。

对于共产党力量的崛起，关东军声称：“再也不能像从

前那样，单纯依靠各防卫军各自进行微不足道的剿匪工作了，关东军要以治安为第一，开始坚决积极的行动”。

关东军提出的“治安第一主义”，其“根据”是援引“日满议定书”中“共同防卫”的条款。关东军提出：在“共同防卫”问题上，“关东军的使命是对苏作战，因此，应迅速确立满洲国的治安，完成对苏作战的准备”。在确立满洲国治安的问题上，关东军又认为：“满洲国军警的能力和素质都很差，很难由他们独自完成满洲国的治安工作。这样，关东军就势必要先以主要精力从事满洲国的治安工作，并要成为其工作的主导力量，指挥满洲国军警共同完成这一任务”。这便是关东军“治安第一主义”的“理论根据”。也是关东军在所谓“独立国家”满洲国内直接进行讨伐的“理论根据”。

此外，关东军还提出：“军的根本任务不能局限在满洲国的治安上，必须在确保满洲国治安后，将主要精力转向对苏作战。将来满洲国的治安必须由满洲国的警务机关自行担当，使之在平战两时都能起到维持国内安定的作用。但目前满洲国的警察能力很差，尤其是对付共产党及反满抗日团体的特高警察和思想警察能力更差，不仅人数少，素质也差，在共产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很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关东宪兵队的作用，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作为关东军司令官在满洲国警务方面的代理人，具体执掌指挥满洲国的各警务机关，配合关东军完成治安肃正工作”。

早在1935年秋，关东军在准备开始大规模武装讨伐前，为突出宪兵的作用，就以宪兵为主成立了政治镇压的专门机

关“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

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委员长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担任，在各地设“地方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分别由各地的宪兵队长和分队（分遣队、分驻所）长担任。

成立警务联络委员会的目的，实质上是由宪兵统一协调、指挥各地的关东州警察，日本外务省警察，满洲国警察，伪满宪兵和铁路警察从事政治镇压活动。

伪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在1935年9月7日成立后，新京、哈尔滨、承德、延吉、齐齐哈尔、奉天等地方委员会也在各地宪兵队本部内成立，到1935年10月10日前，在各宪兵分队、分遣队、分驻所所在地，共成立了88个地区委员会，并在不常设宪兵组织的地方，也设立了15个地区委员会。

伪警务联络委员会成立后，配合1935年秋冬两季的讨伐，统一指挥日伪警宪成立了大量的“联合搜查班”“联合检举班”及各种形式的“特别工作班”，在重点地区组织了统一检查，统一逮捕及搜集情报等活动。

1935年9月伪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成立当初，其人员组成见下页表。

关于警务联络委员会的作用，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认为：“日满各警务机关，在宪兵的协调下以警务联络委员会的形式统一活动，在配合讨伐方面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在思想对策方面，在发挥警务机关综合能力，统一行动及相互联络方面，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对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具体负责“思想对策”业务的齐藤美夫等人，也有

委员会职务	姓　名	阶　级	原机关职务
委员长	东条英机	少　将	关东宪兵队司令官
干事长	狄根丈之助	宪兵大佐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部员
干事兼委员	齐藤美夫	宪兵中佐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部员
干　　事	宇津木孟雄	宪兵大尉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部员
干　　事	山村义雄	宪兵大尉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部员
干　　事	高田典文	宪兵少佐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部员兼关东局事务官
干　　事	松浦克己	宪兵大尉	关东宪兵司令部部员兼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嘱托
干　　事	川人胜一		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特务股长事务官
干事兼委员	有田宪义		铁路总局警务科长
委　　员	武田武	步兵大尉	关东军司令部第一课参谋
委　　员	田中收	宪兵中佐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部员
委　　员	稻田弘义	宪兵少佐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副官
委　　员	四方谅二	宪兵少佐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部员
委　　员	御影池衣雄		关东局警务部事务官警务科长
委　　员	横山宪三	宪兵少佐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部员兼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嘱托
委　　员	梅村园次郎		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特务科长理事官
委　　员	都间观三		满洲国蒙政部警务科长理事官
委　　员	冈村铁彦	上　校	满洲国宪兵司令部
委　　员	岩田文雄		铁路总局警务处长

同样的认识。随即，齐藤等人向关东军司令部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参谋武居提出："在1936年以后即将开始的持久治安

肃正中，日满警务机关的思想对策工作将越来越繁重，因此，应使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有统辖警务工作的权力”。

根据齐藤等人的提案，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们在制定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长久治安肃正计划”时，认真考虑了如何配合讨伐组织政治镇压的问题，最后采纳了齐藤等人的提案。1936年4月1日，在关东军发布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大纲”中，“授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宪兵队长按其职务，相应统辖指挥警务机关的权力”。同时又发出：“以宪兵司令官、宪兵队长、宪兵分队长为委员长，组成中央、地方、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统辖指挥在满各警务机关进行思想对策”的命令。

根据关东军的命令，各地的警务联络委员会，都相继改成“警务统制委员会”。

有关警务统制委员会组成的章程，事先由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草拟，尔后，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颁布，命令日伪各警务机关执行。接着，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具体拟定了警务统制委员会的具体章程，明确规定了警务统制委员会的任务，即统一指挥日伪警察、宪兵、特务，担当对东北人民进行法西斯政治镇压的思想对策工作；负责制定，审查镇压活动的计划、方针，在政治镇压中负责与日伪军警宪特方面保持协调联系。当关东军在各地组织讨伐时，警务统制委员会负责指导日伪警宪，贯彻关东军司令官和各防卫司令官的讨伐命令、计划等。

警务统制委员会的组织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设在新京，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任委员长，地方委员会设在宪兵队

本部所在地，由各宪兵队长任地方委员长。在重要地区设地区委员会，由宪兵分队长、分遣队长或分驻所长任地区委员长。关东州因是日本租借地，因此警务统制委员会的组织形式略有特殊，委员长由关东州厅警察部长担任，大连宪兵队长任副委员长，奉天宪兵队长任顾问。

珲春，当时归侵朝日军的朝鲜军管辖，不是关东军的管区，因此，警务统制委员会的设置也比较特殊，章程中规定，珲春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由当地日军步兵队长任委员长，负责领导政治镇压活动。

另外章程还规定：在宪兵分队（分遣队、分驻所）不常驻的地区，由关东局或领事馆警察署、分署（派出所）长，任地区委员长，负责指挥政治镇压活动。同时，章程还规定：为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在各级委员会之下，都要建立特种侦谍机构和布设特务网。

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及干事会的人员以宪兵为主，关东军、伪满政权、关东州、日本驻伪满大使馆等均派人担任委员、干事或顾问，他们是：

委员长：关东宪兵队司令官

委员：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总务部长、大使馆警务部第一课长、关东局警务部警务课长、民政部警务司长、蒙政部警务科长、铁路总局警务处长

干事长兼委员：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

干事兼委员：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部员、大使馆警务部第二课长、关东局警务部警备课长、关东局警务部高等警察课长、中央治安维持会干事

干事：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部员、大使馆警务部第二课员、关东局警务部警备课员、关东局警务部高等警察课员、民政部警务司司法科长、蒙政部警务科员、铁路总局警务处参与。

顾问：关东军司令部第一课长、关东军司令部第一课参谋、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参谋、关东军司令部第三课参谋。

为强化关东宪兵队的作用，警务统制委员会章程规定了其活动程序，即中央委员长(实际是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总理中央委员会，根据情况召开委员会议，裁决议案，统辖地方委员会。委员会根据委员长之命令，审议报告、议案，向有关机关传达业务，处理委员长临时规定的事项。

委员会和干事会均设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内，平时由干事会根据委员长的命令，处理常务。

关于地方、地区委员会的组成，章程规定要以宪兵队管区为依据，以其管区内的各有关机关职员组成，最后经中央委员长批准。

此外，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参谋们为了使政治镇压活动组织的更好，及时通报各地的情况，处理镇压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还拟定了伪警务统制委员会的活动、报告、经费等制度。规定：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4次会议，地方委员会每月召开1次会议，地区委员会每周召开1次会议，必要时各级委员会可召开临时会议。各级委员会采取思想对策特报、月报等形式，将其工作向各机关通报。各地警务统制委员会的活动经费，由各机关治安费中支出，特殊需要时，由中央委员会提供。

警务联络委员会改为警务统制委员会后，其人员略有变动，但基本是警务联络委员会的原班人马。

警务联络委员会改为警务统制委员会，就其组织性质来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只是宪兵的地位更加突出。过去，在警务联络委员会中，宪兵虽然也起着支配的作用，但有明文规定，宪兵只能起协调、组织、联络作用。改为警务统制委员会后，明文规定宪兵起的是“统制”“指挥”作用。

根据伪警务统制委员会的规定，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可以中央警务统制委员长的名义，有指挥伪满各警务机关首脑的权力；各地宪兵队长，可以地方警务统制委员长的名义，有指挥各省警务厅长、伪满军各地宪兵团长、铁路警护队本队长的权力；各宪兵分队（分遣队、分驻所）长，可以地区委员长的名义，有指挥所在地警察署（分署）长、铁道警护队分队长、伪满军宪兵分团长的权力。实际上将全东北的日伪警宪，全部划入了关东宪兵队的指挥之下。

伪警务统制委员会成立以后，配合1936年春季以后日伪组织的大讨伐，对刚刚恢复的中共地下组织又开展了大规模的侦察镇压。其中几个著名的大惨案，如1936年的“六·一三”大逮捕，1937年的“四·一五”大逮捕等，都是在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统一组织策划下，各警务机关联合搞的。

警务统制委员会，是日本法西斯的头面人物，针对1936年以后东北的抗日形势为统一指挥日伪警宪特组织来对东北人民进行镇压，以宪兵为主而建立起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1936年以后的政治镇压中起到了极坏的作用，给东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由于加大了宪兵的权力，日伪各警务

机关不服相互争功，又使伪警务统制委员会内部矛盾重重。这是因为当时在东北，有日本警察，也有伪满洲国警察。日本警察又分为关东州警察和大使馆警察，关东州警察隶属于日本拓务省，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内活动；大使馆警察隶属日本外务省，在满铁附属地外所谓的日本侨民聚集区活动。另外，伪满系统的警察有满洲国警察，隶属于伪满民政部警务司。铁路警察，隶属于伪满铁路总局，和宪兵总团，隶属于伪满军政部。

在这些庞杂、混乱的警察组织中，以关东州警察和大使馆警察两大系统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日本帝国主义组成警务统制委员会的目的，本来是要解决系统庞杂、政令多出的矛盾，但由于体制的问题，各自为政，相互排斥的矛盾仍未能根本解决，各机关之间的纠纷也不时发生。此外，宪兵利用在警务统制委员会中占据的特殊地位，独断专行，凌驾于各警务机关之上，在各地也不时与其它警务机关发生矛盾。对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首脑人物不得不一再强调："统制的实质是要使各警务机关在原有的系统内部发挥效力，根据各自的特长开展活动，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由宪兵统一指挥"。东条英机也号召各日伪警务机关："要相互打开胸襟，相互信任，交流研究镇压共产党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告诫宪兵："不要抢夺其它机关的'功劳'，各队长、分队长既要放手让各机关去工作，又要掌握各机关的工作情况"。甚至还明确提出要求："当宪兵、领事馆警察、关东局警察、满洲国警察、铁警等共同侦破一个案件时，其功绩应属于警务统制委员会，不能属于个别那个机关。要同心

同德镇压共产党”。

从1935年秋季关东军开始对东北进行大规模武装讨伐开始，到1937年12月警务统制委员会撤销为止，关东宪兵队作为关东军在政治镇压方面的代理人，操纵着警务联络委员会和警务统制委员会，并以这两个委员会的名义，制定和颁发了大量镇压和屠杀东北人民的法令、规定和措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一）制定“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这一“要纲”是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名义向全伪满发布的，是大规模屠杀和镇压中国共产党人的法西斯宣言。该“要纲”的核心，是授权宪兵对逮捕的共产党人，可以不按法律程序，执行“严重处分”。（详细内容见下节）。

（二）制定“满鲜警察协助协定”。1936年1月，在伪满的间岛省图们，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以警务联络委员会的名义，代表伪满警务机关与朝鲜警察签定了上述协定，协定的内容是由关东宪兵队方面提出。当时，属于伪满领土的珲春地区归朝鲜军管辖，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这一地区非常活跃，并经常利用珲春地区的特殊条件，躲避日伪军警的讨伐。为使朝鲜的日本警察配合伪满方面共同镇压这一地区的抗日运动，“协定”规定：朝鲜方面要协助伪满方面的治安工作，特别是国境警察机构，要特别加强对国境的封锁，防止抗日联军在讨伐时越境进入朝鲜境内。伪满方面负责向朝鲜警察机关提供珲春地区的情报。

（三）配合“特设游击队”编成“特别搜查班”。1936年以后，关东军各防卫区都在大讨伐中建立若干个“特设游

击队”，目的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在讨伐区内，与分散活动的小股抗联部队作战。为配合“特设游击队”的活动，在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治安课长齐藤美夫，以中央委员的身份，提出了编成“特别搜查班”的提案，目的是配合“特设游击队”的活动，专门逮捕分散活动的抗联人员及游击队干部。齐藤美夫的提案，得到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批准后，伪民政部警务司即从1936年7月开始，在36个所谓治安工作重点县，组织了日伪警察混合编队的“特别搜查班”。

“特别搜查班”每班20余人，从1936年夏季以后开始活动。这类“特别搜查班”在讨伐中起了相当坏的作用，他们不仅配合讨伐，搜查逮捕分散活动的抗联干部，而且还采取各种手段，打入抗联内部，制造矛盾，分裂抗联开展诱降活动。

（四）编成“思想调查班”。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为搜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活动情况，为将来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作准备，1936年8月，干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在伪满各省的警务厅内，设立“思想调查班”，专门从事情报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另外，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活动情况，为后来的镇压提供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根据，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干事松浦克己提出，在中央也要设镇压共产党活动的专门研究机构。松浦的提议在1937年5月召开的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上得到了通过。会上决议在干事会直接领导下，成立“思想对策调查班”，从各机关抽调有研究能力的专门人

员，担当“思想对策、“防共”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该“思想对策调查班”，在日伪期间，曾通过编发有关共产党情况的参考资料，总结历次大规模镇压的经验，具体地指导着各地警宪活动。为编成“思想对策调查班”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曾特别修改了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的章程。该班的具体活动情况，详见“政治镇压的谋划机关思想对策调查班”一节。

（五）审议、决定编成“外事班”。1936年以后，由于伪满加强了对“防谍”的认识，故各部门都对进入伪满的外国人加紧了检查。伪满外交部、警察厅、铁路警察都在各口岸设有专门的检查机构，各自按照自行的规定，对外国人进行检查。这样，一个外国人(特别是苏联人)进入伪满，往往要受到20多次的检查，而对苏联领事馆的人员，检查的更是苛刻。另外，对外国妇女进行的身体检查，也引起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强烈反感，在检查过程中也屡次发生冲突，致使伪满外交部不时就收到强烈抗议。西方的一些国家，就伪满海关对入境者进行的繁琐检查，也经常告诫本国国民：“去满洲国旅行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同时，一些国家针对日本在东北的作法，也采取了同样的报复手段，对日本在国外的外交官及使节，也采取苛刻的检查。

鉴于这种被动的局面，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负责防谍业务的军官提出：“在苏联向满洲国派遣地下工作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更有效地进行防谍工作，应把侦破苏联谍报员的工作从思想对策业务中独立出来，在特高课或特务课内设立

外事班，专门执掌此工作”。根据这一建议，1936年5月25日，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干事会决定，在干事会的统一领导下，编成“外事班”，从“防谍”的角度出发，直接执掌涉外活动。

根据这一决定，伪满在安东、山海关、满洲里、图们等所谓的国境地点，由宪兵和国境警察联合编成了“关门外事班”，负责检查过往的外国人。在奉天、新京、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大城市，由宪兵和警察联合编成了“合同外事班”，有的地方也称“中间外事班”①，专门以各国驻伪满机构及外国人为对象，从事跟踪，监视等活动。外事班在1937年12月警务统制委员会撤销后，其机构被关东宪兵队保留了下来，后来一直在关东宪兵队的指挥下进行活动，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六）制定“铁路警备对策”。日伪时期，关东军视铁路为其“生命线”，无论是作战、运兵还是进行经济掠夺，铁路都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相反，破坏铁路，不仅能对日本侵略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而且还能造成巨大的影响，起到振奋民心，鼓舞民众抗日士气的作用。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铁路的警备也特别重视。

伪满初期，日伪机关为防范抗日民众利用铁路两侧的庄稼为掩护破坏铁路，曾制定过“铁路展望地带对策”，规定“在铁路两侧50米以内禁止种植高杆农作物”。但由于这一“对

① “中间外事班”的活动，即某个外国人到达一个地方时，由该地“中间外事班”负责跟踪、监视。当这个外国人离开管区时，将其跟踪、监视任务移给另一个地区的“中间外事班”。由于这种活动方式，故称“中间外事班”。

策”严重损害了中国农民的利益，在部分地区受到了抵制，没能彻底贯彻执行。1935年以后，由于中共领导的抗日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破坏铁路的活动也逐渐增多，对此，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干事会作出决议，重新研究制定了“铁路警备对策”。该“对策”内容除继续严厉推行“铁路展望地带对策”外，还包括如下内容：

1．“铁路爱护运动”。即把铁路附近的村庄都作为“铁路爱护村”，将村庄中的青壮年编成“爱路义勇奉公队”，将少年编成“爱路少年队”，由铁路警察操纵控制，驱使他们在铁路上站岗、巡逻、守卫铁路桥，辅助铁路警察警备铁路，防止破坏铁路的抗日人员进入村庄中活动。

2．由宪兵和铁路警察联合组成“盘查班”，在讨伐期间对过往铁路的行人，进行盘查。

3．为防范抗日人员在火车上进行破坏活动，专门设置便衣宪兵，监视、检查乘车旅客。便衣宪兵在列车上设置秘密工作房间，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活动。

此外，日伪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以警务统制委员会或干事会的名义，制定颁发的镇压东北人民的法令对策还有：“省县边境对策”“居住证明书制度”“旅行证明书制度”“自国境20公里无人区规定”“国境地带禁止摄影、绘画规定”“共产党案件有关人员不适合恩赦令规定”等等一系列法西斯镇压、屠杀的法令。

1937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基本控制了伪满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领域后，为欺骗国际舆论、把满洲国傀儡政权打扮成“独立国家”，遂决定在形式上取消日本在东

北的治外法权。于是关东军司令部组织了日伪各机关成立了“撤废治外法权准备委员会”，从各个方面研究“撤废治外法权”后对伪满的控制措施，关东宪兵队作为“准备委员会”在警务方面的代理人，负责制定、策划有关警务方面的对策。不久，所策划的对策都通过伪满法律的形式正式公布，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3项：

“1．在撤废治外法权时，日本警察机关除人事变动外，尽可能按原编制将人员移交给满洲国。移交人员的待遇，可参照撤废治外法权前参加满洲国机关人员的现待遇处理。

2．撤废治外法权后，日本的军事警察机关（指关东宪兵队）援用满洲国的法令，可以与满洲国警察官相同，行使一切警察权。

3．日本权益区内的警察法令，是按适应日本人而制定，故在撤销治外法权后，要将满洲国法令按日本警察法令调整。”

经过关东宪兵队的策划，“撤销治外法权”后关东州警察和大使馆警察摇身一变，全部转为伪满警察，名曰撤销了日本在华的警察系统，实际上更进一步地扩大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警察权力。转入伪满警察系统的日本警察从此可以横行东北各地，毫不顾忌地对东北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撤销治外法权”后，关东宪兵的权力也丝毫未受到影响，它仍可援用伪满的法令，直接参加政治镇压活动。

“撤销治外法权”，从1937年12月开始实施，伪各级警务统制委员会也随之宣布撤销。

四　政治镇压中的杀戮手段
“严重处分”和“军法会审”

1936年4月以后，随着大规模的武装讨伐和政治镇压，数以万计的抗日军民遭到了逮捕。由于被捕的人数太多，对其进行如何处置，给日伪警务机关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所提出的“严重处分”和“军法会审”，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制定的杀戮对策。

1936年7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负责“思想对策”业务的宪兵军官齐藤美夫、宇津木孟雄等人，根据当时讨伐出现的情况，先在司令部内谋划制定了“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的草案及解释这个“要纲”的“说明”。然后将其送交给关东军司令部第一课负责政治镇压的参谋审议。1936年7月8日，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命令的形式颁布。这个“要纲”的内容是：

“第一，日满警务机关对在执行思想对策中所逮捕的共产党有关人员，应根据本要纲处理。

第二，对共产党有关人员的处理方针如下：

（一）对认定是共匪或匪贼的共产党有关人员，仍如过去按军事行动由宪兵处以严重处分。日满警务机关经宪兵之批准，也可以执行严重处分。

（二）对不宜严重处分的共产党有关人员，原则上要送

交军法会审处理。

第三，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统辖日满警务机关，根据本要纲进行处理。”

“要纲”中所指的“共产党有关人员”，从敌伪后来镇压的对象看，不完全是共产党人，也包括广大的抗日民众。关东宪兵队之所以使用“共产党有关人员”的字样，是因为1935年秋季以后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在东北抗日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东北抗日运动的核心。这个“要纲”实质包括两层含意：其一是对直接从事武装抗日活动的人员，及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逮捕后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以违反军事行动为由，由宪兵执行“严重处分”，即就地处死；其二是对那些没有直接参加武装抗日活动人员，如伪满官吏、公职人员、学生、知识界中的一些反满抗日人员，把他们的活动说成是违反军事行动，显然解释不通，为掩人耳目，对这类被捕者的处理，要采取“法律手段处置”。

“严重处分”这一随意杀人的法西斯手段，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932年就曾使用过。当时关东军为镇压“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曾以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向日军各部队长和宪兵发布命令：对逮捕的抗日武装人员，可以就地执行“严重处分”。

关东军这一滥杀政策，在1933年曾达到过顶点，一时用砍头试验日本军刀，用活人当靶子练习刺杀风靡日军部队。当时的日本宪兵以杀人多为骄傲，以争当“砍头名人”而荣耀。例如，当时大虎山宪兵分遣队长宪兵曹长竹泽清态和承

德宪兵队凌源分队军曹坂田胜分别用军刀砍杀了90多人和50多人，被封为“砍头名人”，在日军部队中闻名。

另外，当时在日本宪兵和警察中，还风行着弄人胆，盛传“弄到人胆一则可以大吉大利，二则可以治病去邪”。这样“严重处分”后的人，又成了日本兵攫取人胆的目标，反过来又助长了“严重处分”杀人之风的盛行。

1933年前后，在执行“严重处分”过程中漫无边际的滥杀现象，也曾引起过关东宪兵队首脑机关的重视，感到“严重处分如行使不好，其影响民心甚大”，因此，曾提出“必须下威整饬”。

根据镇压抗日义勇军期间使用“严重处分”所得到的经验，1936年7月，关东宪兵队准备再次使用这一手段时，则重新调整了行使这一权力的范围。关东宪兵队警务部长在向各宪兵队长转发关东军的命令时，明确规定了“严重处分”行使权的范围，即“由宪兵队长（地方委员长）统制，行使前必须呈请宪兵司令官批准备案”。

日本法西斯在东北第二次使用“严重处分”，虽顾忌到残暴的杀戮将激起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对使用权加强了控制，但滥杀之风由此再度弥漫了东北大地。到1937年上半年，又第二次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宪兵不仅将逮捕的抗日人员随意杀害，而且在讨伐中，对抗日武装经常活动的村庄，也经常视为“通匪部落”，对村中的全部男子执行“严重处分”。

二次使用“严重处分”后，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屠杀事件是1937年3月，奉天宪兵队山城镇分队，以警务统制委员会

的名义，批准将逮捕的200余人集体执行“严重处分”屠杀。

滥杀之风的再度弥漫，也使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感到：“各队的处理情况及标准尚不一致，仍有产生弊端之虑”。这样，1937年下半年以后，在日本法西斯认为“严重处分”已初步达到目的，伪满统治秩序已经基本确定后遂变换了镇压方式，将以血腥屠杀为主的镇压手段，改为较缓和的“法律”镇压手段。这样，1937年12月21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梶荣次郎奉命向各宪兵队发布了“关于呈请严重处分标准由”的通知，又重新规定了“严重处分”行使的权限和具体的行使办法。其内容摘录如下：

“兹奉命通报，鉴于满洲国治安的特殊性，行使严重处分应以适合实际情况，在政策上给以权限为宗旨，这一点已为周知，但目前治外法权已经撤销，司法行政各法制已逐渐完备，如再不考虑周围的情况，仍按过去的权限执行，则为不当，故今后仍按下记标准执行：

（一）在特定区域内（指重点讨伐地区）

1．杀人、放火、掠夺、强奸、强盗及进行残暴的匪贼行为者。但对已痛改前非，安分为生者，可按情况适当考虑。

2．为前项行为者积极搜集日满军警情报，供给武器弹药、金银、衣、粮者或为共匪担任宣传、交通等助匪行为者。但因日满军警警备薄弱，为保自身不得已而犯上述行为者不在此限。

3．通苏、通蒙、通华者，再度为匪者，妨碍交通运行者，

治安肃正上需处以严重处分者。

（二）在特定区域以外

1．在邻接特定区域有上述各项行为者，与特定区域内有密切关系者。

2．前项行为者中，其行为极为残暴，在治安上需处以严重处分者。”

“严重处分”作为日本法西斯镇压东北抗日爱国运动的一种“应急手段”，使大批的爱国志士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无数的无辜被任意杀戮，给东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不仅如此，日本法西斯在东北的这一发明，后随着关东宪兵队中的大批法西斯军官被抽调到华北、华南、华中及东南亚地区，亦被随之传播到了各地，在所谓的“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中，又都以特别非常时期为由，在各地重演了这一残暴的杀戮惨剧，给关内各地的中国人民及东南亚各国人民，又制造了灾难。

“军法会审”则是1936年7月关东宪兵队在“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中，制定的与“严重处分”并行使用的另一项残暴杀戮手段。

关东宪兵队在“要纲的说明”中曾明确提到：“对共产党及有关人员，可以看成是危害关东军军事行动，可用严重处分的手段处死”，“因为这些人的活动危害了满洲国的治安，根据日满协定书规定，关东军有负维护满洲国治安的责任，因此，对讨伐中逮捕的人，以危害军事行动名义处死无须置异。但1936年4月以后，随着讨伐的深入，逮捕的各种情况的人将越来越多，如果都用严重处分这个标准执行，则

在量刑上缺乏自由，显然是不行的，也不利用镇压活动的展开”。

对此，关东宪兵队在“要纲的说明”中提出：对不适合执行“严重处分”的其他人员，如伪满官吏，英美等国公司的雇员、知识分子等，则须采取“司法处分”的形式，将被捕者送交法院，判刑处罚。关东宪兵队声称，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弥补了“严重处分”的不足，而且还可以把伪满洲国妆扮成法制国家的形象给人以尊重法制、依法审判的假象。

但在进行“司法处分”的问题上，关东宪兵队的首脑人物又认为：“正常的法律审判很难适应1936年以后大规模逮捕的需要，难以达到大规模镇压的目的。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尤其是在搜集人证、物证等方面，更是过于繁琐。并且时间过长也是一大缺欠，这些对镇压共产党都十分不利。因为，搜集共产党案件的人证、物证，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按照正常审判，证据不足就不能立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就更难搞清，案件的真实性也随之愈加不清。这种情况在日本国内审理共产党案件时，则屡有发生，最终不得不因证据不足而释放。”

鉴于日本国内处理共产党案件的教训，关东宪兵队提出：在中国东北“虽须实行法律程序审判，但决不允许普通法院对治安肃正的癌肿共产党有关人员，进行那种春闲日长的处理方式，而需寻找一种更适合的审判办法。”

关东宪兵队首脑人物这时从日本国内处理“二·二六”事件时采取的“军法会审”形式中，得到了启示，认为这种形

式能适应1936年后大规模镇压的需要。关东宪兵队为说明它的合理性，还援引了欧洲大革命后，在处理反革命案件时，也曾设置过专门审判机关为例。把“军法会审”解释成“是为了国家的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方便的手段”。并声称：“军法会审”除具有临时方便的优点外，审理判决迅速也是一大优点。而且人员的组成，也较切实可行。“从维护军队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关东军司令官为首长，以精通军事的军官为审判官，以法官辅佐法律知识，这样在考虑军队利益的情况下，就能收到切实可行的效果”。

根据这一策划，1936年7月6日，在植田谦吉正式发布“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命令之前，伪满洲国军也参照“军法会审”的办法，以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致函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的形式，发布了满洲国军行使“军法会审”的办法和对其具体解释的“说明”。后来的“军法会审”，则是以伪满洲国军的名义进行的。

佐佐木到一在致函中提到：“满洲国军也要以日本人为主组成军法会审，对共产党人进行审判”。同时，佐佐木到一还对伪军政部所辖各军法处下达指示：“对不宜采取严重处分的共产党有关人员，要在满洲国审判权内，由军法会审审判”。

佐佐木到一在说明伪满军行使“军法会审”的理由时说：“当前，满洲国的共产党的活动，已经超出了单纯匪贼的性质，更超出了单纯思想团体的范畴，而是企图瓦解军队，紊乱治安，颠覆国家为目的的反军反国家的极端分子，其潜伏和策动活动本身，已经触犯了1932年9月10日颁布的暂行

惩治叛徒法，犯下了该法规定的意在紊乱国家及危害或衰弱国家存立之基础的组织结社罪。因此，无须更改现行法令和制定新法令，只须明确解释现行法令，即可进行审判。”

另伪满洲国军在解释“军法会审”的“说明”中讲道：“鉴于军队所担负的维持治安的任务，对共产党有关人员的活动，又可以认为是侵害了军的安宁利益。因此，对共产党有关人员的案件，虽他们本身是一般人，也可由军法会审审判。”

“军法会审”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及东北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最残暴时期使用的一项最残忍手段。实行时期大致从1936年7月开始，到1938年前后结束。以后，日伪政权随着伪满形势的变化，亦逐渐变换了手段，代之的“高等法院涉外庭”和“特别治安庭”等方式审判。

“军法会审”与“严重处分”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以消灭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肉体为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在量刑上也极端残酷。例如：各地对1936年“六·一三”大逮捕组织的“军法会审”伪第三军管区对因黑龙江民报社事件被捕的31人进行的判决中，就有5人被判死刑，2人被判无期徒刑，余者也均被课以重刑。伪第四军管区对因这一事件被捕者组织的“军法会审”，45人中就有15人被判死刑，5人被判无期徒刑。

最为残酷的是1937年对“四·一五”大逮捕组织的“军法会审”。被判刑的436名被捕者中，就有198人被判死刑。在这些被判死刑的人中，绝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最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其中以对中共哈尔滨特委和哈东特委（滨北、滨

绥铁路上的中共地下组织)的镇压最为残酷，伪第四军管区对哈尔滨特委被捕的59人进行的“军法会审”中，就将30人判处死刑。对哈东特委被捕的近400人中，就将85人判处死刑。余者均被判处长刑。

另外，受“四·一五”大逮捕牵连，南满的奉天宪兵队也破坏了中共抚顺特委，对被捕的30余人，奉天宪兵队长加藤泊治郎当即批准将10人进行“严重处分”。余者被送交伪第一军管区进行“军法会审”，又有13人被判处死刑，5人被判处10至15年徒刑。

五　政治镇压的谋划机关“思想对策调查班”

1936年日伪警务机关在侦察中共地下组织的行动中，逮捕了与中共地下组织早已失去联系的海拉尔小学教员任福路。由于任知道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些情况，加之他在受审中胡招乱供，使日伪警务机关掌握了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些线索。认定在伪满的教员、职员、学生中，有大量的“共产党分子”在活动，“共产党的赤化活动已经侵蚀了教育机关”。对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组织了日伪警务机关，在全东北以教育界为中心进行了“侦察”“培养”活动。

另一方面，由于任福路胡招乱供，他自己也被日伪警务机关误认为是“北满教育界中中共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遂对他格外看重，于是决定将他从海拉尔押往哈尔滨进行重点审讯。1936年6月6日，当押送任福路的火车行至富拉尔基附近时，任福路跳车逃跑。任的逃跑给日伪警务机关造成了巨大的震动，打乱了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对北满教育界的“侦察”“培养”部署。这样，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不得不提前行动，把准备在6月末进行的统一逮捕行动提前到6月13日进行。从6月13日下午3时起，伪满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牡丹江等地，对正在监视、跟踪的300多人进行了同时逮捕。这就是日伪时期闻名的“六·一三”大

逮捕。

“六·一三”大逮捕，使中共地下组织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也很快地发现了自己的失误。关东宪兵队司令东条英机，事后在总结这次大逮捕的经验时说：“研究今夏北满的一齐逮捕，在搜查和审讯问题上，都给我们以后的工作造成了困难。特别是不考虑以后，一网打尽式的总逮捕，使我们以后的工作陷入了糊涂状态，使对共产党的侦察工作，不得不从头开始去摸索”。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由于“六·一三”大逮捕是提前进行，日伪警务机关没来得及进行充分组织，把掌握的线索全都抓了，这样导致了“六·一三”后，对共产党的侦察工作陷入了一时无从下手的境地。

面对这种情况，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内部有人提出：对东北共产党的问题要开展基础研究；要系统地搜集、审查、整理这方面的情报，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以此提供镇压的决策资料。

这项提议在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了共鸣，不久，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干事、日本宪兵少佐松浦克己正式提交了组织对共专门研究机构“思想对策调查班”的提案。这个提案后在1937年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会上任命松浦克己为“思想对策调查班”班长，负责指挥全班按照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的方针，开展对策调查、研究工作。

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干事长，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狄根丈之助在会上要求各机关：“要理解中央委员会成

立思想对策调查班的意图，选派优秀的干部参加调查班工作”。同时还要求各机关，要注意培养和发现适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1937年3月，在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松浦克己作了“关于思想对策调查班编成方针、计划的说明”。会议决定，为设立“思想对策调查班”，对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规定第六条之二进行修改，增加“为调查、研究、计划有关思想对策、特别是防共问题业务，在干事会设调查班”一款。

1937年4月5日，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召开了第八次会议。会上松浦克己宣布“思想对策调查班”正式开始工作，要求各部门提供情报资料，协助工作。

“思想对策调查班”设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内。主要活动是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它抗日组织的情报进行综合研究，为各警务机关的镇压活动，提供基础性的参考资料。同时，为提高日伪警务机关在“思想对策”活动中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思想对策调查班”还将一些重大问题编成“文献”“情报”，向各机关分发，具体指导镇压活动。

“思想对策调查班”也负责将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的精神、指示，及“思想对策”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共及抗联动向等，编成“思想对策月报”，每期以“讨伐事项”、“研究事项”“参考事项”、“注意事项”、“决定事项”“希望事项”、“传达事项”“情报事项”等方式向机关传达。

1937年“思想对策调查班”编成时主要成员有：

职　务	姓　名	原　属　机　关（职　务）
班　长	松補克已	日本驻满大使馆第二课课长、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干事、日本宪兵少佐
主　任	北川三郎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部员
班　员	西藤立夫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嘱托
班　员	花岛浅吉	治安部警务司　属官
班　员	冈 本 某	治安部警务司　属官
班　员	小池房治	日本驻满大使馆　警部
班　员	西辻定彦	关东局　警部
班　员	渡 边 某	民政部蒙政司　属官
班　员	田 中 要	铁路总局警务处　巡监
班　员	坂元善藏	铁路总局警务处　巡监
班　员	服 部 某	朝鲜警察派遣员

此外，该班班员还有数名宪兵曹长和军曹。在上述班员中，除日本宪兵外，其他人员均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嘱托的身份，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活动。

“思想对策调查班”正式成立后不久，也就是“六·一三”大逮捕后日伪警务机关对中共的侦察正苦于无处下手的时候，中共哈尔滨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叛变投敌，傅叛变后供出了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等人。由于韩守魁等人的相继叛变，日伪警务机关又重新掌握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线索，结果日伪警务机关通过跟踪、侦察，又在1937年4月15日组织了闻名的“四·一五”大逮捕。“四·一五”大逮捕

为刚刚成立的"思想对策调查班"提供了活动舞台。于是该班全力以赴，围绕这次逮捕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活动开展了调查研究。该班班员治安部属官花岛浅吉等人，为实地考察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经常深入到逮捕现场，具体参加和指导逮捕活动。"思想对策调查班"的大部分成员，也都直接参加审讯，索取需要的资料。经过近4个多月的活动，该班通过对韩守魁、傅景勋等叛徒的审讯，基本上掌握了中共地下组织在东北的活动情况。1937年6月，日伪方面在对"四·一五"事件还没最后完成审讯的情况下，调查班就匆忙将已掌握的材料编成"在满共产党最近运动情况及有关新阵容考察"一书，紧急付印，作为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向各日伪警务机关分发。

在这本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以哈尔滨特委为中心的白区工作情况；中共东北地下组织的机构；中共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吉东省委及各游击区的工作、组织及活动情况；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十一军的组织及活动情况。书后作为参考资料还附有"中共党军编制表" "第三国际规约"等文献。这本书在当时日伪警务机关中，堪称是研究中共地下组织活动最权威的资料。

这本书由班员花岛浅吉、北川三郎、西藤立夫、小池房治4人具体执笔，全体班员参加讨论定稿，最后以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思想对策调查班"的名义印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藤江惠辅为该书作了"序"。讲了匆忙印发此书的目的。他说："该事件（指四·一五）的搜查尚未见结果，但已经看出，苏中两国对满的策动已经非常激烈，为此，

决不允许有片刻的偷安，编成此书，对在满各机关办理有关防共、思想对策及国民思想指导上，如有裨益，颇为幸甚”。

该调查班班长松浦克己也为该书作了“序言”。他从“共产国际反法西斯宣言”和“日德防共协定”两大思想阵营斗争的角度，述说了国际政局的复杂局面，提出：东北和苏联，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很接近，因此，日满共同防共的意义，就在于消灭在满共产党。松浦的“序言”实际上是“思想对策调查班”成立后的政治宣言，也是向伪满各机关阐述着其行动的宗旨。

不久，“思想对策调查班”又将“在满共产党最近运动情况及有关新阵容考察”一书进行了整理，将其中“对共产党的逮捕及处理方法”部分抽出，增添了一些资料，编成“逮捕满洲共产党的经验”，以“思想对策资料”为刊名，直接下发到日伪各基层警务机关，作为镇压、逮捕共产党活动的指导材料。

“思想对策调查班”重新编纂整理的这部资料，从侦察、逮捕、审讯三个方面，总结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他们认为，在侦察方面成功的经验有：

“密探使用的巧妙，例如，在侦察哈尔滨特委某重要女党员时，派去的密探是她幼年时代交往甚密的男同乡，结果使她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入了被侦察圈，使侦察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并通过对她的侦察，发现了其他的党员。另外，对怀疑有共产党活动的地方，派去的密探也获得了成功，例

如，密探通过长期潜伏在哈尔滨口琴社内，发现了该社10余名地下党员，并查清楚了他们的地址，为逮捕提供了依据。”

在侦察方面认为失败的经验有：

“把朝鲜人密探和中国人密探放在一起使用效果不好，一般朝鲜人密探提供不出有价值的情报，而且还易坏事，乱抢中国人密探已经监视的目标，导致侦察失败。另外，在跟踪侦察时，跟踪距离不宜过近，便衣警察不宜暴露其身份，在这次逮捕的侦察中，由于上述情况，都发生过侦察失败的事例。”

在逮捕方面，“思想对策调查班”认为成功的经验有：

“这次逮捕工作保密工作做得好。逮捕计划除少数人知道外，绝大多数参加逮捕的人都不知道。在这次逮捕中，为防止逮捕计划被察觉，逮捕准备会议选定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召开，也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另外，这次逮捕工作组织的也较严密。关于逮捕的方法，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及逮捕人员的临时召集等，也都比较成功。”

关于逮捕上认为失败的经验有：

“逮捕中存在着指挥系统混乱，胡抓乱捕的现象。例如：对某一个地方的逮捕，地方搜查班先捕走了4人，接着哈尔滨警察局又捕走了1人，随后，铁警又去搜捕，导致这个地方人心惶惶，使与共产党员有关系的15人逃跑，使逮捕无法进行”。另外，“对被捕者的举动未能注意监视，也导致过逮捕上的失败，例如，逮捕了满洲省委1名党员后，该人要求喝水，给他水后未加注意，结果该人用水杯打破了玻璃，向其同志发出了危险信号，使其同志逃跑”。还有，

“使用变节党员作密探与其同伙接头时，即使时间过了还没接上头，其他密探也不应去与之接触、交谈，这次逮捕中，这种情况已经造成了逮捕的失败”。

关于审讯方面，“思想对策调查班”认为成功的经验有：

“在审讯中恩威并用收效明显，例如在审讯哈特委某个党员时，先用了该人原来的上级，已经当上了警佐的审讯官审讯，结果遭到了这个党员的指责，未获任何成效，后换了一个审判官，对其进行严厉审讯，结果该人供出了全部犯罪事实。”

关于审讯方面失败的经验有：

“对一些党员的招供不能轻信，在他们招供后不能放松对他们的审讯。在这次逮捕中，发生了有的党员招供后提出写自供书的要求，故放松了审讯，结果他写了两个多星期的自供书，其内容绝大部分是掩护同志的陈词，延误和妨碍了逮捕，为其同志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思想对策调查班”除将“四·一五”大逮捕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印发给日伪各基层警务机关具体指导镇压活动外，在1938年前后，为指导“国境地区”警宪机构封锁抗联的活动，还通过印发韩守魁、傅景勋这两个人的笔记，将抗联越境入苏的情况，从苏联返回东北的秘密经路、手续及抗联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共产国际对抗联的援助等情况，向“国境”日伪警务机关做了通报。

此外，“思想对策调查班”还将中共“八一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第三国际规约”、

“第三国际加盟条件”、“中共党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李立三路线”、“中共党内斗争”等文献、资料编辑成册，提供给日伪首脑机关，供制定政策、法令时参考。

1937年12月，日本在东北“撤销治外法权”后，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亦随之解散，“思想对策调查班”这一机构，改为关东宪兵队的机构被保留了下来。各机关派来的人员或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嘱托的身份，或以原机关情报联络员的身份，仍继续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内活动。

六　政治镇压的别动队“长岛工作班”

“长岛工作班”是以日本宪兵长岛玉次郎的姓作为称谓的宪兵特别工作班。班长长岛玉次郎，日本新泻县人，农民出身，1908年前后出生，1936年4月在大规模血腥屠杀之际，从朝鲜宪兵队转到关东宪兵队，初任本溪湖宪兵分遣队军事警察系军曹，以后历任山城镇、通化宪兵分队工作班班长、关东军直辖工作班班长、野副讨伐司令部第一工作队工作班班长、关东宪兵队教习队教官、古北口宪兵分队长、西南防卫军配属热河游击队队长、东安宪兵队战务课长等职。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任间岛宪兵队第一方面军配属宪兵大尉。

“长岛工作班”是1936年以后活动在通化一带的以宪兵为首的特务组织。班中成员主要由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组成，并网罗操纵了大批中共叛徒。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中共南满省委及基层组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及通化一带的义勇军。该班活动的主要方式，是配合讨伐开展诱降活动。

1936年以后，由于日本法西斯在东北进行的残酷军事讨伐和血腥的政治镇压，使东北的抗日运动进入了极度的困难时期，在白色恐怖中，抗日队伍中的一些人发生了动摇，长岛工作班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将中共柳河县委及基层组织破

坏殆尽；诱降了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给通化地区的抗日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迫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及中共在这地区的地下组织不得不退出这一地区。

“长岛工作班”由于活动“卓有成效”，手法特别，而在日伪时期名噪一时，多次受到关东军司令官和南防卫区司令官的奖赏。隶属关系也由奉天宪兵队山城镇分队领导，转归关东军司令官直辖，经常被派至讨伐最重要地区活动。

长岛玉次郎本人，也随“长岛工作班”而名噪伪满，除获得各种各样的勋章外，其职务也不断受到拔擢，在1936年他仅是一名军曹，到1945年升到了宪兵大尉，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升了6级，这在日本的军队中是少见的。

另外，日本法西斯也把“长岛工作班”的经验推广到了关内，多次派长岛玉次郎去北平、石家庄、太原、济南向华北侵华日军的宪兵队传授“经验”。华北宪兵司令部还不断派人到“长岛工作班”实习，训练特别工作班骨干。

“长岛工作班”曾先后三次编成，第一次是1936年7月到1937年3月，其活动主要是破坏了中共柳河县委。

1936年4月，关东军制定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后，关东军南防卫区根据计划，以通化为中心，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活动。同年7月，伪满洲国军又根据关东军的指令，在东边道北部的9县（通化、集安、临江、长白、濛江、辉南、金川、柳河、桓仁）进行了“独立大讨伐”。为了配合日伪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命令在奉天设置“讨伐指导部”，具体指导伪军的讨伐。

同时，奉天宪兵队长加藤泊治即命令山城镇宪兵分队，

成立特别工作班，在讨伐区外围配合活动，侦察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于是，长岛玉次郎被从本溪湖分遣队调到山城镇分队，以分队附的身份，奉命组织特别工作班，开赴金川、柳河一带活动。

“长岛工作班”第一次编成时，除班长长岛玉次郎等3名日本宪兵外，还配备了2名翻译（朝鲜人宪补），1名密探和3名伪满警察。1936年7月，长岛工作班编成后伪山城镇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第一次将讨伐中得到的中共柳河县委的组织线索，交给“长岛工作班”命令进行侦察，同时指示柳河县伪警察局及各地日本警察署协助“长岛工作班”活动。

“长岛工作班”9人接到命令后，随即化装成工人进入了柳河县五道沟地区开始了秘密活动。经过3个多月的活动，侦察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同年11月，“长岛工作班”在柳河县孤山子地区，在配合日军独立守备队讨伐中，通过将抗日义勇军老长青、赵思明部70余人诱降，第一次捕捉到了中共柳河县委的线索。长岛玉次郎根据赵思明部下严守光、于宪福提供的情况，连夜袭击了柳河县委游击队在孤山子的驻地，逮捕了张德福等2名游击队员。将这2人押到孤山子日本警察署进行严刑审讯后，掌握了柳河县委游击队长车任青的踪迹。

随即，“长岛工作班”又指挥日伪警察袭击了车任青的驻地，逮捕了游击队长车任青及抗联第五团副官处长侯德清等人。接着由于侯德清等人的相继叛变，“长岛工作班”又在柳河县三源浦、孤山子、五道沟、四道沟等地逮捕了柳河

县委游击队员杨玉林、杨景阳、陈仲山及柳河县委工作人员崔洋焕等数十人，逐渐掌握了中共柳河县委的活动情况，目标逐渐集中到县委书记冯剑英身上。

1937年1月，根据以上被捕者中叛变者的供述，长岛玉次郎又指挥四道沟警察分署逮捕了与柳河县委有直接联系的4名中国农民，刑讯后他们又供出了柳河县委的2名重要联络员。1月下旬，“长岛工作班”在五道沟将其中1名重要联络员秘密逮捕，刑讯后完全掌握了柳河县委主要领导人的活动。

1937年2月，在日伪警察的协助下，“长岛工作班”包围了中共柳河县委书记冯剑英的驻地，冯等3人仓猝应战突围，长岛玉次郎命令不准射杀，结果冯等3人跳入柳河、清源两县交界的河中，游至对岸逃跑。三天后，“长岛工作班”将秘密监视的另1名柳河县委重要联络员逮捕，经审讯该联络员确认：三天前跳入河中逃跑的3人中，除柳河县委书记冯剑英外，其他两人1个是冯的妻子，1个是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当夜，他们3个人跳入河中后均受了冻伤，该联络员将冯的妻子用爬犁送到了柳河县城西门外。

长岛玉次郎根据联络员提供的情况，当即指挥班员乘汽车到西门外，在1户中国农民家中将冯剑英的妻子金某逮捕，押到了五道沟警察分署。为了诱出冯剑英逃跑后的下落，长岛玉次郎将抗联叛徒侯德清与冯的妻子金某监禁在一起，以此打探冯的下落。结果侯探知，冯等3人跳入河后都受了冻伤，由于无法再进行活动，遂决定分散隐蔽，金某去柳河县城西门外；冯剑英去清原县草市；组织部长郭喜明去

东丰县。决定待养好伤后，冰雪融化时集合重新开展活动。

根据汉奸侯德清打探到的情况，长岛玉次郎派翻译朝鲜人申宪补带领部分班员赶到了清原县草市，通过当地警察将所有朝鲜族村庄的屯长召集到警察分所，了解各村外来人的情况。当得知没有人来后，申宪补向各朝鲜族屯长训话："最近可能有人要来，发现后要迅速向警察分署秘密报告，协助逮捕。如隐匿不报，定要严加处罚"。随后，申宪补命令警察分署，"逮到犯人后，要将其迅速押送山城镇领事馆警察署或宪兵分队"。

两天后，冯剑英拖着冻伤的身子刚刚逃到草市的朝鲜族村庄，就被村民告密被捕。冯被押到山城镇宪兵分队后，长岛玉次郎立即派汉奸侯德清去认证，当确认是中共柳河县委书记冯剑英后，遂将抓捕的重点转向组织部长郭喜明身上。不久，"长岛工作班"又通过山城镇宪兵分队，指挥东丰县警务局将郭喜明逮捕。

冯剑英、郭喜明等中共柳河县委主要负责人全部被捕后，长岛玉次郎立即指挥该工作班从柳河县返回山城镇，开始了对冯剑英等人的诱降活动。

长岛玉次郎为瓦解冯剑英的抗日意志，首先对他解除了监禁，把工作班员翻译都南植的房子让出来给冯剑英夫妻居住，并为他治疗冻伤。接着不时派去朝鲜族汉奸和抗联叛徒去游说劝降。当冯的冻伤好一些时，长岛玉次郎亲自陪冯去逛大街，以示对他的信任。在长岛玉次郎的物质引诱下，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冯剑英变节投敌，向"长岛工作班"供出了中共柳河县委在五道沟、四道沟、河南的3个支部，及

在五道沟、四道沟、三道沟、孤山子、三源浦、河南的6个外围团体救国会的情况。

1937年3月9日，根据冯剑英的供述，伪山城镇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指挥日伪警察，进行了一齐逮捕，使中共柳河县委的各级组织被破坏殆尽。接着，长岛玉次郎又利用当地农民将冯剑英、车任青等人的劝降信送到了柳河县游击队。最后以改编成伪满军为条件，将这支20余人的抗日武装诱降。至此，中共柳河县委领导下的地下组织和抗日武装，全部被“长岛工作班”破坏。

1937年4月，伪山城镇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召集东丰、海龙、柳河县警察局首席警务指导官（即后来的局长）、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长、铁路警护段长开会，研究对“长岛工作班”诱降人员的处理办法，会上决定：

1. “将抗日义勇军老长青、赵恩明部70人及柳河游击队24人，移交给山城镇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执行严重处分”。不久，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在清源机场，用机枪扫射将这些人集体杀害。

2. “将中共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游击队长车任青、游击队员陈仲山、县委工作员杨玉林、杨景阳、崔洋焕、副官处长侯德清等18人，及中共柳河县委领导下的基层党员、干部34人，由山城镇警务统制委员会执行严重处分。”

3. “为配合长岛工作班以后的活动，将中共柳河县委书记冯剑英、冯的妻子金某、工作员张德福、张庆祥、于宪福移交给通化宪兵分队。”

1937年5月，中共柳河县委被破坏后，日伪机关根据冯剑英等人的交待，经分析研究，逐渐摸到了中共南满省委机关及抗联第一路军的一些情况。于是，奉天宪兵队长加藤泊治郎又携特高课长西田象三等人到通化，与通化宪兵分队长儿岛少佐及长岛玉次郎等人，研究策划破坏中共南满省委及抗联第一路军的具体对策。同时决定第二次编成“长岛工作班”归通化宪兵分队指导。

第二次“长岛工作班”从1937年5月开始活动，到1938年8月结束。配合其活动的有日军独立守备队第1和第6两个大队、奉天警察讨伐队及关东军南防卫区黑崎贞明特设游击队。活动区域主要在桓仁、兴京（新宾）、本溪等县。主要目标为中共南满省委首脑机关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

“长岛工作班”第二次编成时，初期人员为30名，除“长岛工作班”原来的6名成员外，还将中共叛徒冯剑英等人及协和会特别工作班人员、伪满警察等人编入，以后不断扩充，人数最多时达百余人，其中骨干多为中共叛徒。

第二次“长岛工作班”与第一次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人员增加了外，班内还配备着轻机枪等武器，实际变成了特殊的谋略武装工作团。班本部设在通化。

1937年5月该班编成后，旋即开到桓仁、本溪、兴京三县的交界处活动。长岛玉次郎认为：这一带的群众大部都被抗联“赤化”，因此容易搜集到抗联和中共南满省委的活动情报。“长岛工作班”到达这一地区后，先以“通匪”的罪名逮捕了大批群众，严刑拷问，逼其招供抗联活动的情况。

后以提供抗联活动情报为条件，陆续释放。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长岛工作班”逐渐掌握了南满省委活动的地点在桓仁县第六区一带。同时还掌握这一带有200至300名抗联武装围绕南满省委活动。另外这一带还有相当数量的抗日义勇军和绿林武装，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聚集在抗联周围活动。

对此，“长岛工作班”将诱降的重点，第一步选定在抗日义勇军和绿林武装上。首先向和抗联关系较疏的天胜军、正国军、九龙、安阳、保海等部开展了攻势，派去说客，宣传满洲国建国五周年的“大赦令”，游说“到了放下武器的最好时机了，绝对保证生命安全”。同时通知配合诱降活动的日伪军警，加紧对这些武装进行讨伐，施以压力。结果1937年7月，在兴京县永陵街首先将义勇军的救国军、天胜军、正国、保国等部的120余人诱降，由黑崎游击队解除了武装。接着，8月又在永陵街南的小东沟，将九龙、安阳、爱国军、长林，安国军等部220余人诱降，解除了武装。不久又在兴京县的另一个地区，将义勇军海宗部70余人诱降。9月，在碱厂又将老边好部60余人诱降。长岛玉次郎在这些被诱降者中，挑出100人编入“长岛工作班”，其他370人移交给伪兴京县公署，遣送回乡务农。

“长岛工作班”第一步诱降了义勇军后，遂将矛头指向了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军。1937年底，由于上述投降者提供情报，“长岛工作班”掌握在桓仁县第六区老人沟一带，抗联第一军的后勤机关在军需部长胡国臣的带领下，正在为部队募集军粮、经费和武器弹药。于是，“长岛工作

班”在日军讨伐队的协助下，袭击了这一地区的抗联基地。战斗中25名抗联战士牺牲，2名被捕，募集来的大量军需物资被日伪军缴获。军需部长胡国臣受伤后逃脱。不久，长岛班根据2名被捕者提供的线索，又将胡国臣等9人包围，施放催泪瓦斯后，将其逮捕。

1938年1月，长岛班又根据前述被捕者的供述，掌握了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光勋的活动情况。安为东北抗联第一军的重要干部，负责一军的教育、训练、宣传及情报工作。“长岛工作班”在黑崎贞明特设游击队的配合下，又袭击了桓仁县牛毛大山的抗联据点，将受伤正在治疗的安光勋等人逮捕。由于胡国臣、安光勋等抗联第一军的重要干部被捕投敌，使抗联第一军及中共南满省委首脑机关的活动情况，完全暴露给了日伪方面。

1938年2月，关东军南防卫区司令官岩松美雄为彻底破坏中共南满省委，调集了1000多名日军，对南满省委机关活动的区域进行了严密封锁，限制粮食和日用生活品输入。然后，命令黑崎游击队密切配合“长岛工作班”开展活动。不久，日军配合工作班在桓仁县牛毛大山地区，将中共南满省委机关包围，战斗中抗联16名保卫战士及南满省委主要负责人兼组织部长李东日英勇牺牲。

“长岛工作班”破坏南满省委机关后，为搜捕逃走的省委干部，又以叛徒郭云山为首编成4个搜索班，每班4人装扮成朝鲜族樵夫、农民，深入到山区活动。结果省委救国会青年部长小刘等人又遭捕杀。至此，南满省委的主要干部大部被捕牺牲或投敌，南满省委亦被全部破坏。

中共南满省委被破坏后，关东军将“长岛工作班”改为关东军直辖工作班，派到安（丹）奉铁路沿线，以本溪湖、碱厂、赛马集为基地，开展了对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部的诱降活动。

当时正值“七·七”事变后不久，安奉铁路成了日军通过朝鲜输送兵力和军用物资的重要交通线。在这一带活动的抗联第一军第一师200多人，曾给日军的军事运输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长岛班在1938年4月开进这一地区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命令第1独立守备大队和奉天省警察特别讨伐队，全力协助长岛班的活动，加紧讨伐、封锁。

长岛玉次郎首先利用中共叛徒冯剑英、安光勋、胡国臣的关系，向程斌部派进5名叛徒充当特务。他们打入程斌部后，分头制造矛盾，开展分化瓦解活动。不久，由于受讨伐造成的困境和奸细的活动，第一师内部发生了动荡。先是第六团政治部主任甄二龙投敌，接着是师部保卫队政治委员刺杀程斌未遂带伤逃到了敌营。

长岛玉次郎得知对第一师的阴谋活动起到了作用后，先派人给程斌送去了诱降信，接着派叛徒胡国臣等人，到程斌的老家吉林省伊通县，将其胞弟及家眷劫到本溪湖第四区短脖沟，策划让程斌与其家眷会面，进行诱降活动。

1938年6月29日，在派到第一师内部奸细的安排下，程斌带61人到短脖沟与其胞弟会面。这时，“长岛工作班”与黑崎特设游击队将程斌所部团团包围。然后派叛徒胡国臣等人去喊话。程斌当即表示了投降之意，随即长岛玉次郎去与程斌直接交涉。在保证程斌生命安全，部下改编成伪满武装

部队的条件下，程斌带领部下放下了武器。程斌投降后，将在各处活动的100余人诱骗集合，让日军解除了武装。

程斌的投降，使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彻底被瓦解，使抗联第一军主力杨靖宇部失去了依托，活动全部暴露给了日伪方面，迫使其不得不撤离这一地区，向集安方向转移。南满抗日的大好形势，遂告丧失。

1938年6月，“长岛工作班”在本溪湖给程斌办理了投降手续，将其移交给了伪通化省警务厅。通化警务厅后以程斌部为主，编成了程斌警察大队。同年7月，长岛玉次郎又将共产党的叛徒胡国臣、安光勋等5人，也移交给了通化省警务厅，通化省警务厅也将这5名叛徒封为警察作战指导员，编入了程斌警察大队。

第二次长岛工作班由于破坏了中共南满省委，诱降了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功绩卓著”而受到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及关东军南防卫区司令官岩松美雄的奖赏。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特为该班颁发“赏词”，根据“赏词”长岛玉次郎等人得到定期授勋的待遇。

1938年7月，长岛玉次郎只身离开该工作班，回到了通化独立宪兵队。同年8月，通化省警务厅接管了长岛工作班的原班人马，调该厅警务科长富森熊太郎接替了长岛玉次郎的职务，将“长岛工作班”改称为“富森工作队”。

富森工作队的主要成员仍以抗联的叛徒为主，归伪通化省警务厅直接领导。

富森工作队设有本部，为该工作队的首脑机关，人员多系日本人，负责对抗联实行分化、瓦解和诱降的组织工作，

指挥调动各部对抗联实行武力围剿。另作为主力，将程斌警察大队编入富森工作队，改称“富森工作队程斌大队”。此外富森工作队还设有“别动队”和“富森工作队地方工作班”（也称富森工作班）。

程斌大队下设3个中队1个突击队，每个中队和突击队下设2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2个分队和1个机枪班，其主要任务是围剿抗联。1939年5月，日伪在吉林、通化、间岛三省组织了联合大讨伐，通化省警务厅为便于指挥警察讨伐队，成立了临时讨伐本部。对程斌警察大队进行了扩编，将以抗联叛徒为主的富森别动队编入程斌大队。并将程斌大队改称为“通化省警务厅第一讨伐队”，也称“程大队”。人数增加到300人。

富森工作队地方工作班，主要成员也均由抗联叛徒组成，它是专门对抗联第一军主力及中共地下组织从事侦察、情报、诱降等工作的特务组织。

1939年前后，随着欧洲政局和中国战场的变化，伪满的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在中苏边境随着局势的不断紧张，日苏冲突也不断加剧。而在伪满，日伪政权渴望的安定，虽历经多年讨伐围剿，但仍没达到“治安上所预期的目标”。尤其是在靠近朝鲜的“东南部”地区，以杨靖宇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长白、抚松、濛江、临江、集安、桦甸、金川等县，频频出击，用灵活的游击战争，把日伪政权搞的焦头烂额，使日伪方面无法将全部精力用于对苏作战的准备上。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为了尽快确立伪满的“治安”，



在1939年4月7日重新修订了“昭和14年度治安肃正计划要纲”，提出了在讨伐区域，要以捕杀抗联领袖，加强瓦解、归顺工作为重点的“治安肃正计划”。在东边道地区，关东军为消灭抗联第一路军，遂以辉南，金川、濛江、集安、临江、抚松等县为重点开展了讨伐活动。不久，关东军司令部又命令各防卫区司令官：要在1939年内彻底消灭防卫区内的抗日武装。

这样，关东军在东边道地区又重新制定了讨伐计划，决定以吉林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野副昌德少将为首，组织吉林、间岛、通化三省的日伪军警，联合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讨伐。这一计划最初按照关东军的要求，准备从1939年10月开始，年底结束，预算为300万元。但参与制定这一计划的关东军参谋北部邦雄中佐认为：“这一地区情况比较特殊，单靠武力讨伐，对已与民众相结合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抗联，效果不能很好”。因此他提出：“在这一地区要加强政治、思想、宣传等工作，延长讨伐期限，增加预算”的方案。10月1日，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伪满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治安部次长溥田朝美、野副昌德的代表北部邦雄开会研究了此事后，最后决定采纳北部的方案，将讨伐时间延至为1年半，增加经费预算为3000万元。

这次讨伐，日伪方面视其为是最后的治安工作，特别强调在军事讨伐的同时，伪政权、协和会等要与讨伐一体，并行“治本”和“思想工作”。并特别强调“归顺工作”。

在这场大讨伐的前夕，长岛玉次郎奉命第三次组建关东军直辖工作班，进入通化、临江一带活动。野副大讨伐正式

开始后，“长岛工作班”被调往前线，划归野副讨伐司令部直接指挥。第三次长岛工作班，也称“野副讨伐司令部第一工作队工作班”。其主要任务仍是开展诱降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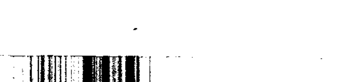
第三次长岛工作班编成不久，在片野特设游击队的配合下，采取封锁粮道等办法，首先在临江县红土崖地区将义勇军魏德诚部120余人诱降。10月下旬，根据日伪“东南部地区收降要领”将其改编为野副讨伐第一工作队“特设队”，也称“魏特设队”。

1941年2月，长岛工作班又在桦甸、抚松一带将抗日义勇军李司令部诱降，将其编入魏特设队内。

魏特设队在长岛玉次郎的指挥下，曾给在东边道地区活动的抗联第一路军造成了巨大的危害。1941年2月，该队在魏德诚的指挥下，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一部包围在桦甸县夹皮沟地区，激战中6名抗联战士牺牲。魏德诚为向长岛玉次郎请功，残忍地将抗联战士的头颅割下来，送到野副讨伐司令部，尸体弃置现场。

1940年2月，长岛工作班在抚松县抚松地区，将金日成部参谋长林宇城等16人诱降。同年8月，长岛玉次郎又以林宇城部为主，将陆续诱降的金日成的副官金某等30余人、第七团李团长等10余人、义勇军岳团长等60余人，共计百余人编成“林特设队”。林特设队的骨干成员均为朝鲜族叛徒，主要任务是对金日成部开展诱降和讨伐活动。

在这次联合大讨伐中，抗日联军的优秀将领杨靖宇、陈翰章等先后牺牲，但日伪方面一直没能搞清金日成部的下落，为此，日伪方面迟迟不能结束讨伐。后由于林特设队在



延吉县龙井地区诱降了金日成部的指导员朱在日等人，才最终搞清金日成率部下数人，已从珲春退入苏联境内。至此，日伪组织的历时一年半的三省联合大讨伐才告结束。

1941年3月19日，关东军在宣布东南部地区肃正工作结束的同时，发布了对长岛工作班及属下特设队的处理办法。宣布长岛工作班解散，将林宇城、魏德诚两个特设队的324名叛徒，移交给间岛省中原工作队。魏德诚、林宇城等人均被录用为伪满警察警佐。

1942年前后，日伪政权在所谓的“西南地区”又对八路军开展了大规模的围剿，并把在东边道地区讨伐镇压的经验，移植到了热河。这时，在东边道地区参加过讨伐镇压的大批警察队、宪兵工作班亦随之被调往热河。长岛玉次郎也在1942年10月被派往热河，转任西南防卫军配属热河游击队第一游击队队长，在热河省的兴隆、承德及河北省部分地区活动。魏、林两个特设队，也被派往热河，改为特务队配合长岛游击队活动。

第三次长岛工作班，由于在野副大讨伐中诱降抗日武装300余人，查清了金日成退入苏联境内的事实，又受到了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大将和讨伐司令官野副昌德的赏词。

日本帝国主义三次编成长岛工作班，给“南满”地区的抗日运动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长岛玉次郎等日本宪兵积极的活动代表了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的要求，也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进行残酷镇压的毒辣手段。长岛玉次郎在介绍他为什么能取得诱降成功的原因时说：

“1. 我所进行的诱降工作，是与日满军警的武力讨伐、

满洲国行政机关实行的经济封锁、压迫及协和会的宣传密切联系着的。

2．在选定诱降工作区后，除讨伐队外，限制一切人员出入，禁止一切生活必需品进入，由此配合诱降工作。

3．我还利用满洲国行政机关的基层组织开展诱降工作。在开展工作时，有时我将任务交给满洲国警察署进行。作为督励他们活动的手段，我有权向他们的上级机关提出晋级、免职、转职、表扬等建议，呈请其实施。对于乡长、屯长则采用欺骗、威胁等手段，迫使他们执行。如他们不答应，即通知警察或宪兵予以镇压。

4．为了欺骗利用当地居民参加诱降工作，有时我事先指挥特别工作班、警察或宪兵将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居民逮捕，然后我用欺骗的手段将他们要出来，胁迫加以利用。

5．对已被诱降了的人，有时我用赠送金钱、物品、在生活日用品上给以优待、保证将来地位等手段，将他们派入准备诱降的部队中，用以搜集情报，开展诱降工作。

6．我还经常使用向诱降目标派遣扰乱分子的办法，有时也利用父母、兄弟、友人等关系去收买诱降部队人员的办法开展活动。

当我完成以上准备工作后，认为有诱降可能时，遂通过各种关系给诱降对象送去劝降信。如对方有投降意思，我就用保证生命安全、改编为满洲国军警部队、希望归农者发给证明书和路费等条件去交涉。对已进行了工作，仍不肯投降的，我即向日满军警讨伐队提供所掌握的情报，指使他们协助加紧讨伐。同时通知满洲国行政机关，加紧对他们进行经

济封锁，消耗他们的武器、弹药、粮食等，使他们陷入疲劳、饥饿、丧失作战能力的困境。然后再利用协和会，加紧对他们进行欺骗宣传。尔后，我再派人送去劝降信，使其内部动摇。当重新有投降可能时，我再用前述条件去与之交涉。当他们答应投降时，我即命令把部队分散，予以缴械。”

通过长岛玉次郎的供述，我们可以看出，长岛工作班对东北抗日运动进行破坏的“卓越功绩”，决不是长岛玉次郎等几个日本宪兵个人能力所为，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控制伪满军警、宪、特、行政、协和会等机关联合行动的结果。长岛工作班在活动中指挥伪满各机关的权力，实际上就是行使着关东军的权力。长岛工作班也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东北人民抗日运动中的一支别动队，它的活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进行血腥镇压活动的一个缩影。

侵苏的秘密准备

（1939—1941）

一　关东宪兵的侵苏预演
——参与“诺门坎事件”

1939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更加动荡不安。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定后，整个世界除美洲外，到处都笼罩着战争的气氛或遭受着战争的威胁。在这一威胁中，社会主义苏联感受最明显，它面临着欧洲和远东两个方面，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威胁。

在世界政局不断动荡和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也在调整着侵略部署，急于从侵华战争中拔出脚来，参与瓜分世界的活动。

然而，日本在瓜分世界的战略部署上，一直受着“南进”和“北进”纷争的困惑。南进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支那半岛，从那里掠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尤其是支撑侵略战争需要的石油、矿石等军事工业资源。同时切断美、英等国在印度支那和缅甸的援蒋物资运输线，迫使国民党政权尽早投降，从中国战场上早日解脱出来。北进是攻击苏联，目的是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消除日本称霸亚洲的障碍。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宿愿。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以后，又进一步地加剧了日本帝国主义“南进”还是“北进”的纷争和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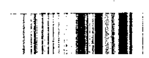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把苏联当成“假想敌”，坚持侵略苏联的政策，因此，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使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开始不断加剧，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都在远东地区增加了兵力。社会主义的苏联为防止日本法西斯侵略、掌握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和动向，加紧了对日的情报工作。关东宪兵队围绕对苏作战，从1938年起，也配合关东军进行了秘密侵苏的准备工作。

1939年5月，在中蒙边境距海拉尔市以南200公里的诺门坎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关东宪兵队在这场冲突中，配合关东军的行动，在各个方面演习了对苏侵略的准备活动。

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5月13日“诺门坎事件”爆发的当天，关东军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根据关东军“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中“一旦发生纠纷，可以暂时进入苏联境内，歼灭苏军”的规定，下令出动部队开展攻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23师团行动的同时，立即命令海拉尔宪兵队配合23师团行动，作好作战中的防谍及部队行动中的警备工作。海拉尔宪兵队当即派出中村久太郎等23名宪兵，配属到23师团，于5月15日随23团司令部一起渡过哈拉哈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搜集情报、警卫师团司令部、看押战俘、维持战地治安等工作。

与此同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得到情报，“苏联为扰乱



日军的后方阵地，摇动民心，已派出恐怖团深入到海拉尔”。于是，司令部又从新京、奉天、哈尔滨等宪兵队抽调50名宪兵赴海拉尔，在海拉尔宪兵队长指挥下，对海拉尔地区加强了警戒。此外，随着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沿白（城）阿（尔山）铁路向中蒙边境移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命令齐齐哈尔宪兵队，对这一地区严加警戒，加强防谍工作。

由于事变的不断扩大，6月下旬关东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越境攻击，（日本方面称其为“第二次诺门坎事件”）为配合这一行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命海拉尔宪兵队长，向23师团加派12名配属宪兵，直接参加军事行动。同时命令海拉尔宪兵队长统一指挥各地增援到中蒙边境的宪兵，对海拉尔地区的一切军事设施加强保护。

接着，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向邻近的齐齐哈尔宪兵队下达“尽快向阿尔山、王爷庙（乌兰浩特）地区派出兵力，与关东军山冈支队及王爷庙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加强对白城至阿尔山一线的防谍工作”的命令。随即齐齐哈尔宪兵队又向上述地区派出了宪兵。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推测，在“诺门坎事变”期间，苏联肯定要利用设在满洲里、哈尔滨等地的领事馆，操纵各地的谍报组织加紧活动，中苏、中蒙边境的谍报人员，围绕着“诺门坎事件”，也一定会采取各种手段，刺探关东军的情报，配合苏军行动。对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将正在筹建中的“无线电侦破特殊分队”调到了白城至阿尔山之间，与海拉尔、齐齐哈尔两个宪兵队内的反谍报宪兵，联合编成了4个“无线电探知队”，在海拉尔、索伦，王爷庙和阿尔山

4个地点，开展了对苏联谍报人员的侦破工作。

6月23日，伴随着23师团主力的大规模越境攻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决策人物警务部长齐藤美夫、高级参谋兼第一课课长松浦克己、第二课课长西田象三、第三课课长都筑敦等人又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宪兵在事件中的应急对策。最后决定依据关东军战时防卫令，将海拉尔、北安、齐齐哈尔3个宪兵队转入战时体制，直接交由防卫司令官指挥。同时作为应急对策，决定从新京、奉天、大连、锦州、承德、哈尔滨等内地宪兵队抽调130名宪兵，一部派至齐齐哈尔和海拉尔两个宪兵队进行增援，在两队长的统一指挥下参加作战，警戒重要设施和军事运输、监视民众、防范伪满军警起义、镇压侦察反战活动等工作；另一部集中到关东宪兵队教习队内，组建野战宪兵队，随时准备开进占领地，执行占领地勤务。

同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还向各队发布"严密注视各地治安，严厉打击反满抗日分子的活动，确保交通运输线的安全畅通"的命令。并对国境宪兵队特别提出，要对苏联方面加强监视。

根据齐藤美夫等人的策划，6月29日，第一批派出了山村少佐等44名宪兵，对滨（哈尔滨）洲（满洲里）铁路沿线和白（城）阿（尔山）铁路沿线进行了警戒。7月4日，关东军23师团全部越境，大规模的军需运输随即开始，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铁路沿线的宪兵队、分队，对作战物资严加警戒，加强防谍，务必保证军事物资的安全。

8月，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命令编成第6军。为协助第6军的后方运输，关东宪兵队又从新京、奉天、哈尔滨、牡丹江、安东等队抽调了大批宪兵，协助第6军在当地征用车马等工作。同时，随着关东军第7、第2、第4师团向诺门坎地区集结，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将集中在教习队内待命的宪兵抽出55名，派到东宁、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宪兵队内，担任上述师团行动中的警戒工作，及部队调走后原驻地的警备工作。

加强对伪满内部的控制和镇压

1939年5月，“诺门坎事件”刚刚发生时，关东军司令部即召开了情报工作会议，首先向各部门通报了战斗情况，要求各部门配合行动，搜集有关方面的情报。会上，关东军司令官命令关东宪兵队，密切注视事件对满洲国治安的影响，统辖各警务机关对伪满严加警戒，注意侦察民心的动向，防止民心动摇。同时，关东军向伪满发出“非常警备命令”并从军队抽调3个大队的兵力，作为“补助宪兵”，交给关东宪兵队指挥。“补助宪兵”佩戴“宪兵”标志，在各地，协助宪兵对车站、码头、军工厂、军需仓库、飞机场、燃料厂、燃料库、粮库、火药库等重要场所和设施，进行巡逻警戒。

对于事变期间伪满内部的治安问题，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曾专门召开了各地宪兵队长会议，会上警务部长齐藤美夫提出：“诺门坎事件的发生及影响，一定会给满洲国的治安带

来新的问题，因此，各宪兵队要结合管内的情况，完成如下警备工作：

1．调查、报告国内党团，乘诺门坎事件之机进行活动的情况。

2．对国内抗日党团的活动，要坚决予以镇压。

3．加强对民心动向的调查，严厉取缔流言蜚语、严惩造谣者。

4．加强对国外宣传活动的调查，彻底封锁外国的广播。

5．对重点地方的旅馆、剧场、影院、车站、码头、群众集会的场所，加强警戒和盘查。”

齐藤美夫还说：“可以设想，各游击队肯定会利用诺门坎事件而展开活动。因此，各宪兵队要注意对游击队的监视，尤其是要注意对抗联第三路军的监视，防止破坏战时的交通运输。”

1939年6月，“诺门坎事件”冲突进一步加剧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城仓义卫和齐藤美夫等人赶到了事变的前沿，对海拉尔宪兵队进行了视察。在此期间，由于抗联第三路军两次袭击白阿铁路，破坏了关东军的战时运输，加之大批的伪满兴安军临阵逃跑，城仓义卫等人认为，这肯定是苏联对满的阴谋活动所致，是苏联操纵抗联及“谍者”，制造、散布流言蜚语，扰乱民心进行巧妙策应的结果。对此，齐藤美夫代表司令官城仓义卫，向海拉尔宪兵队长安藤次郎下达命令：“要确保作战区域后方的绝对安全，加紧搜捕与苏联有关的抗日地下工作者及通苏嫌疑者，逮捕从苏联、外蒙进

入满洲国境内的抗日地下工作者，加紧调查事变地区的民心动向情况”。海拉尔宪兵队根据齐藤美夫的指示，将正在监视侦察的近百名嫌疑者全部进行了逮捕，以“战时利敌罪”为名，将绝大部分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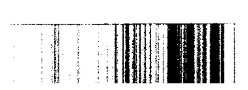
“诺门坎事件”后期，苏联加紧了对伪满的宣传广播，通过设在伯力的电台，不断地报导日军战败的消息。并使用飞机、橡皮艇等，将用日、中、蒙三种文字印成的反战传单向海拉尔地区散发，使日本战败的消息在伪满的西部国境迅速传播。日伪方面对此极为恐慌，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命令各宪兵队，要严厉禁止使用短波收音机，加紧反宣传，尽快安定民心。同时密切监视“莫铁”①工作人员的言行，一经发现有与莫铁员工接触者、或传播流言蜚语者，立即予以逮捕。

鉴于“诺门坎事件”在伪满引发的一系列情况，关东军司令部于7月16日向全伪满下达了“战时防卫令”，宣布伪满进入“战时状态”。同时命令关东宪兵队开始执行“战时防卫要纲”，统一指挥伪满的警务机关，在各地对交通、通讯等重要设施进行重点警备，严厉取缔“流言蜚语”，开始执行“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计划”。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根据关东军发布的“战时防卫令”，命令各地宪兵队，对各地活动的共产党和抗日联军，加紧进行思想对策工作，努力搜集情况和开展诱降、宣抚活动。在城市加紧逮捕潜入的地下工作人员。并配合军警作好10月份

---

① 指莫斯科至满洲里的苏联铁路。



参加吉林、间岛、通化三省联合大讨伐的准备工作。

根据关东军的“战时防卫令”，关东宪兵队还向各地宪兵队发布了“关东宪兵队战时防卫要纲”。其中规定：“在国境地区，有关宪兵队要以关东军防谍勤务令为根据，结合各自的防谍计划，加强和充实防谍网，搜索和破坏各国的谍报网”。根据这一规定，各国境各宪兵队在“诺门坎事变”期间，遂开展了如下的活动：

1．开始实施“秘标工作”。这一活动主要是在“北满”国境地区实行。根据伪满政府颁布的“国境地带法”，国境地带的居民和去国境地带的旅行者，必须携带伪满机关发的“居住证明书”和“旅行证明书”，随时接受检查。“诺门坎事件”期间，由于持伪造两证越境的苏联间谍大量增多，针对这种情况，关东宪兵队在国境地区推行了“秘标对策”，即在证明书上用各种手段施以秘密标志，宪兵通过检查伪造证明书，来发现间谍。（详见第五部分第二节）

2．在国境及部分要塞地区，配备了无线电探寻机，由宪兵和铁路警察联合组成搜查班，通过追踪可疑电波，搜查间谍的活动。

3．加紧了对往来于伪满信件的检查，试图从中查出间谍活动的线索。

4．在山海关、古北口、大连、营口、安东、开山屯、图们、绥芬河、满洲里9处关口及新京、奉天、哈尔策、牡丹江、齐齐哈尔5大城市增加了“外事班”的人力，对过往的外国人，尤其是苏联人加紧了跟踪。关东宪兵队明确指示各地外事班，要把侦察的重点放在苏联人身上，努力发现苏

联间谍。其次，争取查清国民党及英美等国在南满主要城市的情报网。同时命令各外事班，一经发现间谍线索，不得立即逮捕。要对其进行跟踪、侦察，尽量掌握其全貌。当需要逮捕时，必须采用秘密手段执行，待审讯弄清情况后，要尽可能将谍者送交特务机关利用。

参加对"诺门坎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

1939年9月上旬，"诺门坎事件"结束后，日苏双方在哈尔滨就"诺门坎事件"的善后问题进行了谈判。哈尔滨宪兵队受命对谈判地点及苏方代表进行保护。在此期间，哈尔滨宪兵队禀承司令部的旨意，以"保护"为名对苏联谈判代表进行了种种特务活动。为了刺探苏联方面对善后处理的真实意图，哈尔滨宪兵队曾在绥芬河至哈尔滨、满洲里至哈尔滨间的火车中，对苏联方面的谈判通讯员，施放过催眠毒气，试图窒息通讯员窃取苏方的秘密情报。

停战协定签字后，9月25日关东宪兵队又从哈尔滨、新京、奉天等队抽调26名宪兵，准备接收苏联遣返的战俘。9月27日，日方从苏联领回了第一批战俘88人，宪兵将其全部押往吉林市郊的九站陆军医院，由新京宪兵队派人看管，侦察其言行。

"诺门坎事件"中，关东军损失惨重，23师团几乎全军覆灭，万余人死伤。但由于武士道精神统治着当时的日本军队，关东军被俘者不足300人，而这近300人中，绝大部分是受重伤后，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下被俘的。即使这样，关东军



上下也认为是日本军人的耻辱，对接回的战俘采取了极不人道的作法。

关东军对战俘专门成立了“俘虏管理委员会”，将抽调的宪兵装扮成护士等，在吉林陆军医院内，监视和审查这些战俘。并在医院内临时开设了“特别军法会审”，就地对战俘进行审判。近 300 名战俘中，有30余人被特别军法会审判处死刑。战俘中职务最高的是一名少佐中队长，他因作战失职被俘，“俘虏管委会”在审判前命令他向天皇尽忠自杀，由宪兵交给他手枪秘密监督执行。其余的战俘均被押往各地修筑阵地，永远不准返回日本。

二　“满洲86部队”及其活动

由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国境地区日苏两国的间谍战也日趋激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从对1937年以后国境各机关逮捕的越境者中，发现携带性能优良的德制、美制电台的苏联谍报人员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一些首脑人物的重视，针对这种情况，1938年关东宪兵队教习队在制定年度训练计划时，司令部就曾指示："鉴于越境入满的无线电谍者不断增加的情况，在教习队内要开展特别无线教育，使之在今后的防谍工作中，对无线谍报活动有所了解"。这样，教习队长宇野植雄少佐亲自主持，从各宪兵队内抽调了14名宪兵（其中包括华北宪兵2名，朝鲜宪兵2名），首次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训练。训练聘请满洲国交通部无线技官松井义正主持，他讲授了有关无线电方面的基础知识，并对无线电台的结构，各部元器件的技术性能向宪兵作了介绍。训练中松井还向宪兵讲授了反谍报的方法，并将他正在研制的“电波方向探测器”及使用的方法要领，搜寻中的一些技术问题，向宪兵一一作了介绍。

但这次训练，也仅仅是为了“对无线谍报活动有所了解”，重点是放在对谍报器材的辨认上。利用无线电技术破获间谍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提到关东宪兵队的议事日程上。因此，这些宪兵受训后，都回到了原来所在宪兵队。其中仅

哈尔滨宪兵队派来的防谍系军曹大庭竹夫，归队后根据哈尔滨地区“谍报谋略活动异常活跃”的特殊情况，从防谍的角度将所学的知识，向同队的防谍班员作了传授。其它队受训的宪兵归队后连传授都未进行。

1939年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鉴于伪满西部国境苏联谍报活动异常频繁的情况，决定组建专门反谍报机构，于是将1938年3月在教习队受训的10名宪兵重新召回，并以他们为主，编成4个“电波搜查班”派往海拉尔、王爷庙、阿尔山、索伦地区。在这4个电波搜查班中，以宪兵曹长川口武男领导的海拉尔班最为活跃。当时该班在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将地线放在鞋底，头戴耳机，在海拉尔市周围到处游动捕捉电波信号。不久，利用这种落后的搜索技术，首次在海拉尔市的一家杂货店内，破获了一起地下电台，杂货店老板等6名苏联谍报人员被捕。经审讯查明，这架电台是受苏联赤塔指令局指挥，以海拉尔为中心，专门搜集关东军活动的情报，直接向苏联远东军报告。被捕的杂货店老板，后经伪满方面认证，还是一个向伪满捐献过巨额国防献金的“亲日”人士，在设置地下电台房间的墙上，还挂着关东军发给的“表彰状”及日本天皇像。

一个“亲日”人士原来是苏联间谍，这对关东宪兵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由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对反谍报工作认真地进行了考虑，不久，警务部长齐藤美夫组织各课重新调整了反谍报活动的部署，规定各宪兵队在防谍工作中，如发现无线电谍报人员，必须立即向警务部报告，必须在警务部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工作。对已发现的谍报人员，不

准随意逮捕，要围绕其活动暗中开展侦察。当被侦察者有逃跑的兆头需立即逮捕时，也需请示警务部批准。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下一步反谍报活动作准备。

另外，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还决定，在第三课内增设警务部直辖“通讯器材班”（也称警务部第四班），专门担当反谍报器材的研制工作。第四班成立后，不仅研制了“无线电方位探测器”“电波搜寻机”等器材，而且还对这些器材在使用中的伪装携带方法等进行了研究，并专门制造了一批伪装器械。

警务部直辖“通讯器材班”在初设时人员为32名，除少量宪兵外，多数人是以关东宪兵队“嘱托”名义雇来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了活动保密起见，工作场所设在远离司令部的新京宽城子的一所平房内，工作人员均着便装。

由于苏联谍报人员和电台在伪满不断被发现，关东宪兵队的首脑机关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从将来对苏作战着想，还是从镇压伪满境内的反满抗日活动考虑，都必须围绕苏联的谍报和谋略活动，开展经常性的技术研究和训练。关东宪兵队的一些高级参谋中，也开始酝酿设立一个专门技术机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专门担当科学防谍、防谋略、及培养特殊人材任务。关东宪兵队高级参谋们的这种想法，不久得到了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城仓义卫的支持，经关东军司令部批准后，总务部受命制定编成方案。

1939年8月1日，在“诺门坎事件”作战正酣之际，关东宪兵队“特设宪兵队”（亦称满洲第86部队）在警务部“通讯器材班”的基础上正式扩充编成。该队编成的宗旨是：

“为准备对苏作战，利用各种科学手段侦破、镇压满洲国境内的反满抗日活动，捕获地下无线电台，鉴定各种破坏手段，逮捕破获各种类型的谋略破坏集团，配合关东军的军事行动。”

“特设宪兵队”的性质，属关东军秘密部队，与关东军各独立部队统一编制番号。队址设在伪新京特别市原东支铁路① 管理局旧址。其活动依据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命令，“在关东军行动区域内活动。其任务是担当培养特殊人材，研制特殊工作器材、技术药品、物资等工作。”

“特设宪兵队”初设时，定员为150人，下设6个分队，首任队长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毕业生宪兵中佐山村义雄。1939年8月编成时大致情况如下：

队长　山村义雄　中佐

副官　印南武雄　少尉

本部副　龟山三郎　少佐

第一分队（无线电搜索）长　吉田文武　大尉

第二分队（无线电搜索）长　喜冈安直　大尉

第三分队（指纹）长　四宫祐二　准尉

第四分队（法医、细菌）长　菅原三治郎　少尉

第五分队（照像）长　菅原三治郎兼

第六分队（科学）长　龟井真清　大尉

特设宪兵队编成后，立即得到了关东军拨给的大额活动经费，队本部器材班旋即派出大批人马，去东北各地及日

① 即中东铁路。

本，采购特务活动所需的电讯、法医、细菌、照相、指纹、化学等方面器材。经过3个月的准备，一切工作就绪后，关东宪兵队下令各地宪兵队，推荐人员接受训练。

特设宪兵队成立初期，教员均是从伪满和日本聘来的素质较高的专家、学者担任，其中，法医、解剖等课程，从奉天医科大学、新京医科大学、名古屋医科大学请了毛利，桥本、小宫3位医学博士任教；生物、化学等课程，从新京大陆科学院请了5位农学博士任教；法医现场照相、鉴定等课程，从伪满治安部请了日籍技官佐武治郎任教；照相学和一般照相课，从满洲航空株式会社请了小坂信任教；特殊照相机的使用，从关东军司令部请了兵技少佐中林修一任教；洗像、解像技术从满洲国映画社请人担任。此外，特设队还从伪满治安部及日本国内请了大批技术人员，担任指纹鉴别等方面的教学。这些人被聘来后，都以特设队“军属教官”的身份任教。

从各宪兵队抽调的人员，经半年训练后与原队脱离关系，转入特设宪兵队。特设队以这些人为技术骨干，编成了特设队的各个分队。

关东宪兵队无线探查队

“特设队”中的第1、第2两分队，是反谍报分队，也是特设队中最活跃部门。1940年前后，他的首先研制成功了“大功率自动电波搜寻机”（可在大范围内自动记录电波的活动情况）和“手提式电波方位探测器”。1941年5月，首

次派出探查班携带仪器进入牡丹江地区活动。当时正值“关特演”期间，关东军准备进攻苏联的主要兵力在这一地区布设，因此，关东宪兵队也认定牡丹江是苏联间谍最活跃的地区。

探查班抵达牡丹江市后，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捕捉到了1部地下电台的活动情况，确认这部电台每星期五凌晨2点活动。于是，探查班利用仪器开始了测查。当测查马上就要接近到目标时，地下电台突然停止了工作，电波完全消失。探查班在认真检查仪器后，认定是地下电台本身发生了故障后，耐下心来继续监视，结果1个月后当这部电台又重新活动时，探查班遂将谍报员张文善等人捕获，缴获美制电台一架。经审讯查明，张文善等人是经苏联谍报机关专门训练的谍报人员，其活动目标重点是侦察关东军第3军及航空队等部队在牡丹江一带的布防情况。无线电探查班不久又在这一地区将在莫斯科通讯学校受过谍报训练的谍报员刘某连同电台一齐捕获。

通过探查班在牡丹江地区的活动，特设宪兵队认为，所研制的反谍报器材性能良好，无线电搜索两个分队已经掌握利用无线电探测技术进行反谍报活动的能力，遂准备全面开展活动。

但特设队的无线电搜索技术，不久在奉天又遇到了新问题，引起了一些部门对其作用的怀疑。事情是这样：1941年11月，特设队在新京通过使用大功率自动电波搜寻机测定，奉天地区有地下电台在活动，于是特设队以第1分队长吉田文武少佐为首，编成了无线电探查班，进入奉天地区，分3

个小组从3个方向测查搜索。不久探查班在铁西区工业大学附近，捕捉到了呼号为K_2L的可疑电波，经一段侦测后，解明该电台的指令局在苏联的伯力，潜伏地点在铁西区一个半径3公里的地区。每次发报用时12分钟，时间为凌晨2点。根据这一情况，吉田少佐将全体探查班员集中到了这个半径3公里的地区，利用每次暂短的12分钟发报时间，在电波方向探测器的指示下，接近目标，不久，将地下电台潜伏点缩小到了半径500米内，然后通过"三点式交差测式法"最后确定了发报的房间。当探查班正准备冲进房间逮捕发报者时，发报结束电波随即消失了。于是探查班与奉天宪兵队取得了联系，决定在下次发报的12月25日，由奉天宪兵队执行逮捕。12月25日两部宪兵都事先进入了指定地点，当K_2L电波出现后，探查班即带领奉天宪兵队宪兵冲进了一户住宅。但经过2个多小时的反复搜查，一无所获，没能搜到谍报活动的一点证据。对此，探查班受到了奉天宪兵队的奚落，特设宪兵队存在的价值也受到了关东宪兵队一些人的怀疑。第1分队组成的探查班，沮丧地返回了新京本部。

第1分队探查班返回本部后，特设队继续用大功率自动电波搜寻机，从每天晚8点到翌日晨5点，对呼号为JZX的苏联伯力指令局进行监视。1942年7月的一天，队员坂田常穗又捕捉到了K_2L电台的呼叫，于是特设队立即与有关方面联系，请求协助确定方位。后经联合测定，最终判断潜伏电台仍在奉天一带活动。于是，特设队又向奉天派去了第2分队，以分队长喜冈安直为班长，第二次编成无线电探查班。

探查班抵达奉天后，首先以K_2L电台第一次发报的电

波感度、消音等项技术性能为依据，在奉天郊外设若干个测查点，从四周逐渐向电台中心接近。这样，当这部电台第一次发报完了后，探查班即将它的活动方位确定在了半径3公里的范围内，随即探查班迅速集结到了这一地区，准备在第二次发报时，利用小型电波方位探测器最后接近目标。但当宪兵准备最后逮捕时，又由于狗叫使谍报活动中断，致使特设队在奉天的活动又一次遭到了失败。在这以后K_2L地下电台潜伏了5个月没进行活动。

特设队第2分队在奉天活动失败后，主力没有撤回新京，而是确信K_2L地下电台还将要在奉天活动，于是探查班又重新分成3个小组，在3个地点测查，等待K_2L台第三次活动。

1943年2月1日，探查班终于又测到了K_2L电台的活动，并将潜伏点确定在奉天南部15公里处的藤泽制药工厂内。旋即探查班又与奉天宪兵队联系，准备在发报时进行逮捕。2月10日凌晨，探查班和奉天宪兵队共30余名宪兵，联合编成“确定工作班”和“逮捕工作班”秘密包围了电台潜伏点。当K_2L电台刚一呼叫，宪兵即刻冲入房间，将室内的2个农民装束的人逮捕，接着进行了认真的搜查。但发报机，始终没找到，仅找到了一段铜线。探查班认定铜线就是发报机的天线，于是对被捕者进行了审问。宪兵先抓过被捕者的手进行检查，发现一个人的手不像农民手那样粗糙，与其装束不符，认定他就是谍报员。这时一个宪兵走到他背后突然喊了一声潜伏电台的呼号，发现他顿时一惊，宪兵根据这个人的表情变化，确认发报机一定藏在室内。接着30余名

宪兵进行了破坏式搜查，在扒开火炕后在炕灰中搜出了发报机和密码本。这样特设宪兵队历时1年3个月，终于破获了这部苏联间谍电台，向关东军和各宪兵队证实了其存在的价值。被捕的苏联间谍系中国人，名朱福山，曾在苏联间谍机关受过特殊训练，电台的活动目的，主要是报告奉天周围的军事情况及满洲飞机会社的生产情况。

关东宪兵队特设队，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苏联对东北进行谍报活动的指令系统和关系。

1944年5月25日，关东宪兵队进行了改编，特设宪兵队第1、第2分队独立编成关东宪兵队"无线探查队"。1945年8月1日，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将宪兵、特务机关、兵站警备队联合编成"关东军特别警备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向通化转移，这时无线探查队转入战时体制，脱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指挥，改为"第1特别警备队无线探查队"，下设本部和3个中队，同时向第2、第3特别警备队管辖区域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派出了派遣队。1945年8月1日，无线探查队变更隶属关系后的组成情况如下：

本部（78人）

队　　长　宪兵中佐　松永光治

副　　官　宪兵少尉　林幸　男

战务课长　宪兵中尉　雨宫初二郎

教育队长　宪兵少尉　西田晴夫

第一中队（113人）

中队长　宪兵大尉　村井　博

哈尔滨派遣队长　宪兵少尉　久保田捨己

大连派遣队长　宪兵准尉　坪内日暲一
奉天派遣队长　宪兵少尉　神津幸久
东奉天分遣队长　宪兵曹长　村松林平
安东分遣队长　宪兵曹长　柴崎庆三
第二中队（75人）
中队长　宪兵大尉　宫崎末男
牡丹江派遣队长　宪兵少尉　西原贞夫
佳木斯分遣队长　宪兵军曹　石田金一
延吉分遣队长　宪兵曹长　张替次郎
第三中队（72人）
中队长　宪兵中尉　木村欣一
齐齐哈尔派遣队长　宪兵少尉　鹰羽秀三
海拉尔分遣队长　宪兵曹长　山中一男

关东宪兵队科学侦谍班

特设宪兵第3分队，属科学侦察分队，其主要业务是研究、采集、利用和管理指纹。日本帝国主义为有效地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在伪满成立后不久，即把日本警察制度中的指纹制度移植到了伪满，在新京成立了“指纹管理局”，并颁发了“指纹法”。第3分队主要是为所谓的“谋略防卫”而设置，成立后在中苏边境的一些地区，采集了大量工人和居民的10个手指指纹，作为基础资料。在所谓谋略事件发生时，第3分队经常被派至现场，通过勘察、印证指纹，配合破案。指纹分队在特设宪兵队中的地位不很突出，其活动也较

其它分队的活动略为逊色。

第四分队，属“反谋略破坏”分队，其主要任务是从医学角度研究防细菌破坏的办法，它与关东军“731细菌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关系较为密切，同为关东军从事细菌战的秘密部队。它与“731细菌部队”所不同的是，“731部队”是为进行细菌战而研制细菌武器，第4分队是为防细菌战而研究细菌，因此，该分队十分注重细菌战方面的训练。满洲医科大学医学教研室和细菌教研室的泉正一、照井二郎、桥本多计治等人，经常被聘请到分队讲课。1940年5月，该分队曾全体被拉到哈尔滨郊外的“731部队”，进行实地训练，目的是增进对细菌的鉴识能力和防疫能力。该分队在日伪期间，曾主持制定了伪满的“细菌战防卫对策”，并研制了对毒品、细菌实体、头发等的检验和鉴别方法。

第5分队，也属科学侦察分队，其主要活动是研究现场勘察、特种照相，笔迹鉴定等技术，分队组建初期，曾从满洲航空株式会社请人，对全体队员进行了空中摄影、地图绘制、显像、晒像、放大等业务的训练。以后又从伪满治安部分室（保安局）第七科聘请特务警察，传授了指纹照相、显微镜照相、红外光远距离照相、笔记鉴定照相等方面的技术。第5分队在伪满后期还曾研制了打火机微型照相机等间谍活动器材。

为适应伪满末期宪兵、警察大量跟踪、盯梢活动的需要，从远距离拍摄被跟踪者的活动情况，第5分队还曾派专人去日本富士胶片工厂学习，准备开发制造远红外线照相用胶卷，试图利用红外光技术在黑夜无光的情况下，拍摄跟踪目

标的活动情况。这些技术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

另外，为侦破标语、传单等反日宣传品的来源，第5分队还从印刷方式、纸张性能等技术问题，研究了侦破宣传品来源的方法。

第6分队是特设宪兵队科学侦察活动的主体，其活动在特设宪兵队中占据重要地位。因该分队长是宪兵大尉龟井真清，故在关东宪兵队中也常将其称为“龟井队”。分队下设物理、化学、冶金、思想等班，并相应地设置了物理、化学、冶金、电器等实验室，特务活动的设备、器材十分齐全。该分队组建初期，为训练队员，曾从满铁大连科学研究所、满洲大陆科学院等部门，聘请了大批著名专家学者任教。该分队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在思想对策和防谍两项工作中，对各种事件反映出来的现象，通过物理、化学等科学手段，研究侦破的方法。例如：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东北的思想控制，各宪兵队加紧了对往来伪满信件的开封检查。但开封后如何处理确成了一个问题。对此，第6分队物理、化学两班曾联合研究了密写墨水的显像方法，信件的开封及裱糊技术，并对各地宪兵队负责信检的宪兵，组织了训练。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两国军队在作战阵地前沿，都使用军犬进行巡逻，这给日军惯用的偷袭战术带来了许多麻烦。关东宪兵队在进行特务活动中，因遇狗叫而造成失败的情况，也不止一次发生过。对此，第6分队专门组织人力研制了狗安眠药“K剂”，这种药只要狗嘴一接触，狗就立即失去知觉。这一技术研制成功后，特设宪兵队将其

交给了关东军兽医部队（即100部队）大批量生产。1944年前后发放到了太平洋战场的日军各部队。使用中受到了各地日军的欢迎，一度被称之为“降狗妙药”。

第6分队除以科学手段研究特务活动的方法外，一部分人还专门负责研究特务活动的手段。例如：伪满后期，日苏两国在东北进行的间谍战十分激烈，关东宪兵队把苏联设在伪满各地的领事馆，视为指挥间谍活动、领取经费，领取谍报器材的据点，遂围绕各领事馆展开了各种反间谍秘密活动。对此，第6分队曾专门研究发明了“纸币对策”，即将伪满中央银行兑换给苏联各领事馆的货币号码，登记备案，向各地警宪机关通报，以此发现从领事馆领取活动经费的苏联间谍（详细内容见第五部分）。

1940年3月，第6分队为开展“谋略防卫业务”，曾组织全队对各种谋略活动的分类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编写了“谋略破坏类别”教育资料，以满洲86部队亀井队的名义，向各地宪兵队下发，从理论上对各地宪兵队的“谋略防卫”活动进行了指导。“谋略破坏类别”是按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编写，从对象、手段、方式等几个方面叙说了谋略破坏的种类，并例举了多种谋略破坏的具体方法和事例。日本投降后这部资料被缴获，我们从其内容中看到，第6分队编写和下发的这一资料，不仅反映了关东宪兵队对谋略破坏的理解，也包含着准备开展对苏谋略活动的一些想法。第6分队后来配合这一想法，还研制了一批进行谋略活动的器材和药品。1941年“关特演”期间，关东宪兵队为准备越境从事谋略活动，就将第6分队研制的一种无色无味催眠药，向中苏边境

的一些宪兵分遣队发放。

第6分队不仅对谋略活动所需的器材、方法进行研究，还直接参加对反满抗日活动的侦破。1942年8月，牡丹江东宁大肚子川的关东军弹药库发生了大爆炸，"关特演"期间储备的供3个师团作战用的弹药化为灰烬。关东宪兵队最初认定是苏联间谍所为，故特命第6分队前去进行科学调查，后经第6分队反复的验证，查明爆炸是炸药自燃所造成。

另，1938年以后，大连码头仓库、周水子关东军陆军仓库、大连三泰油房等地，陆续发生了近百次莫名其妙的大火，使日寇从东北掠夺的大量准备运回日本的物资及储备的军用被服屡屡被烧。这股地下火焰使日本帝国主义防不胜防，直到1941年关东州警察也没查清火灾的原因，由此在大连地区流传起了天火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第6分队在1942年被派至大连协助破案。结果查明"放火的手段是利用化学品自燃进行引火，纯属谋略放火"。故关东州警察部和大连宪兵队以此为根据，围绕工人聚集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侦破活动，终于破坏了以纪守先为首的抗日地下组织"大连放火团"。

1944年5月20日，关东宪兵队进行机构改革，将第3、第4、第5、第6分队联合编成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科学侦谍班"，也称"司令部第四班"。翌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编成时，"科学侦谍班"又被编入第1特别警备队司令部，班名如故。1944年5月"科学侦谍班"编成时，班址设在伪新京特别市宽城子一带，班员100人，其

主要干部有：

班长	宪兵大尉	长岛恒雄
指纹	宪兵大尉	矢口　正
法医	宪兵准尉	山口　弘
化学	宪兵少尉	镰田光治
照相	宪兵少尉	村越　清

川口无线探查班

关东宪兵队特设队，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侵略军中设置最早、发展最快、技术水平最高、人员、器材最完备的一支科学侦察、谋略机构。它不仅在镇压东北人民、对苏开展秘密战中充当了罪恶角色。而且它研制的技术，特务活动的手段、方法，也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大量地被移植到了华北、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它所培养的人员，也大量地被调到各个战场，充当以科学手段镇压各地人民反抗的骨干，给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例如，太平洋战争后期，拥有350人为侵华日军中规模最大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直辖无线探查队，就是由关东宪兵队特设队派人进行训练，具体指导编成的。这支特殊部队编成后，曾给整个华中地区的地下抗日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再如，1941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为准备发动侵苏战争，曾编成第2野战宪兵队驻于伪满新京待命训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2野战宪兵队被配属到25军隶下，开赴到东

南亚作战。其中特设宪兵队无线探查队川口武雄等16名宪兵，亦被配属到这支野战宪兵队中。1942年5月3日，川口武雄等随队侵入新加坡后，独立编成“川口无线探查班”，与当地的特别警察队一道侦察、搜寻新加坡市内的英美及国民党的地下谍报组织。不久，该班即将国民党系统潜伏在新加坡的谍报站站长陈奇山等9人捕获，破坏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就安插到这一地区的谍报站。接着，川口班又在当地日本宪兵的配合下，将国民党在马来半岛上的谍报组织逐一破坏，使国民党在这一地区苦心经营的地下谍报网基本上全军覆没。以后，川口班还协助日25军参谋部，收买利用被捕获的国民党谍报站，向重庆提供了半年多的假情报。

1942年7月16日，川口探查班又被派往泰国，在曼谷的一所大学校园里建立了探测点，对这一地区的地下谍报组织开始了侦察。不久，首先将伪装成电器修理店的国民党军统系统的谍报站侦破，逮捕了报务员吴剑峰等人。通过审讯判明，国民党军统局长期以来就派人在这一地区潜伏，搜集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吴剑峰等人还向川口班提供，在曼谷地区除有国民党军统系统的谍报组织外，国民党外交部也有谍报站。但当川口班根据吴剑峰等人提供的情况去逮捕时，外交部谍报工作站站长兰东海等人事先察觉，已经逃跑。于是，川口班根据侵泰日军司令部的指令，利用吴剑峰等人，开始向重庆提供假情报，骗取国民党对泰国地区的侦察意图，日本投降后，吴剑峰被国民党逮捕判刑。

1944年3月，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随着盟军在东南亚各战场的大反攻，日本彻底失败已经

确定无疑，在这种情况下，旅居泰国华侨中的地下抗日活动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对此，川口探查班抽出7名宪兵，与10名曼谷宪兵合编成“义第三班”，专门以曼谷的华侨聚居区为目标，侦察地下谍报活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义第三班在曼谷市的华侨香蕉园，将国民党的地下谍报组织彻底破坏。由于川口探查班的活动，使国民党在泰国的谍报网又被破坏殆尽。

三 研究统治远东占领地的办法及编成“野战宪兵队”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德苏开战，使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关于“南进”“北进”的纷争进一步加剧。一派认为：“德苏战争意味着日本可以从北方苏联的沉重压力下解放出来，放手南进，从东南亚取得大量的石油、钢铁、橡胶等战争资源，建立自给自足的态势”；另一派则认为：“德苏开战意味着北方苏联的削弱，应乘机北进，消弭隐患”。在这两种争论相持不下的情况下，6月24日，大本营陆海军部拟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提出“对德苏战争，日本暂不介入，仍坚持为解决中国事变而努力，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向南方扩展。同时，秘密作好对苏作战准备，根据形势演变，待德苏战争的进展对帝国极为有利时，再以武力解决北方问题”。这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即为希特勒的侵略活动所动，有意东西夹击最终消灭日本称霸亚洲的障碍苏联，又想火中取栗，谋取东南亚地区的资源。“要纲”中所提到的“极为有利时”，是指苏维埃政权受到德国攻击崩溃或苏联远东地区陷入混乱时。

但“要纲”并未消除日本内部的争论，事隔三天的6月

27日，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为首的一伙又提出："要下决心立刻参加德苏战争，先搞北面，然后再搞南面，在此期间解决中国事变"。松冈等人的根据是"现在德苏已经开战，日本虽然可以暂时观望，但迟早要卷入进去，待德国击败苏联后，再谈解决苏联问题，在外交上不好办。因此必须在德苏战局未定时动手。另外，立即打苏联估计美国不会参战，因为美国讨厌苏联，如先搞南边，向法属印度支那扩张，可能酿成与英美的战争。如果象帝国国策要纲决定的那样，南北都观望不动，日本将遭到英美苏的包围，因此作为国策，就应该立即攻打苏联，向苏联开战。"

6月27日夜，日本在新形势下如何确立施策问题上，又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紧急会议，陆军方面支持松冈洋右立即对苏开战的主张，提出修改大本营拟定的纲要，将"秘密作好对苏作战准备"修改成"在决心行使武力的情况下开始秘密准备"。但由于海军方面的反对，松冈的提议未被通过。这样7月2日御前会议最后通过了大本营拟定的要纲中的主要精神。

1941年7月，根据御前会议批准的"秘密作好对苏作战准备"的精神，日本陆军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动员，大量的24岁到45岁的预备役中青年，在中国东北和日本被应征入伍，补充进了关东军。一时东北的铁路、港湾、码头都为运兵部队所充塞，堆积如山的作战物资聚集到了东北。关东军的作战师团从12个增加到14个，所有师团都补满编为战时定员，总人数从备战前的40万猛增到70万。这次行动日本帝国主义为隐匿其真实企图，称之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

略称“关特演”。

第1、第2、第3野战宪兵队

在这次行动中，为配合未来的对苏军事占领，管理占领地治安和维持占领地秩序，日本陆军下令编成3个“野战宪兵队”，开赴中国东北，准备随关东军进入苏联。3个野战宪兵队均为战时体制，设有司令部和宪兵队两部分。

第1野战宪兵队司令部于1941年8月7日在日本国内编成，司令官为关东宪兵队原警务部长梶荣次郎少将。8月中旬从大连上岸后，下旬被运到伪满东部国境的密山待命。11月中旬，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从密山又移到伪满新京的宽城子。1942年1月下旬，第1野战宪兵队开赴东南亚作战后，该司令部被解散。

第1野战宪兵队与司令部同期在日本编成。人员是由日本宪兵司令部召集的预备役宪兵组成，总人数为400人，队长为宪兵中佐太田清一。组队后8月上旬随司令部出发，下旬抵达东北。最初被配属到第8师团隶下，不久移驻于掖河地区，一面协助东安宪兵队在东部国境警戒，一面加紧进行侵苏的准备训练。1941年下半年，侵苏德军在斯摩棱克附近遭到苏军阻击后，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德苏战争将进入持久战，苏联及远东地区一时很难出现“极为有利的时机”，故在8月下旬打消了在1941年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决定“无论德苏战争如何，日本将专心致力于南方”。在这种情况下，同年11月上旬，第1野战宪兵队被调往葫芦岛。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第1野战宪兵队随日第14军参加了进攻菲律宾的作战。以后改为第14军宪兵队，也称“比岛宪兵队”。

第2野战宪兵队司令部也于1941年8月在日本编成，在大连登陆后驻屯于伪满新京待命，司令官为高场龟鹤少将。

第2野战宪兵队也于司令部同期在日本编成，队长为宪兵中佐大石正幸，8月中旬在大连上岸后，驻于关东宪兵队教习队内，专门进行侵苏前的准备训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队被编入25军作战序列，1941年底随25军开赴马来西亚作战。

第3野战宪兵队于1941年7月16日根据日本陆军省命令，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在关东宪兵队教习队内编成，人员均从关东宪兵队各队和教习兵中抽调。编制也按战时配备，分司令部和宪兵队两部分，其编成情况如下：

司令部：

司令官	大野广一	少将
总务部长	儿玉正范	大佐
特高课长	池田　清	少佐
警务课长	柳生　馨	少佐
庶务课长	和田都重	中尉
经济课长	松隅　某	少尉
卫生课长	中村　某	大尉

以下还有企划课长、暗号班长等20余人。

宪兵队：

队长	久住健二郎	大佐
副官	高薮佐一郎	大尉

下设4个中队

第1中队长　矢岛七三郎　大尉

第2中队长　小林庄吉　大尉

第3中队长　须乡季三　大尉

第4中队长　谷口　清　大尉

中队下设庶务、特高、警务3股，每中队下设2个小队，小队长由宪兵中尉担任。小队下设3个分队，每个分队15名宪兵，全队400人。

第3野战宪兵队8月2日编成后，开赴到牡丹江郊外，重点进行了俄语、游击战、毒瓦斯等方面的训练。

在此期间，关东军司令部专门设置了第五课，也称“秦机关”，以秦彦三郎少将为机关长，组织各部门对占领地统治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第3野战宪兵队司令官大野广一根据秦机关的命令，命令部下青木益夫等人，立即研究编写指导宪兵将来在占领地活动的教育资料，不久，青木等人即推出了“野战宪兵经济工作”和“经济警察服务指针”两部资料，并作为指导宪兵对占领地进行经济掠夺的应急教材，秘密对第3野战宪兵队进行了训练。战后，这些秘密准备侵苏的证据被缴获，从中看到了第3野战宪兵队侵入苏联后，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经济掠夺和经济统治的一些想法。其中“野战宪兵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有：

“（一）野战宪兵担当经济工作的依据

1．野战宪兵的经济工作观念；

2．经济战的重要性；

（二）野战宪兵将要担当的经济工作

1．远东苏联的经济特征；

2．预想中的经济战；

3．军事占领地的经济工作方针；

4．在作战各阶段与之相配合的经济工作设想；

（三）宪兵在占领地担当经济警察工作的主要任务

1．重点任务与一般任务；

2．搜集经济情报；

3．关于货币工作；

4．关于金融工作；

5．关于物价和利润政策；

6．关于物资工作；

7．关于产业工作；

8．关于企业工作；

9．对经济犯的搜查。”

第3野战宪兵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牡丹江调到大连，经补充后，1942年1月22日被编到16军隶下，司令部解散，宪兵队随16军开赴东南亚作战。

第3野战宪兵队在开往东南亚的途中，在船上进行了马来语的简单会话训练和东南亚基本常识的教育。同年3月初，经苏腊巴亚和雅加达海战后，随16军在爪哇西部登陆，16军占领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后，第3野战宪兵队进行了搜捕残兵、接管物资、保护资源、维持治安、羁押当地要人等工作。1942年4月，日军完全占领爪哇后，第3野战宪兵队改称为“第16军宪兵队”，也称“爪哇宪兵队”。552名宪兵分成13个分队，15个分遣队配备在印尼各地，镇压印尼

人民的反抗。

第8野战宪兵队

1943年下半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扩大，大批的关东军作战部队被调到东南亚战场。同年11月5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命令，命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负责从属下各队抽调兵力，组建第8野战宪兵队，派赴东南亚作战。

11月13日，第8野战宪兵队在伪满新京编成后，受命脱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指挥，转入关东军司令官隶下待命。第8野战宪兵队人员为400人，其主要干部如下：

队长　宪兵中佐　阿部起吉

副官　宪兵中尉　桥本寿男

队附　宪兵少佐　平野幸治

队附　宪兵中尉　生岛八十一

队附　宪兵中尉　寺本史郎

第一中队长　宪兵少佐　菅原三治郎

第二中队长　宪兵少佐　古川与嘉

第三中队长　宪兵少佐　小田村利武

第四中队长　宪兵大尉　末冈高次

1943年12月1日，第8野战宪兵队受命脱离关东军司令官指挥，转入第2方面军作战序列。翌年1月从伪满新京出发，经大连上船开往澳大利亚作战。2月9日在澳大利亚北部登陆后，划归驻地日本海军司令官指挥。不久，根据第2方面军阿南惟几大将的命令，从第8野战宪兵队抽调两个中

队的兵力，临时转属到第5野战宪兵队，配合日第19军（司令官富永信政中将）在新几内亚和阿拉弗拉海方面作战。新几内亚的一些岛屿，是重要的香料产地，因当时这一地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使日军对香料掠夺极为不便，增援第5野战宪兵队，主要是利用宪兵采取以物易物的手段，对这一地区的香料进行掠夺。

第8野战宪兵队本部及另外两个中队，登陆后迅速在澳大利亚北部展开，配合侵澳日军开展了军事地理、民俗民情、自然资源等方面的调查，进行了搜查无线电谍报人员，镇压当地人民反抗等活动，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四　强化对伪满的思想控制及编成“思想宪兵队”

由于日伪政权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接连不断的军事讨伐，及在各地大规模推行“集团部落”“保甲制度”“无人区”等法西斯政策，到1940年以后，东北武装的抗日运动进入了极艰难时期。杨靖宇、陈翰章等抗联的优秀将领相继牺牲，活动在吉东、东满、北满地区的抗联部队逐渐与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武器、弹药、粮食等物资失去了应有的补充，被迫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到1940年底，东北境内仅剩下了少量抗联小部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主力都退入中苏边境苏联一侧野营整训。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认为“满洲国的治安大体已经平定”，于是，逐步将维持伪满治安的任务移交给了伪满军警，关东军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对苏作战的准备上。

另，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对战时军需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为把东北变成支撑战争的“粮谷兵站基地”，关东军操纵伪满政权，也加紧了对东北的经济掠夺。由于推行了“经济统制”、“农产品统制收购”、“粮谷出荷”、“生活必须品配给”等一系列殖民统治的盘剥政策，使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日趋恶化。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业萎缩，农民陷入极度贫困；民族工商业破产；知识

分子生活无法维计，这些又进一步激起了东北各界民众内心的强烈不满。

面临着上述新的情况，关东宪兵队重新估计了形势，认为，在思想对策工作中，属于共产党系统的部分，随着历年的军事讨伐和政治镇压，已经逐渐减少，“最后可能被根本消灭”。而广大民众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诸如工人罢工、士兵起义、“流言蜚语”的传播，及随着生计艰难和战争扩大，各民族人民的反战情绪和对政治、经济的不满情绪将日趋增多。以后，这些反映民心动向方面的工作，应该成为思想对策业务的重点。

对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提出，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调整思想对策业务的重点，制定一个适应形势需要的长久计划，作为以后思想对策工作的纲领。这样1940年5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抛出了“思想对策服务要纲”，并附有详细的“说明”，下发到了各宪兵队。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通过“要纲的说明”，解释了重新制定“思想对策服务要纲”的意义，其中讲到：“关东宪兵队过去因一直是为配合关东军的讨伐，按照关东军在讨伐工作中所给予的任务和权限来开展工作，故没有真正去执行宪兵所应担当的根本意义上的思想警察工作。另关东军在讨伐中所给予的任务和权限，又随着讨伐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导致思想对策工作只能流于形式，与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对策工作相距甚远”。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说明”中将思想对策工作的本意解释为：“是以控制民心动态为对象的一项工作”。并说“在异国完成这样一项工作，任务是相当艰

巨的，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认真地、长期对民心开展侦察，把握民心动向，这样才能真正收到实效，因此，这项工作客观上需要有一个总的要纲，来作为思想对策工作的根本方针”。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解释宪兵在新形势下的活动依据时讲到：“这个要纲虽然对思想对策的内容作了根本上的修改，但所执行的仍是关东军勤务令中所规定给宪兵的任务，只是以宪兵的特殊性来完成日满共同防卫的任务”。这段话的本意是说，关东宪兵队过去在讨伐时，参与政治镇压和屠杀活动，是维护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担当“共同防卫”的任务。现在关东军任务已经转移到准备对苏作战，不再以维护伪满治安为主要任务了，宪兵还继续从事政治镇压和屠杀活动，虽与关东军的行动已经不一致了，但这仍是合法的，仍是按照“共同防卫”的精神在行动。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这个“要纲”开头，将思想对策的总方针确定为：“对日满共同防卫上的有害思想策动进行镇压时，特别是对共产思想及抗日思想进行镇压，同时应注意观察影响治安方面的各种现象，以确保平战两时满洲国的治安”。

细心看来，这段文字实际上包含了思想对策的目标和思想对策意义两层含义。而目标又是两个，一个是所谓的“对日满共同防卫上有害的思想策动”；另一个就是应注意观察的、随着形势变化“影响治安方面的各种现象”。对于这两个目标的处理，要纲的“说明”曾专门作了解释，即对前者，要认真加以防范，一经发现严厉镇压；而对后者，则要

开展大力的侦察。

另，总方针中所表述的思想对策意义，即“确保平战两时满洲国的治安”也有两层含义，这在要纲的“说明”中，也作了专门的解释。其中讲到：“思想对策工作的意义，不反是要维护平时的治安，更主要的是为了保卫战时及事变发生时的治安，因为满洲国的思想，是属于战时类型的思想，因此，满洲国的治安战时要比平时更难维持，这就是思想对策工作的意义所在”。

这个要纲分为5个部分，现将其重点部分及关东宪兵队的具体用意说明于下：

“一、目标

1．警防镇压的目标（甲）

如放任自流，将对满洲国的防卫或军①的利益造成危害的各种思想策动，其范围如下：

共产系：

a．共产党及其外围团体；

b．宣传及谋略；

c．可能滋生出主义的现象；

反日系：

a．反日（满）的结社团体；

b．反军（战）的结社团体；

c．反日（军）的民族运动；

d．同上的思想运动；

---

① 指关东军。

匪贼系：

a. 共产匪（东北抗联）；

b. 政治匪、土匪；

c. 外围团体（通匪者）；

d. 其它有可能扰乱治安的暴力（武装）团体；

其它：

a. 通敌阴谋；

b. 满军警的叛乱；

c. 军系统工人的罢工及阴谋策动；

d. 恶劣的流言蜚语；

2. 注意观察的目标（乙）

虽不能立即造成危害，但在战时或随其发展，将对满洲国的防卫造成重大危害的各种思想策动，特别是反日（反军）的动向，或可能成为破坏治安祸根的现象。其主要范围如下：

民族：

a. 各民族对日（军）的思想动向；

b. 各民族对苏中的思想动向；

c. 各民族对立的动向；

机关：

a. 满军警的思想动向；

b. 满洲国主要机关及特殊会社的动向；

c. 满洲国机关工作人员的动向；

宗教：

a. 宗教；

b．类似宗教；

其它：

a．对重要施政（特别是对改革问题）的反映；

b．经济界特别是物资供给方面的动向；

c．对开拓事业动向；

d．工人及工人运动动向；

e．文艺及刊物动向；

f．流言；

g．对天灾地震的反映。”

“说明”把目标甲“共产系”中“可能滋生出主义的现象”一项解释为，“是那些虽不是外国团体，但放任自流，即可能转成外围团体，或对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起到媒介作用的现象”。

把“反日系”中“反日（军）的民族运动”和“反日（军）的思想运动”两项解释为是“特定阶级的运动，如满系官吏及满系军警等运动”。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要纲”中将目标甲分成4个方面，也反映了屠杀、镇压政策的变化，“说明”中对此解释到：“目标甲是危害性大，属一经发现就必须立即铲除性质的。过去思想对策工作的主要目标，即是目标甲中的‘共产系’和‘匪贼系’，他们随着讨伐和镇压，将会逐渐减少，最后可能完全被消灭。而目标甲的另一部分‘反日系’和‘其它’，其活动已向前发展，并将随着‘共产系’和‘匪贼系’的逐渐消失，成为思想对策工作的重要部分”。

在这个问题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还预测，将来目标甲

的活动，将要从游击区和偏僻的山区逐渐向伪满的大城市转移，故提出镇压的重点也要准备转入大城市。

目标乙中“各民族对苏中的思想动向”一项，主要是指“亲苏”、“恐苏”动向，及接近国民党政权或可能被国民党政权所利用的思想动向。这在“思想对策服务要纲的说明”中，都作了解释。

目标乙中的“其它”类，列举了很多具体的政治、经济、思想动向，关东宪兵队提出，这些动向在将来的战争中，随时都可能对治安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特别提出。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说明目标乙的意义和用意时说：“在过去的思想对策工作中，目标乙几乎未被重视，而这次在要纲中，被确定为重要侦察目标，各队必须要特别予以重视。因为我们估计，即使在满洲国治安平稳时期，满、鲜、蒙等各民族，从他们的民族意识中，也无法避免从中产生出反日、反军的思潮，而这种思潮的暗流又不可避免地要和中苏两国的策动相吻合，导致对共同防卫的国体造成危害，因此必须制定周密的对策，尽早加以防范”。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这段解释，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殖民主义者对异民族的恐惧心理。

关于甲、乙两目标的关系，思想对策服务要纲的说明中讲到：“思想对策工作的目标，是根据国内外各种情况而确定，随其情况的变化也将发生变化。有些目标可能从甲转变为乙，也有些目标可能由乙转成甲，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未曾列举的重要事项”。

“二、实施要领

1．目标甲为实施重点，其次对目标乙实施观察。

2．鉴于各队管内的特殊性，与全局的重要性，要对所有的目标进行充分的侦察。

3．对目标甲应采取积极周密的侦察手段，尽早发现并果断地进行处理，铲除其根源。

4．对目标乙应采取隐密的手段进行侦察，处理时要避免对外部的刺激。要以搜集有价值的情报为目的。

5．要尽快完成对各目标的基础调查，以后在实施时要以此为根据不断充实。

6．搜集情报应尽量广泛，同时要慎重检查，尤其是对根源性的情报，应掌握将来的发展趋势，并要经常的分析整理。密探所提供的情报，虽不一定有用，但也须充分研究。

7．为了搜集情报，应以本队兵力为骨干，设置永久性的侦察网，这样当责任者调换或出现其它事变时，也不致于使其中断。在战时或事变之际，其侦察网仍须按以往态势活动，不可操之过急，要逐渐扩充，使之毫无遗憾地发挥机能。

8．本业务不但各队之间有联系，与防谍业务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各队之间的协调应特别注意。应从全局角度考虑其利害，避免招致不良的影响。

9．在处理事件时，应考虑各民族的特殊性，要以恰当的手段和方法进行。切勿引起民心动摇以致引出不必要事件的发生。

10．在战时或事变发生之际，要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制定有效的对策，以确保治安工作，对此，要机敏准确地判

断情况，对目标甲须进一步加紧监视，对目标乙也应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手段。

11．当发生除战争、事变以外的突发事件时，应迅速对其进行判断，尤其是要正确判断事件的发展变化情况，使之准确、机敏地进行处理。另在处理时，要特别注意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协调，注重全局。

12．要选拔知识丰富、目光敏锐、判断能力优秀者来担当此项工作，同时还要经常对其施以业务和有关方面的特别教育。要慎重使用和监督密探，这是完成本工作的关键。”

关于“实施要领”中的第一项，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要纲”的“说明”中曾告诫各宪兵队，“当估计管内有甲乙两个目标同时存在时，要用全力去侦察目标甲，以余力侦察目标乙。但如何分配力量，须认真考虑。这是因为思想对策工作，虽分成了甲乙两个目标，但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在侦察目标乙时，能得到目标甲的线索，在处理目标甲时，也可能掌握目标乙的概貌，这种现象随时都可能发生。因此，不可能发现了目标甲，就全然放弃目标乙不管。另在没有目标甲的地方，要用全力侦察目标乙。”

对“实施要领”第二项的解释是：“如果对要纲中列举的全部目标都要求一律完成，根据兵力和经费情况是不可能的。因此，各队要根据管内的特殊情况和全局情况，先选择重点全力进行工作。至于一年始终是以一个目标为主，还是逐步向其它目标扩展，在制定年度计划时，要慎重进行考虑。但已列入本要纲中的各目标，不论是否是眼前的目标，都必须加以关注。”

在对“实施要领”第三和第四两项进行说明时讲到：“在对甲乙两目标进行处理时，其标准是对目标甲以铲除其根源为目的；对目标乙以搜集情报为目的。

另外，对目标乙的处理，目前用宪兵代替警察还没有必要，而且在任务权限上也有不妥之处。另对目标乙进行的搜集情报工作，因其手段极容易引起外界的骚动，故对担当此项工作的人员，应认真加以指导和教育。”

在对“实施要领”第五项进行解释时讲到：“本项并不是要求各队对全部目标都进行基础调查，而是希望各队对全部目标的概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经数年后对全部目标逐步完成调查”。

在解释“实施要领”第六项时说：“对已经发生事项的侦察，要以小范围的深究为原则。但对一般的情报，要从各个方面广泛搜集，加以慎重的反复考察，这样才能把握其真相。特别是关系到根源和将来发展趋势的事项，只有对大量的情报进行综合、统计、整理，才能掌握其真相。不确切的情报对此等综合、统计、调查只能是有害的。因此，对密探所提供的情报，要认真加以研究，要查明其虚实。”

对“实施要领”第七项的解释是：“过去搜集情报，多半是依靠特务或密探自由活动来获取，这样，有了优秀人材就能得到好情报，否则只能得到一般或几乎无用的情报。此种以人的素质为中心的情报搜集方式，不仅缺乏准确性和持久性，其接触面也狭窄，很难把各方面的情报都无遗漏地搜集全。因此，必须要以本队的兵力为骨干，设置有组织的侦察网。这里所说的有组织的侦察网，是指通过对管内现有的

机关、团体、各民族各行各业等一切可能成为情报来源的地方，都加以认真的研究，从中选择出有用的地方作为情报据点，然后有组织有系统地对其布置任务，并采取合理的方法进行联系。而将密探仅用于情报工作的补充，在使用时仅限定其完成特定的任务。这种侦察网，在平时要能正常地活动，到战时或事变之际，要能立即强化其机能。对此，侦察网在建立之初，就必须认真进行考虑，使之不仅要满足平时的需要，更应具备战时活动的能力。”

对“实施要领”第八项的说明是：“将来思想对策工作必然要和防谍工作结为一体，因为这两项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无须明确划分，这点要特别加以注意。另思想对策之业务，各队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必须保持密切的联系。”

对“实施要领”第十项的解释是：“在事变或战争发生时，对目标乙要采取同目标甲相同的处置手段。在处置时通常是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进行，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应采取临机应变的处置，尤其是对一些重点目标，要提前进行。”

对“实施要领”第十一项的解释是：“这里所指的突发事件，是比事变或战争程度轻微的国内普通事件，而对其处理，要根据事件的性质有所差别。另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对目标乙也采取积极手段，要加以慎重考虑，以防发生意外。”

这个“要纲”中，除列举了“目标”“意义”“实施要领”等项外，还详细地列举了逮捕、审讯等一系列问题，把宪兵在 1940 年以后的镇压活动，规定到了如何举手投足的细微地步。从中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异民族进行思想统

治的苦心谋划。

从这个“要纲”和“说明”中，可以看出，1940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关东宪兵队在政治镇压和思想统治方面的对策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为把东北变成对外扩张的基地，对人民的镇压和思想控制更加严酷。

1940年5月，在这个“要纲”颁布的同时，关东宪兵队为了调整各宪兵队以后的工作，在司令部又召开了各地宪兵队长会议，具体拟定了活动要点即：

“（一）在治安不好的地区，宪兵仍以协助日满军讨伐为主，进行思想对策活动。

（二）在与治安不好的接壤地区，宪兵要加强对分散转入地下活动的抗联人员和交通员进行搜查。侦察抗联的物资供给线路和抗联取得物资的渠道。另外对一些可能遭到抗联袭击的交通线，主要城市要加强警戒。

（三）在一些大城市中，要加紧侦察共产党的活动及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国境地区，要加紧搜查各种外来势力的策动，并要搞清楚这些策动的系统和活动路线。在北满地区，为防备苏联和抗联第三路军的活动，要格外注意对满洲国军警士兵的策动工作。

（四）北安宪兵队要调查中共北满省委的情况，佳木斯、东安宪兵队，要调查中共吉东省委的情况。”

会上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还向各宪兵队特别强调了要查明满、鲜、蒙各民族的反日思想动态，及由于经济困难而导致的民心不稳情况。并告诫各个宪兵队，在搜集这些情报时，一定要采取稳妥的手段，切忌刺激外部。

不久，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根据“思想对策服务要纲”和“1940年思想对策工作要点”，又向各宪兵队下达了具体任务。这一任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关东宪兵队的活动，即“国内队”转入了控制民心为主；“国境队”将思想对策与防谍结为一体，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对策。各队的具体任务如下表：

队　　别	任　　　　务
关东宪兵队总任务	1．警防、镇压共产党、反日系的策动，侦察其思想动向； 2．警防外国谍报； 3．防止、镇压谋略，特别是对重要资源、设施的破坏。
新京宪兵队	1．掌握都市共产党及其温床的真相； 2．掌握民心动态，特别是满系首脑人物的思想动态； 3．侦察高级间谍； 4．防止军事机密泄漏。
奉天宪兵队	1．掌握共产党从华北方面的策动真相，并对其进行镇压； 2．侦察由于经济困难而引起的民心变化； 3．掌握英美系的谍报谋略组织情况； 4．防止谋略破坏，特别要防止对重要设施和资源的破坏。

续表一

队别	任务
哈尔滨宪兵队	1．掌握哈尔滨市共产党地下组织及其温床的真相； 2．侦察苏联及其它国家的间谍组织； 3．掌握白俄的思想动向。
牡丹江宪兵队	1．掌握中共吉东及南满省委的活动情况； 2．侦察谍报谋略网对重要交通设施及军工厂的活动情况； 3．防止泄露军事机密。
延吉宪兵队	1．侦察朝鲜民族运动及其领导者的活动情况； 2．掌握中共南满省委及其外围团体的情况； 3．警防和镇压苏联间谍的谋略策动活动。
东宁宪兵队	1．侦察越境潜入的间谍； 2．掌握国境地区居民的思想情况及亲苏动向； 3．防止及镇压对军事设施的破坏。
东安宪兵队	1．侦察及镇压国境地区居民、满军警士兵的通苏行为； 2．侦察逮捕越境潜伏的间谍和谋略员； 3．掌握吉东省委及其外围团体的活动； 4．防止、镇压对军事设施的破坏活动。
佳木斯宪兵队	1．侦察逮捕入境的间谍和谋略员； 2．掌握中共吉东省委和外围团体的活动； 3．掌握民心包括满军、满警士兵的动态；及苏联对民心动态所采取的一切活动； 4．防止对重要设施及资源的破坏。

续表二

队　　别	任　　务
北安宪兵队	1．侦察镇压中共北满省委及其外围团体的活动； 2．侦察逮捕入境间谍； 3．防止、镇压对军事设施的破坏。
齐齐哈尔宪兵队	1．侦察镇压中共北满省委系统的地下组织； 2．掌握民心及满军、满警士兵的动态，以及苏联对民心动态所采取的策动活动； 3．警防对军事及交通设施的破坏。
海拉尔宪兵队	1．在满洲里关口进行防谍，同时利用通过国境的日本人搜集外事情报； 2．掌握白俄及蒙古民族的思想动态，掌握苏联对蒙古民族思想动态方面所采取的策动活动； 3．防止军事机密泄漏。
锦州宪兵队	1．要特别侦察逮捕从山海关口入满的间谍； 2．防止对重要设施及资源进行破坏； 3．侦察抗日的策动情况。
承德宪兵队	1．侦察镇压共产党八路军系统的地下组织及红枪会的活动； 2．警防外蒙对满洲的策动； 3．掌握民心离反的真相及思想动态。

续表三

队　　别	任　　　　务
大连宪兵队	1．警防对港湾及各种补给厂的破坏； 2．侦察镇压英美等敌对国所进行的思想、经济等谋略活动； 3．侦察从华北方面潜入的间谍及思想谋略员。
通化宪兵队	1．防止、镇压破坏开发资源所进行的间谍谋略活动； 2．侦察及镇压朝鲜民族运动及满人由时局问题所产生的思想动态； 3．掌握南满省委及外围团体的活动。

关东宪兵队在制定和确定了一连串纲要、重点和目标后，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思想对策活动，从1940年5月开始，着手组建了“思想宪兵队”，准备用以专门担当思想统治和思想镇压活动。

“思想宪兵队”组建的方针是“加强满洲国的思想防卫，组成统一的侦察网，以此完成思想对策工作，同时确立将来战争发生时的思想、情报、宣传、谋略之基础。”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思想宪兵队编成要领”中，规定了其任务和权限，即：

“（一）思想宪兵队隶属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专掌思想对策业务，负责确立有关思想情报、宣传谋略及对此防卫的基础；

（二）一般宪兵队除有特殊命令或思想宪兵队要求协助

外，主要担当军事警察和防谍业务；

（三）思想宪兵队在关东宪兵队全管区内活动，需要时呈请关东军司令官批准可以常驻国外或临时派遣国外。”

另，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将思想宪兵队的性质确定为“以特务工作为原则的秘密宪兵队”。在执行任务时，可根据需要，请求附近宪兵队予以秘密协助。一般宪兵队在活动中，如发现思想对策情报或思想案件线索时，要求立即通报或移交给思想宪兵队处理。

思想宪兵队预计定员350名，其中宪兵补（朝鲜人）、宪补（中国人）200名，日本宪兵150名。每年活动经费预算20万元。如此庞大的预算。其根据是，每名宪兵要使用2名密探，每名宪补、宪兵补要使用1名密探，这样即使用500名密探，平均每名密探月津贴30元，计1万5千元，年计18万元。

思想宪兵队本部设在伪满新京，内设队长1名，（由日本宪兵大佐或中佐担任），副官1名（由宪兵少佐担任）。队本部下设企划、工作、监察、庶务、会计5个课，课长一般由宪兵中、少佐担任。

企划课下设企划、调查、教育3个班，负责规划、调查、专门教育、思想宣传，搜集谋略活动情报、科学审讯、编写思想对策教育资料及组织教育等活动。

工作课下设思想宣传及防卫、思想谋略及防卫、思想情报及防卫3个班，是思想宪兵队从事思想对策活动的具体执行部门。

监察课的主要任务是监察队员的行为及使用密探的情况；庶务课负责除业务以外的一般工作及人事业务。

思想宪兵队下设7个分队，分队长由宪兵少佐担任。各分队内也相应地设企划、工作、庶务3个班，其活动与本队的课相同。分队下设分遣队，总共在全东北设15个分遣队（不包括大连分队下设的分遣队），分遣队内设工作和庶务两系。由于思想宪兵队属于秘密宪兵队性质，故不以活动地为冠称，分队和分遣队均使用番号。各分队、分遣队的番号、配置与管区情况如下：

分队番号	地址	分遣队番号	地址	管区
第一分队	新京	第三十一分遣队	吉林	新京、延吉宪兵队管内
		第三十二分遣队	延吉	
第二分队	奉天	第四十一分遣队	鞍山	奉天、通化宪兵队管内
		第四十二分遣队	安东	
		第四十三分遣队	抚顺	
		第四十四分遣队	通化	
第三分队	大连			大连宪兵队管内
第四分队	锦州	第五十一分遣队	承德	锦州、承德宪兵队管内
		第五十二分遣队	山海关	
第五分队	哈尔滨	第六十一分遣队	北安	哈尔滨、北安宪兵队管内
		第六十二分遣队	黑河	
第六分队	牡丹江	第七十一分遣队	佳木斯	牡丹江、东安、东宁、佳木斯宪兵队管内
		第七十二分遣队	东安	
		第七十三分遣队	绥芬河	
第七分队	齐齐哈尔	第八十一分遣队	白城子	齐齐哈尔、海拉尔宪兵队管内
		第八十二分遣队	海拉尔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投降前夕，大量销毁了档案证据，思想宪兵队的活动情况不十分清楚，但根据1941年以后关东宪兵队各队的活动来看，并没有像“思想宪兵队编成要领”中规定的那样，将思想对策业务全部移交给思想宪兵队，专事军事警察和防谍业务，而是一直担当着思想、政治镇压工作。其原因可能是伪满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进行思想控制越来越困难，仅凭思想宪兵队无法完成任务的缘故。

1942年1月1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发布了“昭和17年度思想对策服务重点”的命令。这个命令根据1940年5月所制定的永久计划，将思想对策工作转入战时体制，对思想对策过去划定的甲、乙两个目标，命令采取相同的处理办法，即严厉镇压。这个命令分为4点：

“（一）要警防、镇压苏、华及苏、华利用的敌国对满洲国思想的策动。

（二）要重点在满人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搜捕共产抗日组织，并加以镇压。

（三）要彻查各民族的思想动向，特别要搞清楚随着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满、蒙、鲜各民族的反日、亲苏、亲美、亲蒋的思想动向，并对此加以警防和镇压。

（四）警防和镇压随着大东亚战争的发生，经济界的转变及扰乱经济的情况。”

原守在这个命令的后面，还特别注明，“以后的思想对策工作，要根据这个命令执行，废除甲、乙两目标的区别，使之合乎永久对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这个“思想对策服务要点”，实际上是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屠杀的又一个命令，所谓转入战时体制，废除甲乙两个目标的区别，其核心就是将政治镇压的重点，从平时的监视、控制向大规模屠杀上转移。

五　战时大屠杀的预谋——“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计划”

在1939年8月“诺门坎事件”期间，关东军为准备全面对苏作战，拟定了“关东军对苏作战计划概要”，准备将关东军转为战时体制。这个“概要”的主要内容是，在关东军之上编成“关东军总军司令部”，将其军事管区分成“野战区”和“防卫区”两部分。

从王爷庙（乌兰浩特）以西的中蒙边境开始，经王爷庙、扎兰屯、讷河、龙镇，沿伪三江省、牡丹江省、间岛省西部省境划线，以南、以西地区为防卫区；以北、以东地区为野战区。在防卫区内，以各独立守备队为主编成“关东防卫军”，在总军的指挥下，与伪满军共同担当防卫。在野战区内，设立第1、第2方面军及第2、装甲、水上等数个野战军司令部，分别在伪满国境的东、北、西三个方面展开，准备对苏作战。

这个计划拟定后，由于“诺门坎事件”结束而一度搁置，后在1940年2月颁布。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根据这一对苏作战计划，制定了“关东宪兵队战时警备计划”和“关东宪兵队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要纲”，下发给各地宪兵队命令执行。根据“关东宪兵队战时警备计划”，1940年以后，关东宪兵队总兵力将从3000人

增加到4 500人，重点向野战区内的牡丹江、东安、佳木斯宪兵队，及新京、奉天、大连、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伪满大城市增配。目的是战争一爆发，野战区内的宪兵队立即转变成野战宪兵队，配属到军队参加军事行动；重点大城市的宪兵队，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开展活动。

"战时警备计划"还规定：防卫区以外的宪兵队，除开战后转为野战宪兵队直接配合军事行动外，还须担当镇压管内的各种反抗活动；监视伪满政权重要人物；防范伪军官兵起义；警戒重要设施、确保战时铁路运输安全等任务。

"战时警备计划"的宗旨，就是要强化所谓的非常情况下的警备体制，在作战地区的后方，采取残酷的对策，制止、镇压由战争而引起的一切骚动和反抗活动。

为了能确保这个计划到时能顺利地执行，计划本身要求，各宪兵队长在平时，要根据管内的特殊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的永久计划和年度计划，明确本队所要担当的任务。另外，平时就要特别注意民心动向，掌握与苏联有关系人的情况，以便战时采取措施。对战时需要镇压的人，要作成"名簿"，制定出逮捕镇压计划。对战时有可能起义的伪军、团体、伪满要人、要展开深入的调查，对开战时需要特别警备的物资、设施、重要场所，要制定出具体的警备计划及警备要领，以便在战时有条不紊地执行。

这样，作为战时警备计划中的特别对策，在1940年5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召开的全满宪兵队长会议上，发布了"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要纲"。

这个"要纲"是禀承关东军参谋长的旨意，由宪兵司令部

第二课负责思想对策的宪兵少佐本田贞晴，指挥战时警备系军曹笹城户哲郎编拟，最后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城仓义卫的名义下达的。“要纲”的主要内容是将宪兵平时监视的可疑人士，包括去过苏联或与苏联有联系的人；所谓亲苏分子；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人；曾参加过抗日活动的人；有左翼思想的人，都作为“战时有害分子”，按甲，乙、丙3种类型进行登记，制成“战时有害分子名簿”，将他们平时的活动，随时登记在“名簿”内，准备进入战时，根据名簿内登记的情况进行处置。3种战时有害分子的处置方法是：甲种，进入战时后，立即予以逮捕处死；乙种，进入战时后，根据形势变化情况，重要者报请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后处死；丙种，进行严格监视，防备逃跑，重要者报请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请示处理办法。

这一“要纲”下达后，各地纷纷将“可疑者”登记入“战时有害分子名簿”进行侦察。据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统计，各地宪兵队第一次登记入“名簿”的可疑者，即有210人，其中甲种120人，乙种75人，丙种15人。1941年被登记在名簿中的可疑者增加到1200人，其中中国人有800余人，苏联和无国籍人270人，欧美人110人。这一屠杀密谋，在伪满后期秘密地准备了5年，1945年8月10日，在日苏开战后的第二天，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下令，各宪兵队转入战时体制，直接由关东军司令官指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通电撤往通化。

由于法西斯德国投降后，苏军出兵东北的时间比关东军估计的要早，关东军未来得及作好对苏作战的全面调整。开战后苏联空军突然轰炸了新京、哈尔滨等伪满大城市，地面

部队迅速突破中苏、中蒙边境的防线，进入东北平原，打乱了关东军匆忙组建起的防御体系，致使日本法西斯策划了5年余的这一战时屠杀计划，没能全面地展开，仅在8月9、10两日，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奉天、大连、锦州、承德宪兵队下属的部分分队、分遣队在局部地区执行了，其中在博克图处死了3人，在齐齐哈尔抓了9人，哈尔滨抓了30人，奉天抓了6人，大连抓了8人，其余多数宪兵队还未来得及动手，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六　关东宪兵队战时统制伪满警宪机关对策

1937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假借“撤废治外法权”名目，将设在东北各地的领事馆和满铁附属地两个日本警察系统，原封不动地转成了伪满洲国警察，迅速地改变了伪满警察的成分，使之成为了一支镇压东北人民的重要工具。

“撤废治外法权”后，伪警务统制委员会亦随之撤销。在此之前，为了使日本宪兵能在所谓的“恢复满洲国主权”后，能继续行使镇压东北人民的警察权力，关东军在“撤废治外法权”的同时，援引了“日满共同防卫”的“理论”，制定了“日本国军事警察，在执行满洲国法令时，与满洲国警察具有同样权力”的规定，使之继续把持着镇压东北人民的警察权力。

1939年6月，随着日苏关系的日趋紧张，日本帝国主义为确保对苏开战后伪满的治安，在制定一系列法西斯统治、镇压对策的同时，又重新制定了由宪兵统一指挥各警宪机关进行共同镇压的具体办法，即“日满警务机关统制区处要领”。这个“要领”是根据关东宪兵司令官城仓义卫命令，由司令部第一课附武藤喜一郎与伪满治安部警务司法制处和警备科密谋协商后抛出的。“要领”的根本目的是准备对苏作战，主要精神是强化宪兵的统制权。

"统制区处要领"中所规定的宪兵权力，就其本质来说，与1936年警务统制委员会期间宪兵的权力没有区别，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区处"和"统制"是两种含意，"区处"主要用于平时，仅限于对平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侦察、逮捕、处理时，由宪兵指挥（区处）伪满警察、伪满保安局、伪满铁路警察和伪满宪兵的行动。当事件处理完了后，其它机关仍独自活动，不是对所有事件的处理都区处。"统制"则不然，统制主要用于战时，即进入战时体制后，其它机关无条件地接受宪兵的统一指挥。

统制、区处的内容包括：军事警察、思想对策（特别是对有关共产党事件的镇压）、保护警卫交通、通信设施等业务。宪兵对各警务机关统制区处的具体关系是：宪兵司令官与伪满治安部大臣联系后，可以统制、区处伪中央保安局长官、警务司长、首都警察总监、铁路总监、伪满宪兵总团司令官；各地宪兵队长，根据宪兵司令官的命令，可以统制、区处省警务厅长（与该省长联系后）、地方保安局长、伪满宪兵团长（需与日本军事顾问联系）、铁警本队长；宪兵分队长秉承宪兵队长的命令，可以统制、区处县警务科长、国境警察队长、伪满宪兵分团长和铁警队长。但大连宪兵队其情况略有特殊，因是设于日本租借地，故统制、区处权只能在防谍、思想对策、军事警察方面宪兵队可承司令官的命令，指挥关东局司政部长、关东州警察部长，在其它方面没有这种权力。

另，在处理防谍和思想对策业务时，其它警务机关的活动

如与保安局的业务发生冲突时，① 则由宪兵队长负责与关东军派在保安局的参与② 联系，协商解决。

1939年以后，"区处"的形式主要在北满用得较多，关东宪兵队使用这一手段指挥伪满警宪进行残酷镇压的事件主要有如下几次：

（一）"讷河事件"

1939年初，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主力，冲破日伪军警在松花江下游的重重包围后，翻过小兴安岭，西征到达了日伪统治薄弱的嫩江平原，在讷河、嫩江、布西、克山、德都等县，重新建立起了地下组织，并深入到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了救国会等大量的抗日组织。"诺门坎事件"期间，为响应中共北满省委"积极破坏日伪后方军事设施，协助全国抗战和蒙古人民反日反击战"的号召，第二支队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在"九·一八"事变8周年纪念日之际，攻进了讷河县城，捣毁了伪县公署、警务科，袭击了银行，俘虏了大批伪满军警，释放了狱中数百名被押的群众。

这次行动，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振奋了北满人民的抗日士气，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支持。抗联所过村屯，群众都出来夹道欢迎，送水送饭，提供情报，担当向导。这次行动对日伪政权来说，也是一次极大的打击，日伪遂将这一地区划为了"匪区"。为扑灭这一地区燃起的抗日烽火，割断群众与抗联的血肉联系，切断抗联的给养供应，日

---

① 保安局的活动主要是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指导下，通过对苏派遣间谍的手段，收集防谍及思想对策等方面的情报。宪兵队主要是正面防谍。

② "参与"是关东军现役军官，是关东军派往保安局的代表。

伪方面采取了“治标”、“治本”、“思想对策”并用的手段，在归屯并村，重兵围剿的同时，齐齐哈尔宪兵队、龙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齐齐哈尔铁路警护队等部门，都向这一地区派进了大批的密探、特务，以讷河县为中心，开展了侦察活动。经过近9个月的调查，1940年9月，日伪方面确定了第一批90人的逮捕名单。随即，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城仓义卫向齐齐哈尔宪队长星实敏，下达了区处命令，命令星实敏区处龙江省警务厅长、齐齐哈尔铁路警护队长等，联合执行镇压。

星实敏随即命令齐齐哈尔宪兵分队长吉屋治郎吉具体指挥这次镇压行动。吉屋调集了齐齐哈尔宪兵分队、龙江省警务厅，齐齐哈尔市警察局、讷河县警务科、齐齐哈尔铁道警护队、伪满宪兵第3团的百余名宪兵、警察，编成了若干个逮捕班，以讷河县龙河、九井、讷南等村为重点，在1940年9月和12月进行了2次大逮捕，共捕去抗日群众132人，分别羁于齐齐哈尔宪兵分队、齐齐哈尔警察局、讷河县警务科内刑讯、拷问。最后将其中52人，送伪齐齐哈尔高等法院审判，中共讷河县委书记尹子魁等2人被处死刑，区委书记迟万钧等6人被判无期徒刑，33人被判10年以上徒刑，11人被判10年以下徒刑。

（二）“田白工作”

1941年4月，活动在德都、克山、依安一带的抗联三路军九支队，为开僻城市工作，派支队秘书王耀钧潜入齐齐哈尔市，发展了具有抗日意识的青年齐齐哈尔铁路局货物员史履升等人，建立了抗日地下组织——中共北满省委第一执委部，史履升任执委。不久又在齐齐哈尔市的龙沙公园、省立

图书馆等地相继组织了若干个基层小组，在抗联九支队的指导下，秘密发展同志，制定行动纲领，准备开展地下抗日活动。

1941年9月，第九支队在嫩江西岸与讷河县交界处的郭泥屯活动时，突然遭到从昂昂溪开来的两支日军讨伐队的袭击，战斗中支队政委郭铁坚等18名抗联战士英勇牺牲。随军日本宪兵在搜查牺牲者时，从郭铁坚身上得到了地下党的文件和两份用代号写的地下组织人员表。据此，齐齐哈尔宪兵队初步掌握，在齐齐哈尔市有以史履升为首的中共地下组织在活动。

齐齐哈尔宪兵队长星实敏将其情况报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后，又受命区处指挥当地各警务机关，编成若干个搜查班，以齐齐哈尔铁路局中国人职员为中心，开展侦察活动。由于这次侦察是起于田中、白丸两支讨伐队缴获的文件，故将其代号称为“田白工作”。

日本宪兵首先指挥伪满警察在史履升家对面设立了监视所，通过对出入史履升家的人进行跟踪侦察，不久就将缴获文件中的代号与地下组织成员对上了号。这样，1941年11月初，关东宪兵队下达了逮捕命令，命令星实敏区处指挥齐齐哈尔铁路警护队和龙江省警务厅执行逮捕。

星实敏先用电话将齐齐哈尔铁道警护队队长永野登召到办公室，告诉他“在齐齐哈尔铁路局管内，有抗日地下组织在活动，领导人为铁路局职员史履升，最近要对这个组织进行大逮捕，铁警方面要作好准备，准备逮捕郑家屯至北安间各站包括站长在内的20余人，逮捕时间等候通知”。一周

后，星实敏又将永野登召到齐齐哈尔宪兵分队长办公室，将郑家屯、白城子、齐齐哈尔等车站包括站长在内的24人逮捕名单交给了他，命令他当晚组织逮捕，并告诫他，这个事件正在秘密进行，不准向部下泄漏。永野回到铁道警护队后，根据逮捕名单，先命令日本人的铁路管理所所长，挑选出24个人，准备代替被捕者的工作。接着将属下铁路警察，编成了24个逮捕小组，在当天晚上进行了全部逮捕。

在铁路警察行动的同时，宪兵指挥伪满警察，在齐齐哈尔等地也展开了大逮捕。“田白工作”总共逮捕了100余人，经宪兵指挥伪满警察审讯后，将其中38人送伪齐齐哈尔高等法院判刑。结果史履升、王耀钧等3人被判死刑，4人被判无期徒刑，17人被判15年徒刑，12人被判5至8年徒刑，2人在刑讯中被打死在狱中。

（三）“贞星工作”

1941年5月，齐齐哈尔宪兵队使用的密探报告，在齐齐哈尔铁路局职工内，有以阎幼文、田维民为首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在活动，但经过侦察后，因证据不足未进行逮捕。后宪兵在对“田白事件”的审讯中，通过对被捕者万先崎的拷问，又掌握了一些线索。这样，当“田白工作”告一段落后，1941年12月8日，齐齐哈尔宪兵队长星实敏，遂命令本部特高课长原田武，组织日伪警务机关进行侦察。星实敏将自己的姓作为这次活动的代号，起名“贞星工作”。

“贞星工作”初期采取的办法是，捕到了嫌疑者就施以严刑拷问，逼迫供出有关人员，然后逮捕接着逼供。由于采用了这种不断逮捕不断拷问的办法，使涉及到的人越来越

多，逐渐发现了东北党务办事处、东北调查室、北宁铁路党部筹备处等数个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线索，并涉及到了锦州、哈尔滨、沈阳、营口、山海关等地的一些部门。于是齐齐哈尔宪兵队长将这一情况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作了报告，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命令第三课长吉房虎雄，对各地宪兵队统一指挥，组织逮捕。1941年12月17日，吉房虎雄召集齐齐哈尔宪兵队长星实敏、新京宪兵队长门田喜实、哈尔滨宪兵队长春日馨、奉天宪兵队长矶高磨、锦州宪兵队长稻田弘义等人开会，以司令官的名义命令他们区处指挥各地的日伪警务机关，迅速结束对这一事件的侦察。23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根据各地宪兵队报告的情况，下达了一齐逮捕的命令。

在“贞星工作”中，齐齐哈尔地区逮捕了160余人；锦州地区逮捕了60余人，沈阳逮捕了20余人。围绕“贞星工作”的侦察逮捕，日伪方面又查清了东北协会、东北抗战机构、读书会、铁血同盟等抗日地下组织的一些情况，引发了1941年12月30日全东北的一齐大逮捕，即所谓的“一二·三〇”事件。据日伪方面统计，在“贞星工作”和“一二·三〇”事件中，被捕的各界爱国人士近700人，刑讯后送交伪各地法院判刑的就达200余人。

“满洲秘密防御战”内幕

（1941—1945）

一　特务、密探监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向英美等国公开宣战。

战争初期，日本采取和德国相同的闪电战术，袭击了英美两国设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重要军事基地，占领了东南亚的一些主要区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但开战5个月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攻势，即被美军所遏止。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本深深地陷入了太平洋战争中。从1942年下半年起，战局急转直下，开始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转化，日军在中途岛海战败北后，接着在南亚又被赶出了瓜达尔卡纳尔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又在索罗门上空战死，这一系列事件表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制海权已经基本丧失。美军在攻克塞班岛、关岛等重要岛屿，打到菲律宾后，也使日本在东南亚战场，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

在战局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太平洋各战场上的作战部署，将关东军的精锐师团，陆续调往东南亚地区作战。这样，准备用于对付苏联的，有"北方阵护神"之称的关东军，实力开始了大幅度下降。

相反，1942年以后，苏联已经逐渐度过了卫国战争的最困难时期，1943年2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德军精

锐33万以后，苏德战局也开始急转直下，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改观，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开始停止从远东向欧洲抽调军队，这实际上也给关东军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当日本的全部人力、物力都陷在太平洋地区和英美作战的情况下，“北方”的形势随着欧洲战局的演变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不能不使日本帝国主义惊恐不安，形势也迫使日本不得不调整对苏联的政策。这样，1943年以后，日本对苏政策，从太平洋战争初期“避免两面作战、严密监视、加强防卫”的对峙方针，调整为“绝对保持静谧”全面持久防御的方针。

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改观，也迅速影响到了伪满，这种形势与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撑整个太平洋战争需要，对东北所进行的疯狂掠夺，又共同引发成民怨日涨、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局面，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统治感到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对民众中潜藏的反抗意识更为恐惧。面对这种“内外时局日益紧迫，形势急变实难预料”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除动员伪满各机构进行所谓的综合防卫外，还指挥警、宪、特开展了“满洲秘密防御战”。使用大量特务、密探侦察民众生活。通过严密监视、控制民众对时局的看法，及随时局变化反映出的民族倾向，来制定镇压政策，则是“满洲秘密防御战”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行将灭亡的情况下，利用宪兵特务不择手段监视民众进行秘密战的一些具体事例，我们不准备详述。下面仅就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导秘密战的纲领性文件“关东宪兵队警务服务指针”所列举的一些问题，结合其活

动，简单作些剖析，以此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开展秘密战的一些内幕。

“关东宪兵队警务工作指针”，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失利时的1942年7月24日抛出的，其内容主要规定了搜集民心动向情报的一些基本政策、注意事项和关于建立情报搜集体制的一些问题。文件一开头就声称：宪兵对情报的搜集工作，必须要贯彻始终如一的方针，必须有长久计划，运用和统制各情报机关，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迅速、准确地进行搜集。为了使情报工作能在秘密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文件要求各宪兵队，要迅速完成对准备侦察目标的基础调查，为以后的侦察作好准备。

文件要求各宪兵队，在进行情报活动时，首先要树立正确方法，克服片面性、表面性和局限性。并通过对中国民众传统处世习惯的分析，告诫日本宪兵：“中国民众，自旧军阀时代以来，就有莫谈国事、缄口不言的习惯，即使对亲朋好友，除特别值得信赖的人外，都不去谈论政事。因此，宪警人员想通过百姓之口所吐出的真情，来把握民心动向，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样宪兵在搜集情报活动中，就必然会遇到因民族习惯而带来的障碍。”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文件要求宪兵，要悉心研究排除这一障碍的手段和方法。并具体提出，在侦察中，宪兵除直接和侦察对象接触，争取得到信赖获取情报外，更主要的办法，是要在民众的底层建立和发展情报网，通过这类情报网，直接搜集底层民众的呼声，达到真正掌握民心动向的目的。在谈到民众底层情报网的意义时，文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提到过去在搜集民众对生活

必需品配给方面的情报时，因在民众底层没有情报网，故无法得到民众真正意见的情报，仅能从配发者一方得到一些片面性的情报。建立民众底层情报网，将有助于克服片面性的缺欠。关东宪兵队所提出的克服片面性的办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密探、特务安插到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

这个文件在指导宪兵进行情报活动问题上，还提出“认真研究各民族特性，利用民族特性的微妙之处，排除表面现象的干扰，把握其深层内容，真正掌握民心动向”的要求。“利用民族特性微妙之处，把握深层内容”的“主张”，当时曾是关东宪兵队进行秘密战中一个十分阴险的手法，这种手法当时在具体指导特务活动的其它文件中曾明确地展开过。比如，有的文件提到：“中国小学生与日本小学生打架，过去未曾引起注意，也没去追查中国小学生的行为，是受了教师的反日情绪影响，还是受其家长的影响，被小孩打架这一表面现象所迷惑。其实中国小学生的行为，乃是民族特性的微妙之处，是掌握民族情绪动态情报的一个绝好机会，故不应放过。”

这种通过民族微妙之处，侦察民心动态的“主张”，既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险狡诈，也反映了侵略者在行将灭亡前的恐惧心理。

关于搜集情报的方法，“警务活动指针”还告诫宪兵，不能仅注意民众在言论和行动上的反映，而要通过社会生活所反映出的现象，如通过金融界、经济界、消费、流通等领域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去捕捉民心动向的实质。这种理论指

导关东宪兵队最典型的活动。是日伪后期宪兵对汉奸个人活动的监视。当时日本宪兵通过观察部分汉奸从银行大量提取现款、奢侈消费等现象，捕捉到了伪满汉奸对日本失去信心、颓废、彷徨的思想动向。这一情报报到关东军后，关东军司令部为控制这些汉奸死心塌地地为其卖命，曾安排他们到处去发表攻击国民党和苏联的讲演，并将讲演的内容在伪满报刊、电台上大肆宣扬。使他们彻底得罪国民党和苏联，以此断绝这些人寻找后路的念头。

为了更有效地分析情报，关东宪兵队"警务工作指针"还要求各地宪兵队："要对各地区的特点和特殊人进行调查"。这一调查，曾是关东宪兵队进行秘密防御战的又一项重要措施。

关于"地区特点"，文件中曾列举要对"地区性的思想倾向"，"教育普及水平"、"贫富间的差异""主导性的职业"、"政治敏感度""地区宗教色彩、系统、信仰程度""与外界交往关系"等项进行调查。调查这些问题的目的，主要是为研究思想动向方面的情报作参考。

当时通化宪兵队在日伪机关的配合下，对通化地区的特点进行了调查，并得出了如下的调查结论："该地是由长城以南来的汉人流民和鲜人流民所开发，由于处地偏僻，远隔中央、沐浴不到文化的恩惠，加之交通不发达，被重叠的山岳丛林环绕，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由于该地农民不能单独依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而要靠养蚕、伐木、采人参等副业补充维持生活。这种生产方式又造就了大量的以副业为生的农民群存在。这一分散的副业生产方式同时又为匪贼的兴

起，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另这一地区的可耕土地，几乎全集中到地主手中，农民苦于无地，加之交通不便，远隔中央，又使其农业生产被封锁在自然经济的框子里，使商品经济渗透缓慢，阻碍了无地农民的分化，导致人口相对过剩，反过来又加重了超经济剥削的发生，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又进一步遭到了破坏，农民更进一步陷于贫困。这种自然状况和经济状况都成为了这一地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以上这段文字的分析，如果是一个学者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多少还有些可以自圆其说之处，但出于法西斯殖民主义者之口，将当地人民的反抗解释为是地区特点的原因，则包藏着否认殖民掠夺给当地造成的经济破坏和诋毁民族反抗意识的用意。这类出自民族偏见和阶级偏见的调查，也很难真正掌握当地民众的思想动向，只能在各地制造恐怖。

关于“特殊人”，警务工作指针将其规定为“是各地区（部落、屯、街）中对一般民众有影响的人物”。关东宪兵队在解释调查这些人对“满洲秘密防御战”的意义时，分析了东北民众的思想状况，认为“占民众大部的底层阶级，他们对事物往往缺乏独立的见解，对日满的统治，不是盲目的持抨击态度，就是持明哲保身的态度，大部民众的思想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有识之士、长者或土豪地主的影响”。因此，对有影响力的“特殊人”进行调查，把握了这些人的动向，也就把握了一般民众的动向。

关于通过设置秘密情报网开展秘密战的问题，警务工作指针中还曾规定：“除在民众最底层设置情报网外，在各个

地方都要设置可靠而又持久的情报网，使其按照一定的章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根据这一要求，1942年下半年以后，关东宪兵队各队，在伪满政权各级机关、商社、团体内都建立了秘密情报网。为了配合这类秘密情报网的活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还指示各队，要在各行各业和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广泛地发展和使用密探，用以直接去搜集一般民心动态方面的情报。另外，为了使情报准确起见，还要求在设置密探的地方，必须同时安插2个密探，以此对情报相互印证。

在控制使用密探的问题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对担当具体任务的宪兵还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他们深入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学习中国社会的民俗民情，严格掌握密探的活动。使用时要统一指挥，谨慎小心，严禁密探之间进行横向联系。为控制密探，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还曾设想，将密探的活动专业化，根据密探的特点，分别用去搜集思想、谋略、外事等方面的情报。

关东宪兵队对选择、发展密探的问题也尤为重视，对此曾专门作过以下规定：

（一）“密探要从优秀的有才能的人中挑选，尤其是要从身居要职、懂日语，亲日意识浓厚的人中去发展”。关东宪兵队还提出，发展有机会接触到被侦察对象的人，或有条件接触到被侦察对象的人当密探，是开展秘密战中一件十分有价值的工作。根据这一原则，伪新京宪兵队战务课政治情报班，在日伪后期，为控制伪满政权，曾把密探都发展到了伪满大臣们的身边，很多大臣的私人秘书都是新京宪兵队

的密探，甚至连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姨太太，都是监视张景惠活动的密探。这种发展身居要职的人作密探的办法，使宪兵对伪满汉奸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

（二）“对各民族进行情报活动，要尽可能使用该民族的人”。

（三）“对外国人进行情报活动，要尽量使用外国人，或通晓外事的人充当密探”。关东宪兵队在对苏联领事馆的特务活动中，就使用了这种办法。

（四）“要注意发展和使用女性作密探”。

（五）“对准备逮捕和急需掌握全貌的侦察目标，要争取在该目标或组织内部发展密探，以此收取更大的实效”。这种办法，日伪方面在“一二·三〇”事件中，破坏“读书会”时，就使用了这种办法。

日伪统治末期，东北民众以沉默形式表现出的反抗意识，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毛骨悚然，坐立不安，依靠密探、特务维持统治成为了重要手段。伪满末期，密探、特务无孔不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上至宪兵头目、下至外勤警察，无不使用密探，大密探下面还使用小密探，大大小小的密探，特务仗势欺人，鱼肉乡里的情景随时随处可见。有的为敲诈勒索、栽赃陷害，有的为争功求赏、制造冤案，出现了统治系统人员庞杂、组织混乱的局面。

关东宪兵队首脑机关也曾意识到，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对维持其统治将有害无益，故有人提出了废除使用密探的意见。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各个战场上的全面败北，对东北这块殖民地进行统治，不靠密探、特务，已别无良策了。

但是，关东宪兵队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还是制定了一系列控制、掌握密探活动的办法。例如：为预防密探仗势胡作非为，提供假情报、骗取奖赏，专门设置宪兵或“监督密探”，监视密探的活动。在发展密探问题上，还规定要根据使用的目的和任务对发展人进行详细考核，对其性格、技能、品行等进行调查。并制定一套手续，将发展人的情况，按姓名、年龄、宗教信仰、职业、原籍、出生地、经历、发展时间、发展目的，家庭情况、指纹、健康情况、特殊技能、外语能力、记忆力、与被侦察者的关系及认识程度、对其奖惩办法等，详细登记备案，以便掌握控制。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还要求各地宪兵队，“不能仅用物质报酬来作为控制和使用密探的唯一办法，要研究如何使密探对宪兵产生热情，要尽量使密探感到自己是在受到重用，受到信任，来进行活动。同时，宪兵司令部又要求各队，在使用密探进行活动时，要使密探尽可能少了解用其去侦察的真实目的和意图。

为使密探的活动更能行之有效，宪兵司令部还要求操纵密探的宪兵，要根据使用密探的目的，任务及密探本人的特点，经常对其进行秘密教育，启发他们的智能、帮助他们拟定完成任务的方法、手段、排除障碍及隐蔽身份的办法，从事活动的要领等。而对他们提供的情报，司令部又要求不可轻信，必须进行严格审查，重要的还要求重新调查。

关东宪兵队在操纵密探活动中，特别注意“反间谍行为”，对此，要求除对密探的日常言行密切加以注意外，还须经常采取一些办法，对密探进行考察。例如，对认为是不

可靠的密探，命令去侦察已经掌握了的情况，或是将同一任务交给两个密探同时去侦察，通过两者提供的情报，检验密探的可信程度。关东宪兵队曾明文规定：对认为是不可靠的密探，要对其进行跟踪、或有意泄露给无害的秘密，以此侦察是否有“反间谍行为”。

关东宪兵队在秘密战中，还专门建立了情报审查和报告制度。要求各宪兵队要组织专人对情报进行审查，掌握情报的来源、系统、以及被侦察事项的发展趋势，并要对情报进行经常性的研究和统计，以此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

在各类情报中，民心动向方面的情报是关东宪兵队搜集的重点，这类情报被认为是价值大、对制定统治政策和镇压政策有重大意义。但这类情报数量多，虚的东西和水分也多。对此，关东宪兵队曾绞尽脑汁，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这类情报。例如，太平洋战争后期，奉天市流传起了“某某中国人肉铺，卖了日本女人大腿肉”的谣言，奉天宪兵队认为这是反映民心动向方面的情报，遂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去侦察研究、分析这种谣言能迅速传播所反映出的民心动向。从中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开展秘密战的良苦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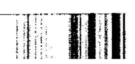
关于判断情报的准确性和价值问题上，关东宪兵队首脑机关曾一再告诫基层宪兵，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切不可“先入为主”，不去努力发现真凭实据，只靠想象进行判断。尤其是对民心动向方面的情报，更不允许不作认真研究，就向上级报告。对此，在情报报告制度中，特别要求宪兵，在向上级报告情报时，必须同时注明情报的出处、准确

程度，以及宪兵对此情报的看法和处理意见。

关东宪兵队通过搜集情报，控制民心，在东北进行的秘密战中，除使用大量密探、特务外，还直接录用了大量的朝鲜人和中国人担当“宪兵补”（朝鲜人）和“宪补”（中国人），以弥补日本宪兵人力的不足。“宪兵补”和“宪补”的地位与密探不同，他们直接从属于关东宪兵队系统，入关东宪兵队编制，其任务、权限在关东宪兵队规章中都有明确规定。宪兵补和宪补，一般都配属到宪兵分队以下的基层宪兵组织中，在分队一般由特务主任或特务班长掌握，在执行任务时，佩戴“宪兵补”或“宪补”的标志。这些人由于属于日本人系统，因此，在伪满汉奸群中地位较显赫，权力也较大。各宪兵分队、分遣队后来的翻译，大部分都是以宪兵补、宪补的方式录用的。

宪兵补和宪补必须得经过关东宪兵队教习队的训练，太平洋战争以后，关东宪兵队教习队正式开办宪兵补候补者分队和宪补候补者分队，开始大批培养这些人。能被选中当宪兵补的朝鲜人，必须是精通日语，宣誓效忠日本帝国主义的人。宪补要求在粗通日语的中国人中挑选，经考试合格宣誓效忠日本帝国主义后录取。宪兵补、宪补一般在关东宪兵队教习队受训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地日本宪兵分队、分遣队中。宪兵补、宪补的主要活动也是搜集情报。他们在日本宪兵队中的地位比较低，其阶级共分四等，一等宪（兵）补相当于日本宪兵伍长，四等宪（兵）补相当于二等兵。

随着秘密战的深入，配属到各地日本宪兵队的宪（兵）



补人数也不断增加，1940年以前，关东宪兵队宪（兵）补总人数不足100人，到1943年前后，猛增到400余人，相当于关东宪兵队总兵力的1/10。而且关东宪兵队教习队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一直在加紧训练，陆续向各地宪兵队补充。

二　在“防谍”名目下的恐怖活动

防谍的含义

防范敌方势力通过间谍行为危害军队的安全，这本是关东宪兵队军事警察业务的一项内容。但是，在伪满的中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日益不利于日本，关东宪兵队防谍活动的内容，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维护关东军安全的范畴，成了血腥镇压东北人民、强化法西斯残暴统治，开展“秘密防御战”的一项重要活动。

关东宪兵队的防谍业务，有“消极防谍”和“积极防谍”之分，前者大致是维护关东军安全，原意上的防谍业务，由各宪兵队内的军事警察部门负责。后者则是本节论述的内容，其活动由各宪兵队特高课（1943年以后改成战务课）负责。其内容包括跟踪、盯梢、逮捕、镇压、迫害等一系列特务活动。

“积极防谍”所援引的也是“日满共同防卫理论”关东宪兵队根据这一理论，把一切反抗日伪统治的活动，都解释成为是破坏关东军军事行动或军事安全的“谋略活动”来进行镇压。尤其是在日伪统治的末期，防谍的范畴扩大到了漫无边际，没有界限的程度。

在“积极防谍”中，又分成“防谍报”和“防谋略”两部分，对这两部分运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侦破，由关东宪兵队直属86部队负责，各宪兵队只在活动中加以配合(本书第四部分中已经述及)。这里所讲的防谍，是专指特务警察业务上的活动。

关东宪兵队后期的防谍业务，就其内容来说，很多地方与“思想对策”业务界限混淆，这在关东宪兵队内部，也一直纠缠不清。“防谍”主要的含义是指对外，本意是指防范苏联、国民党重庆政权、英、美等国对伪满及关东军进行的谋略活动及无线电谍报活动。“思想对策”的主要含义是对内，在伪满内部镇压人民的反抗、控制人民思想。早在1937年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确立殖民统治秩序时期，把外国间谍的活动，都看成是阻碍建立统治秩序的行为，故把“防谍”当作为思想对策业务的一部分来搞，在人员配备上，仅在警务部第二课（主要执行思想对策业务）内设1名军官，具体负责此项业务，而到1940年以后，随着东北抗日运动进入低潮，东北抗日联军大部分退入苏联境内，关东宪兵队重新整理了“防谍”的看法，认为“防谍”的主要目标应对准苏联，应重点防范苏联对伪满进行的各种谋略活动，尤其是要防范苏联，通过训练、派遣抗联人员，充当情报员、谋略员潜回伪满，启发民众的反满抗日意识，组织地下抗日组织，“扰乱治安”等活动。因此，在这个时期，关东宪兵队将抗联的活动和中共东北地下党的活动，都与苏联对伪满的谋略活动联系在一起，视其为是苏联间谍活动的一部分。这样，防谍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又囊括了对内政治镇压

的思想对策业务。

在日伪统治的后期，关东军精锐被大部抽调到东南亚战场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统治更是风声鹤唳，对民众的一切反抗行为，都唯恐是苏联的谋略活动。因此，这时的防谍工作，在很多地方已经代替了思想对策业务，在宪兵队的业务中占据了首要的地位。

关东宪兵队对防谍的新认识

1943年6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向各地宪兵队发布了“如何查明苏联思想策动真相”的文件，从理论上指导了各地宪兵队的防谍活动。这个文件认为：苏联对伪满进行谋略活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派遣谋略人员进入伪满进行思想策动。对此提出“要建立入满情报员和谋略员的逮捕组织网，查清苏联通过上述情报员，谋略员进行思想策动的真相。”同时又提出：“查清苏联进行思想策动真相的关键，是破坏地下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关东宪兵队认为，过去在中苏东部国境和北部国境，由于封锁不严，出入国境比较容易，因此为苏联所利用，派进了大量的情报员和谍报员来满活动。建立逮捕网的目的，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对情报员、谋略员可能过往的道路进行秘密监视和侦察，对乌苏里江、黑龙江两岸附近的车站、码头进行控制。通过检查“居住证明书”和“旅行证明书”等防谍措施，对当地居民和过往行人进行严密控制。这样，一方面尽量掌握越境者的往返路线，及时逮捕，协同保安局进行反利

用活动；另一方面通过逮捕越境者，搞清苏联对伪满进行活动的根本目的，以此制定秘密防御战的对策。对此，关东宪兵队围绕逮捕苏联越境者，建立逮捕网，在中苏国境附近的一些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其中主要的有“间道对策”、“秘标对策”、“农耕工作”、“妓院工作”、“列车盘查工作”、“特殊工人（指八路军战俘）工作”等等。后面将结合关东宪兵队的防谍活动，专门加以介绍。

关东宪兵队从“查明苏联思想策动”入手，开展的“满洲秘密防御战”中，还特别提出：“要选定重点地区和重点人作目标，开展工作，进行侦察。”

关于“重点地区”，关东宪兵队提出要选定以下几类：

一是，选定亲苏思想和反满抗日思想浓厚的国境居民区为目标。关东宪兵队认为，这类地区，多是伪满行政机构不健全、控制力较薄弱的地方。他们通过1943年在北满破坏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团体，认识到伪满政权控制力薄弱的地区，也是抗联活动较活跃的地区。而抗联已不是以前的反满抗日团体了，他们的活动是在执行着苏联对满的情报任务和思想谋略任务。因此，无论中共北满省委领导的抗联第三路军，还是中共吉东省委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都是苏联远东红军统一领导下的谋略团体。因此，凡有苏联谍报员、谋略员活动的地方，就一定有中共地下组织存在，查明苏联思想策动的重点，也就应放在侦察这些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上。

二是，要选定发生过叛乱，集体入苏等事件的地区作为重点，进行活动。

三是，要选择将来对苏作战的重要地区，开展工作。这

主要是指中苏东部国境地区。关东宪兵队认为，苏联对伪满的谋略活动，包含着将来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又由于东部国境是将来对苏作战的主攻阵地，在那里驻有大量的日军和修筑了无数的军事设施，因此，可以设想，苏联的谋略活动在这一地区一定极为活跃。因此，要将这类地区作为查明苏联思想策动的重点地区。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这一认识，在1943年的机构改革中曾作了组织落实，在中苏东部、东北部国境筑城（修工事）地区，增设了若干个宪兵派遣队和分遣队、分驻所，以此加强这方面的防谍工作。

关于以人为重点，去查明苏联进行思想策动真相，关东宪兵队提出应选定以下五种人。

（一）要选定参加过反满抗日活动，有过亲苏行为或历史上曾是思想犯的人作为重点。这是关东宪兵队分析哗变后集体越境入苏的伪军、伪警，大部分都是"九·一八"事变后"归顺"的东北军官兵，所得出的结论。

（二）要将知识阶层中的青壮年、激进分子，对日伪统治持不平不满态度的人作为重点。这是关东宪兵队通过总结"讷河事件""贞星工作"，"一二·三〇"事件，发现大批被捕者多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得出的认识。根据反满抗日人员成分的变化，关东宪兵队在"如何查明苏联思想策动"中，明确提出："满洲国内的思想运动，近来正从无知识的大众向知识界中波及，因此，在防谍工作中，也必须对这些人的思想、言论、活动特别加以注意。"

（三）要将在国境地区修筑工事的一般工人和特殊工人（指八路军战俘），伪军、伪警、自卫团员作为重点。关东

宪兵队认为，这些人是苏联在边境地区进行谋略活动的重要目标，而且事实上也在不断发生着这些人逃向苏联的事件。

（四）要将教员，宗教团体中的人员，秘密结社中的重要人物作为重点。

（五）要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的渔夫及有被间谍利用条件的人作为重点。

关东宪兵队在防谍活动中，还提醒在基层活动宪兵、宪兵补、宪补说："苏联所进行的思想策动活动，已经改变了过去的传统方式，不在使用共产主义的词句去进行宣传了，更多采用的方式已经改成为揭露日本在各战场上的失败；宣传苏联强大；日苏之战不可避免等，在民众中制造战争的恐惧，或是利用民众对战时困苦生活的不满，去启发民族意识，渗透反满抗日思想，来达到谋略的目的。"对此关东宪兵队要求各级宪兵组织，"要把工人罢工、怠工等劳工问题；满军满警的哗变、叛逃；民众因生活困苦而表示的不满，及不服伪满法令，亲苏、恐苏等思想动向，都要作为防谍工作的线索，先认定背后有苏联间谍在策动，然后再努力去查明情况。"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解释这种活动方式的根据时说："苏联对伪满进行的思想策动，一般都不直接出面，多是以暗中指导或提供资金的方式进行，想查清直接活动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防谍工作中，必须采用这种先入为主的工作方式，然后再努力去弄清发生上述罢工，叛逃事件的思想原因，追查这种思想原因是如何受了苏联谋略员活动的影响。在查出苏联谋略员后，再顺藤摸瓜最后搜出中共的地下组

织”。日本法西斯这一充满恐怖的活动方式，一方面反映了行将崩溃的反动势力的凶狠狡猾，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

关东宪兵队在防谍活动中，与日伪各警务机关的关系

参加“满洲秘密防御战”的日伪警务机关，除关东宪兵队外，还有哈尔滨特务机关和伪满保安局等系统，他们的最高指挥机关，是关东军第二课。关东宪兵队在上述机关中，充当着主要的角色。它与伪满保安局的关系，关东军曾明确规定为：在防谍工作中，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可以向伪中央保安局长提出意见，并根据需要予以内部指导。各地宪兵队长与各省地方保安局长地位平等，但宪兵队须向省地方保安局派遣军官，负责与保安局协调关系。关东军的这一原则规定，实际上也是规定了关东宪兵队与哈尔滨特务机关（关东军情报部）的关系。

这是因为伪满保安局及所控制的国境警察队，与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关系十分密切，保安局负责防谍业务中的反利用部分和通过向苏、蒙派遣间谍，获取防谍方面的情报。这样无论对内、对外，它都与日本特务机关的业务重叠。关东军第二课为协调伪满的特务组织和关东军自己的特务组织之间的关系，曾专派1名中佐级参谋长期驻在伪满中央保安局内，以“参与”名义负责对保安局业务进行指导。各地的特务机关（关东军情报部支部）长，也相应地担任各省地方保安局

"参事"，负责对伪地方保安局进行内部指导。这样，由于哈尔滨特务机关实际上成了伪满保安局的后台，伪满保安局与关东宪兵队的关系，实际上成了哈尔滨特务机关与关东宪兵队的关系。

由于在防谍活动中，宪兵、特务机关、伪满保安局都插手，因此，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内讧，1942年9月，这一矛盾发展到了顶点，活动在伪牡丹江省国境地区的东宁宪兵分队和当地特务机关，围绕对1名苏联间谍的处置问题发生了直接冲突，宪兵从防卫的角度出发，主张立即逮捕，特务机关强调有反利用的价值，拒绝宪兵插手。最后事情发展到了不可解的程度，宪兵利用职权将东宁派出所所长等3名特务机关人员进行了拘留。这一冲突震动了当时的关东军首脑机关，也迫使其不得不重新调整宪兵、特务机关在秘密防御战中的关系。以后，关东军第二课作为调整两者之间关系的办法，命令各地宪兵队，向当地特务机关派遣兼职人员，协调防谍方面的工作。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也与哈尔滨特务机关长进行了磋商，重新明确了各自的分工，确定宪兵队负责防卫意义上的防谍工作；特务机关和伪满保安局负责反利用和对外派遣方面的防谍工作。

重新明确分工以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通知各宪兵队，在审讯案犯时，主要就其本身业务进行审讯，有关谍者所掌握的外部情况，特别是有关军事、政治、民情等方面的情况，交给当地特务机关进行审讯。同时重申，在防谍（指防卫方面）工作中，必须以宪兵为主，当几个机关共同侦察一个案件时，必须从侦察开始，就由宪兵统一指挥各机关。由

宪兵负责各机关的联系和协调工作。

关东宪兵队防谍工作原则

1942年以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向各地宪兵队下达的防谍工作具体要求时提出：一经发现线索，要立即进行周密、耐心的侦察，要尽量避免见头就抓，零打碎敲的作法。要一面努力防范间谍可能造成的危害；一面放长线钓大鱼，争取一网打尽。当获得证据后，要立即进行逮捕，然后根据审讯要领，审出间谍接受指令及进行活动的内容及方法；有无同伙；逮捕前与同伙是否已经进行了紧急联系；同伙的概况；是否已销毁了证据等，尽量掌握间谍的系统、联络人、发展人等间谍网的全貌。

作为防谍工作的原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要求属下各队，必须挑选素质好、反应快，了解中国民族习惯和粗通汉语的宪兵担当防谍工作。并对这些人要经常地进行特别训练，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使其在遇到重大事件时，能沉着、冷静地对全局作出判断，及时采取妥善的处置办法。对具体执行防谍勤务的宪兵，要求他们认真分析研究过去发生过的案件；研究苏联在伪满进行各种谋略活动的方法、手段，以此增强识破新手段的能力。甚至还具体要求宪兵去研究间谍、谋略人员的起居习惯、言语特征、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微的特殊迹象，以此去捕捉间谍活动的线索。

关东宪兵队在“满洲秘密防御战”活动中，除制定了一系列的防谍具体方针、对策外，还制定了一些具体办法，在

各地区使用。

“农耕工作”和“隘路工作”

在中苏东部国境的珲春、东宁、绥芬河、虎林，北部国境的黑河，西部国境的满洲里等地的国境线上，宪兵掌握，这些地区间谍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充当联络员，通过往返越境，传递情报。这类间谍主要是苏联人，少量是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不深入到东北内地，一般不离开国境线活动。关东宪兵队将这类间谍称为“活塞式间谍”。1942年以后，关东宪兵队基本上掌握了这类间谍的活动路线、时间和方法。在东部国境，为搜捕这类间谍，东安和鸡宁两个宪兵队针对这类间谍活动的特点，在国境线上搞了“农耕工作”、“隘路工作”、“间道工作”、“据点工作”等活动。所谓“农耕工作”，就是在已经掌握的间谍越境地点，设置便衣宪兵，伪装成种地的农民，等待间谍过境后来接触。“隘路工作”就是在间谍越境必经的渡口、地点，设置潜伏宪兵，等候间谍过境，进行逮捕。“据点工作”与“农耕工作”类似，即在荒无人烟的地区，设置猎人打猎用的茅草屋或马架子，宪兵伪装成猎人，等候越境者进屋休息时逮捕。“间道工作”即是在国境线附近划出禁区，将一些村庄划入禁区内，宪兵通过控制这些村庄，发现和逮捕越境的间谍。

秘标对策

关东宪兵队认为，在靠近国境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要地活动的间谍，其活动与“活塞式间谍”相衔接，是进入内地活动的间谍。这类间谍多为中国人，外表很难辨别，对此，宪兵和铁路警察联合组成“盘查班”通过检查旅客的“旅行证明书”和当地居民的“居住证明书”来搜查间谍。“旅行证明书”和“居住证明书”均是根据伪满颁布的“国境地带法”所制定，其中规定：“居住在国境地区的居民，必须持有警务机关发给的居住证明；去国境地区探亲、旅行的人，必须要携带本人居住地警务机关签发的旅行证明。”关东宪兵队为了防范间谍持伪造的证明进行活动，及通过识破伪造证明逮捕苏联间谍，曾专门制定了“秘标对策”，即通过在证明上暗设秘密标志，开展防谍活动。

当时执行“秘标对策”的主要有东安、东宁、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6个宪兵队，实施的主要地区在滨绥铁路沿线、密山铁路沿线、北（安）黑（河）铁路沿线、滨洲铁路沿线及松花江航路上。“秘标”最初由宪兵负责制作，1944年以后改由伪满保安局制作。“秘标”的具体实施办法，比较混乱，除印刷用纸上设有统一的“秘标”外，各发证机关在发证时，也都各自设“秘标”，甚至有的机关在检证时，也设“秘标”。

当时，除使用带有暗影的特殊纸作为统一的“秘标”印刷证明书外，在印刷时，也设秘标，例如，在印刷居住证明

书时就设了两处统一秘标，一处设在繁体“證”字上，右边的一捺比正常写法稍长一点；另一处设在“使用规则”中的一条虚线上，将这条虚线上的一点有意省去。

除统一秘标外，发证机关设的秘标就更多了，其中，在盖印章上，秘标最多。印章正盖、斜盖、盖在签发人姓名上边，还是下边，是将姓名全盖上，还是盖一半，都可能是“秘标”。另外，还有根据持证人年龄、性别不同，而规定的盖印秘标。在印泥中渗入化学药水，也是设置秘标的一种办法。当时，在实施“秘标对策”的铁路线上，宪兵和铁警组成的秘标检查组在火车上的秘密房间检查旅客证明时，主要是用药水检验印泥，来检查秘标。

关东宪兵队“秘标识别服务内规”规定，各宪兵队在实施“秘标对策”中，如发现伪造证明的重大嫌疑者，不得立即进行逮捕，要进行跟踪侦察。

“秘标对策”实施以后，越搞越复杂，加之发证机关手续多不健全，使大量的中国民众无辜遭到了迫害。因检查秘标而逮捕的间谍嫌疑者中，真正的间谍微乎其微，绝大部分是因手续不全，日伪机关通报不灵而被捕的无辜民众。据关东宪兵队后来统计，通过秘标对策所逮捕的苏联间谍，只占被捕间谍总数的5％左右。这一手段后来被苏联方面识破。关东宪兵队不得不承认，它在防谍工作中未能收到预期成效。

光 工 作

在哈尔滨、满洲里、大连3地，关东宪兵队的防谍工

作，则以苏联领事馆为重点进行活动。当时关东宪兵队认为，苏联驻伪满各地的领事馆，是苏联间谍活动的公开机构，也是间谍在伪满境内活动的指挥机关，很多间谍都是通过领事馆进行联络，传递情报，接受指令。因此，苏联领事馆应是防谍工作的一个重点，不仅对使馆人员在馆外的活动要严加监视，对使馆使用的雇佣人，经常出入使馆的中国人，白俄及日本人，也要进行跟踪侦察，以此发现被操纵的间谍和领事馆指挥间谍活动的事实。

这样，在1943年秋，关东宪兵队派到关东军第二课担任课附的军官上铁坪一、喜冈安直等人，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将伪滨江省警务厅长富田直次、特务科长坂田义政、哈尔滨市警察局外事科长影山善次郎等人召到了关东军司令部，与关东军第二课主任参谋筐井中佐、伪警务总局特务处长高松征二等人，一起策划了对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进行监视、侦察的阴谋计划，并将其代号定为“光工作”。会上决定：“光工作”由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具体指挥，哈尔滨市警察局具体执行。所需汽车等一切物资、器材由关东军和伪满政府提供。

会后，组成了“光工作队”。队长由伪满警正近藤某担任，队员20余人绝大部分是进入伪满警察组织的日本退役宪兵。“光工作队”内设有本部和监视、跟踪两个班，哈尔滨宪兵队专门派去联络员，将监视、跟踪情况，随时向关东军第二课和宪兵司令部报告。

“光工作”开始后，监视班首先在苏联总领事馆对面的一个车库上，设置了监视电话和观察哨。并使用远红外线照相

机和望远镜照相机，对出入苏联总领事馆的人员进行拍照，然后逐一进行调查。活动中观察哨如发现苏联总领事馆人员或总领事馆汽车要外出时，立即用电话通知跟踪班跟踪。当时光工作队在苏联总领事馆门前，经常停放5台汽车，随时准备对领事馆的汽车进行跟踪。

另外，光工作队还在哈尔滨市内南岗中央寺院、新哈尔滨旅馆、富士屋旅馆、买卖街等苏联人经常聚集的场所，设置了伪装监视哨，对苏联领事馆人员和苏联人，无国籍白俄进行监视。

纸币对策

关东宪兵队以苏联领事馆为重点开展的防谍活动中，还曾搞过“纸币对策”。关东宪兵队一度认为，很多潜伏间谍，其活动经费是从领事馆提取，为了从活动经费上发现间谍活动的线索，关东宪兵队特设队专门研究发明了“纸币对策”。“纸币对策”即是宪兵和伪满中央银行协商，将兑换给各地苏联领事馆的伪满纸币号码登记备案，向各地日伪警务机关通报。准备在搜查间谍嫌疑者时，通过检查他们所携带的货币，相互印证。另外，也通过监视这类纸币的流通情况测查间谍活动范围。1944年12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为测查苏联间谍在东部国境活动的状况，曾命令牡丹江宪兵队组织人力对管内流通的货币进行清查，结果掖河分遣队宪兵，在掖河地区流通的货币中，发现了1张被登记在案的10元纸币。经查明是一个人存入邮局的储蓄款，对此，牡丹江宪兵队

调集了大量的宪兵、特务对存款人进行了跟踪监视，甚至对出入存款人家的人都一一展开了侦察，试图以此发现间谍网的线索。

关东宪兵队在以苏联领事馆为重点进行特务活动的同时，也通过各地的外事班，对过境的苏联人开展特务活动。伪满期间，外事班多由日本宪兵和伪满铁路警察联合组成。设在海关的称“关门外事班”，设在内地的称“合同外事班”或“中间外事班”。中间外事班一般在当地火车站活动，对进入管区的可疑外国人进行跟踪监视，当外国人离开管区时将监视任务，移交给其它中间外事班续续进行。关门外事班主要在海关活动，一般由当地宪兵分队长兼任班长，班员由宪兵、铁警、国境警察联合组成，表面工作是负责检查过境人员证件、护照，保护过境列车的安全。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经常伪装成铁路工作人员，以检车为名进入旅客包房，监视旅客在车内的活动。各地外事班都想尽办法控制外国旅客（尤其是苏联人）进入伪满境内后的活动，阻扰他们在旅行中和中国人接触、交谈。当发现他们与中国人交谈后，立即对谈话内容进行侦讯，并威胁以后不许再交谈。

伪铁道警护队总监部（在奉天）驻新京办事处，曾长期派1名巡监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内，在关东宪兵队警务部长的直接指挥下，以“嘱托”身份指挥各地外事班进行活动。这名“嘱托”还通过“外事月报”的形式，将过境外国人的数量、言行、跟踪监视的特殊案例，定期向各地宪兵队、铁路警护队、华北宪兵和朝鲜宪兵通报。

要视察人名簿制度

关东宪兵队防谍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放在伪满国内的部分地区，目标是对准“固定间谍”。宪兵称之为这是最困难的工作，也是最不易出成绩的工作。对此关东宪兵队制定了“特别要视察人名簿”“要视察团体名簿”及“邮件检查”等制度，专门用以侦察这类“固定间谍”的活动。

日伪方面将“特别要视察人”定为“行迹可疑的人（包括间谍或战时可能受间谍唆使参与反日活动的人”。“特别要视察人名簿制度”规定，对这些人要分类开展长期的跟踪监视，并把监视的情况登记备案，以备战时紧急处置。这一活动，最初是由关东军参谋长提议，经关东宪兵队和伪满保安局分头进行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办法。关东宪兵队在“高等警察事务规程”中，曾对特别要视察人制度作了明文规定。规定“特别要视察人名簿”，各宪兵队要设专人负责，每年定期修订2次，随时剔出失去价值的内容，补充新内容。当被视察人移动时，要将“视察人名簿”移交给移驻地宪兵队，继续跟踪侦察。

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内，也设有专人负责“名簿”工作，1941年以后，司令部负责名簿工作的宪兵，还将所掌握的全部“要视察人”，按“思想关系”“防谍关系”“外事关系”三大类重新整理，编成了“联名簿”。被登记在“防谍关系”上的“要视察人”，既有汉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也有无国籍白俄。名簿中登记的内容，有他们的民

族情绪、政治态度、思想倾向等等。

"要视察人名簿"也是"战时有害分子名簿"的基础资料，1939年"诺门坎事件"期间，关东军参谋长曾命令关东宪兵队和伪满保安局，对"要视察人名簿"进行整理，从中选出一部分编入"战时有害分子名簿"，作好非常时期屠杀的准备。关东宪兵队搞的"战时有害分子"分三类，详见本书第四部分第五节。

伪满保安局根据关东军参谋长的命令，制定了"战时有害分子名簿样式及规程计划"。从"要视察人名簿"中选出甲、乙、丙、丁、戊5类编入了"战时有害分子名簿"。其中将"谍报员、谋略员、共产党员、特别时期有害者"，编入甲类，准备战时立即处死；将"比甲类危害小，以暂时不屠杀更有利者"，编入乙类，准备战时立即逮捕，送法院判刑；将各外国公司、商社的外国人，涉及国际关系不好处置的人，编入丙类，准备战时逮捕拘押；将需要进一步加强监视的人，编入丁类，准备在战时严加控制；将有反利用价值或准备进行反利用的人，编入戊类，准备进行反利用。此外，"战时有害分子名簿样式及规程计划"还规定，对5种战时有害分子，平时就须作好处置准备，对屠杀方法；监禁场所；执行屠杀人都须具体落实。被登记在"战时有害分子名簿"上的人，在移动时"名簿"要随人走。伪满保安局为防止这一阴谋计划被泄露，还规定各地保安局在业务联系时，对"战时有害分子"必须使用代号。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伪满保安局加快了对"战时有害分子"的屠杀准备，伪中央保安局长命令各地方保安局

长，从登记在"名簿"中的"战时有害分子"，选出一批准备立即屠杀。同时命令第二科"名簿系"，将保安局掌握的全部战时有害分子，制成"联名簿"，为在全东北进行大屠杀作好准备。"联名簿"编成后复写两份，一份呈送关东军参谋长；一份留保安局保存。根据当时担当此项具体工作的伪满中央保安局第二科外事股名簿管理系属官兴相繁战后交待，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伪满保安局掌握的"战时有害分子"有1200人，其中甲类占20%，乙类占10%；中国人占甲乙两类人数中的80%以上，其余是白俄和欧美人。

在防谍活动中，伪满保安局还将在伪满的外国商社、宗教机关、社会团体等，制成"要视察团体名簿"，进行监视侦察。当时东北有近700家外国商社、宗教机关和社会团体、雇佣了2500余名中国人为其服务，伪满保安局将这些人称为"防谍上要注意者"登记在"要视察团体名簿"上，进行长期秘密监视。伪满保安局第二科外事股，还责令外国商社、社会团体等，必须对使用的雇佣人的自然情况，活动情况向保安局禀报。

在"要视察团体名簿"上，还记录着其雇佣人的使用情况，甚至连被解雇后的去向情况，都详细登记。保安局第二科外事股也经常把这些人的去向情况，向各地宪兵队和保安局通报。

秘密检查私人信件活动

检查私人信件、电报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进行的一项

重大阴谋活动。早在1937年初，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就命令在全伪满各主要城市设立“通信检阅部”，在邮局检查“思想和防谍上的有害信件”，以此作为发现“思想”“防谍”案件的手段。这样，新京、哈尔滨、奉天、大连等大城市的宪兵队，在本部特高课内都成立了“通讯检阅班”配合特务分室(1938年后的保安局)，参加信件检查活动。

宪兵在信件检查活动中，充当的是指挥官角色。1938年伪满保安局成立以后，被派到各地方保安局的宪兵军官（包括准士官和下士官），多以保安局嘱托的名义，担任监督官，监督保安局人员的工作。为了加强对全伪满的信检工作，伪中央保安局专门设置了第六科，也称“邮便物检阅担当科”，负责对各地保安局的信检业务进行指导。

第六科共有特务30余名，下设“索出”、“开封”、“翻译”3个系，他们的活动是根据保安局第二科（国内防谍业务担当科）外事股提供的目标，由索出系出面，指挥伪满邮政局的日籍职员，或在邮政局内设立“检阅室”，或将目标信件拿回保安局，由开封系进行技术开封，然后在第二科外事股“通信检查录取(摘录)票处理系”属官的指导下，制成“录取票”，或是请保安局第七科（化学防谍担当科）的摄影技师进行翻拍，然后将原件交回开封系，由研究糊封技术的人员用同质浆糊糊封，交回邮局。“录取票”或翻拍件制成后，再转交给翻译系翻译，当确信内容有价值时，则向关东军参谋长报告。

伪满各地方保安局的信检工作，大体与中央保安局的活动相同。当时，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的信检业务最重，故中央

保安局第六科主要是协助它工作。当时首都地方保安局检查的主要目标是：在伪官政府任职的中国人与关内亲属的通信；白俄；外籍公司职员；各国公使馆人员及雇佣人的通信。据当时参加这一活动的伪满保安局特务供称，伪首都地方保安局检查的信件，绝大多数都是外国公司的商业情报，仅有极少部分是白俄对苏德战争的反映。

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检查信件的目标，除各国的公司、商社外，关东军还特别要求对启东公司，香港、上海等地银行驻哈机构人员及苏联总领事馆人员的信件进行检查。尤其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对苏联领事馆的信件更是有件必查。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通过检查领事馆人员与苏联国内及满洲里、奉天、上海等地的通信联系，了解到了这些外交人员对卫国战争的坚强信念，将其作成“苏联人对苏德战争的思想动向情报”，向伪中央保安局和关东军参谋长作了报告。此外，居住在哈尔滨的苏联人和无国籍白俄的通信，也是滨江省地方保安局信件检查的重点。

伪奉天省地方保安局，在奉天中央邮政局内设“检阅室”，信件检查的重点是驻沈阳的英、美、法等国领事馆人员、传教士、外国公司职员的通信。苏德战争爆发后，重点通过检查这些人的信件，了解在东北的西方人对苏德战争的看法，并将他们中多数人认为苏联能打胜的看法，作成“在满外国人思想动态情报”，向关东军参谋长作报告。

三　进行秘密战的大谋略部队“关东军特别警备队”

1943年以后，华北人民在八路军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下，各地都相继建立了敌后抗日政权。共产党的影响已经深深地在华北民众中扎了根，共产党的主张和做法，也得到了华北民众的热烈拥护。

当时，日本设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通过情报分析了华北占领地的民心动向，得出结论是：民众对共产党的信赖度如果是100的话，日军只能是60，而重庆国民党政权则是零。当时日军正千方百计地以国民党政权为主要对象开展诱降活动，面对着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壮大和影响，极为恐惧。华北侵略军针对共产党、八路军已经与华北民众密切结合这一情况，决定采取武装镇压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手段，用宪兵、特务、军队联合编成武装谋略部队，深入到华北各个地区，镇压共产党、八路军和民众的抗日活动。“华北特别警备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编成的。

华北特别警备队以宪兵为主，司令官由华北派遣军宪兵司令官加藤泊治郎担任，队本部下设庞大的特务机构，有战务班、情报班、后方班、电器班、化学班、照相班、邮件侦谍班、指纹班、对共调査班、翻译班、整备班，养成班及无线侦察队、教育队、特别侦察队、特别情报队、骑马挺进队

等，司令部下设大队，每个大队下设5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5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情报、逮捕、侦谍、宣传等5个分队。小队一般都装备轻机枪、掷弹筒等作战武器。“华北特别警备队”于1943年6月在天津成立，最初设5个大队，1944年6月又增设5个大队，总兵力为1万人。

“华北特别警备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行将失败前夕，将军、警、宪、特合为一体；特务活动和军事镇压并用，对华北人民进行镇压的一种试验，这种试验对太平洋战争后期，各战场上都受到打击的日军，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关东军在日本投降的前夕，也效仿了这种办法，将宪兵、特务、兵站警备队合编成“关东军特别警备队”，将武装镇压、特务活动、谋略破坏合为一体，准备开战后镇压东北人民的大规模起义；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与苏军展开游击战。

成立关东军特别警备队，最早酝酿于1944年下半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纪念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27周年的讲话中，谴责了日本的侵略活动，表明了苏联对日本的态度，从此打消了日本谋求中苏边境长久安宁的奢望，进一步加剧了对苏联的不安。1945年1月，苏联在欧洲战场展开全线反攻后，德国投降已成必然趋势，这时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都已意识到苏联出兵东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认为，在中国东北建立持久的对苏作战防御体制，无论是从军事实力上，还是从时间上都是相当困难的了。成立“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用军、警、宪、特合一的组织形式，控制战时后方；在苏军进入东北后，与苏军开展游击战，则是关东军的首脑们绞尽脑汁想出

的一条补救之策。据此关东军第二课与哈尔滨特务机关和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协商，制定了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编成方案。决定将关东宪兵队兵力的大部，兵站警备队兵力的全部和各地特务机关支部的全体人员，联合编入“关东军特别警备队”。哈尔滨特务机关本部，仍作为关东军的直辖部队，继续担当搜集情报工作。原宪兵业务除军事警察业务由未编入“特别警备队”的宪兵担当外，其余全部移交给特别警备队。

关东军这一设想，1945年3月报到东京后，参谋本部担心大量抽调特务机关人员，会影响对苏情报工作的效率，没有立即批准。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投降后，参谋本部看到即使情报工作再出色，关东军已无力在对苏作战中获胜。从开展游击战的角度考虑，1945年7月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成立特别警备队的方案。

于是，关东军在苏联出兵东北的前夕，匆忙行动，在第一线作战部队向战时防御体制过渡中，匆忙宣布编成第1、第2、第3三个特别警备队。

8月2日，关东军司令部召开了特别警备队大队长会议，会上确定特别警备队的性质为保安、游击、逮捕、镇压多位一体的综合性大谋略部队。具体任务是日苏开战后，监督军队、管理居民、统辖警察、警戒重要设施、镇压人民起义、逮捕、处理“战时有害分子”等；在苏军进入东北后，除直接参加对苏作战外，担当在苏军后方开展游击战、破坏通讯、铁路、交通、袭击苏军后勤运输部队、破坏宿营地等任务。此外，关东军还准备把警察、密探、宪兵补．宪补等

都陆续编入特别警备队：

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的干部是以宪兵和特务机关成员为主，第1特别警备队司令官由奉天特务机关长久保宗治少将担任，司令部设在奉天，归关东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指挥。属下10个大队，分别被配置在奉天、新京、鞍山、承德、锦州、兴安、通化、大连、通化、白城、吉林、丹东、抚顺等大中城市中。第2特别警备队司令官为今井龟次郎少将，司令部设在牡丹江，受关东军第1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指挥，下属5个大队计划配置到中苏东部国境的间岛、牡丹江、东安、佳木斯等地。第3特别警备队原拟定由斋藤浩二大佐任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归关东军直辖，划第4军司令官上村干男中将指挥。在哈尔滨、孙吴、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配置。但负责这一地区防卫的司令官上村干男怀疑特别警备队的价值，并向关东军司令官提出异议，结果第3特别警备队没编成。斋藤浩二被调任第4军副参谋长。

特别警备队大队长的资格原拟定与日军联队长的资格相同，但实际上没设那么高，一般都由中、少佐担当。大队下设战务课和保安中队（以宪兵为主）、谍报中队（以特务机关人员为主）游击中队（以兵站警备队为主）。有的大队还准备设机关枪中队和迫击炮中队。中队一般下设特务班和保安小队、游击小队。也有的中队设独立行李小队（负责押运辎重、武器弹药等）。中队特务班与原宪兵队的特务班任务相同，主要是操纵密探网，控制掌握民心。游击小队主要任务是袭击战时起义的村庄，进行逮捕屠杀等活动。小队下设

分队，一般每个小队下设2—3个分队。

1945年8月，关东军3个特别警备队编建时，拟定各大队的配备情况如下：

	大队	布设地区
第1特别警备队（司令部奉天）	第一大队	奉天、通辽一带
	第二大队	公主岭一带
	第三大队	通化一带
	第四大队	奉天北陵
	第五大队	公主岭附近
	第六大队	
	第七大队	四平一带
	第八大队	
	第九大队	奉天、承德、赤峰
	第十大队	王爷庙
	教习队	奉天
第2特别警备队（司令部牡丹江）	第一大队	牡丹江附近
	第二大队	延吉、敦化一带
	第三大队	牡丹江一带
	第四大队	密山、鸡宁一带
	第五大队	佳木斯一带
第三特别警备队（司令部齐齐哈尔）	第一大队	齐齐哈尔
	第二大队	昂昂溪一带
	第三大队	海拉尔
	第四大队	孙吴一带
	第五大队	海拉尔

关东军特别警备队在1945年8月上旬大体编成后，最初

准备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各队教习队都准备对中队长以上的干部进行短期特殊培训，以便适应开战后的需要。但由于8月9日苏军突然发起攻击，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各地正在组建的特别警备队，停止组建，人员全部转到各作战部队。这样，真正编成的大队和中队寥寥无几，编成的也失去了指挥系统，无法进行活动。当时仅第2特别警备队第二大队，由于编的较快，8月9日当得到苏军进攻的消息后，在延边地区开始了部分阴谋活动，他们为了稳定民心，在延边地区上空，释放了大量的挂有“百万日军在海参崴登陆，征讨苏联赤魔”标语的气球。接着在11日，又派出2个武装谋略班，准备先去珲春特务机关索取情报，然后潜入苏联境内，破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12日又派出挺进班，携带电台潜入到了中苏国境的山中，准备搜集苏军行动的情报。14日，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准备去袭击已经进入珲春市内的苏军司令部，但由于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大队的阴谋活动都没能得逞。其它已经编成的大队、中队，绝大部分在开战后的混乱中与指挥机关失去了联系，不是在流窜中被苏军消灭，就是被各地日军收编，都没真正开展起工作。关东军的大谋略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最后的溃败而告终。

遍布全东北的关东宪兵网

监视伪满中央政权的新京宪兵队

新京宪兵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东北过程中第一批建立的一个宪兵机构。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称之为“长春宪兵队”。组建时人员的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九·一八”事变前就盘踞在“南满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内的日本宪兵。这部分宪兵也称“关东宪兵”，直辖日本国内的宪兵司令部，与关东军无隶属关系。“九·一八”事变后，这部分宪兵从东北各地向奉天、长春两地集结进行了重新编组，以四平以南地区的宪兵分队、分遣队、编成奉天和奉天商埠地两个宪兵队，四平以北地区的长春分队及公主岭等分遣队则编成“长春宪兵队”。这是新京宪兵队的最初部分。新京宪兵队的另一部分，是事变后从日本国内、台湾及朝鲜等地增援来的宪兵，以及从关东军作战部抽调出的“补助宪兵”。

长春宪兵队在“九·一八”事变后，实际上是关东军占领“东满”过程中的宪兵配属据点和调动宪兵的中转站；大批从日本、朝鲜、台湾来到东北的宪兵，通过长春宪兵队，被派到“东满”各地。

长春宪兵队本部编成后，除长春分队维护长春治安，控制长春市政，管理满铁附属地以外，大部分宪兵主要是配合

关东军作战，随关东军进入洮南、延边、吉林、辽源等地，相继组建了敦化、洮南、通辽、吉林、西安（辽源）等宪兵分队和分遣队。1932年伪满成立以后，根据战时条例，日本陆军省命令关东宪兵队脱离日本宪兵司令部指挥，转归关东军作战序列后，关东军命令，长春宪兵队改称"新京宪兵队"重新整编。整编后新京宪兵队下设附属地（长春分队改称）、吉林、洮南、通辽、公主岭5个分队及城内、宽城子、敦化、西安、南岭、磐石数个分遣队和分驻所。

1934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与关东军司令部一同从奉天迁至伪满新京后，新京宪兵队本部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一起在伪满新京中央大街（今春谊宾馆楼内）办公。翌年4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办公楼（今吉林省政府办公楼）在新京新发路落成后，新京宪兵队本部又随司令部一同迁到新址。

1934年以前，新京宪兵队主要任务是配合关东军的占领活动，因此，随占领地的变化，隶下分队、分遣队废止、升降，转属频繁，变化较大。当时管辖的区域也很大，曾一时西管到内蒙的通辽、开鲁，北到榆树、东抵敦化、南到磐石。"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境的大部，均属其管辖范围。不仅如此，后在北满、东满建立的牡丹江、延吉、海拉尔、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东宁等宪兵队，大多都是由新京宪兵队派出的配属宪兵或机构独立、繁衍建成的。

1934年以后，随着伪满行政机构改革，东北从4省被分成14省、后来又被分成19省，各地亦随之新组织增设了一些宪兵队。由此，"九·一八"事变后最初组建的几个宪兵队其辖区都相对缩小。但新京宪兵队的管区一直变化不

大。

新京宪兵队管区由于地处伪满的心脏，日伪的首脑机关大部麕集于此，因此该队的地位及任务较其它宪兵队特殊。其中最特殊的一项任务，即是代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监视伪满中央机构接受关东军“内部指导”的情况。因此，它在机构的设置上也独具特色。伪满后期，新京宪兵队本部曾设有特别情报班、军事情报班、特高内勤班、宫内府派遣等特殊组织（后述）。

此外，该队在所谓的治安、防谍、思想对策等活动上，地位也十分特殊，用新京宪兵队首脑人物的话说，“管内是满洲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会敏感地波及到全国（指伪满），刺激与动摇民心。因此，保卫首都的军政机关，确保首都治安，要防患于未然。特别是思想对策和防谍工作，更须做到万全。”

由于地位特殊，任务特殊，新京宪兵队的编制也大，人数也多，人员最多时到300余人，并使用了大量的宪兵补和宪补。新京宪兵队队长的阶级也较高，一般都是由相当日军联队长的“优秀”宪兵大佐担任。① 管辖市区及周围7县的新京宪兵分队长，也多由宪兵少佐担当。

新京宪兵队的活动，大体以1939年为期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主要任务是镇压东北人民的武装抗日活动，新京宪兵队当时将其管区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吉林、敦化两个分队

① 关东宪兵队下属各队长的阶级，一般都由中佐或少佐担任，也有是大尉阶级的，仅大连、奉天、哈尔滨、新京4个宪兵队，由大佐担任过队长。

管辖的所谓“治安不良”地区，包括今永吉、磐石、桦甸、额穆（蛟河）及敦化至镜泊湖一带。这些地区当时活动着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宪兵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一方面是配属到讨伐部队，利用特务活动的手段，在讨伐区周围刺探情报、配合伪满政权进行所谓的“治本”和“思想对策”工作；另一方面，编成“特别搜查班”直接参加讨伐，配合“特设游击队”① 专门捕杀分散活动的抗联干部。

1936年以前，日伪政权对东北抗日武装部队的情况掌握的并不十分清楚，各讨伐部队的行动缺乏联系，情报搜集的也不准确，因此，抗联武装经常利用各路敌人之间的空隙，跳出包围圈躲开敌人的讨伐。1936年以后，关东宪兵队根据前段对抗联讨伐得出的经验，认识到：“思想匪（指抗联）不同于一般匪，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有组织的反满抗日游击活动。”因此，1936年以后，关东宪兵队命令在“治安不良”地区，宪兵队执行思想对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反满抗日组织的系统及活动地区的分布情况，以此作为资料，为讨伐部队提供行动依据。

根据这一命令，1936年以后，吉林、敦化两宪兵分队，重点开展了搜集抗日联军的组织系统、活动等方面的情报，并大量搜集了当地抗联及游击队的传单、文件、告示等，企图以此掌握当地抗联的组织系统线索。1938年夏，敦化分队配属

---

① 特设游击队在讨伐中，主要是打击分散活动的抗联小股部队，特别搜查班主要是以分散活动的抗联干部为目标。

宪兵曾通过在桦甸县山区搜集到的传单、告示等，掌握了中共东满省委在这一带领导抗日运动的基本情况。

此外，吉、敦两个宪兵分队宪兵还在所谓“治安不良地区”开展了调查活动，指挥日伪警宪封锁通往讨伐地区的道路，在讨伐地区附近的铁路、公路上进行严格盘查。为了捕捉因躲避讨伐而分散潜入城镇的抗联战士，这两个分队还在讨伐区附近的一些城镇，设置了大量的密探网，并加强了对旅馆、剧院、商店的检查。

1937年11月，在日伪军警宪进行所谓三年长久“治安肃正”的第二个年头，新京宪兵队在本部召开了分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确立冬季以后，该队在讨伐地区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活动在桦甸、磐石、额穆（蛟河）、敦化各县山区的抗联第一军和由安图、濛江（靖宇）各县向敦化方向移动的抗联第二军。并特别提出要通过“思想对策”工作，诱降、消灭杨靖宇领导的抗联一路军直辖部队和根据地。根据这一决定，新京宪兵队指挥日伪警宪和派遣宪兵，配合讨伐部队对杨靖宇部开展了讨伐逮捕工作。由于通化宪兵分队领导的“长岛工作班”和新京宪兵队派遣宪兵从通化、敦化两个方面对抗联一路军夹击开展特务活动，加之日伪军警的讨伐，使杨靖宇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得不退出该地区，向金川、辉南方向转移。在1937年冬季讨伐中，吉林宪兵分队配属到各讨伐队的宪兵，总共逮捕了20余名抗联战士，其中8名被处以“严重处分”。“冬季工作”结束后，1938年2月，新京宪兵队又在吉林分队召开了春季讨伐逮捕工作准备会议，会上提出，杨靖宇部虽然已撤出管区，但在春季工作

以前，应对与杨靖宇部有过联系的抗日民众和潜伏到吉林市及其附近农村的队员，进行大搜捕。会后，新京宪兵队还派吉林宪兵分队长和吉林省警务厅警备科长去通化，与通化独立宪兵分队联系，协商在春季前，共同指挥两地警宪开展一场大规模的逮捕活动。这次两地总共逮捕了与抗联有联系的民众及隐蔽在城市的游击队员700余人，其中大部被处以“严重处分”。

1938年5月下旬，新京宪兵队又根据关东宪兵队当年肃正计划，制定了“夏季工作”方针，即为防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趁青纱帐起之际，重返磐石、桦甸，由吉林宪兵分队指挥伪满警察在桦甸、濛江边境加强了警戒，搜集情报，并与通化宪兵分队联络，密切监视杨靖宇部的活动。1938年7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为强化对杨靖宇领导的抗联一路军的镇压工作，将敦化宪兵分队又重新从延吉宪兵队划出，归入新京宪兵队指挥。于是，新京宪兵队又重新对吉林、敦化两宪兵队的特务活动进行了分工，吉林宪兵分队负责在桦甸，濛江一带开展“集家并户”等活动，配合讨伐部队监视杨靖宇部主力的动向；敦化宪兵分队，配合在敦化、额穆县境及敦化至镜泊湖一带讨伐抗联一路军三方面军陈翰章部的日伪军警，开展“夏季工作”。为阻止上述两部抗联的汇合，敦化分队曾对两部抗联部队联络的通道，进行了重点侦察。1938年12月后，敦化宪兵分队通过特务活动掌握了在敦化、镜泊湖一带活动的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翰章部已向宁安方向移动，无与杨靖宇部汇合的可能性后，遂将主力转移到东边道地区，开始了对杨靖宇部的跟踪活动。

1939年秋，吉敦两分队参加了日军吉长守备队司令野副昌德少将指挥的吉林、通化、间岛三省联合大讨伐。

除吉林、敦化两个分队管区外，新京宪兵队其它分队管区均为“治安平定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南、北两个新京宪兵分队以兴安大路（今西安大路）为界的新京市内管区，及九台、榆树、扶余、乾安、德惠、农安、前郭等县；公主岭宪兵分队管辖的四平、公主岭两市及伊通、怀德、梨树、通辽等县。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各级宪兵组织，其“思想对策”活动，主要是依据日伪警务机关的工作计划，通过警务统制委员会的形式，对管内的共产党、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进行侦察、镇压。1937年前后，在所谓“治安平定地带”的新京至吉林间的铁路，经常受到抗日武装的袭击，这给日伪政权以相当大的威胁。为消灭抗日游击队在统治中心京畿地区的活动，新京宪兵队曾以本部特高课30余名宪兵和南、北新京两个分队的70余名宪兵联合编成了机动警戒部队，一方面分班昼夜巡逻，大造警戒的声势，另一方面加紧在列车和车站进行检查，搜查逮捕可疑者。

1938年前后，新京宪兵队在日本帝国主义确立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过程中，曾对吉林省及长春市人民操起屠刀，欠下了笔笔血债。例如，1937年11月初，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制定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及抗日民众政策的核心人物，警务部第二课课长齐藤美夫调任新京宪兵队任队长，他一到任即命令南、北新京两个宪兵分队和伪首都警察厅警察，将逮捕的抗日人士，挑出30余人分乘两辆卡车押赴长春郊外执行“严重处分”。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刑车上的一名抗日义士，戴着

手铐夺下了一名伪满警察的枪支，将其击毙，然后组织难友集体逃跑。负责屠杀的新京宪兵队附西田宪兵少佐当即命令停车，指挥宪兵警察开枪扫射，结果身戴刑具的30余名抗日勇士全部遇难。

1938年4月，东京陆军户山学校数名学员在该校法西斯教官河野义的带领下，来到公主岭进行实地演习，为了试验刺刀和战刀的砍杀效果，向新京宪兵队提出要用活人做试验，于是，新京宪兵队命令公主岭分队，将关押的5名抗日人员交出供试验，使这5名抗日战士惨遭杀害。户山学校这伙法西斯分子由此得出："用刺刀刺杀人比用战刀砍杀人效果更佳"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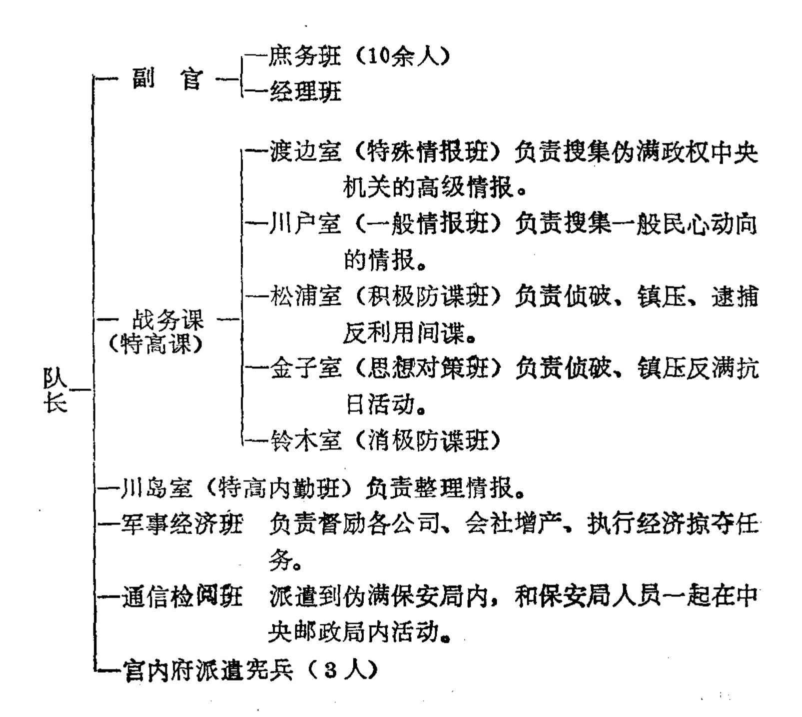
1940年杨靖宇、魏拯民、陈翰章等优秀抗日将领牺牲以后，抗联一路军的活动进入了低潮，大部队伍开始撤入苏联境内休整。这时日伪统治当局认为"武装的抗日活动已经不足为患"，宪兵以后的政治镇压活动，应从过去以配合军事讨伐为主，转向对民心及各种地下反日活动进行长期的、严密的侦察和控制。为此，1940年5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布"思想对策要纲"，提出了宪兵工作重点转变的纲领。新京宪兵队亦随着关东宪兵队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参加野副大讨伐以后，也将其活动重点做了重大调整，开始了以新京为中心的控制民心活动。

"新京"作为伪满洲国的首都，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用帝国主义分子的话说，是推行"国策"的发源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可能很快地传播到全伪满，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构

成威胁。因此，新京宪兵队对“新京”控制的对策主要是从预防着手，即对一切反满抗日地下组织、活动、思想都以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为原则，尽量避免演化成对伪满政权造成直接威胁的严重事件。

另外，对所谓的一切“不平不稳”的现象及有碍日本对伪满政策贯彻实施到底的倾向，都须严加监视，及时向关东军通报。这主要表现在对伪满中央机关的监视上。

对此，新京宪兵队首先在机构设置方面进行了改编。1940年以后新京宪兵队本部机构的设置情况是：



以上各班人数，多则十五六人，少三五人。

特殊情报班及其活动

“特殊情报班”也称“政治班”。班长为日本宪兵准尉渡边千之，故对外也称“渡边室”。该班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亲自下令编成，是代表着关东军和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执行对伪满中央机构及大汉奸进行监视的一个特殊机构。该班有近10名成员，其活动主要如下：

（一）利用宪兵的特殊地位，经常深入到伪满的各个重要部门，通过和日籍首脑人物广泛结交的手段，监视伪满各部门贯彻执行关东军指导伪满施策的情况。该班还负责侦察中国要人对日感情和对日信赖程度的变化情况，密查各施政机构有无官吏抵制日本对满政策，妨碍贯彻伪满“建国精神”，阻扰关东军“内部指导”及秘密结社组成宗派等情况和动向。

（二）组成对上层人物侦察监视的侦察网。由于在新京的伪满中央机构很多，特别情报班的人员有限，因此，他们活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胁迫和收买手段，组成了一个有40多个单位，七八十人参加的侦察网。侦察网中的人，多数为伪满大汉奸周围的工作人员，其中重要的人物有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负责监视张景惠；教育司长饭塚富太郎，负责监视文教大臣卢元善；司法部秘书盐见某，负责监视该部大臣阎传绂；军事部庶务科工作人员引削某，负责监视大臣邢士廉；参议府秘书大藤传次郎，负

责监视参议蔡运升；伪新京市公署总务科长饭泽富一，负责侦察市长张联文等等。

此外，“特别情报班”对伪满“要人”聚会的场所也十分注意。当时新京的世界红万字会曾一度是伪满“要人”聚会和社交的一个场所，特别班为了掌握内里的活动情况，通过张海鹏的关系，派一名叫冈野金吾的宪兵打入到内部，冈野以会员的身份参与活动，侦察聚会人员中是否有人与重庆国民党有联系；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消息从这里传出后，冈野又追查了消息的传播来源。

特别情报班宪兵不仅通过大汉奸聚会和社交侦察他们的活动，而且还通过监视他们夫人的活动来侦察他们对日本人忠诚的程度。当时，张景惠七姨太徐芷卿的公馆，一度成为伪满汉奸夫人们聚会的一个重要场所，由于徐是总理大臣的夫人，又是国防妇人会会长，因此想巴结张景惠的汉奸们都怂恿夫人们去徐公馆，联络感情。这样徐公馆不仅成为贵妇人们社交的场所，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大汉奸们通过夫人交换消息的场所。对这里的情况，特别情报班十分关注，为了通过贵妇人掌握汉奸们的动态，特情班首先通过伪首都警察厅将徐芷卿发展成密探，通过她一面监视张景惠的情况，一面侦察大汉奸们在枕边表露心态的情报。特情班的宪兵为使贵妇人们能有更多的聚会机会，经常把“满映”摄制的“精彩”片送到徐公馆放映，招引贵妇人们去观赏，以此获取更多的情况。

（三）不给伪满大汉奸们留后路，使他们死心踏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

194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鉴于在各个战场上失败，决定把东北作为将来对苏作战的主战场。为了稳定东北，防止民心动摇，关东军策划了“人民最信赖的人”（指汉奸）与日本共生死的阴谋计划。所谓“人民最信赖的人”即指伪满简任官以上的文官，少将以上的武官和特殊会社董事以上的人员。实行的具体办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让他们站出来公开发表反苏、反共、反重庆的讲演，然后在伪满的报刊、电台上大肆广播、宣传，造成亲日家的形象，使苏联、国民党，共产党对他们都厌恶，断绝他们留后路的念头，死心塌地跟日本帝国主义走。

2．对他们施以优厚待遇，加以收买。这些人多是伪满“建国”有功者，大多数人都有相当数额的“建国功劳金”储存在伪满中央银行，过去对“功劳金”一直只支给利息不能取本，这时开禁同意他们取本隐蔽，或购物储存。另外，在生活必需品的配给上也给以特殊照顾，名义上他们也要服从经济统制法规，实际上尽量地给以最大的满足。

3．重新起用一部分有影响的或已退职的汉奸，让他们重新担任职务。如退职闲居在家的第一任经济部大臣韩云阶就重新被任命为军需监察委员，派到鞍钢去视察，大汉奸于静远被任命兼任协和会本部长。

特别情报班，在这一阴谋计划中，负责对汉奸们的动向进行监视。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投降以后，关东军鉴于不利的形势，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人的控制，为了掌握他们可能出现的离心离德的兆头，关东军命令特别情报班加紧对这些

“要人”进行工作。据此，特情班分两个阶段对伪满大汉奸展开工作，第一阶段是将这些人的出身、经历、家庭状况、经济情况、亲戚朋友关系、交际关系、思想状况等等作成基础材料，然后与邮便检查班合作，对这些人的通信、谈话进行侦察，了解他们对时局的看法。第二个阶段是侦察他们秘密转移动产和变卖不动产的情况，以此判明他们的动向。

特情班在侦察监视活动中，还根据这些人的经历、籍贯把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特情班认为，在当时几个重要汉奸派别中，奉天派人数最多势力最大，金州派（即关东州人，自称二等皇民出身者）最得意。当时特情班将汉奸们划分成的派别是：

派　系	姓　名	在伪满担任的职务
奉天派	张景惠	总理大臣
	吕荣寰	伪满驻汪伪大使
	阮振铎	外交部大臣
	于静远	经济部大臣
	黄富俊	兴农部大臣
	于镜涛	勤劳部大臣
	张联文	新京特别市市长
	金　卓	电业会社理事
金州派（关东州）	韩云阶	第一任经济部大臣
	谷次亨	交通部大臣
	阎传绂	司法部大臣
	卢元善	文教部大臣

续表

派　系	姓　名	在伪满担任的职务
吉林派	熙　洽 宪　原 吉　兴 宪　臣 张文铸	宫内府大臣 驻日武官 尚书府大臣　上将 侍从武官长　上将
双城派	于芷山 于琛徵 蔡运升	上将 上将 参议

特别情报班在侦察、整理这些人的材料时，还经常通过利用各派之间的矛盾，刺探他们的内幕情况。例如："吕荣寰过去曾巴结讨好过日本人，目的是想谋求国务总理职务，当看到日本要不行了时，就变卖了家产，购买黄金，病托隐退；臧式毅预测日本要失败，认为日语要用不着了，让自己女儿学英语"等情报，就是通过制造奉天派和金州派间的矛盾，使其相互攻讦中揭发出来的。

特情班对伪满大汉奸的侦察、监视活动，一直进行到了"八·一五"日本投降。

一般情报班

"一般情报班"，也称"民心动向内查班"。班长是宪兵准尉"川户武"，故也称"川户室"。该班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的1944年9月到1945年8月，在战务课长青木益夫的指挥

下，直接执行关东军交给的任务，十几名成员为关东军制定战败前的对策，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资料。该班当时在新京搜集情报的内容有：

1．对大量征用劳工的反映。日伪统治后期，日本帝国主义曾征用了大量的劳工到中苏边境构筑阵地。一般情报班收集的这方面情报，不仅有广大民众对征用劳工的强烈不满，也有民众消极抵制逃避被征的各种办法。如当时经常采用的花钱找人代替、贿赂办事人员、报假名、假职业、假地址准备将来逃跑等手段，均为该班的特务宪兵所探知，为关东军所掌握。此外，该班还负责监视调查伪满劳工协会的征劳工计划、实施情况；伪满协和会与之配合进行欺骗宣传的实际效果等等。

2．调查黑市经济情况。伪满末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经济掠夺的加强，经济统制也日益被强化，造成了市场物资的奇缺，致使在伪满一些大城市中，形成了一些地下黑市。该班奉命对伪新京附近的黑市商人、黑市物资种类、来源、价格、交易手段，以及黑市物资的储存情况进行了调查。后来关东军的“一号工作”（另述）就是根据该班提供的情报制定的。此外，该班还对物资配给活动中日伪各级官吏的营私舞弊（包括勾结、收买、套购等）活动，也进行了调查。

3．搜集对各种经济掠夺活动的反映。例如，对粮食政策的反映，他们搜集了伪满政府和特殊会社掠夺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实施情况；民众对此的反映情况。甚至连某些地方农产所因技术设备不佳，运输不畅，造成大批掠夺到手的粮食

变质发霉情况，也都作为情报，报到了关东军司令部。

对征集金属制品的反映。该班除大量搜集了民众对此的反感言论外，还特别调查了协和会进行欺骗宣传起到的效果情况。

此外，该班还搜集了伪满开发总局，满拓会社掠夺土地活动的情况及中国民众对此的反抗情况。

关东军为了支撑战争需要，加紧了对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对此，曾通过军事经济班，命令满炭各煤矿的经理，努力增产，该班曾调查了部分矿的生产情况，并将劳动力普遍不足，缺乏机械设备等向关东军做了报告。

4．搜集临战前民心动摇的反映。1944年7月，美国远东空军部成立后，多次利用国民党成都机场对东北进行了空袭，造成了东北民心的大骚动。有产者为避免空袭损失，有的开始变卖房产、土地，为日本投降后的个人出路打算。该情报班视这些举动为“反战、反军离心离德动向”，遂对此展开了侦察，他们将这些人变卖土地、房产情况；在银行支取存款情况；拒买公债等，都作为情报，向关东军作了报告。另外，他们还特别注意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将中日两国人的民事纠纷，看成是“离心离德”的动态，并将新京地区的纠纷情况作成统计表，向关东军报告。

一般情报班，不仅在中国人中活动，在日本人中也活动，他们还通过侦察在华（东北）日本人的颓废行为，把握战败前在华日本人的动态。例如：一般情报班，把在伪满政权，各会社供职的日本人经常去酒馆狂饮、逛妓院、偷偷纳妾、经常缺勤等都统统视为“因战局不利而导致的腐败现

象”，对其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作成日本人“离心离德倾向”的情报，向关东军报告。

5．搜集民众对战争预测的反映。

在这方面，该班主要是搜集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反映。例如，1945年4日，苏联通知日本，“日苏中立条约”不再延长的消息传出后，该班广泛搜集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事件的反映，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秘密流传的“年内日苏开战”等说法，都被该班侦察到并作为情报多次向关东军报告。“波茨坦宣言”内容传出后，该班又对各民族知识分子反映进行了侦察。

德国投降前后，美国B_{29}和P_{51}机群不断轮番对日本本土进行了轰炸，给在华日本人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日本知识分子中也曾广泛流传着1945年内美军将在日本本土登陆的说法。尤其是1945年6月，日军在冲绳战败的消息传到东北后，日本的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切断了归国的交通要道，更引起了骚动不安。总之，在华日本知识分子的忧虑、动摇、恐慌、颓废等情况，都成了该情报班特务侦察活动的内容。

我们从新京宪兵队一般情报班的活动中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一般地搜集情报，而是一个执行关东军特殊任务的机构。

军事经济班

“军事经济班”也是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设在新京宪兵队本部内的一个特殊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关东军制定经济政

策而提供经济情报。该班所搜集的经济情报，不同于一般情报班的经济情报。它主要是搞高层次的情报，其范围不仅包括东北的经济动态，连华北的物价指数，上海金融市场的行情，日本会社在华活动的情况，均属该班掌握之列。该班成员经常出入于三井物产、三菱商社及横滨正金银行等日本财团设在东北的办事机构，直接索取经济情报，向关东军报告。

另外，该班还负责监督伪满各特殊公司、会社的生产经营情况，直接出面督励战时增产、支援战争。暗地里也直接参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经济掠夺活动。其中最典型的是配合关东军的“一号工作”。1944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各个战场的相继失败，大批的关东军精锐作战师团和作战物资被抽调到各个战场，使关东军的实力迅速下降。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准备好对苏作战，日本陆军省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东北进行了总动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数10万新兵应征入伍，由于关东军新建了十五六个师团，武器装备、军需品成了当时新建师团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另外，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后方兵站基地的东北，由于连年不断的经济掠夺，工业生产力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难以再继续支撑着巨大的战争消耗。

与上述情况同时发生的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由于战争形势急剧变化，越来越不利于日本，东北民心也动荡不安，中国商人开始大量抛出伪币，争相存储物资，设法避免因日本失败而受到经济损失。在这种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关东军再想通过强硬的经济统制手段，用便宜的价格筹集到大量的战争物资，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了。面对这种情况，关东军制

定了秘密的经济掠夺方案，代号为"一号工作"。

"一号工作"的具体内容就是关东军秘密派出大批人员持伪币到东北各地收买黑市流通的商品，筹集战争物资。由于伪满政权曾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严厉取缔黑市经济，这样关东军派出的采购人员，在不能暴露身份的条件下，随时都可能遭到伪满经济警察的逮捕。为了完成这一掠夺工作，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新京宪兵队本部军事经济班，秘密在新京地区协助这项工作。关东军派出的采购人员，多是一些日本在华商人，关东军通过给他们以巨额留利，指挥他们在各地进行收买。当时在长春活动的采购人员，以日本退伍军人川户理由为首，以新京第一旅社为秘密交易所进行活动。这些人在与黑市商人秘密交易时，军事经济班宪兵化装成同伙在一旁援助，一方面监视雇用商人，防止他们泄露关东军购买的内幕；另一方面掌握交易价格防止雇用商人无边无际地攫取暴利，当雇用商人被伪满经济警察逮捕时，军事经济班负责交涉领回。从"一号工作"开始到1944年9日为止，关东军在伪满新京黑市秘密购买了价值两亿多元的物资，其中包括铜材、电器材料、工业宝石、白金、铝、摩托车、机械、水银等。军事经济班宪兵除协助黑市商人秘密购买物资外，还在本部战务课长青木益夫的指挥下，到永春路黑市场直接参与购买活动。当买卖不成交时，他们就亮出宪兵的身份，将对方逮捕，强行没收物资。

宫内府派遣宪兵

新京宪兵队除对伪满政府各部严密监视控制外，还派出3名宪兵军曹常驻于伪满皇宫。对伪满皇帝严加监视，这3名宪兵军曹直辖新京宪兵队长领导，称“宫内府派遣宪兵”。这一活动最初始于伪满建立前后，一直沿续到1945年日本垮台。“九·一八”事变后，溥仪身边聚集着一批清朝的遗老遗少，对关东军让溥仪当伪满“执政”误认为是要帮他们恢复“大清江山”，故一些人蠢蠢欲动，频繁地穿梭于关内和伪满之间，策划复辟活动，企图借日本的势力，恢复清朝的统治。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要的并不是一个复辟王朝，而是一个傀儡皇帝。为了预防溥仪及前清的遗老遗少们利用皇宫的特殊环境，从事有碍“日满亲善”的活动，新京宪兵队在伪满建立不久，就向宫内府派进了宪兵，从内部对溥仪及周围人的活动加强了监视控制。

宫内府派遣宪兵还承担对帝宫的部分警卫任务。日伪时期警卫帝宫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禁卫军”（日伪时期称羽林军），是“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从投敌的东北军、警察和铁道守备队中抽人编成；另一支是“护军”。这两支帝宫警卫部队分属于伪满军事部（1937年以前称军政部，1943年以前称治安部）和宫内府警务处领导。但关东宪兵队对这两支警卫部队都不十分放心，因此由宫内府派遣宪兵负责监视这两支部队的巡逻警备情况，并经常检查出入宫内者携带的物品。实际上宫内府宪兵是担当着监视指挥宫廷警卫部队

的任务。

另外，宫内府派遣宪兵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监视侦察谒见溥仪人的言行动向。尤其是在伪满后期，宪兵对要求谒见溥仪者和进贡者，都亲自过问，尤其是对军人更特别留意。并把谒见溥仪来人的情况作成情报，不断地通过新京宪兵队向宪兵司令部报告。实际上宫内府派遣宪兵，是关东军控制傀儡皇帝的耳目。

新京宪兵队除本部的活动外，属下分队1944年以后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对苏作战进行准备，各分队活动的重点都是加紧对民心动向的侦察，制定管内军事设施警备对策，为对苏开战时，镇压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作准备。

吉林分队当时“思想对策”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对准吉林师道大学和各国民高等学校，侦察内部的反满抗日思想及国民党、共产党在里面的活动情况，并派宪兵军曹大岛光在教育界中设了密探网。另外，新京宪兵队本部还根据掌握的线索，命令吉林分队加紧对伪满第二军管区部分高级军官进行侦察，认为那里有国民党地下组织在活动。但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一直没能侦察清楚。

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初。该分队以“八路军工作”为代号，将市内居住的一名叫“洽文浩”的中国人逮捕，长期羁押。并动用大批的特务对其周围的人进行长期监视侦察，试图发现华北八路军在吉林市活动的蛛丝马迹。后来发现是一名姓梁的汉奸宪补，为了立功请赏、故意制造的假案。这名汉奸虽被吉林分队开除，但这名无辜的中国人受尽了折磨，平白被拘押达半年之久。吉林分队的防谍工作（包括思

想对策）重点是放在管内的军事设施和重要工矿上，当时该分队所管辖的吉林省南半部各县、驻屯着大量的日军部队及兵工厂、燃料厂、军需补给厂，敦化宪兵分遣队管内还有对苏作战的秘密军事阵地。在上述重要设施中，丰满发电所和永吉县哈达湾附近的火箭炮火药工程（当时称“一号工程”）是该宪兵分队防范重点中的重点。为此，吉林分队专门在上述两地设置了宪兵分驻所，派出宪兵军曹小美野等人常驻于两地。在丰满发电所，宪兵采取威胁和物资特殊配给等手段，在欢乐街、杂货商行、丰满发电所建筑处、勤劳奉公队内，发展了大批密探、特务，对丰满发电所内的中国工人进行秘密监视。在“一号工程”，宪兵为确保安全，也使用了大批的特务，对400余名中国劳工进行监视。当时有一个叫张海明的汉奸，宪兵利用他办的食堂做秘密监视据点，派去密探做厨子，侦察劳工在吃饭时流露出的不满言论。1945年7月，张海明探听到一名工人在宿舍里说，“日本马上就要战败了，我们在这干真傻”，这句话被报告上去后，宪兵命令继续对这名工人进行监视，一直跟踪到了日本投降。此外，在“一号工程”附近设的煎饼铺、小摊床，也大都是宪兵的密探活动点。

1945年8月，组建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的命令下达后，新京宪兵队所属分队大部分宪兵被编入第1特别警备队。队本部被配属到第3方面军内，专门担当军事警察任务，并开始着手执行“焦土杀戮计划”，当时该计划的内容有，炸毁新京的一切重要建筑设施，退至吉林，用远程火箭炮轰击苏军。

公主岭分队在苏联对日宣战后，根据分队的防卫计

划，召集了公主岭的日本在乡军人、开拓团员、日本警察及公主岭农校150余名日本学生，编成了4个防卫小队，在宪兵分队长大森金一郎的指挥下，准备在苏军攻占公主岭时，配合关东军第39师团232联队死守公主岭。此外公主岭宪兵分队还收缴了民间的鸟枪、猎枪等作为武器，并强令中国铁匠赶造了大量的扎枪头，准备在开战时发给日本男女老少，用以编成"死守队"，准备以血肉之躯，阻击苏军的行动。对此，公主岭分队还编成了"死守队"的指挥系统，由宪兵队长担任死守队长，下设"死守指挥班"。

公主岭宪兵分队的这些阴谋活动由于苏军迅速占领东北，日本很快宣布投降，在公主岭附近没发生大的战斗，公主岭宪兵分队也随日军守备部队一同被解除了武装。至此，新京宪兵队最后解体。

二 控制"南满"的奉天、通化、锦州、四平、鞍山宪兵队

奉天、通化宪兵队

"奉天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在南满地区设置最早的一个宪兵据点（基地），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它除直接控制当时东北的心脏奉天外，还担负着向关东军作战部队派遣宪兵，在占领地维持治安，建立统治秩序、扶植伪政权等活动。伪满成立以后，奉天宪兵队逐渐失掉了南满宪兵据点的地位，转变成了独立宪兵队。派遣到各地的随军宪兵，亦随之在各地设置了固定的宪兵机构，有的作为奉天宪兵队的分队、分遣队仍保持隶属关系，有的独立转属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直辖。锦州、鞍山、通化、四平、承德等宪兵队，均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奉天宪兵队分离形成的。

伪满成立初期，奉天宪兵队管区曾一度南到辽东半岛，北至四平吉、奉两省交界，东抵中朝边界，西至内蒙双辽。奉天宪兵队在这一广大的区域内设置了相当数量的宪兵分队、分遣队。1934年前后，随着伪满行政机构的改革，省境划小各地宪兵队相续建立，奉天队管区相对缩小，1940年以前，大致管辖伪满的奉天、安东、通化3省。1940年通化宪

兵队成立以后，辖区基本限于奉天、安东两省。

1934年以前，辽东地区的抗日运动主要以唐聚伍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最有影响，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活动在凤城、岫岩、安东三省地带的邓铁梅、苗可秀、李春润，活动在东边道地区的王凤阁等抗日义勇军。“塘沽协定”签字后，日本帝国主义基本上达到了对东北进行军事占领的目的后，遂开始实行了所谓的“治安第一”主义，关东军主力调过头来，采取“分散配置”的办法，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讨伐。到1934年底以后，东边道地区的抗日义勇军，除王凤阁部以外，大部分被消灭。但1935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南满临时特委的领导下，这一带的抗日斗争又有了蓬勃的发展，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前身）在这一带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在通化、临江、柳河、桓仁、濛江、金川、抚松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反日会、“打狗队”等抗日民众组织，并依据这一带有利的地形，多次破坏沈海铁路，伏击日军运输队，袭击伪政权，给日伪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1935年秋，关东军开始组织“昭和10年度秋季治安肃正工作”以后，奉天宪兵队鉴于管区的形势，也于1935年12月15日，重新调整了宪兵机构，开始将活动重点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

在这次调整中，奉天宪兵队首先将城内分队管辖的山城镇分遣队升格为直辖分队，并在抗联活跃的通化、桓仁、金川、临江4个地区设立了分遣队，归山城镇宪兵分队指挥。

奉天宪兵队在东边道一带加强了宪兵组织以后，配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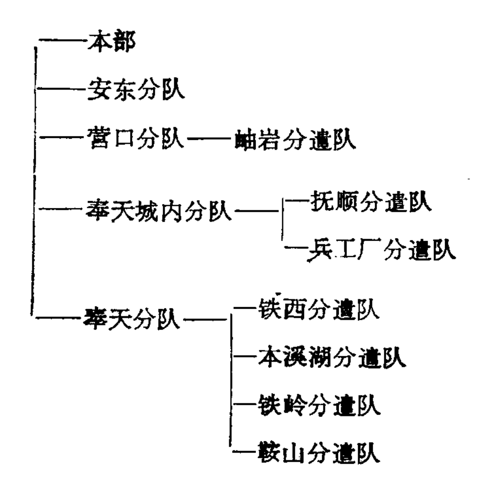
伪军讨伐，开始对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山城镇宪兵分队与新京宪兵队吉林分队遥相呼应，沿东边道北、南两个方向开始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1936年6月，随着日伪开始的“三年肃正”活动，奉天宪兵队又将通化分遣队升格为分队，下辖金川、临江、桓仁3个分遣队，接替原山城镇分队的任务，专门围绕抗联第一军展开活动。1937年6月，在“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的第二个年头，日伪政权又将东北道地区做为肃正的重点，关东宪兵队又根据讨伐的需要，将通化宪兵分队升格为独立宪兵分队，直辖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挥，并将其活动的重点确定为搜集东北抗日联军及中共南满省委的组织情报，搜捕抗联联络员。为此，特调去有政治镇压经验的奉天宪兵队特高课长宪兵中佐西田象三为队长，以加强宪兵在东边道地区的特务活动。日伪时期，以活跃在东边道地区，专事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而出名的“长岛工作班”，最初即是属山城镇宪兵分队领导，后来随着通化地区宪兵组织的变迁，才成了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直辖工作班。1940年日寇在“野副大讨伐”以后，将通化独立宪兵分队升格为“通化宪兵队”，除设本部外，下设通化、临江两个分队，在集安设分遣队。

1936年关东军曾指使伪满洲国军在东边道地区独立进行了大讨伐。在讨伐中伪满宪兵编成“混成宪兵队”专门负责搜集情报，破坏当地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关东军为了不使伪满宪兵的活动与关东宪兵队活动出现矛盾，命令奉天宪兵队长，对这一区活动的伪满宪兵负责指导，于是奉天宪兵队长加藤泊治郎又派特高课长在通化设置了“伪满宪兵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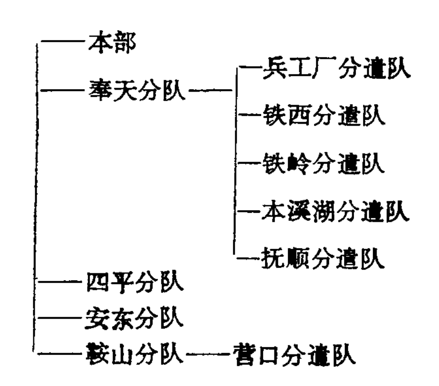
部”，具体指导伪满宪兵对义勇军王凤阁部的侦察诱降活动，最终使王凤阁部被消灭。1939年以前，奉天宪兵队除将兵力重点配备在东边道地区，参加对抗联第一军讨伐和进行策反活动外，还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满进行的“六·一三”（1936年）、“四·一五”（1937年）“三·一五”（1938年）等大逮捕，在南满广大地区，也开展了侦破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继1936年下半年，破坏中共柳河县委以后，1937年又破坏了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委员会，给中共在这一地区的基层组织，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1937年初，奉天宪兵队侦知，从1936年开始，在抚顺县伪满官吏和小学校教职员中，有中共地下组织在活动，为了进一步掌握活动情况，3月上旬，奉天城内分队将收买的一名汉奸密探，安插进了中共抚顺特别支部，由于内部潜入了奸细，半年后抚顺特别支部的活动情况被奉天宪兵队完全侦察清楚，于是在同年10月初，奉天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西田象三带领城内分队20余名宪兵从奉天赶到抚顺，指挥当地宪兵分遣队和日伪警察展开了大逮捕，在这一事件中，中共抚顺特别支部负责人张佐汉等31名地下组织成员被捕。于同年11月被送到伪第一军管区进行了“军法会审”，张佐汉等13人被处死刑，杀死在沈阳小河沿，傅景生等5人被判处10年至15年徒刑。

1940年7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根据日本陆军省对在满部队改编要领，对奉天宪兵队进行了较大的改编，关闭和新设了若干个分队和分遣队。1940年7月前奉天宪兵队机构设置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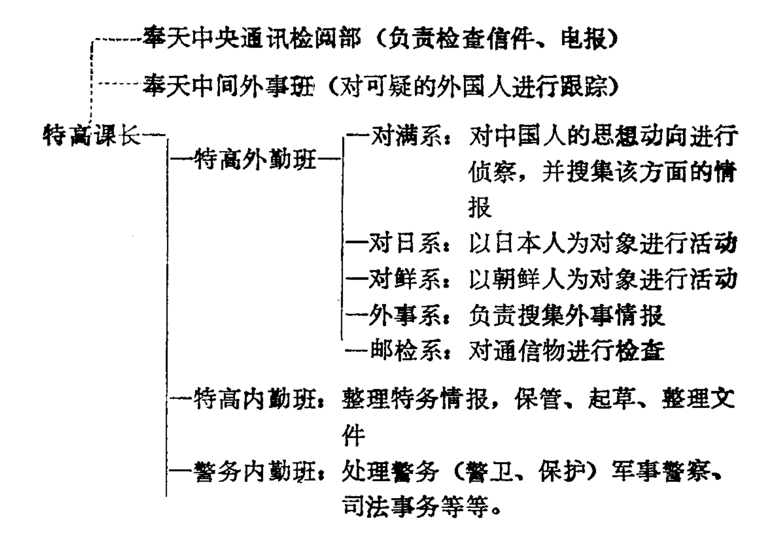


1940年7月改编以后的机构设置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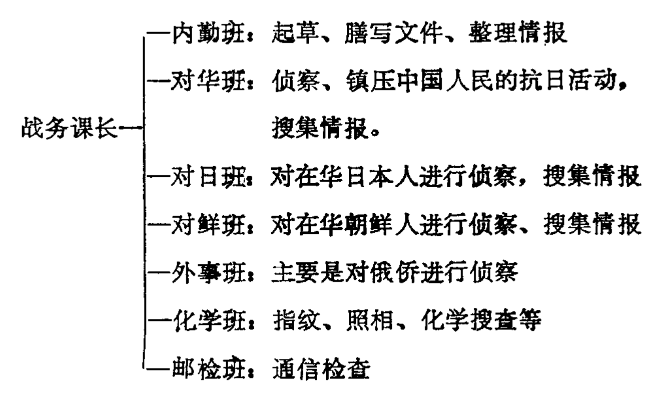


此外，在文官屯附近由于有日军火药工厂，又设立了文官屯宪兵分驻所，以后还设了辽阳分队。

奉天宪兵队本部在这次改编中，也作了较大的调整，尤其是特高课变化最大，1940年7月以后，特高课内部组织情况如下：



1943年以后，各地宪兵队本部的特高课改为战务课后，奉天宪兵队战务课又进行了一番调整。调整后的组织情况如下：



特高课共有30余名宪兵，主要都配备在对华班中，对华班也称“思想对策班”战务课内设有两个，一个称“重庆

班”，因以日本宪兵准尉今关喜太郎为班长，故也称“今关工作班”属下14名宪兵，6名密探，重点对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开展侦破活动。一个称“延安班”因以宪兵准尉渡边一雄为首，故也称“渡边工作班”，重点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活动。1944年至1945年期间，这两个班曾以“黎春工作”“岭云工作”“烈风工作”为代号，对国民党地下组织及东北抗日民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1944年6月，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后，法西斯德国在欧洲战场开始了全线溃败，这时重庆国民党政权已经看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转折，日本的投降已经为期不远了。为了在日本投降后，迅速控制东北，阻止华北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利用毗邻东北的条件，抢占东北，国民党加强了在伪满的活动，尤其是在伪满军中的活动。“黎春工作”即是奉天宪兵队战务课对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辽宁省党部的侦察代号。

“黎春工作”发端于1944年4月，当时“今关工作班”宪兵军曹吉濑某，在搜集奉天市内学生、教员的反日动态情报时，手下汉奸密探张某报告：“在奉天第四国民高等学校，有一名叫刘凤山的学生研究三民主义。这个情报报到战务课后，战务课长小林喜一认为，在学生中一定有秘密抗日地下组织在活动，于是命令吉濑军曹继续侦察。吉濑根据小林喜一的命令，除加强对刘凤山的跟踪监视外，还指令第四国民高等学校的一名日籍教员，对刘凤山的思想、言行及交友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刘与同班同学董国富、刘某、钱某等交往甚密，并对日籍教员怀有强烈厌恶情绪，于是，“今关工作

班”将刘凤山秘密逮捕。

通过审讯刘凤山，宪兵得知在第四国民高等学校学生中，有称之为“兴志会”的反满抗日学生组织，正在发展会员，秘密组织研究三民主义，并准备在同年6月，召开“兴志会”扩大会议，研究讨论以后的组织活动和会员发展方针。于是，奉天宪兵队战务课将这一情况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作了报告。

同时，战务课指挥“今关工作班”制定了对“兴志会”的侦察计划，并提出了迅速侦破其背景关系的要求。不久宪兵将刘凤山收买作了密探，对其进行了从事特务活动的训练，然后令其潜回“兴志会”内部。宪兵为提高刘凤山在“兴志会”的地位，使他能接触到核心情况，还为刘凤山制作了“收复东北失地”、“不忘‘九·一八’国耻事变”等抗日标语。为了加强与刘凤山的联系，奉天宪兵队还在市内奉光街22号“满洲自行车轮胎配给组合”设置了秘密工作室。

打入“兴志会”内部的刘凤山1944年7月报告，住在市内大西街的李某，有意接近他，询问过他学习情况和交朋友情况，并约他两天后到大西门附近谈谈，于是奉天宪兵队决定对这位身分不明的可疑人进行跟踪侦察，结果发现李某住在大西街李毓润法律事务所。同时，刘凤山也报告，李某约他会面是让他复写“工作手册”。“今关工作班”将“工作手册”翻拍后，根据手册中有孙中山的肖像，三民主义纲领，“九·一八”国耻事变宣传材料等内容，判明是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的党员工作宣传材料，至此，奉天宪兵队摸

到了国民党在奉天地区活动的线索。经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批准后，以“黎春工作”为代号．正式开始了侦察活动。

奉天宪兵队在制定的“黎春工作”的侦察方针、侦察要领等计划中，将工作的重点指向了伪军，试图通过“兴志会”发现伪满军内部的抗日分子和抗日组织。

不久，刘凤山报告，“兴志会”会员董国富说，其兄董国财是第一自动车（汽车）队中尉中队长，正在进行抗日活动。对此，战务课长小林喜一命令“今关班”的大久保军曹，专门负责对董国财进行侦察，与此同时，“今关工作班”还与董国财部队的日本人队长桑原中校和军属黑川某联系，请求帮助调查董国财的思想情况和交友情况，结果发现第一自动车队萧上尉、张宝贵上尉、汽车学校李中尉、伪军第一宪兵团军属余量、锦州第十二宪兵团王恩儒中尉、退伍军官李芳春等人与董国财交往甚密。对此，奉天宪兵队“今关工作班”又开始与各方面联系，分头进行了侦察活动，并秘密检查了他们来往的信件。

1944年8月，在跟踪侦察董国财等人的同时，以吉濑曹长为首的13名宪兵和密探，对大西区大西街的李毓润法律事务所也进行了严密监视，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监视事务所的汉奸王宪补，发现住在事务所的一个人往外搬家，王宪补随即对这个人进行了跟踪，当行至市内富士町满洲医科大学附近时、被跟踪的人扔下正在搬运的行李逃跑。由于宪兵的跟踪活动暴露，使宪兵已经掌握了的住在李毓润法律事务所的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负责人罗庆春、辽宁省党部负责人张宝慈、李某等6人闻讯逃跑，同时伪满军官董国财夫妇及其

朋友益发银行会计庞某等人也弃职逃跑。奉天宪兵队战务课无奈，只好对这些人的住宅进行了搜查，结果搜出了油印机。为了抓捕这些人，继续找到线索，“今关工作班”开始了疯狂的乱捕滥抓，先后将与上述人员有关的李毓润法律事务所的房东，志城银行经理常某，益发银行会计侯某，董国财的弟弟奉天满洲飞机公司工人董国宝、弟弟第四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董国富，伪军第一自动车队少尉张宝贵，及董国财的姐姐等都抓了起来，威逼他们交出上述人的下落，同时，“今关工作班”还派人去新民，搜查了董国财妻子的娘家。

宪兵在“黎春工作”中发现的国民党嫌疑者，不仅涉及到了伪满军界、教育界、金融界、也涉及到了伪满的司法机关，奉天省高等法院审判官潘某也涉嫌参与国民党的地下活动。鉴于这种情况，奉天宪兵队决定，动用全队兵力对辖内的审判机关、学校、金融机关、伪军部队进行基础调查，并以此为重点，强化秘密情报网。1945年2月，“今关工作班”在班长今关喜太郎的带领下，首先完成了对管内的被服厂、粮秣厂、通信器材厂、航空学校、陆军训练学校、第一高炮部队等36个伪军独立单位的基础调查，作成了“军官下士官调查名簿”。不久又完成了对益发银行等8家银行、南满医科大学及部分伪满司法机构的基础调查，编成了“银行职员名簿”“医大学生名簿”“审判官名簿”和“律师簿名”。

在追查伪军内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中，“今关工作班”根据“军官下士官调查名簿”首先将重点指向伪军第一自动车队和第一高炮部队。

在对第一自动车队侦察中，宪兵发现有一个叫许永贵的

中尉，过去与董国财关系密切，但已转到伪新京兽医大学做属教官，为了对他进行跟踪侦察，“今关工作班”班长今关喜太郎奉命去新京伪国务院审计局，找了庶务科长高井某，策划了以出差名义，将该科与许永贵有接触的科员邵某骗到奉天进行了逮捕，宪兵对邵某进行了审讯，并加以威胁，在他宣誓同意做密探监视许永贵后，将其放回。

这时，“今关工作班”成员也将第一汽车队少尉张宝贵逮捕，进行了昼夜刑讯，在他答应作密探，负责报告国民党地下组织在第一汽车队的活动后，将其释放。

在对伪军第一高炮部队的侦察中，“今关工作班”采用了物资收买的办法，用面粉、食油等紧缺的经济统制品，收买了伪军第一高炮司令部上尉张海山，命他对队内进行侦察，结果司令部少校徐麟对日籍军官不满的言论被张密报了上去，徐麟也被定为重点侦察对象。

由于奉天益发银行和志诚银行在“黎春工作”中，都涉嫌与国民党地下组织有联系，因此宪兵在对金融界的侦察中将这两个银行列为重点。为了侦察志诚银行职员的情况，奉天宪兵队先将李毓润法律事务所的房东、志诚银行经理常某绑架到奉天宪兵队本部，审讯和威胁后，在他宣誓同意充当坐探后释放。宪兵给他的任务是监视接近李毓润法律事务所的人，注意其相貌和举止言行。提供志诚银行职员名单，监视职员的活动。为了侦察益发银行，“今关工作班”的宪兵还在马路上逮捕了一名家住该银行宿舍的会计，令他提供逃跑的庞某情况，并让他宣誓同意作密探监视该行人员。

为在南满医科大学侦察学生的反满抗日组织，宪兵队逮

捕了该校一名姓王的学生，将他绑架到本部威胁恫吓，当他宣誓愿意充当特务后将其释放。这名密探后来将该校的5名抗日学生，报告给了奉天宪兵队。

“在黎春工作”中，奉天宪兵队“邮检班”还配合“今关工作班”活动，从1944年6月开始，对有关30余人的来往信件进行了检查，据当时参与这一活动的日本宪兵供称，因“黎春工作”被检查扣押的信件大约有600余封。

1944年前后，在奉天参与侦察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日伪警务机关，除关东宪兵队外，还有奉天省地方保安局和伪满警察。警察和保安局活动的代号是“桃园工作”。由于宪兵侦破了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地下组织的据点“李毓润法律事务所”，使国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罗庆春等人不得不在1944年5、6月间转移到伪满新京。在奉天发展的地下组织也基本上都被日伪警务机关破坏殆尽。当时仅伪奉天省警务厅就逮捕了300余名与国民党地下组织有关的人员。

罗庆春等人转移到伪满新京后，同年10月重庆国民党中央再次命令他重建东北国民党组织，于是，罗等人又以伪满政府和社会各部门的日本留学生为目标，积极展开了活动，并借美国飞机大举轰炸东北之际，将其活动由秘密形式发展到了半公开状态，拟定了“组织发展计划”和“党务工作大纲”，提出了党军工作一体化的工作原则及争取群众、防止异党活动、准备军事反攻、准备复员，准备政权干部等活动要领。

但由于国民党组织不严，内部打进了伪满首都警察厅的特务，使其领导人罗庆春、张宝慈等人被捕，党员名

单、个人自传、工作手册及重庆国民党中央对其工作的指示、命令全部落入日伪警务机关之手，致使日伪警务机关于1945年5月23日，又以“晓工作”为代号，按名单在全东北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捕，国民党地下组织数百名成员被捕，使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活动彻底失败。

正当“今关工作班”对国民党地下组织加紧侦察破坏的同时，奉天宪兵队战务课长小林喜一又接到密探的报告，在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有“文艺小组”在活动，于是，小林喜一又以“岭云工作”为代号，命令战务课“思想对策班”的“渡边工作班”着手侦察。

不久，在“七·七”事变纪念日的晚上，奉天城内出现了多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青年们团结起来！”的抗日标语，宪兵根据标语的字迹和内容判定，是青年学生所为，故加紧了对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可疑师生的跟踪侦察，但一直未能发现线索。于是宪兵重新拟定了侦察计划，首先用紧缺物品白面、食油收买了该校一名姓邓的教员，然后通过他又收买了一名参加了地下爱国组织的学生。不久，这个学校中高年级学生中的地下组织情况亦被“渡边工作班”侦察清楚。

该组织最初称“自兴会”，后改为“复华会”，1943年末成立。目的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团结同学，启蒙青年思想，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组织内设：宣传启蒙部，负责编写爱国教育材料，主要的方法是将同学们作的爱国文章组织传阅，以此启发同学们的思想，增强爱国意识。

组织部：负责发展同学（会员）。

军事部：准备派会员加入伪军，在军队内部扩大组织。

会计部：负责筹集活动经费。

“渡边工作班”经过半年多的监视侦察后判明：“复华会”纯系学生的自发组织，背后即没有国民党操纵，也不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于是在1945年3月对其进行了镇压，35名成员（均为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生或毕业生）全部被捕，其中6名组织者，被送奉天高等法院判刑。其余者被强令宣誓，以后不再从事反满抗日活动，送回家中，由当地宪兵警察监视其行动。

锦州宪兵队

“锦州宪兵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控制辽西地区而设置的一个宪兵机构。1937年以前，与奉天宪兵队东西呼应，以辽西重镇锦州为中心，控制北宁铁路、营口港，执行着关东军在南满地区镇压中国人民抗日运动，切断东北与华北血肉联系、掠夺东北资源的任务。

锦州宪兵队的前身，是承德宪兵队锦州分队。1932年初，关东军占领锦州后，先以第8师团派遣宪兵编成“锦州临时宪兵队”。1933年2月，日军攻占热河后，设热河宪兵队，同时将锦州临时宪兵队改为分队，置热河宪兵队隶下。不久，锦州分队又划入奉天宪兵队。1936年8月，锦州宪兵队正式成立。队下设锦州、山海关、阜新、锦西4个分队及通辽、兴城等分遣队。锦州地处北宁铁路沿线，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尤为重要，1936年关东宪兵队司

令部在此设立宪兵队有种种考虑，其一，是“九·一八”事变后，该地一度成为东北救亡的中心，张学良政权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迁到此地办公。在流亡政府的支持下，事变后辽西的抗日义勇军组织的最早，声势最大，最兴盛时期达数十万人马，几十路大军。东北全境沦陷义勇军被镇压后，大量的东北军官兵和义勇军战士散于民间，这些人的反满抗日意识并没泯灭，“七·七”事变前活动尤为明显。此外，关内的东北军也以北宁铁路为中心，在这一带频频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十分恐惧，害怕这一带的民众配合关内东北军“群起叛乱，颠覆满洲国”。

其二，辽西不仅有通向关内的咽喉重镇锦州，也有通向华北门户的山海关。另外该地经济地位也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辽西地区的石油资源在锦州、锦西设置了三井合成燃料厂及军用煤炭液化场等大型军用能源企业。并铺设了通至葫芦岛的石油输出管道。另阜新、北票的优质无烟煤，杨家杖子超过日本全国产量数倍的稀有金属钼、绥中的水银、铜、硅石、锰、铀等矿产资源，也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重点目标。保护经济掠夺，乃是设置锦州宪兵队的另一重要考虑。

锦州宪兵队分队以下的分遣队、派遣队分驻所等机构，绝大部分是按经济掠夺需要配备的，太平洋战争前后，为了保护葫芦岛外运码头，在锦西分队下设了葫芦岛分遣队、在阜新分队设置了北票分驻所。当时杨家杖子开采的钼在葫芦岛由德国潜艇装运出口，为了保证对这种矿产资源的掠夺，锦州宪兵队又在杨家杖子设置了派遣队。

另外，锦州宪兵队所管辖的山海关宪兵分队，在关东宪兵队中其地位也十分特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曾在山海关设了两个宪兵机构，一个是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宪兵队"天津分队山海关分遣队；一个是关东宪兵队的山海关分队，两个山海关宪兵队的管区以山海关车站为界。山海关车站原归华北宪兵管辖，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后军事运输繁忙等因素，被关东宪兵队接管。山海关分队除管辖山海关车站外，还管辖着兴城、绥中两县。山海关分队总共有宪兵20余名，其中半数以上配备在山海关车站，主要任务是警戒车站，办理军事运输，密查走私，堵截"通缉犯"，搜查"经济犯"。此外，还与伪满警察、铁路警察联合编成"关门外事班"对过往的外国人，展开监视侦察活动。

1936年前后，承德宪兵队侦察到在锦州、山海关、朝阳、阜新及兴安南省通辽一带，有"旧东北军的残余分子"在从事"建军"活动。于是命令锦州宪兵分队派出密探进行侦察。不久，锦州分队密探王毅晨在其朋友佟云亭处听到，义县有个叫王凤林的人，正以"中华民国仁义军"的名义召兵。锦州宪兵分队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派这名汉奸通过朋友关系打入内部，进行侦察。

王凤林，义县人，家住辽西义县城东药王庙附近，原系卖报出身，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素怀不满，"九·一八"后一直与朋友策划起义。但王凤林文化不高，头脑简单，汉奸王毅晨打入内部后重点与他交结，每日请他吃饭，供他花钱，经过一段时间的引诱后，王凤林终于将其组织的名单交给了王密探。此外，王密探还了解到：王凤林多次派

人去北平，与国民党“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联系，接受召兵工作指示的情况以及“七·七”事变后他们准备以义县、朝阳、北镇为中心，面向营口、鞍山、奉天、海伦等地，召集东北军旧部、编成3个师10个旅8万余人准备暴动的种种重要情况。

鉴于这种情况，锦州宪兵队认为：“在华北事变之际（指“七·七”事变），这种活动十分危险，必须立即镇压”于是，从8月18日开始，伪锦州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指挥各地警察，宪兵、铁警，在伪满锦州省的锦县、朝阳、北镇、义县、绥中、及兴安南省的通辽等地，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捕，以军长王凤林为首的90余名仁义军成员被捕。王凤林在审讯中当场被打死，其余人被送伪第五军管区进行了“军法会审”。依据伪满的“暂行惩治叛徒法”，8名重要成员被判死刑，大部分被判处有期徒刑。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结束间岛、吉林、通化3省联合大讨伐后，开始将工作的重点转入加强对伪满国内的思想统治方面，南满各地的宪兵队都进一步充实了特高课组织，在北满没设特高课的宪兵队，也开始设了特高课。围绕工作重点的转变，各地宪兵队的组织也相应地做了调整，新设和撤并了一些分队和分遣队。在这种情况下，锦州宪兵队将原来的4个分队，改为锦州和山海关两个分队，下设葫芦岛、阜新、通辽3个分遣队。

四平、鞍山宪兵队

四平，地处伪满新京和奉天两大重要城市之间，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较为严密的地区，也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关东宪兵队在这一地区一直未重点配备宪兵，直到1944年5月前，仅在四平街有一个宪兵分队，15名宪兵，归奉天宪兵队领导，执行一般的宪兵任务。1944年5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突然在这一地区设立了独立宪兵队，并以四平为中心，沿通辽——四平——通化铁路，设置了若干个分遣队，宪兵队长的阶级也由过去的少尉提高到中佐。四平宪兵队的建立，主要是为配合1944年前后关东军作战体制的变化。

1944年以后，战争形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苏联对日作战已成早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和关东军的首脑人物开始考虑最后的防御问题，最后决定放弃关东军多年的主动出击作战设想，采取全面持久的防御作战方案，准备在日苏开战后，利用东北广阔的地域，与苏联开展持久战，以确保日本在东北东南部和北朝鲜地区的统治，根据这个180度作战方案的大转变，关东军也重新调整了在东北的军事部署，开始将中苏东部国境的部队，秘密向长春至图们铁路沿线一带移动，同时将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从奉天移到辽源，部队沿通辽至通化一线展开，与其它师团一起担当"满洲"中部、西部和西南部的防卫（不久关东防卫军又被改为44军作为野战部队担当守备任务），四平宪兵队正是根据这一军事部署的

转变，从军事警察，防谍和“思想对策”方面考虑而设置的。

鞍山，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钢铁资源的重要基地，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以经营“满铁”附属地为名，在这一带探矿建厂，到“九·一八”事变前，鞍山的钢铁工业已初具规模。为保证经济掠夺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很早就建立了宪兵机构。“九·一八”事变前，该地即有鞍山宪兵分遣队，归奉天宪兵分队管辖，“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掠夺规模的不断扩大，1936年在鞍山成立了宪兵分队，归奉天宪兵队管辖，一直到1944年6月，这一地区的宪兵组织，一直是奉天宪兵队的一部分。1939年日伪对间岛、通化、吉林3省联合大讨伐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南满地区已经“天下太平”，故在宪兵机构改革中，又将鞍山宪兵分队改为分遣队。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随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在南洋和中国华北、华中等地区掠夺到了大量的铁矿石，急需运往鞍山冶炼成生铁，然后运回日本，这样一来鞍山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鞍山宪兵分遣队又升格为宪兵分队。这时由于鞍山用的冶炼煤依赖华北运入，运输也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样鞍山宪兵分队不仅控制鞍山至营口间的铁路，还在营口设置了分遣队，直接控制营口港。

鞍山宪兵分队还直接监督鞍钢的生产，在“昭和制钢所”厂内设置了“宪兵执勤办公室”，操纵大批密探，特务在工人中活动，刺探工人们的思想动向，侦察工人们的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7月29日，60余架美国 B_{29} 轰炸机首次袭击了鞍

山、大连、奉天等伪满重工业城市，接着8月4日、8月27日、9月8日、9月26日美军又出动了上百架飞机，连续对东北重工业城市进行了轰炸。在这一系列轰炸中，鞍山的钢铁工业首当其冲，成了美机重点袭击的目标。鞍钢的损失也极为惨重，其中7月29日和9月8日的两次空袭中，鞍钢就伤亡了600多人，部分高炉和辅助设备被炸毁。鞍钢一片恐慌，民心动摇，流言四起，治安开始发生混乱。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失去制空能力，对这种大规模轰炸无可奈何的日本军部，为躲避轰炸，指令关东军着手疏散鞍钢。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于1944年9月决定设立鞍山宪兵队，派古川岩吉中佐为队长，将奉天宪兵队的本溪、营口等分队划入鞍山宪兵队隶下。重点加强空袭时的警备工作及指导各机关防空、疏散和通讯联络等工作。

1945年8月1日，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编成，鞍山宪兵队被撤销，奉天、锦州、四平宪兵队大部分人员被抽调编入第1特别警备队中，各宪兵队仅剩下本部和极少量人员被配属到各作战部队中担当军事警察业务。8月10日，苏军进入东北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通令，除通化宪兵队以外，各宪兵队与司令部脱离隶属关系，转归当地作战部队司令官指挥，宪兵司令部开始向通化转移。奉天宪兵队队长镰田浩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自杀，本部未编入特别警备队的45名宪兵，在队副官桑原中尉的带领下，一直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保持联系，并将45人分成了3个小队，准备步行去烟台乘船回日本，后由于苏联红军迅速抵达奉天，该队被缴械。

锦州宪兵队绝大多数人员在8月1日被编入特别警备队

后，队本部的任务改为承担军事警察职责和警备热河、长城方面八路军的活动。日本宣布投降后，与司令部失掉联络，队长堀田正雄为接通联系带领残部及家属步行来到伪满新京，结果被苏军解除武装，收容进了南岭收容所。至此，日本帝国主义用于控制东北南部的宪兵机构彻底崩溃。

三　围绕"白俄"对苏从事特务活动的哈尔滨宪兵队

哈尔滨宪兵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满"最早建立的一个宪兵基地。它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满"的活动中，担当着向作战部队配属宪兵、在占领地布设宪兵点的活动。它的前身是关东军第2师团和第8师团配属宪兵队。伪满建立后的1932年5月，根据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由配属到驻防部队宪兵编成驻防地宪兵队"的命令，哈尔滨宪兵队正式编成。

哈尔滨宪兵队在1933年前，除管辖哈尔滨市区及周围地区外，其分队、分遣队随着关东军向"北满"的推进，一度设到掖河、绥芬河、佳木斯、密山、一面坡、横道河子、东宁、依兰、富锦等地。1935年佳木斯、牡丹江、东宁等地的宪兵队相继成立后，哈尔滨宪兵队的管区逐渐缩小，以后一直局限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伪满滨江省内。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期间，设在各地的独立宪兵队，都有各自特殊的任务，由于宪兵同时担当着军事警察和政治镇压的双重任务，因此，宪兵队设置的原则既不是按伪满的行政区域而定（有的宪兵队管伪满的几个省），也不是按关东军的防卫区而设，更不是以大城市或中心城市为原则设立。各宪兵队设立的根据，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种是前面述及过的鞍山、通化、四平宪兵队类型，这类宪兵队一般规模都不大，临时性和变动性较大，随着形势的需要设立，也随着形势的变化降格、废止。设立后其任务明确；另一种类型的是国境地区的宪兵队，如东宁、鸡宁、北安（孙吴）、东安（密山）、海拉尔、阿尔山等宪兵队。这类宪兵队都设在对苏作战的前沿，因这些地区战略地位重要，驻屯着大量军队，筑有众多的国境阵地、囤积着无数的作战物资，因此宪兵队的主要活动是"防谍"。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部分国境宪兵队还兼有侵苏后转成野战宪兵队的任务；第三种类型则是从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思想镇压、民族压迫等方面考虑，设在一些重点城市的宪兵队。新京、奉天、锦州、大连、承德、间岛、齐齐哈尔等宪兵队，多属这一类型，哈尔滨宪兵队便属其中之一。这类宪兵队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且编制大，人数多，队本部负责思想控制和政治镇压的专门机构特高课（战务课）的机构尤为庞大，活动也格外频繁。这类宪兵队，特高课人员一般都占队本部人员的2/3以上，特高课长的地位相当于副队长，一般都由宪兵少佐担任。

哈尔滨宪兵队正是这种类型的宪兵队，它在伪满14年中，主要是担当着政治镇压的任务。但由于哈尔滨地区的情况十分特殊，因此，哈尔滨宪兵队的活动又带有着十分神秘的色彩。

哈尔滨地处中东铁路交差点上，历史上曾是沙俄侵略远东的政治中心。由于十月革命后，一些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反共分子及1935年苏联出卖中东铁路后一些不肯返回苏联的人

长期逗留在哈尔滨周围，致使哈尔滨宪兵队的大部分业务，是围绕着这些人而展开。据日伪时期统计，当时哈尔滨附近的白俄，大约有3万人左右，占东北7万白俄总数的40％以上。这些人按国际法规定，既没有苏联国籍，也没有“满洲国国籍”，伪满将其称之为“无国籍白俄”。另外，在这些白俄中，民族成分又十分复杂，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土耳其鞑靼人，也有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等。在这些人中除犹太人外，其它民族的白俄生活都较贫困。当时，日伪方面对这些人的看法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虽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持有敌视态度，但由于生活贫困，很容易被苏联的物质引诱所收买，成为苏联对伪满进行谋略活动的工具。另外，在这些人中也一定潜藏着一些伪装成反共，实际上早已加入了苏联国籍的“赤俄”分子。据此，哈尔滨宪兵队对这些人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期，是全队工作的主要部分。

由于这一特殊性，哈尔滨宪兵队本部在机构设置上，也与新京、奉天等队有很大的差别，在战务课中曾专门设置“积极防谍班”（也称战务第一班），十余名宪兵除偶尔参与前面已述及过的跟踪、监视苏联总领事馆的“光工作”外，重点是监视白俄的活动。他们在白俄中收买安插密探，太平洋战争后，“积极防谍班”还编成了“无国籍白俄名簿”，将他们的活动定期登记，时刻监视他们的行动。

1939年4月，“积极防谍班”的密探报告：哈尔滨货车站有1名中国职员，生活条件与其收入差距很大，该人出手阔绰，怀疑是苏联间谍。于是防谍班对其进行了秘密侦察，

结果发现该人与住在斜门街1名叫罕吉姆诺夫的白俄有接触，哈尔滨宪兵队为侦察这名白俄的活动，首先将这名中国铁路职员逮捕，经反利用后，由他负责对罕吉姆诺夫进行长期跟踪监视。宪兵在跟踪时，还用长焦距镜头照相机把与罕吉姆诺夫接触的苏联人都一一拍照下来，逐个进行跟踪，结果发现罕吉姆诺夫与苏联领事馆有联系。1940年4月，宪兵将其逮捕，逆用后用他长期刺探苏联总领事馆的情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为隐匿对苏特务活动的罪行，哈尔滨宪兵队安排罕吉姆诺夫逃到了上海。

哈尔滨宪兵队除对白俄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控制外，还配合哈尔滨特务机关、白俄事务管理局对白俄进行管理和"内部指导"，对白俄与中国人、日本人通婚，白俄子弟入伪满建国大学进行家庭背景调查，目的是建立所谓的防御体制，使"白俄不被赤俄的煽动所动摇，出现与日满方面背道而驰的事态"。

日伪期间，宪兵和哈尔滨特务机关（关东军情报部）在对苏活动中有着明确的分工，宪兵的任务主要是执行安全保卫意义上的"防谍"，特务机关负责对苏进行谋略和谍报工作。然而这种分工对哈尔滨宪兵队来说，多少有些例外。这是因为对白俄工作，不仅有防谍的一面，也有进行谋略活动的一面，同样一个目标，由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两个系统分别进行工作，这样势必要出现各种矛盾，对此，关东军为"圆滑"两者之间的关系，明文规定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兼任哈尔滨特务机关对苏谍报主任职务。据此，哈尔滨宪兵队不仅担当对白俄的防谍工作，也配合特务机关对白俄

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参与对犹太人的“河豚计划”。

本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后，为永久地霸占这片土地，日本财界和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们，曾异想天开地设想要划出一块土地，把世界各地受到迫害无家可归的近百万犹太人吸引到东北。企图借助这种民族情感，吸引美国犹太富商的金钱，利用犹太难民的才能和学识，开发东北。

当时，这种设想的真实用意出自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日本用武力占领东北这块超过自己本土1倍以上的土地后，对埋藏于地下的宝藏和丰富资源无力开发。当时的日本既无财力又缺技术，还遭受着美、英等国的强烈指责，日本想通过给犹太人划出一块安身土地，以此争取美国的犹太社团及知名人士，影响美国政府，减轻对日本的敌视，争取得到美国政府的投资。其二，获取美国犹太财团的巨额援助，购买日本所需的物资。其三，通过迅速开发东北，增加东北实力，以实现抵制苏联的愿望。

关东军参谋和日本财界在打这一如意算盘、把目光放在犹太人口袋里的金钱和他们脑子里的智慧时，也对犹太民族又敬又怕，唯恐到头来驾驭不了，养虎遗患。所以，在策划这一阴谋计划的同时，即起了一个自警自诫的代号“河豚计划”，把犹太人视为“河豚”，取意为“河豚体内有毒，料理得当味道鲜美，可大饱口福，如操作不慎，则有丧身的危险”。

在“河豚计划”秘密策划期间，关东宪兵队和哈尔滨特

务机关即接到了对东北犹太人展开怀柔工作的命令。然而，这时东北的犹太人，处境已经十分艰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大批日本浪人也随之涌入东北，他们侵占了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利益和财产，使犹太人已经无法正常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河豚计划"时，旅居哈尔滨的犹太人已经开始大批南下，70%的人已经逃往平津及上海的英法租界，哈尔滨残存的犹太人，已不足1500人。关东宪兵队为贯彻"河豚计划"的设想，决定第一步对残留东北的犹太人进行安抚。为了执行这项工作，特地将"犹太通"，1925年曾在哈尔滨秘密作过犹太人工作的日本宪兵少佐河村爱三郎，从日本调到哈尔滨，担任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长，重点为实施"河豚计划"铺平道路。

河村在出任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长时，哈尔滨的犹太人不仅遭受着日本浪人的欺凌，也经常遭到白俄右翼团伙的袭击，哈尔滨著名的马迭尔旅馆老板的儿子，就因是犹太人，而被白俄内的其它民族人杀害了，肇事凶手没受到法律制裁。另外，当时"北满"一带正流行瘟疫，有人密告是犹太人所为，故伪满警察也逮捕大量犹太人，查不出证据也长期关押不放。这两件事在犹太人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河村特高课长上任后，当即提出"没有理由敌视善良的犹太人"，"对犹太人压迫与满洲建国精神和协和精神不符"，遂开展了怀柔犹太人工作。河村会同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安藤麟三郎少将，首先将杀害马迭尔老板儿子的白俄右翼团体成员，驱逐出满洲国，接着对因流行瘟疫而被捕的犹太人进行了调查，很快又以证据不足为由，将其全部释放。这

两件事处理后，宪兵和特务机关得到了在哈犹太人的好感，对进一步开展犹太人工作创造了条件。不久，河村特高课长又通过他当年在哈尔滨的旧交，结识了亚洲地区犹太运动的领导者，在哈尔滨经营医院的医学博士尼古拉·库弗斯曼。河村向库弗斯曼透露，宪兵和特务机关在日本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犹太人的解放运动，愿意给以关照。库弗斯曼在河村的启发下，不久提出了在哈尔滨召开远东犹太人大会的请求，河村与新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樋口季一郎少将磋商后，表示同意并许诺尽量予以帮助。这样，哈尔滨又逐渐成为了远东犹太人的中心。1937年哈尔滨宪兵队协助残留在东北的犹太人，组织了远东犹太人协会，1938年1月，还支持犹太人在哈尔滨一路街商工组合，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人大会，来自东京、天津、上海、香港的2000余名犹太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樋口季一郎少将和河村特高课长微服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声援犹太人的讲话。这次会上，犹太人还发表了“愿与日本及满洲国合作，建立亚洲新秩序”的声明。

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亚洲以色列的“河豚计划”，筹划了七八年，设计可谓绵细。1938年12月经东京最高首脑秘密首肯后，1940年拿到美国，找到了美国犹太社会最有影响的人士、世界犹太人协会会长，犹太教士、美国财界巨头史蒂芬·怀特，向他兜售这一计划，想从中弄到几亿美元，但遭到了怀特的拒绝，致使日本人精心策划的“河豚计划”宣告破产。随即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长河村爱三郎，也完成了他的使命，离职卸任。

哈尔滨宪兵队和特务机关，30年代配合“河豚计划”在哈尔滨对犹太人进行的阴谋活动，一度在全世界犹太人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日本投降前夕特务机关和宪兵都将大量的档案罪证销毁，使我们很难掌握当时活动的详细内幕，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发掘。

除积极防谍外，哈尔滨宪兵队的消极防谍工作也颇具特色。消极防谍也称“自体防谍”，由特高课内的“消极防谍班”（也称“战务第二班”）负责，其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对管内驻屯的日伪军部队、伪满政府机关、重要企事业进行秘密保护，通过设在这些机关、部门的防谍网（防谍协会）与其保持秘密联系，就防谍的具体事宜，对其进行监督指导。另一项则是向管内的兵工厂、军用物资储备基地、物资补给厂等地派去宪兵，对在这些地方劳动的中国工人进行严密监视。宪兵在这些地方收买和安插了大量的密探，负责侦察内部的可疑现象。此外，“消极防谍班”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即是对设在哈尔滨郊外平房的“731部队”进行防谍保护。“731部队”也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东北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其活动完全是在极秘密状态下进行。对此，哈尔滨宪兵队“消极防谍班”专门派去1名宪兵曹长，在内部担当防谍工作。此外，哈尔滨宪兵队还派人负责对“731部队”外出人员的活动进行监视。当时“消极防谍班”宪兵曾从防谍的立场出发，不止一次地向该部队长发出警告，“部下有人在哈尔滨饭馆吃饭时，流露出了能使对方明白该队性质的支言片语”，责令整饬内部。

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战务课内，还设有“邮便检查班”，

该班近10名成员，分两部工作。一部在哈尔滨中央邮政局内通过检查信件、电报直接发现思想对策和防谍工作上的线索；另一部被派至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与保安局人员联合办公，这部宪兵对内称“特殊工作班”，对外借用“冈田洋行”牌子，对往来于哈尔滨的各国领事馆的信件、文书、小件包裹进行秘密拆检，从中刺探外国情报。伪满末期，“特殊工作班”除加紧拆检外国使馆的信件外，还配合哈尔滨特务机关进行了部分谍报和谋略活动。

哈尔滨由于是滨北（安）、滨洲（满洲里）、滨绥（芬河）等重要铁路的交叉点，因此，其管区不仅是对苏防谍工作的重要地区，也是侦察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重点地区。中共北满省委、吉东省委围绕铁路，在这一地区很早就建立了许多基层组织，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也都围绕铁路开展了抗日活动。因此，哈尔滨宪兵队在进行“防谍工作”同时，也担当着对内镇压的“思想对策”工作。

“思想对策”工作在1938年以前，哈尔滨宪兵队主要是通过警务统制委员会的形式，直接指挥各地伪满警察进行。1938年以后，哈尔滨宪兵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防谍上后，“思想对策”业务中侦察、镇压共产党、国民党及反满抗日地下组织这部分，逐渐交给了伪滨江省警务厅和哈尔滨警察局执行，宪兵则以主要力量从事侦察在满日本人（共产党）、朝鲜人的反战反军① 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及搜集各方面情报等工作。1938年以后，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曾专门设立

① 指反对关东军的运动。

了“一般情报班”，负责搜集伪满经济动态、政治动态、时局动态及伪满政权机关、部队、学校、会社、一般市民对伪满施策反映等方面的情报。

宪兵这时在“思想对策”工作中，只是在遇到重大事件（如王岗事件）时，才按照关东宪兵队“区处统制各警务机关要领”，统一指挥管内各警务机关活动。

1938年以前，哈尔滨宪兵队的下属机构主要是配合关东军在这一地区的讨伐、镇压而设置，其具体情况如下：

哈尔滨宪兵队本部（哈尔滨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

- 一面坡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队）
- 帽儿山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遣队）
- 珠河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队）
- 阿城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队）
- 双城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遣队）
- 五常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遣队）
- 绥化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队）
- 满沟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遣队）
- 安达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遣队）
- 海伦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队）
- 双河镇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遣队）
- 傅家甸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宪兵分队）

这期间哈尔滨宪兵队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镇压活动，是1937年的“四·一五”大逮捕，哈尔滨宪兵队指挥下属各分队、分遣队在哈尔滨、安达、双城、阿城等地，对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下的哈东特委，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中共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投敌变节，向哈尔滨宪兵队出卖了哈东特委的组织情况，哈尔滨宪兵队根据傅的供述，指挥在哈的日伪警务机关，进行了跟踪侦察，最后指

挥伪满警察、宪兵一齐动手，将中共哈东特委彻底破坏，总共逮捕了近300人，处死了近百人。1938年前哈尔滨宪兵队组织的"四·一五"大逮捕，是关东宪兵队镇压中国共产党人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最残酷的一次。

1938年以后，哈尔滨宪兵队参与指挥最大的一次政治镇压活动是"王岗事件"。

1941年1月4日，驻哈尔滨附近王岗的伪满第三飞行队80余名士兵，受东北抗联三路军在三肇（肇东、肇源、肇州）地区抗日活动的鼓舞，在中士苏贵祥等人的领导下，杀死队内日籍军官和亲日军官，发动了震惊伪满的"王岗起义"。之后，携带大量的枪支弹药乘汽车进入三肇地区，准备与抗联三路军十二支队汇合。事件发生后，哈尔滨宪兵队根据"区处统制日满警务机关要领"，宣布统一指挥伪满警察、宪兵，配合日伪军进行讨伐和调查。随即派出3名宪兵到王岗飞行队，切断该队与外部的联系，取缔内部的"流言蜚语"，暗中追查起义线索。接着队本部又派出11名宪兵到讨伐部队，直接指挥随军伪满宪兵参加讨伐活动。

1月6日起义部队被日伪军讨伐队包围在肇东县榆树林一带后，经激战30人战死、45人被俘、10人逃跑，派遣宪兵随即开始了搜索逃散起义士兵，对战死者认定原籍、姓名等工作。1月7日，哈尔滨宪兵队又从特高课抽调8名宪兵，临时编成"审讯班"赶赴肇东县，对被捕者进行突击审讯，当大致弄清起义的情况后，哈尔滨宪兵队长命令，将全部被捕者押回哈尔滨进行详细审问。并决定由17名日本宪兵编成"特别搜查班"，重点追查导致这次起义的背景关系，并命

令伪满宪兵第4团配合行动。

不久，哈尔滨宪兵队完成了对王岗起义全过程及背景的调查，作出了3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作了报告。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使敌伪内部十分震惊，对此有人提出"象第三飞行队这样素质比较好的满洲国军部队，都如此不可靠，倘若有计划地对其进行谋略，则将是相当危险的，因而要对满洲国军进行根本的改造"。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接到这个调查报告后，当即以"王岗事件的全貌"为题，向关东军司令部作了报告。不久，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将其全文转发给伪满司法部、最高检察厅、治安部顾问部、警务司、伪满宪兵总团、伪满铁路总监部等单位，令其研究控制伪满军的具体对策。不久，伪满治安部根据"王岗事件"的调查材料，制定了"满洲国军思想对策工作章程"和"满洲国军思想对策情报收集计划"，要求各部队对伪满士兵的出身、历史、思想倾向、言行、交友关系、外出情况等进行调查，与士兵家属所在地的伪满警察机关进行联系，以此控制伪满军的思想动向，防范共产党从中活动。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前夕，哈尔滨宪兵队下属分队、分遣队大部分人员被编入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配属到第4方面军，准备在苏军进入东北后，配合关东军在东北西部和北部地区作战，开展谋略破坏活动。后由于苏军机械化部队迅速突破关东军西部和北部防线，进入东北平原，日本宣布投降，哈尔滨宪兵队的人员，亦随第3特别警备队被解除了武装，与北满地区被俘的日军一同被押往苏联。

四　封锁长城的热河宪兵队

热河，古已有制，清雍正年间设厅，民国（1928）年间改省，历史上为塞外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交融地区。近代以后，虽未曾纳入东三省版图，但多为东三省势力所节制。由于这一地区地理、历史条件特殊，“九·一八”事变伊始，关东军就将其纳入了“满洲国”的版图。1933年初日寇占领该地后，设热河省，置热河宪兵队，不久改称“承德宪兵队”，管辖着今河北省承德（市）、平泉、青龙、承德（县）、滦平、丰宁、围场、隆化、兴隆1市8县；内蒙古赤峰（市）、乌丹、宁城、喀喇沁、敖汉、翁牛特、赤峰1市6县旗及辽宁省朝阳、凌源、建昌、建平、北票、喀左6县旗。1934年后，伪满行政区几经调整，先14省后增为19省，热河省域亦随之部分变动，今辽宁西部的北票、朝阳等县被划入伪锦州省。1942年以后大规模的“西南肃正”即是在这一区域展开。热河宪兵队是1933年关东军攻占热河后，以参加热河作战的第6师团配属宪兵为主编成，初期下属分队有五：两个置于长城上的古北口和喜峰口，另三个分别置于承德、赤峰和锦州，1934年前后隶下锦州分队划入奉天宪兵队。以后各分队大致分工是承德分队管辖热河中西部的隆化、承德、丰宁、围场、喀中（平泉）各旗县和伪蒙疆政府的多伦，后承德分队平泉分遣队升格分队，专管

喀中旗；赤峰分队管热北的翁牛特左右旗及伪兴安西省的林西一带；古北口分队管辖靠近长城，通往京北的滦平、兴隆两县；喜峰口分队管长城线上与冀东接壤的青龙县。“七·七”事变后，古北口和喜峰口两个分队，亦随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将其管区推到长城以南，分别管到了华北的密云、迁安、遵化等地区，古北口分队曾在密云的石匣镇、喜峰口分队曾在遵化的撒河桥设置了分遣队。

总的来讲，1940年以前，承德宪兵队的活动要较伪满其它宪兵队平淡逊色。

“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为配合八路军北渡黄河向太行山区挺进，要不失时机地以燕山山脉主峰雾灵山为中心，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热察边、冀热边、冀热辽广大地区，展开敌后抗日游击活动。

据此，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从1938年开始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开赴这一地区，发动群众，组织人民，建立地方政权，在长城内外组建了数十支游击队，开辟了十几块游击区。

1940年前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又提出，要将冀热边、热察边建立起的小股敌后游击武装发展成大股游击队，将开辟的游击区建成抗日根据地。对此，1940年7月晋察冀军区在冀热边成立了军分区，派出晋察冀军区第10、12、13三个主力团，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到1941年8月，已经在热河省境内及边境地区建成了迁遵兴、丰滦密、平兴密、迁青平等联合县委和基层党组织，围绕着雾灵山区开辟了五指山（迁遵兴联合县委）、莲花瓣（丰滦密）、大小黄崖（平兴

密）、王厂沟（迁青平）4块较大的抗日根据地。到1941年秋，冀热边军分区领导的抗日游击区又越过长城发展到了伪满国境内热南的兴隆、青龙、凌源；热中的平泉、宁城，热西的滦平、丰宁等县，使冀东、平北、冀热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连成一片，造就了西起雾灵山，东到都山，北逼锦承铁路，南跨长城大约40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直指日伪统治的重镇承德和锦州。

在这种情况下，日伪统治当局十分惊慌，先是要求热河省要以“总力”用3年的时间肃清这一地区“共产党的策动”，建设“明朗的热河”。但不久又很快地发现，仅凭热河1省，已无力对付这一地区蓬勃兴起的抗日斗争局面，于是，日伪开始大规模的调兵遣将，组织了所谓的“西南肃正”。

1941年9月，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发布了“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计划”，提出要在这一地区开展大规模肃正工作，将八路军驱逐出“西部国境”。同时命令承德宪兵队长，统制区处伪满宪兵、警察，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察，并对红枪会及一些其它宗教团体加紧进行宣抚善导，使其成为配合肃正讨伐的辅助力量。

不久，承德宪兵队队长早川中佐以“中共最近进入长城线，对居民实施赤化”为由，向下属各分队发布命令，命令承德分队以兴隆和丰宁县大阁镇为中心，分别向马兰峪、茅山、六道河子、鹰手营子、半壁山、大滩、百草、千家店等长城线地区；古北口分队向汤河口等地区派遣宪兵，搜集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查明共产党外围组织在上述地区的活

动。接着，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又指挥汉奸密探李根山等5人，编成“特别思想工作班”，装扮成商人，携带鸦片，驱赶马、牛、羊等畜，以秘密贸易为掩护，潜入京北、通州、滦平等地，刺探八路军活动的情报。当时敌后抗日政权，为发动群众，筹集给养，在长城线上采取通商自由，武装保护“走私”，鼓励商贩在长城内外贩卖活动的政策。“特别思想工作班”侦察到这一情况后，及时向承德宪兵队作了报告。

同时，承德宪兵队长根据西南防卫军的命令，也向承德地区的日伪警务机关发出了区处统制命令，命令为：

“热河警务厅长负责侦察特殊思想地带的民心动向；抑制民心动摇，防止谣言及谋略活动。国境线上的特别搜查班，要密切协助派遣宪兵的活动。

第五宪兵团长，在继续执行原任务的同时，也须令国境派遣宪兵协助日军派遣宪兵长的活动。同时加强对满军士兵的工作，防止谍报和谋略活动。

锦州铁路警护本队长，须命令热河省内的铁路警护队长，除继续执行原任务外，要特别注意侦察铁路沿线居民的思想动向，防止动摇，遏止谣言和加强防谍工作。”

为了侦察研究中共的情况，西南防卫司令官命令以承德宪兵队宪兵为主，成立“对共调查班”。“对共调查班”由防卫军参谋长植山大佐任班长，承德宪兵队长任副班长，热河省警务厅特务科长、协和会1名科长、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和1名少佐4人任组长，班员由军事部1名参事，2名宪兵，2名警察，2名兴农合作社人员，2名伪满军官，1名

铁警，1名检查官组成。每年拨经费4.5万元，专门对热河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活动进行研究，搜集情报指导各机关的讨伐活动。该工作班一直活动到1945年。1944年3月曾编印了“冀热地区中共活动的方式”一书，将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经济政策、除奸对策、瓦解敌军工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当作“西南肃正”工作的指导文件发放到日伪各机关。

“西南肃正”在1942年至1944年达到了高潮，其中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3年最为残酷，当时受害最重的是承德、滦平、丰宁、青龙，兴隆5个靠近长城的县。这场大规模武装镇压的最高指挥者，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军司令官，主要参加者有日伪军、警、宪、政、协和会五部分，人数在30万以上。这场讨伐中，日伪方面搬用了对通化地区讨伐的经验，并把参与策划通化地区讨伐的主要罪魁，都调到这一地区指挥讨伐。

讨伐中伪满各地都派来了大批警宪人员“增援”，在通化大讨伐中罪恶累累的程斌、唐振东等8个通化警察大队，全部被调到热河，改编成热河警察大队，伪满宪兵总团也临时从各地抽调宪兵编成“西南特务宪兵队”。

承德宪兵队也根据讨伐的需要，改变了机构，除原设的各分队、分遣队继续保留外，1943年1月，又从作战部队抽调数百名“补助宪兵”，与宪补，宪兵补编成3个宪兵游击队，每队120余人，下设3个小队，9个分队。从全伪满挑选政治镇压经验丰富的宪兵干部出任队长、分队长。当时第一游击队长即是闻名全伪满的日本宪兵中尉长岛玉次郎，他以

古北口宪兵分队长身分指挥第一游击队在承德、滦平、兴隆等县活动，主要目标是镇压中共滦承兴县委；第二游击队以承德宪兵分队长生田为首，活动在承兴两县交界的半壁山地区，以镇压中共迁遵兴县委为主要任务；第三游击队以喜峰口分队长笠井神夫为首，重点活动在青龙县内，以中共迁青平县委为主要活动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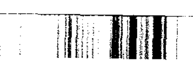
1944年3月，日军调整了热河的兵力部署，从华北调来一个师团，接替热河独立守备队，进入热河地区进行讨伐。该师团长接任西南防卫军司令官后，根据热河地区的特殊情况，把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组织活动方式移入到热河，重新改组了热河的宪兵组织。

首先他将承德宪兵队原有的承德、青龙、（喜峰口）、赤峰、平泉、古北口5个分队的兵力压缩，使其专门担当军事警察业务，同时在交通要道，"治安不良"地区的茶棚、宽城、双山、峪耳崖、琉璃庙、白城子、马兰峪、叶伯寿、上谷、凌源等地设立了宪兵派遣队，由承德宪兵队本部统一指挥，配合宪兵特别警备小队活动，这些宪兵派遣队以后都改编成宪兵分遣队。

同时，又将3个宪兵游击队编成8个特别警备小队，每队50人，下设3个分队9个组，全部改成轻装，专门对付八路军的小股部队和中共地下县委的干部。1944年改编后的宪兵特别警备小队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小队：队长　承德分队长笠井神夫中尉兼，主要活动在喀左旗和凌源地区。

第二小队：队长　古北口分队长长岛玉次郎中尉兼，主



要在喀中黄土梁子一带活动。

第三小队：队长　赤峰分队长百鸟少尉兼，主要在青龙县、宽城子地区活动。

第四小队：队长　青龙（喜峰口）宪兵分队长佐佐木宪兵少尉兼，在青龙地区活动。

第五小队：队长　青龙宪兵队附高山准尉兼，在青龙县双山子一带活动。

第六小队：队长　平泉宪兵分遣队木下宪兵准尉兼，在喀左、宁城地区活动。

第七小队：队长　投德宪兵分队附仓岗准尉兼，在承德地区活动。

第八小队：不清楚。

1943年6月，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还与西南防卫军参谋，热河省井务厅特高科长，协和会事务长等人，共同策划了对“家里教”的收买活动。历史上由于热河地区是蒙汉民族杂居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导致“家里教”、“红枪会”一类邪教团体在这一地区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承德宪兵队为利用这些邪教团体配合讨伐和镇压活动，决定对其进行收买，结果承德宪兵队将“家里教”的20余名头目都收买成特务班长，责令热河省协和会和警务厅为其提供经费，指挥他们大力发展教徒，以此搜集八路军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

“西南肃正”期间，日伪警宪配合军事讨伐，在这一地区疯狂地进行搜捕、抓人，制造了无数起血案，承德宪兵队便是其元凶罪魁。承德宪兵队直接参与指挥的重大血案有：

（一）半壁山地区的三次大逮捕

半壁山地区位于兴隆县东南部的五指山下，是八路军晋察冀第十三分军区在冀热边开辟的五指山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9年这一地区就是敌后游击区．1940年3月，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成立后，领导该地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这一地区，村村都有中共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两面政权，少数村庄还建立了抗日武装，抗日民众配合敌后政权征粮征物，转储物资，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破坏日伪的交通，传递情报，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这一地区也成了"西南肃正"中日伪讨伐的重点。在1942年、1943年、1944年三个春节，承德宪兵队在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利用中国人民在家过春节的民族风俗，连续进行了3次大逮捕，据统计有1890名群众被捕，数百人被处死。

1942年旧历腊月二十五开始的第一次大逮捕，是喜峰口宪兵分队直接指挥的，在此之前，喜峰口分队指挥伪半壁山警察署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潜入到这一地区，对抗日家属、区村干部、进步人士、接近八路军者、积极交公粮的人等进行调查，之后在大批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将这一地区的各个村庄包围，宪兵按名单抓人，然后送兴隆特别治安庭审判。这次镇压相当残酷，共有五六百人被捕，近百人被处死。余者多被课以重刑后，押到东北各地做劳工。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943年旧历腊月二十九至正月初进行，逮捕的方式和第一次相同，由于这一年是"西南肃正"最残酷的一年，因此这次在半壁山地区的逮捕也最为残酷，有900多人被捕。锦州特别治安庭派出人员在当地设置"临时治安庭"，随抓随

开庭审判，不出数日，即有百余人被一审判处死刑，由宪兵和警察就地进行集体屠杀。第三次大逮捕是在1944年旧历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进行，在这次大逮捕中，敌人采用了和前两次完全不同的作法，见到中国人就抓，尤其是在靠近长城的靳杖子、冷嘴头、赵杖子等村最为残酷，其中仅靳杖子一村就有100多人被捕。这次大逮捕，半壁山地区数十个村庄无一幸免，共有一千三四百人被捕。

据当地调查证实，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屠杀暴行令人发指，被杀绝斩尽的不下几十户，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儿童，以至哑吧、残疾人都无一幸免。由于屠杀，在兰旗营村造成了"万人坑"，在大莫峪村造成了"寡妇庄"1944年以后，这一地区成了无人区。

（二）九虎岭惨案

九虎岭村位于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抗日根据地内。1941年以后中共冀东党分委领导下的迁青平联合县委经常在这地区活动。在九虎岭村中有一个仅有30来户的小庄叫九虎岭庄，1942年7月和1943年1月，曾两次受到日寇的血洗，数次遭到劫难。其中1943年1月的一次最为悲惨。

这年1月，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子派遣队的密探侦知，八路军迁青平县委正在九虎岭村开会，承德宪兵队长收到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的报告后，鉴于这一带抗日武装的强大，遂立即从承德、古北口两地调集了100余名宪兵，加之喜峰口分队的60余名宪兵，联合组成搜索队，在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的带领下，连夜便装将九虎岭庄包围。由于县委干部撤走，宪兵遂对民众采取了残忍的报复手段，抓捕了19人，将

14人当场杀害。其残害的手段令人发指：有的被打碎下颌致死；有的被按在地上挖去双眼；有的被挖去心；有的被塞进冰窟窿；有的用三角尖木棍穿透胸膛钉在地上钉死；宪兵在过堂审讯时，使用的手段更加残酷；有的被烧红的烙铁烙掉了鼻子，有的被烙得露出了天灵盖骨；不仅对成年人如此，对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村民刘文振8个月的小孩，被日本宪兵从其母亲的怀里夺去，活活摔死。由于日寇的残暴杀戮，这个仅30来户的小村庄就绝户了7家。

（三）“二·一”惨案

“二·一”惨案是1943年春节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今河北省承德县鹰手营子、南双庙、三道河子、大杖子、东涝洼、韦子岭等14个村庄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承德宪兵队宪兵，驻下板城日军讨伐队和伪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分三股以清乡为名，同时将上述14个村庄包围，上千人被捕，数百人被判刑，254人被残杀致死。在这次惨案中，由于亲人被害造成孤寡愁病，无法生活而死去者又达600多人，遭劫后的14个村庄，有近60户人家死绝；致伤、致残者更是无法统计。这一带是家家有血根，户户有怨魂。

“二·一”惨案发生地，位于承德南部的五指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内，这里从1938年起就是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游击区，14个村庄的人民为抵御外侮，很早就参加了抗日活动。1940年以后，这里属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第十三区管辖，是雾灵山抗日根据地与冀东抗日根据地秘密联络的一条交通要道。

1943年初，十三区抗日干部在胖和尚村开会时被日寇讨

伐队包围，突围中区文书高云峰同志不幸牺牲，身上携带的各村干部名单被敌人得到，“二·一”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承德宪兵队是这次惨案的罪魁祸首，在逮捕前，特高课长木村光明将各地活动的近600名宪兵、宪补、宪兵补和补助宪兵集中到了这里，在1月31日晚和2月1日晨分别将14个村中的7个重点村庄包围。上至60多岁以上的老人，下至15岁的少年，只要是男人都三五个用绳子捆在一起，按掌握的村干部名单抓人，然后追查谁给八路军送过公粮，做过鞋，传过信，站过岗。经过四五天的血腥拷问后，2月6日（大年初二）将一部分认为是重点的人物押送到承德监狱，一部分押到新杖子村东头杀害，杀害时还拉去了很多人陪榜。其余的青壮年都押送到东北各地当劳工。承德宪兵队搜捕的7个村庄中，以鹰手营子、东涝洼、南双庙3个村最惨，其中东涝洼村在2月1日被抓到新杖子的129人中，有2人被当场杀死，74人被押到承德处死和判刑，被判刑者光复后仅有17人有幸生还。全村120户人家，死绝了20户。南双庙村被押到新杖子的110人中，85人被送到承德审判，其中6人被判死刑，1人被刑讯打死，余者被判刑后送到本溪、丹东、阜新当劳工，光复后仅有8人逃回，其他人全部葬身它乡。全村80户人家，死绝了14户，400多口人剩下不到一半。鹰手营子、南双庙、东涝洼村成了当地闻名的“寡妇村”。

“西南肃正”期间，承德宪兵队除直接参与制造了上述几起大惨案外，在最残酷的1943年还区处指挥了全热河的日伪警察，两次对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团体进行了大逮捕，敌

人将这两次活动称之为“剔抉”工作，据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向伪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第一次大逮捕是在9月11日到9月27日进行，主要对象是承德东南部和兴隆县东部的迁遵兴联合县委；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联合县委；青龙东南部的青绥凌联合县委和平泉西南部的承平宁联合县委。由承德、古北口、喜峰口分队和平泉分遣队分别指挥上述4个地区的伪满警察、伪满宪兵，铁警在日伪军的配合下进行。第一次“剔抉”总共逮捕了958人，其中456人被送伪法院判刑。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0月6日到10月19日进行，这次除继续在第一次逮捕的地区重新逮捕外，喜峰口分队还将逮捕范围扩展到了长城以南的迁安县滦阳、铁门关和碾子岭等地区。第二次“剔抉”总共逮捕了292人，其中68人被送到伪高等法院判刑。

“西南肃正”中，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军、警、宪、特、行政、司法、协和会等机构联合镇压的办法。伪锦州省高等检察厅和高等法院配合讨伐，在热河很多地方设立了“临时特别治安庭”，对逮捕的抗日军民随时起诉，随时开庭，一审判决。当时伪锦州高等法院在讨伐最残酷的青龙、宽城、喜峰口、平泉、半壁山、鹰手营子等地，都开设过“临时特别治安庭”，审判后将判处死刑的人，随时交给当地日本宪兵就地屠杀。

“西南肃正”中，日本法西斯为彻底割断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血肉联系，疯狂地推行了“集团部落”政策，热河的广大地区被划成无人区，严禁老百姓进入。1943年以后，承德宪兵队还编成了宪兵游击队，在长城两侧的无人区进行游动

搜捕，发现有人脱离“集团部落”进入无人区活动，就当即杀死。下面是日本和歌县人岛津酉二郎1954年8月16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段供述，他1942年来到中国，1943年时是承德宪兵队所属长岛玉次郎部下的第一宪兵游击队宪兵伍长，他说：

“1943年11月15日，我们长岛游击队第一小队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西北方活动，逮捕了1名怀疑是八路军联络员的行商，我对其进行了审问，该商闭口不答，小野曹长当即命令我等7人对其刑讯拷打，我将这名行商打倒后，用他自带的扁担压在他脖子上，用脚踩着两头，一直把这个人压死。

1944年2月20日，我们在密云县东南地区活动，夜12点左右，见有一农民在耕田，长岛队长认为此人在夜间耕田稀奇，可能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故命令将其逮捕杀死，当我持刀去砍杀时，该人已被别人砍倒，正在痛苦挣扎，我又连砍了几刀，将该人杀死。

1945年6月，我们在遵化县马兰峪南搜索时，发现了一对新婚夫妇，我指挥部下将他们逮捕先打成半死状态，然后将男的拉到田中用军刀杀死，女的交给新兵练刺杀，但女的用手抓住刺刀不放，新兵不能刺中，于是我上前将这个女人摔倒，用军刀砍了她的脖子，将她斩杀。”

通过这个宪兵伍长血淋淋的供述，就可想而知宪兵在热河地区的残忍凶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按计划承德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要被改编成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第6大队，准备配合关

东军第4方面军阻击从外蒙和中苏西部国境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当关东军主力撤至通化、朝鲜一线后，在苏军占领地开展游击战。但由于苏军迅速进入东北，承德宪兵队还未来得及改编完，就随日本投降而被解除了武装。

五　“镇守关东州”的大连宪兵队

大连宪兵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伪满洲国以外地区唯一的一支独立宪兵队。它所管辖的区域，包括大连市及辽东半岛瓦房店以南地区。

大连也是关东宪兵队最早染指的地方，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沙俄手中夺得了“南满铁路”和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后，以“护路”和“保护”租界为名，置关东军驻防，于是大连、旅顺两地便最早有了关东宪兵。“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旅顺设有宪兵分队，直辖驻在旅顺的关东宪兵队指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从旅顺先迁奉天，后移“新京”，各宪兵队根据军事行动的需要，几经改编，但驻大连、旅顺的两个宪兵分队到1936年以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1936年4月以后，旅顺分队降格，变成大连分队旅顺分遣队。不久，随着关东军对东北抗日运动开展的大规模屠杀和镇压，大连分队也越出管区经常派遣宪兵随讨伐队在“三角地区”活动，为方便起见，大连分队被划归到奉天宪兵队隶下，以独立宪兵分队的形式活动。1939年4月，鉴于“关东州”的反日活动不断增强，大连独立宪兵分队脱离与奉天宪兵队的隶属关系，编成“大连临时宪兵队”。同年8月，大连宪兵队正式成立，下设大连、旅顺两个分队，同时在本

部设立了特高课。

大连宪兵队的存在根据，不同于驻扎在伪满境内的日本宪兵队，后者的存在根据是依“日满协议书”中“共同防卫”的“理论”，因此，对一切反满抗日事件，宪兵不但可以用“扰乱（关东）军的安宁”为借口进行处置，也可用“危害共同防卫”为理由进行镇压。而大连宪兵队活动的区域，由于已被视为“日本领土”，日本帝国主义又在这块土地上经营了多年，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也都相当完备，因此在1939年以前，大连宪兵队的活动根据都是以保护关东军行动的面目出现，它所担当的“思想对策”、“防谍”、军事警察的三大任务，也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制定的。当时大连宪兵队的具体任务是：

“1．对通过大连的军用物资进行保护，防止谋略破坏。

2．警防大连及附近的重要设施（码头、军工厂）、资源（兵器军需库）。

3．对旅顺、大连、金川等地军人军属执行军事警察业务。”

前两项，在1939年以前，对伪满境内的宪兵队来说，则包含着“思想对策”工作的内容。

1939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地区设置独立宪兵队也自有它的道理。这因为大连是东北最大的港口，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掠夺来的大量资源要由大连港装船运往日本，关东军及部分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也要从这里上岸，围绕大连港，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地区设置了大量的仓库、物资转

运站和上岸军用品储备基地，使用了大量的工人，因此，对码头和这些设施的警戒，对中国工人的监视也成了极为重要的任务。相反，对这些设施的破坏，也成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特殊反抗方式，从1937年起，在大连地区围绕着大连港和日本军用物资开展了放火焚烧活动，据日伪方面统计，1937年到1940年的3年中，抗日放火团就在大连地区放了50余次大火，重点是烧码头仓库和军需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火不仅烧码头也烧市内的油坊和重要的军需工厂。周水子的日本陆军仓库也数次燃烧起熊熊大火，1942年秋的一场莫名奇妙的大火把整整一仓库棉军帽烧得一干二净，使数十万关东军当年的防寒军帽告急。大火把敌人烧得焦头烂额，每次大火过后，大连的日本宪兵和关东州警察都要在现场逮捕大量中国工人进行刑讯，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也曾派去"86部队"协助侦破，但直到1942年前，抗日放火组织一直未能破获。因此，加强以大连码头为中心的防范，监视码头工人的活动，警防火灾，则是设置大连独立宪兵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随着所谓的满洲国经济建设和太平洋战争后军需品生产的激增，大连成了经济、工业的重要地区，因此，对一切反日活动加强警防、侦破、镇压，也急需加强在大连的宪兵组织，这是大连宪兵队扩充的第二个原因。

其三，大连是华北、华中等地进入东北的一条海上通道，搜查从海路进入伪满的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及外国间谍，监视伪满从华北和山东等地抓募的大量劳工，审查停靠大连港的各地船只，也急需加强宪兵的兵力，这是1939年以

后增设大连宪兵队的另一个原因。

大连宪兵队活动的主体部分，是本部特高课和大连宪兵分队，这两部分人员占全队总人数的70%以上。从1939年8月大连宪兵队独立以后，随着战局的变化，队内的组织机构也几经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要属特高课外勤部分。1939年大连宪兵队成立初，特高课外勤部分只有外事、防谍、思想对策、邮件检阅4个班，1942年6月，除上述4个班外，又增设了"化学"和"别班"两个班。1944年4月，特高课改为战务课后，"别班"撤销，将思想对策班扩充成为两个，同时增设了"埠头"和"戎克对策"两个班，使大连宪兵队战务课的外勤班变成了7个。当时两个思想对策班一个设在旅顺，配合旅顺宪兵分队负责侦查中国人的思想动向，另一个设在大连，负责掌握日本人、朝鲜人的思想动向。"外事班"以外国人和苏联领事馆为中心展开活动，全班5名宪兵，除对苏联领事馆人员进行监视侦察外，还在特高课长的指挥下，对苏联领事馆展开特务活动，一度曾收买了在领事馆工作的中国厨师和中国籍女教师，为其在领事馆内搜集情况。"防谍班"主要是在大连市内和工厂、港湾、军事设施内活动，侦察所谓的谍报和谋略活动。"邮检班"的活动与伪满其它宪兵队的活动大体相同。主要搜查中共和重庆的所谓"有害通信"。1942年设立的"别班"，是对寺儿沟和小岗子中国人聚集区，进行重点监视和侦察而特设的一个特殊工作班，主要活动是在中国人中搜查谍报、谋略组织，执行思想对策班和防谍班类似的业务。"戎克班"是关东宪兵队内唯一的一个执行海上特殊任务的宪兵机构，日语中的"戎克"是指帆船，大连宪兵队

战务课设这个班的主要任务，是指挥大连分队在大连沿海搜捕乘帆船进入大连的抗日地下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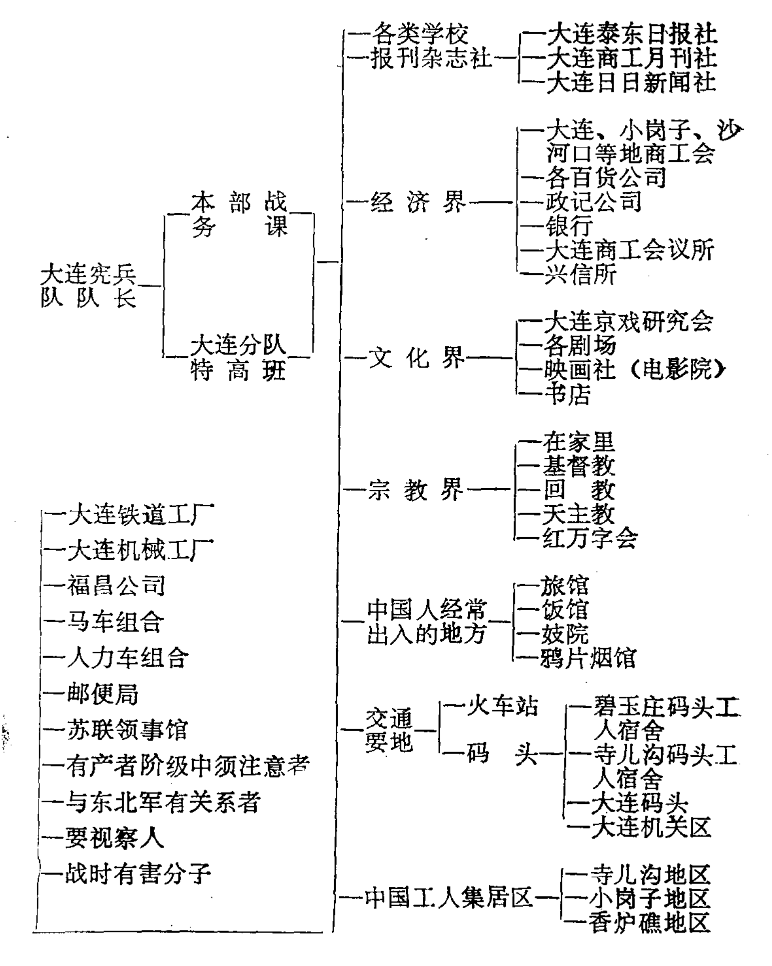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的演变和军需品需求的激增，大连宪兵队的活动也更加活跃。

首先，1942年7月，大连宪兵队在市内的一些重要公司、工厂建立了联合的防谍机构“星交会”。这个组织，形式上为民间防谍团体，实际上是禀承关东军司令部的意图组建，大连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在策划过程中，先找到了与关东军关系密切的福昌公司经理相生常三郎和关东州经济会会长首滕定等人发起组建，大连宪兵队直接予以协助，成立该会的目的，不仅要协助大连宪兵队在一些重要公司、会社内加强防谍、防谋略活动，保障战时军需品的生产，而且还有督促各工厂、会社落实、贯彻关东军的各项措施的义务。该会的会址，设在大连市山县通福昌公司内部。参加“星交会”作为会员者，必须是与关东军有关系的公司，会社、工厂或军用品商人中积极拥护和狂热支持侵华战争的日本人，会员入会前要受到大连宪兵队的调查，并须交纳会费，配戴会章。

该会拟定的活动宗旨是：在关东军的指导下，积极进行自体防谍。其实重点是为宪兵搜集情报，进行特务活动。会员都在本单位安插密探监视、探听工人的活动，侦察工人中是否有谍报、谋略的嫌疑者和地下抗日工作者。大连宪兵队还通过“星交会”采集了大连市所有军需工厂工人的指纹，对协助日本宪兵镇压中国工人的反日活动，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第二，大连宪兵队本部战务课和大连宪兵分队特高班还在管区内设置了庞大的特务网，对各行各业进行严密监视。

当时设在各行各业的特务网分布如下：



以上这种特务网，大连宪兵队除运用其侦察、搜捕地下抗日工作者、防谍、防谋略外，更主要的是用其搜集情报，当时安插在各地的密探、特务都有明确的情报搜集题目，例

如：当时要求在文化教育界活动的特务搜集情报的题目有：

各学校（公学堂）中国籍教师的思想动态；

中国人京剧研究会研究的内容，会员的思想动向；

中国新闻记者的思想动态，及新闻记事内容；

“商工月刊”杂志记者的动向及记事内容；

上映的电影、戏剧的内容与中国人的思想情绪之间的关系；

大连“新华书店”经营的动向；

大连各宗教团体的宣传宗旨，传教士、信徒的动向；

在经济界活动的密探、特务搜集情报的题目有：

中国商人的经营动向，经营状态、转业、废业的情况；

中国人对日本诸施策的反映及动向；

中国资产阶级的财产状况及对日本的态度；

大连市内中国人油房的经营状况；

中国人的储蓄情况及趋向；

与关东军有关的会社、工厂中，中国工人的状况。

无孔不入的特务密探网和特务活动，给大连人民的生活笼罩上了极度恐怖的阴影，人们的思想感情稍有某种流露，就可能被特务当做情报报到宪兵队，闲谈碎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惹来被跟踪监视的麻烦。例如1943年前后，大连的中文刊物《商工月刊》上登载了一首描绘大连美丽夜景的抒情诗，引起了大连宪兵队特务们的怀疑，认为诗中有意暴露大连的机密，有通苏嫌疑，故对投稿者进行了追查，结果发现作者是伪满佳木斯人，更加重了对其怀疑，为此大连宪兵队曾

通过佳木斯宪兵队对该作者的历史进行了调查，一直到日本投降，该人因一首小诗，一直在被监视中生活。还有，大连市浪花町“新华书店”的老板高某，是日本留学生，在与其朋友的闲谈中讲了“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一席话，不知怎么被密探听到，报到了宪兵队，宪兵认为“该人思想偏激，有影响他人或发展成反满抗日思想的危险”。故对他进行了长期的秘密审查和监视，直到日本投降，他始终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状态下生活。

第三，对一部分所谓的重要人物，制成“要视察人名簿”和“战时有害分子名簿”为非常时期进行屠杀和镇压做准备。太平洋战争后期，大连宪兵队战务课把居住在大连地区的原东北军军官、官吏，以及从关内各地来到大连定居的军阀政客和与他们有联系的人数百名，编成“要视察人名簿”对这些人的行踪、旅行、活动进行严密监视，随时登记入簿。

为镇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抗日运动，掌握民心动向，“取缔流言蜚语”，作好对“突发事件”处理的准备工作，大连宪兵队战务课还派出宪兵，对大连市区以外的金州、普兰店，貔子窝（今皮口）等地进行了基础调查，调查了“地方有力者”、“站在指导地位上的人物”的基本情况及妨碍日满一体的“要人”的思想动向情况、民众对时局的言论、看法等情况。

为了随时掌握上述情况，宪兵还在各地民政署的日本人中和中国“要人”周围安插、收买了大批密探、特务、收集情报。

大连宪兵队除本部战务课积极开展特务活动外，大连宪兵分队的特务活动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大连宪兵分队的活动区域重点是以大连市区和码头为中心，太平洋战争以后，分队下设埠头分遣队和周水子派遣队，其中埠头分遣队有12名宪兵，重点负责警护码头的设施，检问检索上下船的旅客。周水子因设有炸药工厂，故宪兵派遣队5名宪兵，主要是围绕着防谍防谋略而展开活动。日本投降前的1944年和1945年，大连分队根据管辖区内的特殊情况，制定了“应付内外事态紧急变化情况下的一系列对策”即“苦力对策”、“船舶对策”、“补给厂对策”、“戎克对策”等等。

“苦力对策”即是以码头、补给厂、福昌公司、满铁各工厂等重点场所工作的中国工人为对象，首先对他们聚集的碧山庄、东山庄、千代田町宿舍等地进行基础调查，对各部门工人的住宿及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并围绕这些工人，分别制作“苦力名簿”，时刻监视工人们的活动。其次，在这些地点设立情报网。“苦力对策”中，计划“要在各宿舍里发展两名苦力头阶层的人做联络员（密探）”。到日本战败前为止，大连宪兵分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计划，碧山庄、东山庄，千代田町各工人聚集区及各宿舍的“苦力头”和“二头”大部分都被大连宪兵分队发展做了密探，而且还对这些密探进行了业务训练。大连分队除建立密探网之外，还直接向这些地方派去汉奸宪补，伪装成工人，打入工人中间直接搜集情报。

另外，大连分队在福昌公司，满铁各工厂，码头工人工

作现场附近的酒馆、妓院等地，也都收买和布置了大量的密探，时刻监视工人们的业余行动及思想动向。

“船舶对策”即是以停靠驶出大连码头的船只，上下船的旅客为对象进行的特务活动。目的是搜查从华北等地乘船进入大连后去“满洲国”的人，以及查明进出的中国人中是否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地下人员。大连宪兵分队首先围绕船舶开展基础调查，对经常往返于天津、烟台、威海、青岛、上海等航路上的船员，进行秘密审查，并要求这些船舶定期向宪兵分队提交航运预定表、载货单，如是客船必须随时提供旅客名单，以备检查。

同时宪兵还在船员和海关工作人员中建立情报网。监视出入大连码头的旅客、劳工，搜集他们的各种言论。当时大连分队在驶往各航路的船员中，都安插2名密探，1名是中国人，1名是日本人，也有的航路上安插白俄作密探。为了监视从华北等地进入大连或转道去伪满的劳工，宪兵在劳务协会埠头派出所工作人员中，也收买了密探，使其通过检查乘四等舱旅客的“劳动票”，发现劳工中的可疑分子。

为了监视外地停靠大连港的船只，大连分队也在海关税务署中收买安插了密探，使其在税收中监视入航者的情况。

1943年前后，大连分队还操纵1名叫邱洪臣的中共叛徒，使其在码头和旅客当中活动，利用他了解共产党、八路军内部情况这一特点，专门在旅客中侦察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嫌疑人员。

为配合对货轮和客轮进行的“船舶对策”，大连宪兵分

队还在本部战务课“戎克班”的具体指挥下，在老虎滩、傅家甸、香炉礁、小平岛等一些帆船经常停靠岸的地点，开展了所谓的“戎克对策”。目的是通过侦察大连附近的帆船，抓捕“非法航运者”，以此发现共产党、国民党地下组织利用帆船进行的活动。当时大连宪兵分队曾在上述地点进行了秘密调查，还在“戎克组合”中收买了数名坐探，将他们布置在“非法航运者”经常登陆的地方，一经发现无籍帆船活动，立刻报告宪兵前去搜查。

所谓“补给厂对策”即是以大连市内重要军需工厂为对象制定的特务活动方案。活动重点是在周水子和大连码头等地。在这一对策中，大连分队首先是对各军需补给厂进行基础调查，调查各厂的防谍制度、机构及工人和出入的商人等情况。对工人的监视和调查，主要是依靠“苦力对策”来实现。当时设在大连的军需补给厂，有相当一部分办公室或工厂设在市内，而仓库大部分都设在码头附近，这样保护补给厂的工作又分成码头，和厂区两部分，对此大连分队的特务活动也分成两部分，在码头宪兵不仅每天在上下工时对在军用码头干活的中国工人亲自盘查，而且还在工人中收买密探，监视工人在干活时的情况。在厂区，宪兵除收买厂内的职员外，还在工人宿舍周围的居民中收买密探，监视工人们闲暇时间的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大连宪兵队在队长森安精一中佐的指挥下，制定了“焦土作战”计划，把大连这块殖民地视为日本国土，叫嚣要死守。同时，又制定了对重点地区的爆炸计划，准备在关键时刻进行全市大爆炸。后因日本

天皇宣布投降，“焦土作战”计划和大爆炸计划都未能实现。

1945年8月23日，日本宣布投降一周后，苏军少将加曼诺夫乘坐的授降飞机在周水子机场降落，关东州防卫司令官兼旅顺要塞司令柳田元三中将、关东州长官、大连宪兵队长及关东州警察部长等人被召到机场，加曼诺夫宣布收降命令，命令驻大连的日军及警察从24日起在指定地点集结解除武装，同时命令大连宪兵队编成数个临时小队，在日军、警察被解除武装后，临时负责维持大连治安。24日，日军被解除武装后，大连市内开始发生暴动，大连市土佐町东亚烟草会社250名中国工人起义，向日寇、警察、宪兵复仇，森安精一立即指挥第二临时小队和宪兵教习队300名教习兵，对暴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8月25日早，苏军发现大连宪兵队在投降前，曾策划将谢苗诺夫和1938年叛逃到伪满的苏军大将留希科夫隐匿的事实后，将大连宪兵队长森安精一逮捕，同时解除了宪兵的武装。将准尉以下的宪兵押往金州，准尉以上的军官作为战犯嫌疑者陆续被押往到了苏联。

六　配合关东军东线进攻的牡丹江、东宁、东安、鸡宁、间岛宪兵队

关东军对苏作战的构想

近代史上沙俄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扩张活动中于中国东北相遇。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国在东北得手后，时刻防范着俄国从北部卷土重来，因此一直把俄国作为假想敌，进行研究，制定未来的作战对策。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全东北后，日本的势力范围推到了北满的中苏边境，开始与苏联直接对峙。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从国防和战略方面考虑，逐渐在远东地区加强了对日备战，从1934年开始，不断在中苏边境特别是在远东沿海州地区扩充实力，苏联除新增设十数个步兵、骑兵、坦克师和数百架作战飞机加强对沿海州防御外，还新设了远东舰队，修复和起用了海参崴军港。

1935年前后，苏联远东空军又装备了$ТБ_5$型四引擎大型远程轰炸机，日本参谋本部推测，这种轰炸机的续航能力可以轰炸日本东京后返航。苏联海军也在海参崴布设了水下潜艇和高速鱼雷艇。苏联陆军也开始在漫长的中苏国境上，建筑准备作战用的碉堡群式的永久阵地和野战阵地。

苏联陆、海、空三军在远东地区的反应，反过来又进一

步刺激了日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根据苏联的反应，推测苏联将来对日作战的方针是："以中苏西部国境为主战场，利用那里地靠欧洲部分近的有利条件，与日本决战。而在远东（中苏东部国境），由于远离苏联的中心，当地尚未开发，大量的作战物资和军队都需外调，难以构成独立的作战态势，且战时利用西伯利亚铁路运输，也将是相当困难的事"。由此，参谋本部作战课判断，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反应，也仅仅是把远东作为未来对日作战的辅助战场，在沿海州布设大型远程轰炸机和在海参崴布设水下潜艇等，目的是开战后用以轰炸日本本土，拦截日本经日本海向朝鲜的海上运输，配合在中苏西部国境作战。

根据这一认识，日本陆军逐步确定了对苏作战的基本方针，即在中苏东部国境采取攻势，将第一打击目标确定为苏联远东的沿海州地区，首先消灭这一地区的空军基地，占领海参崴军港，而在西部和北部国境，则采取守势。

根据日本陆军制定的对苏作战方案，关东军从1936年开始，在中苏东部国境采取了一系列对苏作战措施。

首先，将东部国境分成4段，开始修筑国防阵地和野战阵地，并逐渐向各阵地配备了国境守备队和野战师团，准备对苏作战。日伪期间，关东军设在东部国境线上的阵地情况如下：

	阵　　　　地	兵　　　力
珲春—土门子(春化)段（伪间岛省东面）	以五家子第九国境阵地为中心，并在马鞍山、石磊子山、马滴达、望潮山等地配设了大量的野战阵地群	由第九国境守备队步兵4个中队，炮兵2个中队，工兵1个中队约1500人守备

续表：

	阵地	兵力
东宁—绥芬河段（伪牡丹江省东面）	以东宁第一，绥芬河第二、鹿鸣台第十、观月台第十一国境阵地为中心，并在郭亮船口、兴隆屯、狼洞沟、高安村等地，修了近百个核心阵地和野战阵地	由第一、第二、第十、第十一4个国境守备队27个步兵中队、13个炮兵中队、6个半工兵中队守备，兵力在1万人以上
半截河—庙岭段（伪牡丹江省东南面）	以半截河第三、庙岭第十二国境阵地为中心，并在三棱通、二人班、青狐岭庙、南天门、小鹿台等地修了大量的野战阵地和核心阵地	由第三、第十二国境守备队10个步兵中队、5个炮兵中队、2个工兵中队约3500人守备
虎头段（伪东安省东面）	以虎头第四国境阵地为中心，并在其周围修了十数个核心阵地和野战阵地	由第四国境守备队12个步兵中队、4个炮兵中队、3个工兵中队约7500人守备

其次，关东军为接通日本本土经日本海到中苏东部国境的运输，从1936年开始在朝鲜新辟罗津港，修了图们至牡丹江的铁路，使海上运输和东北铁路网联成一片，摆脱了军需物资单一从大连港上岸的局面。

第三，从1938年“诺门坎事件”开始至1941年“关特演”期间，关东军在东部国境进一步强化了攻击苏联的作战准备，在珲春至春化之间，新设了第2军；在东宁至绥芬河之间设了第3军；在绥芬河至观月台之间设了20军；在虎林一带设了第5军，并从日本、朝鲜，奉天等地调入了数个师

团。"关特演"期间，关东军在中苏东部国境部署的作战师团达12个之多，占关东军作战师团的3/5以上。同时在牡丹江及附近铁路沿线的一些小镇，关东军还部署了战车部队、航空部队及大量的军需补给基地。关东军的作战部署是，开战后以东宁，绥芬河一线的第3军为主决战军，以20军、第5军和独立19师团为辅助决战军，从东宁，绥芬河、虎头、东兴镇等几个方向同时出兵，直取苏联沿海州，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占领海参崴，最后与苏联远东军决战，然后回师西下，与苏军决战。这样，由于关东军重点准备在东部国境作战的设想，使这一地区的一些小镇，成了伪满闻名的军事区，国境线上一些图不见名的小村庄，也都驻满了军队。

间岛、牡丹江、东宁、鸡宁、东安宪兵队，正是根据关东军在东部国境的战略构想，相继建立和开展活动的。

牡丹江宪兵队

牡丹江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满后于1935年前后建立的一支宪兵机构。当时伪满行政区刚从4省改为14省，牡丹江宪兵队最初管辖着滨江和三江两省的东部地区。1936年4月后，关东军指挥日伪军警进行所谓的三年治安肃正期间，牡丹江宪兵队配合讨伐，统辖这一地区的日伪警宪，以牡丹江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的名义，开展了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及抗联的逮捕镇压。当时牡丹江宪兵队下属分队，分遣队指挥的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有牡丹江、宁安、东京城、林口、横道河子、海林、新安镇、穆稜、下城子、梨树

镇、绥芬河、东宁、密山、半截河、虎林、勃利、佳木斯、依兰、富锦、饶河、同江、平阳镇22个，后来的佳木斯、东安、东宁、鸡宁宪兵队管区，当时均归牡丹江宪兵队管辖。

1939年前后，伪满增设牡丹江、东安、通化、北安4省，改行政14省为18省，关东宪兵队也在东部国境增设了东宁，东安两个宪兵队，在北部增设了佳木斯宪兵队。这样伪满三江、东安两省和牡丹江省东部从牡丹江宪兵队划出，牡丹江宪兵队管区缩小到了伪牡丹江省西半部。这时牡丹江宪兵队下设的机构仅剩：

牡丹江分队——┬—掖河分遣队
　　　　　　　└—横道河子分驻所

宁 安 分 队——┬—东京城分遣队
　　　　　　　├—温春分驻所
　　　　　　　└—兰岗分驻所

穆棱分队——下城子分遣队

八面通分队——梨树镇分驻所

1941年“关特演”期间，关东军调集7个师团编成20军，布设在东部国境的绥芬河至观月台之间，对此，关东宪兵队又从牡丹江、东安各宪兵队抽出部分分队、分遣队编成鸡宁宪兵队，牡丹江宪兵队的八面通分队及下城子分遣队、梨树镇分驻所，又被编入了鸡宁宪兵队。这时牡丹江宪兵队的机构又进一步缩小，仅剩牡丹江、宁安、穆棱、掖河4个分队、海林、东京城2个分遣队和横道河子、石头2个分驻所。其中掖河分队是从分遣队升格的。

1943年下半年以后，关东军被大量地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后，20军亦被调往华中作战。随着20军调走，鸡宁宪兵队被

撤销，东宁宪兵队并入牡丹江宪兵队。这时牡丹江宪兵队的机构又重新开始膨胀，管区扩展到了牡丹江省全境。1944年8月以后，牡丹江宪兵队的编制如下：

牡丹江分队——林海分遣队

掖河分队

宁安分队——┬—东京城派遣队
　　　　　　└—石头派遣队

东宁分队——城子沟派遣队

大肚子川分队——石门子派遣队

老黑山分队

绥阳分队——绥芬河派遣队

八面通分队——┬—下城子分遣队
　　　　　　　└—梨树镇分驻所

日伪期间，牡丹江宪兵队最活跃时期是在1938年“诺门坎事件”以后至关东军实力鼎盛期的1943年上半年，这期间牡丹江宪兵队的管区虽逐渐缩小，但活动确异常频繁。当时该队工作的目标主要有四：

一是，警护当地驻军。当时关东军准备对苏作战的第二线部队，大都集中在牡丹江市周围，对苏作战的主决战军第3军司令部，就设在牡丹江市，此外，关东军第9师团、第2师团、飞行团（2个联队）司令部及大量的工兵、炮兵部队、兵器补给厂、粮秣补给厂、被服补给厂、野战医院等作战辅助机关，也都驻防在牡丹江市附近。对这些机关、部队执行军事警察业务和防谍，则是牡丹江宪兵队的首要任务。

二是，管内有佳（木斯）图（们）线；哈（尔滨）绥

（芬河）线；绥（阳）东（宁）线；下（城子）梨（树镇）线4条重要铁路经过，这4条铁路在对苏作战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围绕着这4条铁路进行防谍工作，则是牡丹江宪兵队的又一重要任务。

三是，管内宁安至镜泊湖到敦化一线，被认为是抗联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秘密联络的交通要道，陈翰章领导的第二军第五师一直在这一地区活动，因此侦察镇压抗联的活动，则是牡丹江宪兵队的第三大任务。

四是，管内的穆稜、横道河子、梨树镇是当时东北仅次于哈尔滨、海拉尔的第三白俄聚居区，另当时横道河子和梨树镇煤矿及森林警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白俄，因此，配合特务机关对这些人进行控制，并以这些人为中心开展防谍工作，则是牡丹江宪兵队的第四项任务。

这期间牡丹江宪兵队所属的4个分队中，以牡丹江分队的活动最频繁，其编制也最大，全分队50余名宪兵在分队长堀口正雄的指挥下，编成特高和警务两个总班，每个总班下设若干个专业工作班，重点以牡丹江市区为中心开展活动。特高总班以木村勇准尉为总班长，下设秘标、防谍、思想对策、机搜、邮检5个工作班。

“秘标工作班”主要是根据关东宪兵队的“秘标对策内规”，在通过管区内的火车上，检查旅客的旅行证明，以此从中发现苏联间谍。当时牡丹江宪兵分队是在全伪满各地“秘标对策”搞的最凶的一个宪兵分队，仅在牡丹江通往绥芬河一段铁路上，就设了4个“查证班”，各“查证班”均由1名宪兵和3名铁路警察联合编成，以宪兵为头，在火车

上设“特别室”，将旅客证件收上去利用特殊仪器进行检查。当时乘这段火车的人很多是去国境修工事的华北和东北各地的劳工，这些劳工中经常有人因“旅行证明”不符合秘标规定而被扣押，宪兵也明白，这多是发证机关的责任，但在未弄清情况前，一律视其为间谍嫌疑者进行审讯，等与发证机关联系对证后再释放。这样牡丹江宪兵分队里，经常关押着大量的这类间谍嫌疑者。

“诺门坎事件”期间，关东军在东部国境的一部分兵力被调到诺门坎方向，牡丹江宪兵队为保护军事运输，除加紧在火车上检查外，还从各分队抽调了大批宪兵，对管内铁路加强了保护，牡丹江分队还曾编成数个“检问班”，在下城子、横道河子各站设了“检问所”，随时对旅客进行搜身和检查。每当军用列车到站时，宪兵就将候车旅客赶出车站，对车站实行戒严。

“防谍工作班”是以牡丹江市区为中心，侦察苏联的间谍网。

“思想对策班”是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及反满抗日团体为对象开展活动，该班曾使用了多名汉奸、密探，侦察牡丹江市的民心动向。1938年底该班曾配合伪牡丹江省地方保安局和铁路警察，破坏了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的中东铁路职工部。

“机搜工作班”是关东宪兵队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工作班。1939年以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鉴于苏联在伪满的谍报活动日趋频繁，决定对无线电发报机的入境加紧搜查，并命令牡丹江宪兵队从东部国境加紧搜查。牡丹江宪兵分队“机搜

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编成的。该班主要是对过往牡丹江车站的行李、货物进行检查，从中发现发报机。当时由于过往牡丹江车站的货物较多，“机搜班”无力逐一开包检查，故使用了1米多长的铁钎子先逐一刺探货物，在发现里面有铁质东西时，再打开进行检查。

警务总班以高山贞吉准尉为总班长，下设军事警察、警务、车站取缔、司法4个班，重点担当军事警察业务。“车站取缔班”在牡丹江车站执行军事警察业务时，也对一般旅客进行检问和搜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牡丹江宪兵队绝大部分宪兵被编入关东军第2特别警备队第1和第3大队，配属到第1方面军中，准备从间岛、牡丹江、东安、佳木斯几个方向抵抗苏联的进攻。但由于苏军迅速从东部国境观月台等地突破日军的防线，直抵牡丹江，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第2特别警备队各大队在8月17日随第3军和第5军被解除了武装。牡丹江宪兵队历任队长有儿岛正范、都筑敦、平木武等人，最后一任队长是日本宪兵中佐望月政吉。

东宁宪兵队

东宁宪兵队是1939年7月，在关东宪兵队改编时设在伪满东部国境上的又一支宪兵队。设立的直接目的是为加强对绥芬河至东宁之间的防卫，对第3军执行防谍和军事警察业务。

东宁宪兵队管区为牡丹江省靠近国境的东半部，是典型



的国境宪兵队。该队成立之初，沿国境设了东宁、大肚子川、绥阳、绥芬河4个分队和石门子、老黑山、绥南3个分遣队。1942年鸡宁宪兵队编成后，绥阳和绥芬河两个宪兵分队被划出，管区缩小到牡丹江省东部国境南端。

东宁宪兵队管区，由于是对苏作战的主攻地段，因此，除第3军3个师团沿东宁以南边境驻防外，在老黑山一带还设有关东军3个大型军需补给厂①，使用了数千名中国工人。围绕补给厂工人进行的防谍、防谋略活动，也是东宁宪兵队的一项重要任务。东宁宪兵队曾在各补给厂配备宪兵，安插大批密探、特务监视工人的活动，协助厂方进行“劳务管理”和“防谍保密”。

1942年9月，第15野战兵器厂（关东军2632部队）设在老黑山中的弹药库发生了大爆炸，“关特演”期间储备供2个师团作战用的弹药化为灰烬。事件发生后，东宁宪兵队立即在现场逮捕了上百名中国工人进行严刑拷问，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也调去特设宪兵队现场侦察，结果发现是由于炸药自燃造成爆炸。以后，关东宪兵队特别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防范，事件发生后老黑山分遣队被升格为分队，专门对这一地区进行保护。

① 关东军设在老黑山一带的军需补给厂如表：

补给厂番号	补给厂名称	地址
关东军2632部队	第15野战兵器厂老黑山出张所	老黑山
关东军2638部队	第16野战燃料厂老黑山出张所	老黑山南村，西村
关东军2643部队	第16野战货物厂老黑山出张所	老黑山南村、西村

关东防卫军东防卫区司令官鉴于这一爆炸事件，也命令东宁宪兵队制定对这一地区的劳工管理措施，于是东宁宪兵队战务课会同当地的警察、铁警、协和会、劳工协会、包工头制定了监视劳工计划，内容有：

“1．对劳工的活动加紧侦察，设专人掌管劳工考勤本，严密注视劳工的请假、外出情况，作为将来镇压工作的参考资料。

2．各部门根据考勤本登记的工人出勤情况，对未出工的工人进行调查、盘问，从中发现可疑线索。

3．对经常外出的工人，要进行特殊登记，重点调查，一经发现可疑情况，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老黑山分队成立后，重点以上述3个补给厂为目标进行活动，每隔3天将对劳工监视情况，作为防谍情报向东宁宪兵队本部直接报告1次。

东宁宪兵队管区内还有以东宁，鹿鸣台两个国境阵地为中心的大量对苏作战的野战阵地，为防范间谍刺探这些阵地的军事机密，东宁队经常用宪兵、宪补和密探组成若干个潜伏哨，沿国境线上布设，监视对面苏联的情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退至苏联境内休整的东北抗日联军经常组成小部队，越境返回东北从事抗日活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认为，东宁至绥芬河一线是抗联往返苏联的一条秘密通道，故责令东宁宪兵队加紧侦察。1943年9月，东宁队战务课拟定侦察计划，曾指挥东宁、大肚子川、老黑山3个分队和石门子分遣队进行了侦察。

东宁宪兵队除平时以防谍、防谋略为主要任务外，战时

防卫计划还规定：

“1．在管区日军向对面苏联发动进攻时，东宁宪兵队抽调30名宪兵随军队进入苏联境内，在苏联对面的波尔达夫加街设立临时宪兵队，维持占领地治安，在野战宪兵队抵达后，将任务移交给野战宪兵队，尔后返回警戒东宁城。

2．对苏开战时，将居住在国境线上的石门子、大城子等15个村庄的5000名中国居民，用县长的名义赶到穆稜和绥阳一带。

3．开战后根据编入战时有害分子名簿中的名单，立即执行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计划。”当时东宁宪兵队编入“战时有害分子名簿”中的人，没有第一种，第二种有7人，第三种有10人，均为中国人。

东宁宪兵队在1944年5月与牡丹江宪兵队合并。

东安宪兵队

东安宪兵队是1940年伪满在东部国境设立东安省以后建立的，建立初期，在东安、平阳、虎林、宝清、林口5地设分队，在斐德、半截河、虎头、滴道4地设分遣队，在二人班、鸡西两地设了分驻所。1941年8月，关东宪兵队改编时，佳木斯宪兵队根据宪兵司令部“宪兵队管区要尽量与满国洲行政管区相一致”的要求，将勃利分队拨给东安队，使东安宪兵队增至为6个分队，同时又增设了密山、饶河、杏树等分遣队，管区扩展到了伪满东安省的全境。

同年9月，关东军在东部国境增设了20军，关东宪兵

队为了警备20军和参加对苏作战，在东宁和东安两个宪兵队之间又临时增设了鸡宁宪兵队，东安队管区西半部的平阳、林口、勃利3个分队及所属分遣队又被划到了鸡宁宪兵队隶下，东安宪兵队管区缩小到伪满东安省的东半部。属下分队仅剩东安、宝清，虎林3个分队和斐德、虎头、饶河3个分遣队及密山1个分驻所。

东安宪兵队也属典型的国境宪兵队，服务对象主要是第3军，准备在对苏开战时首先做为军令宪兵配属到第3军中，从东部国境的兴凯湖附近进入对面苏联，在占领地执行宪兵业务。平时，由于管区大部为军事区，居民较少，故重点是执行军事警察业务。

在所谓的“防谍”活动中，东安宪兵队也是当时搞“秘标对策”最凶的一个队，队本部战务课不仅在虎头通往牡丹江的火车上设置数个“检证班”，利用“秘标”检查旅客的“旅行证明书”，在1944年以前，也一直负责在发给当地居民的“居住证明书”上暗设“秘标”。这项工作直到1944年以后才移交给伪满保安局办理。

“关特演”前后，东安宪兵队管区内驻满了日军，当时关东军第11师团驻在虎林、24师团驻在斐德，沿国境线还部署了战车第11、12两个联队，骑兵第3旅团，第6独立守备队及数个炮兵联队。守备虎头、庙岭两个国境阵地的国境守备队，也有相当于1个师团的兵力，因此，对军队执行军事警察业务，乃是东安宪兵队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尤其是1944年下半年，关东军大量的精锐师团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以后，关东军为补充兵力，曾在东北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中召募

了十几万人，编入了关东军各部队中，第5军所属各师团也补充进了大量的“体弱者，思想有问题者和朝鲜人壮丁”，鉴于这种情况，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曾明确向东安宪兵队长上坪铁一训示，要求他在战斗力显著降低的情况下，率领全队强化军事警察的使命，严厉整饬管区内各部队的军风军纪，保障东部国境日军对苏作战的完备态势。同时在国境附近加强防谍对策。

1944年以后，东安宪兵队所属的东安、宝清、虎林3个分队都在中苏国境的前沿设置了宪兵分遣队和派遣队，① 东安分队在密山设宪兵派遣队，重点是搜查从兴凯湖附近越境的苏联间谍和潜伏在密山军事基地附近的间谍。

虎林分队在国境最前沿的虎头设立了分遣队，除对国境守备队执行军事警察业务外，还因虎头附近的黑嘴子、安乐镇，当年是抗联活动的重点地区，宪兵和特务机关都认为这一地区与苏联关系密切，因此，虎头分遣队的任务，主要是围绕上述地区搜捕潜伏到虎头国境阵地的间谍，监视从苏联依曼地区过来的越境间谍。

东安省最北端的饶河一带，是东北抗日联军往返苏联的一条重要通道，故宝清分队曾在饶河设立宪兵派遣队，除配合宝清分队侦察抗联在宝清至饶河一带的活动外，重点搜捕从对面苏联比金地区越过乌苏里江进入三江省和宝清地区的

① 关东宪兵队设置在各地的分遣队、分驻所属关东军正式编制，设立时，必须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向关东军司令官申报，批准后才能设立。而宪兵派遣队，则是各地宪兵队长，根据需要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申请由宪兵队司令官批准设置的带有临时性质的宪兵机构，不列入关东军正式编制。

间谍。

1944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遭到沉重打击以后，开始加强对本土的防御，故大本营命令将第5军所属师团调回日本，为了保守这次军事行动的秘密，驻东安的第5军司令官清水中将以东防卫区司令官的资格，命令东安宪兵队长加强防谍，保护这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知其内幕者只限师团长和参谋长，东安宪兵队也只限队长上坪铁一一人知道，第5军参谋长曾命令上坪铁一向所属分队长保密。为了隐匿其企图，第5军将这次行动称“冬季一号演习”并严令东安地区的宪兵、特务机关、东安省警务厅整顿使用的密探，不得接近军事目标。东安宪兵队长上坪铁一为保证这次军事行动的顺利，以“鸦饲工作”为代号，指挥属下各宪兵分队长对长期监视侦察的十几个目标进行了一齐逮捕，并将被捕者送到“731部队”做细菌试验。

1945年8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召开全满宪兵队长会议，会上大木繁司令官向东安宪兵队下达命令：

（一）根据关东军作战配备的变更，关东宪兵队的任务配备也随之转变，决定从8月1日起撤销东安宪兵队，将东安宪兵队主力100余名宪兵转属到第2特别警备队司令部指挥。

（二）东安宪兵队监禁的人员及正在侦察中的事件，全部移交给东安特务机关。

（三）特别警备队编成后，随关东宪兵队任务、权限的变更，将防谍、思想对策、治安、情报等保安工作全部移交

给特别警备队，东安宪兵队除主力编入特别警备队外，少数宪兵配属到第一方面军，专门负责军事警察业务或执行关东军司令部临时安排的任务。

（四）东安宪兵队所管的文书、物品移交给牡丹江宪兵队本部保存。

根据以上命令，各分队长将监禁人员和侦察的事件都交给了附近的特务机关。8月8日，原东安宪兵队主力和哈尔滨特务机关东安支部及部分兵站警备队成员编成第2特别警备队第4大队。准备分5个中队在鸡宁、东安、饶河三个方向配合关东军第1方面军对苏作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各中队均与上级失去联系，当得知日本宣布投降后，开始分散向吉林方向移动，后多在途中被解除武装。

鸡宁宪兵队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大举向苏联发动进攻，德苏战争爆发。同年7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根据欧洲战局的变化，拟定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其中规定，对北面的苏联“要秘密作好行使武力的准备”。当时的日本军政各界，都认为德苏战争，苏联必败，这个“要纲”的真实意图是等待苏联遭到德国沉重打击后，远东地区发生混乱时，再乘机出兵配合法西斯德国，彻底消灭苏维埃政权，彻底解决日本向亚洲扩张的后顾之忧。

根据这个“要纲”，日本陆军以“关东军特别演习”（简称“关特演”）为代号，在同年7月两次下达动员令，

向中国东北开始大量增兵。为加强东部国境对苏作战的攻势，关东军从朝鲜、日本、南满等地调来了3个师团编成第20军，配备在观月台和绥芬河之间，准备在对苏开战时，以此作为东部左翼助攻军，从平阳镇和观月台两个方向进入苏联境内，寻机与苏联远东红军决战。

为了保障第20军军事行动的安全，1941年9月，在20军组建的同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也临时组建了鸡宁宪兵队。

鸡宁宪兵队本部设在鸡宁街一所朝鲜人开的旅馆内，自编成到1944年10月随第20军调防撤销，三年间，历任队长有4人，首任为宪兵中佐堀口正雄，后任有森本勇（宪兵中佐）、望月政吉（宪兵大佐）和上坪铁一（宪兵中佐）3人。

鸡宁宪兵队属临时宪兵队性质，属下各分队、分遣队是从牡丹江、东安等宪兵队下属分队直接拨过来的。分队管区与原来管区基本不变，因此自编成到撤销其机构一直变化不大，其设在各地的分队有如下5个：

八面通分队——下城子分遣队
　　　　　　|—梨树镇分驻所
绥阳分队——绥芬河分遣队
鸡宁分队——林口分遣队
　　　　　|—滴道分驻所
平阳分队——半截河分遣队
勃利分队——杏树分遣队

其中八面通、绥阳两分队原属牡丹江宪兵队；鸡宁、平阳、勃利3个分队原属东安宪兵队。鸡宁分队在归东安宪兵

队前，称林口分队设在林口县的林口街，在鸡宁县的滴道、鸡西两地设分遣队和分驻所，划归鸡宁宪兵队后，分队东移到了鸡宁县的鸡宁街，改名为鸡宁分队，在林口街设分遣队，管辖林口县。

鸡宁宪兵队的管区有三大特点：

一是军队多，1943年以后，大本营鉴于与东部主决战军第8军对峙的苏军兵力日趋加强，决定将东部的主决战军改为20军，遂开始为20军重点配备兵力。在1943年上半年关东军对苏备战高潮期间，20军兵力从3个师团，猛增到8个师团（其中包括2个战车师团），加之各种后勤补给部队，国境守备队等，使鸡宁宪兵队管内的总兵力，一时达十数万之多。其中绥阳分队管辖的绥阳县驻军最多，据载，绥阳驻1个师团，绥西的细鳞河驻1个师团，绥南、绥芬河等地也都驻着大量的日军联队、大队。当时鸡宁队管区不仅在铁路沿线，就是在偏僻的小村，到处都是日本兵。

二是鸡宁宪兵队管区工人（劳工）多，工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20军扩编以后，在勃利、八面通、下城子、梨树镇等地修筑军用道路、飞机场时，从山东等地招募来的劳工。另一部分是煤矿工人，当时鸡宁宪兵队管区内有鸡西、梨树镇、滴道等煤矿，鸡宁宪兵队和当地日本特务机关均认为：这些煤矿由于离国境近，是苏联间谍越境后落身隐藏的重要场所。另外，这一带过去曾是抗联第八军活动过的地方，第八军军长谢文东虽在1939年被诱降放下了武器，但部下绝大部分都流散到了鸡西、滴道等煤矿做了矿工，因此对这些人须格外严加防范。

鸡宁宪兵队各分队鉴于管内这两大特点，都将军事警察和防谍两大业务确立为活动重点。

勃利分队的活动主要是以分队特高班为主，50多名宪兵大部是用于警护设在青山堡的"神风特攻队"基地①和设在杏树的关东军航空士官学校。另该分队为利用民间组织防谍，特高班防谍系主任还在勃利县城设立了"防谍团体二十日会"，将当地一些公司、会社的亲日派人士吸收为会员，每月20日召集开一次会议，指导他们识破苏联间谍活动的方法，此外还利用会员监视电报电话局、车站、军事设施、为部队服务的商业点等。有时也利用会员搜集当地居民的思想，言论情报。

鸡宁分队重点是在鸡西、城子河，滴道等煤矿中活动，搜查潜伏的苏联间谍，侦察矿工们的活动。当时分队曾在鸡西煤矿花钱雇用密探，使他们混入工人中间，监视工人们的活动。在滴道，专门设置了分驻所，配备曹长以下6名宪兵，主要是协助滴道矿方管理煤矿工人。另在管区的城子河矿，分队也派出2—3名宪兵，监视工人的活动。

绥阳分队有50余名宪兵，主要是在国境线上防谍，当时该分队管辖着观月台—绥芬河—东宁间的国境阵地和野战阵地，绥芬河和观月台两地除设有国境阵地驻有大量国境守备队外，也是20军对苏作战的重要进攻路线，为了防备苏联间

---

① "神风特攻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为弥补空军战斗力的不足，用武士道精神组织起来的特殊空军作战部队。为击毁目标，将特制飞机装满炸药，采取飞行员、飞机、攻击目标同归于尽的的办法作战。"神风"取意于中国元朝进攻日本时，船队遭台风失败日本是得"神风"帮助之意。

谍越境进入这一地区，分队在老莱营和观月台附近设了若干个潜伏哨，每个哨位配备6至8名宪兵，有的哨位还配备汽车，日夜监视着对面苏联的情况。

八面通分队除对国境防谍外，重点是监视梨树镇煤矿，当时梨树镇煤矿不但离国境近，而且还有部分白俄在里面工作，因此，以白俄为主要目标的防谍工作，是八面通分队防谍工作的重点。

1944年10月，20军撤走后，鸡宁宪兵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故宣布撤销。各分队、分遣队又都回归到了原属的宪兵队，其业务和管区未变。

间岛宪兵队

间岛宪兵队1943年4月以前称延吉宪兵队，1943年4月以后，因队本部所在地的延吉街改称为间岛市，故改名为“间岛宪兵队”。

日本帝国主义在延边地区设置宪兵的历史较久，在“九·一八”事变前，因延边地区归朝鲜军管辖，珲春就有了日本宪兵。“九·一八”事变关东军进入延边后，也由随军宪兵编成了“间岛派遣宪兵队”，本部设在延吉街，在龙井、图们、百草沟（汪清）设了分遣队。

1932年12月关东宪兵队改编时，在延边地区废止了间岛派遣宪兵队，正式设立了延吉宪兵队。第一任宪兵队长由加藤泊治郎中佐担任。全队增编为50人，下设延吉、图们两个分队。

1938年12月，珲春地区从朝鲜军管区划归给关东军管区后，延吉宪兵队又在珲春设立了宪兵分队，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关东宪兵队曾在敦化、安图、龙井、百草沟、开山屯、金苍、春化等地设过宪兵分遣队和派遣队，在马滴达、杜荒子、明月沟、春阳、罗子沟等地设过宪兵分驻所。历任的宪兵队长除加泊藤治郎外，还有桥本信次、阿部起吉、金泽朝文等人。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间岛宪兵队有珲春、图们、延吉、春化4个分队，宪兵队长为金泽朝文宪兵中佐。

延吉宪兵队管区的特点是地处中朝边境，被称为“间岛”的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为朝鲜族聚集区，邻近的安图、敦化、桦甸、抚松等县，也居住着大量的朝鲜族。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曾不断地利用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来强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镇压中朝人民抗日运动。

1932年2月，关东宪兵队就曾利用汉城“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胤等人，组织过“民生团”专门发展朝鲜人为团员，通过打进中共东满省委领导的抗日组织内部，制造鲜汉民族党员之间矛盾，破坏这一地区的抗日运动。“民生团”失败解散后，1934年9月延吉宪兵队长加藤泊治郎等人，又策划成立了“间岛协助会”。

“间岛协助会”与“民生团”虽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但性质相同，都是日本宪兵利用民族矛盾一手建立起来的镇压延边地区抗日运动的反动组织。会员均为朝鲜族，其“宣言”中明确提出，“要以日本为盟主……扬弃狭隘的

民族观念，击毁外来的，非现实的共产主义。”其根本用意，一是从民族内部反对朝鲜民族主义运动，二是反对中共东满省委领导的抗日运动。该会的行动纲领有6条，其具体内容是：

“1．宣传与培养日满一体思想；

2．促使共产党及反日、反满军解体；

3．在共产党及反日、反满军的阵营中移植正义分子；

4．在一般群众中移植正义分子；

5．揭发共产党及反日、反满军的地下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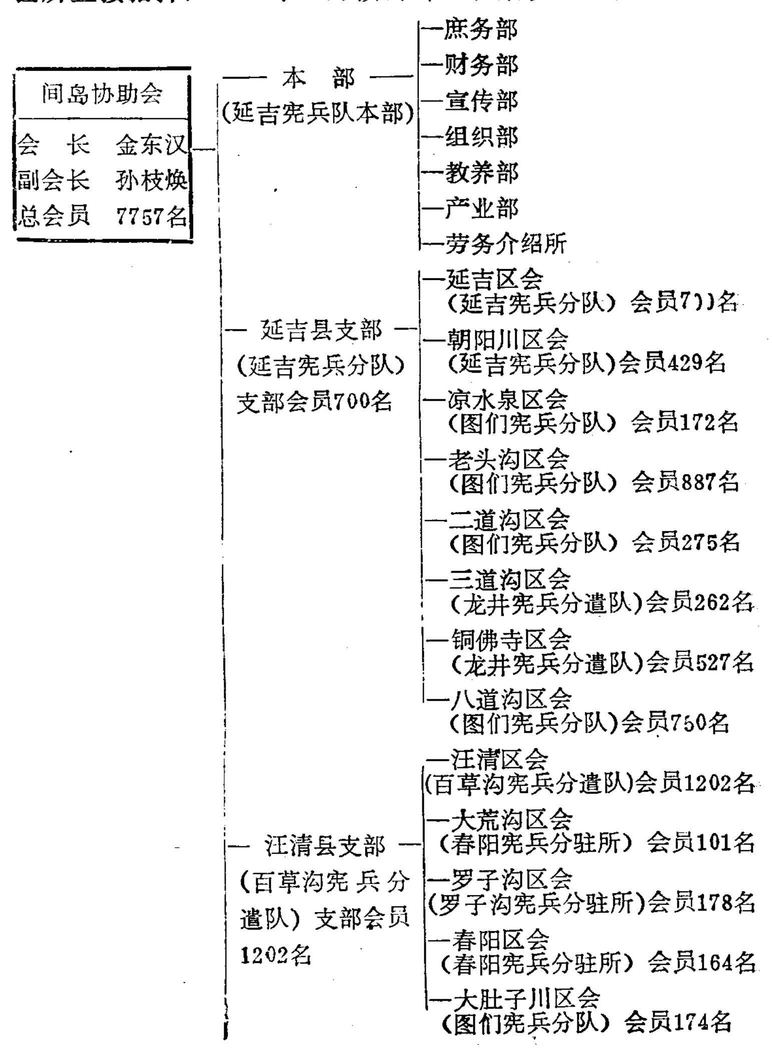
6．对朝鲜人之不良分子，用朝鲜人的力量剿灭，以期完成日满合作。”

该会经费由延吉宪兵队负责支付，直属延吉宪兵队指挥，有关民族问题的具体事项，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指导。

“间岛协助会”本部设在延吉，在延吉、汪清、明月沟、安图、敦化等地设支部、支部下设区会，区会下设总班，总班下设班，每5人为一班。组织原则是：“清除一切民主主义痕迹，由会长独裁统治。”

入会原则是“凡赞成该会目的者，都可成为会员。会员的最低义务是充当密探，向班长报告班内和村内所发生的情况。协助会成立的初期，宪兵主要是利用会员监视、管制“归顺者”，宪兵将“归顺者”安置到有会员居住的地方、时刻监视他们的活动，当认为“归顺者”已经彻底改悔后，再把他们重新编组，迁到其它的地方去。“间岛协助会”的各

支部、区会的活动都由延吉宪兵队下设的分队、分遣队、分驻所直接指挥，1936年4月该会的组织系统如下表：



—明月沟支部—明月沟区会，会员1101名
（明月沟宪兵分驻所）
支部会员1101名
—安图县支部—安图区会，会员137名
（安图宪兵分遣队）
支部会员137名
—敦化县支部—敦化区会，会员70名。
（敦化宪兵分遣队）
支部会员70名

注：括号内的宪兵队，表示直接指挥协助会支部、区会的当地宪兵机构。

“间岛协助会”还在会员中组织了两个“武装行动队”。直接配合日军独立守备队和宪兵的讨伐镇压活动。一个称“义勇军自卫团”始建于协助会成立初期，团员多是积极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骨干会员，其活动由延吉独立守备队队长指挥，并由独立守备队负责对其进行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配合守备队在各地讨伐。

另一个武装行动队称“协和义勇团”，也称“协助会特别工作班”，这个组织在间岛协助会的各个支部都有，工作班成员多是死心塌地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中坚会员。

特别工作班的活动对延边地区的抗日运动危害最大，他们经常和日本宪兵一同行动，在日本宪兵的指挥下，侦察中共东满特委的基层组织，警戒城乡，搜捕潜入到城镇中活动的抗日武装人员。另外，特别工作班还进行过所谓的“山区工作”。“山区工作”的内容除直接派遣武装人员袭击抗联的哨兵，小股部队，向山区散发传单，派抗联家属去诱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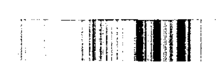
写离间信等活动外，还派工作员打进抗联内部，制造矛盾，利用民生团潜入过党内造成的影响，不断制造民生团仍在活动的假象，企图惹起党内搔动，制造内部倾轧。

此外，延吉宪兵队为在延边地区从根本上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切断抗联与朝鲜族群众的血肉联系，还曾利用“间岛协助会”组织“劳动介绍所”和“产业部”，通过介绍职业，提供就业门路来达到控制朝鲜族群众的目的。

“劳动介绍所”活动纲领是：“通过给会员和归顺者介绍职业，使其生活安定，尔后对他们施以精神上的指导和训练，使其从根本上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产业部”是“间岛协助会”内部的经济组织，它以宪兵为后盾，从间岛省公署要来了大片的土地作为农场，将归顺者和无产会员迁去耕种。同时还争得了开山屯，小百草沟等金砂矿的开采权，安排其会员开采。另外，为防止会员失业，生活无保障，产业部还设了染房，浆洗房等供会员谋生。

“间岛协助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延边少数民族地区专门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活动而成立的集政治、军事、经济活动为一体的反动政治团体。它的活动曾给延边地区的抗日运动造成过巨大的危害，但它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很难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统治东北的需要，因此1936年冬，伪满协和会成立后，关东军以“一国一党主义”为理由，将其解散与协和会合并。

合并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认为，“间岛协助会”的某些部分，特别是利用民族矛盾组织起来专门对付共产党的



"特别工作班"，不仅在延边地区仍有存在的价值，而且在朝鲜人聚集的东边道地区，也有存在的意义，因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决定将"特别工作班"作为"协和会特别工作班保留。

会长金东汉在"间岛协助会"解散后，仍在宪兵的操纵下活动。1936年关东军指挥伪满军警在东边道地区进行独立大讨伐时，金东汉也被调到东边道，在奉天宪兵队长加藤泊治郎的指挥下活动。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后，1938年关东宪兵队又将金东汉调到三江省，参加三江大讨伐，结果他在活动中被打死。

延吉宪兵队为利用民族矛盾，操纵朝鲜族汉奸破坏抗日运动，1941年11月，还根据关东军东防卫军的命令，成立了以图们宪兵分队长田上惟敏宪兵少尉为班长的"田上工作班"该班成员以朝鲜族汉奸和抗联的朝鲜族叛徒为主，李基权为该班的委嘱宣抚部长，宋宝玉、雪熙宇为副部长，永田金堆为宣传部长，木村武男为工作班主任，下设情报、经理等部，该班在延边地区设17个地区工作班，每班10—20人。主要活动是搜集情报，诱降抗联部队，调查延边地区朝鲜人的动态。

该班当时活动的手段颇似"长岛工作班，"由于朝鲜族汉奸李基权等人特别卖力，加之有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特别发给的充足活动经费，该工作班在图们地区的活动十分猖獗，给这一地区的抗日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而"田上工作班"在伪满也颇有"名声"，多次得到关东军东防卫军司令官和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嘉奖。

延吉宪兵队管区的另一个特点是地处中苏边境，也有“防谍”任务。关东军在东部国境的对苏作战部署中，“关特演”期间曾在珲春一带布置了第2军，作为主决战军第3军的助攻军，准备在开战时，一面配合第3军行动，一面从珲春直扑海参崴。第2军平时由关东军第71师团和第9国境守备队组成，战时驻北朝鲜的独立19师团也编入第2军作战序列。

由于延边地区是关东军对苏作战的重要区域，因此管区内靠近边境地带除筑有大量的军事阵地外，在珲春杜荒子，金苍岭附近，还修筑了军用道路，经常有从东北各地征募来的劳工在干活，为此，延吉宪兵队专门在杜荒子设立了宪兵分驻所，负责对劳工进行监视。另在珲春兴仁村、二道沟屯还设有关东军2637部队（野战兵器厂）和2642部队（汽车补给厂）两个大型军需补给厂，为防范间谍和谋略破坏，珲春宪兵分队常年在这一地区派驻派遣宪兵。

太平洋战争后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战败迹象的日益显露，活动在延边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也开始抬头，1944年春，宗教团体青林教在教官林青林和干部玄天海等人的领导下，为准备迎接日本战败，开始发展教徒，募集资金，并在和龙县的炮台山祈祷，咒日本早日战败。同时为迎接美军登陆，还准备了欢迎旗帜。一时青林教徒和支持者发展到了千余人。

这一情况引起了间岛宪兵队和当地伪满保安局的密切注视，伪满间岛地方保安局和龙井宪兵分遣队同时展开了侦

察，保安局通过特谍班长①长岛勉伪装成卖药的，打入青林教内部侦察，宪兵则通过协和会侦察。不久，教内的活动基本被搞清，宪兵和保安局特务交换情报后，从1944年底开始由间岛宪兵队区署间岛地方保安局，对青林教进行联合镇压，到1945年5月，百余名教徒被捕，伪牡丹江高等法院曾对此进行了判决，其中5名首要人物被判死刑，25名重要人物被判有期徒刑。

1945年8月6日，间岛宪兵队各分队被编入第2特别警备队第2大队，分别被配属到第3军中。8月9日当接到苏联的进攻报告后，第2大队立即集结兵力，准备开展对苏秘密战。11日，根据第3军的命令，第2大队派出两个有宪兵参加的武装谋略班，准备先去珲春特务分机关索取情报后，潜入对岸苏联境内，在斯拉维扬卡·克拉斯基诺附近破坏苏联一侧的铁路运输和通信线路，12日，又派出一个宪兵、特务混合编成的挺进班，携带无线电通讯器材，准备前往中苏国境前沿某地，长期潜伏，收集情报。8月14日，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准备袭击进入珲春的苏军中枢指挥机关。8月15日以后，由于日本宣布投降，第2特别警备队第3大队各中队，相继被解除武装。

① 特谍班即伪满保安局下设的伪装特务网。

七　布防在伪满北部边境线上的佳木斯、孙吴宪兵队

佳木斯宪兵队

佳木斯宪兵队，是1937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三江平原上的一支宪兵机构。1936年4月以后，关东军指挥伪满各机关，对东北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讨伐的初期，重点先是放在伪满中心城市的周围及间岛、吉林、安东、奉天东部几个地区。经半年多的残酷围剿，日伪方面认为："满洲国的治安，已呈现出显著的好转趋势"。但也就是在这时，东北的三江平原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伪三江省的汤原、桦川、依兰、勃利、方正等县，逐渐成为了北满抗日运动的中心，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有8个军（即3军、4军、5军、6军、7军、8军、9军、11军）聚集到了这一地区，给日伪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三江省的很多城镇，实际上已经控制在人民手中。

三江地区抗日形势的发展，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惧，1937年3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签发的1937年度关东军作战命令中，就曾提出，在"肃清"间岛、吉林、安东、东边道等地区抗联活动后，抽出手来，准备在

1937年选择一定时机，对三江地区进行特别大讨伐。同月25日，关东军在颁发的“1937年度治安肃正要纲”中，又明确提出：“在进行对滨江、间岛、吉林、安东、奉天东部的讨伐时，要在三江作好准备。暂时用现有兵力、警察、宪兵讨伐，同时，要加紧对三江地区的共产党情况进行调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准备1938年以后对三江地区大规模的讨伐，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于1937年2月，正式设立了佳木斯宪兵队。佳木斯宪兵队基本是从牡丹江宪兵队分家编成，成立之初下设：

佳木斯分队——鹤岗分遣队
宝清分队——同江分遣队
汤原分队——依兰分遣队
勃利分队——┬——林口分遣队
　　　　　　└——杏树分遣队
富锦分队

1937年6月，关东军在1937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工作结束后，鉴于三江地区抗日形势的迅猛发展，决定修改1937年治安肃正计划，提前对三江地区开展大讨伐。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向日伪各机关解释为什么对三江地区提前进行讨伐时，讲了以下几点原因，大意是：

（一）伪满各地受到讨伐的抗联，都已向三江集聚，三江实际上已成了共产党和抗联的天下。共产党正在利用日本向三江移民等活动，在当地民众中宣传抗日、扩大势力，并在三江地区实际上统治了相当大的区域。

（二）三江地区已经达到了“匪民界限混淆不清的境

地”，不仅与“共匪”有血缘关系者甚多，而且当地民众多数倾向共产党，使其可以得到充足的给养，迅速发展。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这一地区的民众中，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三）三江方面的满系军警，自卫团，在抗日形势的影响下，也在发生着质变，他们之中很多人，不仅对“满洲国”的政策消极对待，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以保命为借口，向“共匪”提供武器弹药。“更有甚者，警察官中竟有很多人通匪，多次引导共匪袭击县公署、警察署等”。东条英机哀叹：“三江地区的治安已经达到了极为恶劣的程度，国家政策已经不能实施，匪民混迹不清，分离已十分困难，这种情况如放任下去，不仅将来根本肃清十分困难，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日本重要的国策移民政策的实施。同时也更易为苏联的政策所利用。”

为对三江地区进行大讨伐，1937年6月11日关东军发布命令，命令将第4师团调往三江，以该师团长代替第4独立守备队长，担任“东北防卫区”司令官职务，直接指挥对三江地区的大讨伐。同时命令佳木斯宪兵队及下属各分队、分遣队，在讨伐重点地区的汤原、桦川、依兰、勃利、方正等县加紧活动，为第4师团的讨伐，提供情报。

佳木斯宪兵队在三江大讨伐中的具体活动如下：

（一）军事上直接参加讨伐。1937年入冬以后，鉴于抗日联军分散成小股活动的情况，关东军也改变了讨伐初期对三江地区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办法，编成了数个配有轻机枪，人员在150名左右的“特设游击队”，试图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与分散活动的抗联部队作战。佳木斯宪兵队为配合这一

战术的变化，以警务统制委员会的名义，指挥三江地区日伪警务机关，编成了若干个“特别搜查班”、“挺身工作班”等组织，配合“特设游击队”，专门以抗联干部为对象，开展诱降、特务活动。另外，从间岛地区调来的“协和会特别工作班”，当时也归佳木斯宪兵队直接指挥。该班原名为“间岛协助会特别工作班”，1936年间岛协助会和协和会合并后，改为协和会特别工作班。三江大讨伐开始后，他们在朝鲜族汉奸金东汉的带领下，被调到三江。当时，三江地区有3万多名朝鲜族，关东军认为：“这些朝鲜人中，很多人主张共产主义，他们对日本向三江移民，已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正在发生动摇和不稳”。另三江地区抗联队伍中，很多领导人都是朝鲜族。佳木斯宪兵队操纵协和会特别工作班，主要是利用他们在朝鲜族中开展特务活动，配合讨伐对抗联中的朝鲜族干部开展诱降瓦解活动。

（二）政治上配合日伪政权，进行分离抗日军民血肉联系的活动。这一工作日伪方面称之为“匪民分离”工作。佳木斯宪兵队曾以警务统制委员会的形式，指挥日伪军警在讨伐区周围配合日伪政权进行了“治标”、“治本”、“思想”等工作，试图通过从控制居住、思想、职业三个方面，切断抗联与民众的血肉联系。

在控制居住上，佳木斯宪兵队指挥当地的日伪警务机关，通过强化集团部落，进行户口调查、建立健全保甲制度、发放居住证明、宣传贯彻“国境地带法”等手段，对三江地区的居民加紧了控制，企图通过这些办法，造成抗联无处安身的局面。为了配合完成上述活动，佳木斯宪兵队还指

挥伪满警察，对各地保、甲、牌长及中心人物进行了训练，目的是使他们“在匪民分离工作中，对一般住民进行指导和启发”。

在控制思想上，佳木斯宪兵队提出：“由于三江地区的居民大量与共产党有血缘联系，共产党及抗日联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已经十分特殊，他们和居民的关系已经超出一般匪团仅仅是重仁义，不侵犯的关系，而是充当着居民的保护者。当地居民对其统治已经习惯，已经感受不到是在受害了”。对此，佳木斯宪兵队提出：“对三江地区的匪民分离工作，不能简单地去理解，要采取彻底的军事镇压和对民心恩威并用的办法去开展工作”。这样，在协和会向居民大肆宣传“建国精神”、“王道政治”、“协和精神”的同时，佳木斯宪兵队，也指挥日伪警宪，加紧了对所谓“通匪者的搜查”。

佳木斯宪兵队在指挥搜查所谓“通匪者”时，还把重点放在了伪满军警和自卫团中，提出“要用敏锐的眼光，发现满军警中的通匪者，并以坚强的决心，恰当的手段铲除其通匪行为”。当时为了稳定民心，不使伪满军警发生骚动，佳木斯宪兵队还指示伪满宪兵，在处理伪满军中的“通匪者”时，要慎重行事，事先一定要与伪满军警的干部进行充分协商。

在控制职业上，佳木斯宪兵队提出：为达到“匪民分离”的目的，宪兵、警察要对森林采伐、采矿、捕渔等带有分散游动性的行业，进行控制，使抗联无处落脚藏身。另外还指挥伪满警察，到处搜查私种鸦片者，目的是防止抗联获得鸦片，作为活动经费。

（三）在经济上配合讨伐，对抗联进行封锁。当时佳木

斯宪兵队指挥日伪警宪的具体作法是：

1．加强对集团部落内居民的监视控制，在集团部落外划出大片的无人区，试图通过控制集团部落内部民众的办法，切断抗联获得粮食的渠道。

2．以佳木斯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的名义，向当地居民发放了“物品购买证”，试图通过控制商品流通渠道，限制民众购买活动，使抗联从民众手中得不到粮食等各种生活必需品。

3．加强对船舶、汽车等各类运输业人员进行控制，试图通过控制运输途径，切断抗联的物资来源。

4．收缴民间散存的武器，加强对警察、自卫团武器弹药的控制，以此切断抗联武器弹药补给的来源。

（四）配合讨伐组织了“三·一五”大逮捕。三江大讨伐开始后，佳木斯宪兵队除派出宪兵直接参加讨伐外，还指挥各分队、分遣队，协和会特别工作班，警察特别搜查班，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及外围团体进行了侦察。1937年8月下旬，三江大讨伐开始不久，关东军熊谷旅团一部在讨伐中，逮捕了中共汤原县委宣传部长尹洪明等人，日军后将这些人移交给了佳木斯宪兵队汤原分队，通过审讯，佳木斯宪兵队第一次得到了三江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线索。汤原宪兵分队根据尹洪明等人的供述，又先后诱降了汤原县委书记高雨春和组织部长周兴武等人，进而又初步掌握了中共地下组织在汤原、依兰、富锦、桦川等县的活动情况。以后经数个月的侦察，基本查清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在三江地区各县的组织情况。于是，1938年3月3日，佳木斯宪兵

队在本部召开了逮捕工作会议，会上决定3月15日在汤原、桦川、依兰、富锦等地，对已查明的中共地下县委及外围团体统一进行逮捕，然后通过审讯口供，再进一步破坏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临时省委。

佳木斯宪兵队对这次逮捕组织的十分慎密，行动前对参加逮捕活动的伪满警察进行了严格保密，所有参加逮捕的伪满警察，都是在头天晚上和逮捕当天临时召集的。逮捕由佳木斯、汤原、勃利、富锦宪兵分队和依兰、鹤立、林口分遣队分别组织进行，从1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7日，总共逮捕了315人。"三·一五"大逮捕后，由于中共汤原、依兰、桦川、勃利、富锦县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被捕，县区两级组织及外围团体大部被破坏殆尽，使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临时省委，不得不撤退到抗联队伍中。

三江大讨伐以后，佳木斯宪兵队的任务开始重点向政治镇压和防谍方面转移，至"关特演"前，该队的主要任务有以下两项：

一是，富锦、宝清两分队，重点侦察抗联往返于苏联和伪满之间的活动线路。当时关东宪兵队认为，饶河对岸的比金，是苏联指使抗联潜回伪满从事抗日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而饶河通往宝清和饶河通往富锦的沼泽地带，则是抗联往返于苏联和伪满之间必经地区，因此，富锦、宝清两个分队在上述地区设置了大量的秘密据点，采取了各种办法，对越境者进行搜捕。

二是，佳木斯和勃利两分队，重点监视讨伐后散在各地的抗联战士，当时佳木斯分队管辖的鹤岗煤矿和勃利分队管



辖的一些煤矿，里面有很多矿工都曾参加过抗日活动，日伪方面最担心这些人，遇到时机再揭竿而起，故由佳木斯和勃利宪兵分队负责对其监视。

1941年“关特演”以后，随着关东军在东部国境大量增派兵力，为加强对新设的20军的防谍和适应侵入苏联后转为野战宪兵队的需要，佳木斯宪兵队的宝清、勃利两分队被划到鸡宁宪兵队。同时，随着关东军在萝北地区大量集结，佳木斯宪兵队又增设了兴山镇（在鹤岗）宪兵分队。至此，佳木斯宪兵队有佳木斯、富锦、依兰、兴山镇 4 个宪兵分队，管辖着伪三江省的全部地区。

从“关特演”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准备攻击苏联期间，佳木斯宪兵队还在三江平原东北部，配合哈尔滨特务机关对苏进行了谋略活动。当时这一地区，按照关东军的作战部署，是介于东部主攻方向和正北防御阵地之间，大本营曾在这一地区有过“三江作战”的设想，即准备战时通过这一地区的沼泽地带，直取苏联远东重镇哈巴罗夫斯克，切断苏联滨海边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联系，斩断苏联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配合东部主决战军南北夹击，与苏联远东军决战。“三江作战”的设想后被认为不现实而被否决，以后关东军将这一地区改为持久防御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对苏谋略活动。当时哈尔滨特务机关曾针对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编成了以白俄为主的浅野部队和以伪满宪兵为主的独立宪兵队（乙部队），准备开战后渡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在几个地点同时爆破西伯利亚铁路。佳木斯宪兵队管辖区的饶河、抚远，即是哈尔滨特务机关从事这一

谋略活动设在东北部国境上的据点，对此，佳木斯宪兵队配合特务机关，在汤原附近的南叉建立了特殊移民村，从哈尔滨等地迁去了数百名白俄，以此作为浅野部队在中苏国境线上进行谋略活动的基地。佳木斯宪兵队同时也负责对这些白俄进行监视。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苏边境对苏联采取的“绝对不刺激”政策，佳木斯宪兵队的活动又重点转向了防谍和防谋略方面。这期间佳木斯宪兵队在管区内围绕对苏防御战，将防谍和思想对策两项工作合二为一进行。1944年关东军转为对苏全面守势后，由于将“关特演”期间集结到萝北地区的3个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故兴山镇宪兵分队被撤销。这时佳木斯宪兵队仅剩下了佳木斯、富锦、鹤岗3个分队，重点是根据关东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御体制而开展活动。

当时关东军在三江防范苏联进攻主要在两个区域，一是松花江水路，开战后主要防范苏联黑龙江舰队，从同江进入松花江，沿松花江进入北满。另一是萝北对面，防范黑龙江结冻后，苏军从萝北对面的犹太自治州越过黑龙江，从陆路经萝北、名山镇、凤翔、鹤立攻击佳木斯。对此，为扼守松花江水路，关东军以富锦为中心，沿小兴安岭东侧，松花江南岸，在同江到富锦之间，修筑了坚固的富锦国境阵地；为了阻止苏军从陆路进攻，关东军在萝北修筑了凤翔第十四国境阵地。扼守水路的富锦国境阵地由甲乙两地区构成，甲地区建在乌尔古力山上，以3个步兵大队，2个炮兵大队和1个工兵中队守备；乙地区修在富锦街的东北角，由2个步兵大

队，1个炮兵大队和1个工兵中队守备。另关东军为封锁松花江面，堵截苏军舰队进入松花江，还在同江、津街口等地，修建了大量野战阵地。扼守陆路的凤翔第十四国境阵地，由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守备。另外，为开战后节节抗击苏军，关东军还在兴山镇设了兴山守备队，配署了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和1个工兵中队。

1944年以后，佳木斯宪兵队的富锦、鹤岗两分队，主要是围绕关东军这两条防御线路，开展活动。佳木斯分队主要是围绕第二线作战部队开展防谍活动。当时3个分队的具体活动情况如下：

佳木斯分队，设在桦川县，当时由于佳木斯附近驻有日军相当数量的第二线作战部队，及空军基地、军需补给厂等，该分队活动的重点是以这些军队、设施为对象，开展防谍活动。当时佳木斯分队还在莲江口设置了分遣队，重点搜查沿松花江水路进入佳木斯的苏联间谍。此外，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汤原的木材，每到采伐季节，都从东北各地运去很多采伐工人，以这些工人为对象开展防谍活动，也是当时佳木斯宪兵分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鹤岗分队，设在伪满的鹤立县，主要是以凤翔第十四国境阵地和兴山镇野战阵地为中心开展防谍活动。另外，关东宪兵队当时认为：从黑河省佛山经佳木斯到富锦的松花江北岸地区，是苏联间谍比较活跃的地区，这一带又有抗联活动的基础，鹤岗煤矿工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参加过抗日活动，因此，围绕这一地区的特殊情况开展防谍，则是鹤岗分队的主要业务。

富锦分队，设在富锦县，是佳木斯宪兵队当时最活跃的一个分队。分队将管区分成绥滨、同江、集贤镇、富锦街4个地区进行活动。绥滨地区，以绥滨县为中心，由于这一地区紧靠中苏边境，当地居民一直保持着与对岸苏联人进行贸易往来的传统，富锦分队在这个地区的主要活动是，封锁国境，对秘密越境贸易的人进行逮捕；同江地区，地处松花江和黑龙江的汇合处，是苏联从水路进入北满的重要门户，为此，富锦分队在同江专门设置了宪兵分遣队，主要任务是封锁国境，搜捕从对岸苏联潜入伪满的间谍。另外，位于三江平原最北部的抚远县，由于是大片沼泽地，没有关东军驻军和日本宪兵，但黑龙江中生长的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鲑鱼，每到繁殖期大量游入抚远县境内的河流中产卵，每到这一季节，日伪政权都要组织大批人力进入抚远捕鲑鱼，故以捕鲑人为对象开展防谍，也成了同江宪兵分遣队的一项任务，由同江分遣队派出宪兵，对捕鲑人进行监视；集贤镇地区，不靠近中苏边境，但是关东军对苏作战的第二线地区，这里从1941年开始，修建了飞机场等一系列军事设施，在这个地区围绕飞机场等军事设施的防谍，则是富锦分队的主要任务。另当地的富安煤矿，也是该队防谍活动的重点，分队在里面安插了大批密探、特务，对矿工们的活动进行监视侦察。

1945年7月中旬，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前夕，关东军收缩了北部和东部的防线，准备放弃东北大部地区，固守安奉铁路以北、奉山（城镇）铁路以南靠近北朝鲜的地区。8月初由于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编成，佳木斯宪兵队宣布被撤销，人员被分成两部分，100余名主力被编入关东军第2特

别警备队第5大队，准备与苏军开展游击战。本部23名宪兵改为佳木斯宪兵分队，在分队长田上惟敏的指挥下，担当军事警察业务。8月11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撤至通化后，佳木斯宪兵分队转入关东防卫军隶下，8月16日被苏军解除武装。

孙吴宪兵队

孙吴宪兵队，是1940年初准备进攻苏联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中苏国境正北方向设置的一个宪兵机构，设立之初称“北安宪兵队”，下设孙吴、北安、黑河、山神府4个分队，及龙镇、绥化、奇克、神武屯、瑷珲等分遣队。1941年7月改为“孙吴宪兵队”。管区为伪满的北安、黑河两省及漫长的中苏北部国境线。

根据关东军的作战部署，“关特演”期间孙吴宪兵队管区曾是关东军继东部发动进攻后，攻击苏联的第二个出兵地点，因此，以北安为中心曾集结了大量的日军作战部队。使北安一时成了仅次于牡丹江的伪满第二大“军都”。当时设北安宪兵队，主要是从防谍和军事警察工作方面考虑。

“关特演”以后，孙吴宪兵队参与了大量的对苏谋略活动。由于黑龙江对岸苏联境内的西伯利亚铁路，离国境线较近，关东军在北部国境对苏作战的部署中，曾把破坏西伯利亚铁路、切断苏联从欧洲地区向远东的运输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对此，哈尔滨特务机关为策应关东军的行动，曾在黑龙江流域选择了漠河、鸥浦、呼玛、乌云等地作为据点，训练白俄部队和伪满独立宪兵队，准备战时从事谋略破坏活动。

孙吴宪兵队为配合这一活动，曾向白俄部队和伪满独立宪兵队派去宪兵，协助开展防谍活动。

1942年以后，孙吴宪兵队的防谍活动主要在以下两个地区进行：

（一）围绕国境线上的对苏作战阵地，进行活动。1940年以后，由于北部国境线被关东军确定为重点防守地区，故关东军新建和加固了一批国境阵地和野战阵地。当时，沿黑龙江国境从黑河省的瑷珲县至佛山县，曾修筑了无数个碉堡群，当时比较大的有：

霍尔莫津第五国境阵地。该阵地由筑在黑龙江岸上的霍尔莫津和胜武屯两个核心阵地组成；另围绕国境阵地在逊河、孙吴一带，还修有大量的永久阵地，并在奇克、乌云、佛山设有部分野战阵地和观察哨，主要目的是准备抵御苏军从正北面右翼的进攻。

瑷珲第六国境阵地，该阵地以瑷珲、胜闽山、朝水等核心阵地构成。另围绕核心阵地在黄金子、松树沟还设有大量野战阵地，该阵地群规模较大，是关东军设在正北面国境线上的主阵地，阵地内驻屯着第六国境守备队大量的步兵、工兵和炮兵部队。战时重点防御苏联从黑河对面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陆路上的进攻。

黑河第七国境阵地，该阵地设在黑河街以南的黑龙江边上，阵地内秘密地布设了各式大口径远程炮，主要任务是对苏开战时，封锁黑龙江面和苏联境内与黑龙江相连的结雅河，阻击苏军从黑河对岸水路进入东北。

法别拉第十三国境阵地，该阵地位于北部国境的最北

端，围绕法别拉核心阵地，关东军还在黑河西、东黑山、马场、达音山等地修筑了大量的野战阵地群，试图在苏军进攻东北时，节节抵抗。

以上阵地都由关东军国境守备队守备，是对苏作战的最前沿。孙吴宪兵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主要是围绕上述阵地的防谍活动而进行。其中，孙吴分队主要负责霍尔莫津阵地，属下奇克分遣队，负责佛山至奇克间200多公里国境线上的防谍；黑河分队主要围绕黑河街开展活动，搜查苏联间谍，警备黑河国境阵地；山神府分队瑷珲分遣队，重点警备瑷珲国境阵地，神武屯分遣队，重点警备法别拉国境阵地。

（二）围绕北（安）黑（河）铁路开展活动。北黑铁路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苏联专门修建的一条军用铁路，在这条铁路两侧的防谍，也是孙吴宪兵队的一项重要活动。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翻过小兴安岭，西征到嫩江平原后，曾在北黑铁路两侧的克山、拜泉、通北、绥化等县活动。对此，孙吴宪兵队在组队初期，即在北安设分队，沿铁路南北两地设龙门分遣队和绥化分遣队，重点侦察抗联的活动。此外，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北安分队还把对北安一带对苏作战第二线部队的防谍工作，作为分队活动的重点，并将“思想对策”工作和防谍工作结为一体，对中共地下组织和抗联开展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关东军在北安一带作战师团的调走，北安分队活动的重点转为在北安市及北黑铁路两侧开展防谍活动。

1945年8月，在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编成的同时，孙吴宪

兵队被撤销，黑河、孙吴、山神府分队被编入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北安分队36名宪兵开战后，在八木分队长的指挥下，跑到日本士兵中进行了“誓死效忠天皇”“与苏军血战到底”的蛊惑宣传，日本天皇停战诏书广播后，八木分队长又指挥宪兵跑到部队和侨民中，大肆煽动“杀身成仁”、“为天皇尽忠”，产生了极坏的影响。8月30日该分队在北安市被苏军解除武装。

八　协助关东军西线防守的齐齐哈尔、海拉尔、兴安宪兵队

齐齐哈尔宪兵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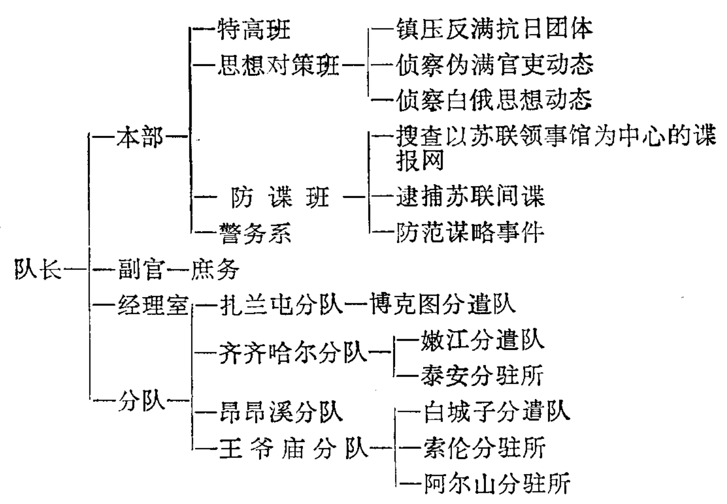
齐齐哈尔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在伪满西部建立的宪兵机构，以后的海拉尔、兴安宪兵队，都是由它的下属分队扩充编成。

1932年5月10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及北满大部城市后，先以铃木混成旅团配属宪兵长海村园次郎等60名宪兵为主，编成了齐齐哈尔派遣宪兵队，下设齐齐哈尔、克山两个分队。6月15日日本陆军省发布“满洲派遣部队编成要领”后，关东宪兵队根据这一要领，撤销了齐齐哈尔派遣宪兵队，正式编成齐齐哈尔宪兵队。并在齐齐哈尔、嫩江等大兴安岭以东地区，设立了4个分队，3个分遣队，归齐齐哈尔宪兵队直接指挥。

1933年以后，随关东军对全东北的占领，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管区迅速扩展到伪满西部的兴安东、北、南3省及龙江省广大区域。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收买中东铁路以后，齐齐哈尔宪兵队又以滨洲铁路哈（尔滨）满（洲里）段；齐齐哈尔至嫩江段铁路；白（城）阿（尔山）铁路为中心，在满洲

里、海拉尔、昂昂溪、博克图、王爷庙、白城、阿尔山、嫩江等地，设置了宪兵分队和分遣队，一方面充当军事警察；一方面配合日伪军讨伐，镇压抗日义勇军等活动。

1935年9月，东条英机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后，命令在全东北对中共地下组织及苏联的间谍活动进行侦察镇压，根据这一活动的需要，1936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在兴安北省设立了海拉尔宪兵队。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管区被划出去一部分。从海拉尔宪兵队成立到“诺门坎事件”之前，齐齐哈尔宪兵队的机构设置情况如下：



1935年11月，齐齐哈尔宪兵队长中田敏雄根据东条英机6个月侦察清楚中共地下组织的命令，指挥管内的日伪警务机关对共产党的活动开展了侦察。不久即发现了中共满洲省委在齐齐哈尔地区的组织线索，经侦察掌握了黑龙江《民报》社社长王甄海等人，在教育界的教师、学生中．进行地

下抗日活动的情况。又经数月侦察，最后完全掌握了其组织的全部活动。1936年6月13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组织全东北第一次统一大逮捕中，齐齐哈尔宪兵队亦参加了行动，在本部设立了“搜查本部”，指挥伪龙江省警务厅、齐齐哈尔领事馆警察署，在齐齐哈尔市进行了大逮捕。这次共逮捕教员，学生（包括部分教育官吏和报界人员）38人，送伪第三军管区军法会审后，其主要人物被处以死刑，余者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长刑。

齐齐哈尔宪兵队在指挥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同时，也对苏联的间谍活动加紧了侦察。1936年秋，宪兵在孙吴一带逮捕了越境去苏联看病的2名中国人①，经审讯这两人承认是苏联潜伏在齐齐哈尔地下间谍网的联络员，担当着返往苏联传递情报的任务，并供认了苏联间谍在齐齐哈尔的一些情况。据此，齐齐哈尔宪兵队以齐齐哈尔市为中心，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捕活动。不久，宪兵上等兵土屋芳雄利用密探首先在城北关逮捕了一个叫张惠民的人，从他的住宅中搜出了电台等间谍活动器材，并缴获了大量未来得及送出的情报。齐齐哈尔宪兵队根据缴获情报中有关东军驻屯情况；部队番号、兵种、人数；军用机场设施、飞机架数、机种、飞机每天起落架次；齐齐哈尔铁路军事运输情况；伪龙江省公署政治、经济情况；伪满第三军管区部队编制，各级指挥员姓名等大量内容，判明这决不能是张惠民一人所为，张很可

---

① 当时黑河、孙吴没有通往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等地的火车，往返只能乘马车，当地居民去苏联比去齐齐哈尔方便，因此当地居民有越境去苏联看病的习惯。

能就是齐齐哈尔苏联地下间谍网的成员，于是，宪兵对张进行了残酷的刑讯。由于张的叛变，齐齐哈尔宪兵队将这个10余名成员的苏联间谍网全部破获，经审讯查明，这个间谍网的成员分布在齐齐哈尔的铁路、新闻、商业各界及飞机场周围，主要是搜集关东军及伪满政权的情报。张惠民负责对各类情报进行整理，然后交联络员从孙吴越境送往苏联。

不久，齐齐哈尔宪兵队将这个情报网的8名主要成员执行“严重处分”，就地处死，其余人送伪法院判刑。

这件事在关东宪兵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以此为契机关东宪兵队在国境地区采取了一系列防谍措施。

“诺门坎事件”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是齐齐哈尔宪兵队最活跃时期，“诺门坎事件”中，齐齐哈尔宪兵队在本部曾专门设立了“龙江防卫警察部”，指挥宪兵、特务、警察、协和会沿白阿铁路、齐齐哈尔至嫩江铁路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并将其情报汇总、整理，随时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这期间白城子分队还曾派出小川繁三等宪兵，在中蒙边境配合特务机关，操纵200余名蒙古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谋略和情报活动，他们经常越境采取绑架蒙古哨兵和边民的手段，索取情报。

“关特演”期间，齐齐哈尔宪兵队还直接参与了对苏武装谋略的准备活动。当时关东军和哈尔滨特务机关曾制定了一个“对苏挺进突击方案”，决定派遣一支武装谋略部队，从齐齐哈尔宪兵队管区的甘河地区出发，寻找翻越大兴安岭的道路，秘密进入中苏边境漠河，开战后进入苏联境内，破坏西伯利亚铁路大桥，对苏进行谋略宣传，扰乱苏联后方。

1941年6月，当哈尔滨特务机关将白俄组成的浅野部队300余人，集中到甘河白俄特别移民区后，齐齐哈尔宪兵队为配合这次行动，派出了数名宪兵进入该部队。当时哈尔滨特务机关给派遣宪兵的任务是：

1．配合武装谋略部队征集运输车马和人力，并负责对其监视。为使这次行动彻底保密，部队抵达漠河后，由派遣宪兵负责对征来的运输人员执行集体屠杀。

2．派遣宪兵负责对浅野部队的行动实行警戒，发现有人逃跑，抓捕后就地枪决。浅野部队行动区域，由派遣宪兵对周围进行戒严，发现有人进入戒严地区者，就地枪决。

齐齐哈尔宪兵队的派遣宪兵，根据特务机关的命令，先后从巴彦、嫩江等地掠夺了近300辆大车和数百名劳工，为武装谋略部队搬运物资，并先后枪杀了5名因打猎而误入戒严区的中国猎人。

这支部队从甘河出发后，经巴彦、五家子等地后摸索前进，在荒无人烟的大兴安岭艰难地跋涉了3个多月，死了200多名劳工，损失了大量车马，最后也未能找到一条翻过大兴安岭的道路，于是，同年9月下旬浅野部队返回嫩江，被调往它地，齐齐哈尔宪兵队派遣宪兵，也返回了原部队。

“诺门坎事件”以后，关东军逐渐加强了对西部国境的警备，从1940年开始，在齐齐哈尔宪兵队管区的阿尔山、五叉沟、罕达嘎呀等地构筑了大量的对苏作战阵地，从华北和东北各地运来了大批的战俘和劳工，驱使其进行劳役。围绕这些阵地和劳工的防谍，也成了齐齐哈尔宪兵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3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各战场的不断败北，关东军也开始对伪满西部国境的防卫日益感到不安，尤其是对白城至阿尔山铁路以南地区的平原地带更是担心。关东军已经意识到，战时这一地区的防御能力，很难抵挡住苏联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对此，关东军从1943年开始，又在林西、吐列莫杜、户地、乌勿林等地，修筑了大量防御苏联进攻的作战阵地，并在阿尔山、五叉沟加派了兵力。为了适应这一地区的防谍需要，1944年5月，关东宪兵队又正式成立了“阿尔山宪兵队”。下设阿尔山、兴安（王爷庙）两个分队，直接管辖白阿铁路两侧地区及各野战阵地。同时以王爷庙为中心，对伪满蒙族官吏的思想动向及伪满兴安军官学校学生进行侦察。阿尔山宪兵队成立后，齐齐哈尔宪兵队仅剩齐齐哈尔、昂昂溪、嫩江3个分队，管辖区域缩小到伪满龙江省境内。

1945年4月，在关东军转入全面防御后，为贯彻关东军开战后在齐齐哈尔至四平铁路以西地区节节抗击苏蒙军队，进行持久战的打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将阿尔山宪兵队进行扩编，改称为“兴安宪兵队”。本部设在王爷庙，调日本宪兵少佐小林喜一为队长，下设兴安、阿尔山、五叉沟、白城子4个分队。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齐齐哈尔宪兵队转入战时体制，本部40余名宪兵在队长玉岗严的带领下、开始焚烧文件，准备执行“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计划”。各分队在改编成特别警备队的过程中，由于突然接到停止的命令，遂失去了指挥系统，各自开始了行动。嫩江分队在少尉

分队长笹城户哲郎的带领下，筹集了粮食及大量生活日用品，准备潜入到大兴安岭山中，策动欺骗鄂伦春民族，一同与苏联进行持久的游击战。同时编成了3个放火班，准备撤出嫩江街前，将日本人的房舍、军营、官衙、小学校舍等全部烧毁。8月12日驻嫩江附近的伪满军骑兵21团和辎重第8团部分官兵起义后，嫩江分队还组织了伪满警察、铁警及在乡军人，对其进行了镇压。昂昂溪分队，开战后在分队长凌真喜雄的带领下，也烧毁了全部文件，作了对苏进行持久战的准备。

8月17日苏军进入齐齐哈尔后，齐齐哈尔宪兵队及各分队被解除了武装，队长玉岗严服毒自杀，余部随被俘日军被押往苏联。

兴安宪兵队在苏军出兵东北后，由于驻王爷庙的伪满兴安军大量逃跑，从10日开始，本部60余名宪兵组织了当地日本在乡军人，构筑工事准备进行抵抗。11日接到南下与奉天宪兵队汇合的命令后，小林喜一带领大部队员乘车到了奉天，被编入奉天防卫司令官隶下，8月20日日本投降后被解除武装。位于白阿铁路最西端的兴安宪兵队阿尔山和五叉沟两个分队，由于开战后王爷庙至阿尔山段铁路被苏联飞机炸毁，无法与本部汇合撤到奉天，故随当地日军退到了齐齐哈尔，后随日军作战部队一同被解除武装。

海拉尔宪兵队

海拉尔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1936年设在伪满最西部

的一支宪兵队，它的前身是齐齐哈尔宪兵队海拉尔分队。该队第一任队长是日本宪兵中佐板尾秀一。1936年编成时，下设海拉尔、满洲里、三河、扎赉诺尔、牙克石、阿穆古朗等分队和分遣队，管辖区域为伪满兴安北省。

兴安北省地处中、苏、蒙三国交界，西面向通往苏联的门户满洲里，东背靠东北平原的屏障、南北走向的大兴安岭山脉，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条中东铁路横贯东西，将其与北满紧紧相连。伪满时期，这里是关东军对苏作战的最前沿，也是关东军对苏"东攻西守"作战构想中的永久防御地区。海拉尔宪兵队的活动，就是在这一特殊环境下进行的。海拉尔宪兵队在伪满期间的活动，主要有四：

其一，是对蒙古族、白俄进行控制。

兴安北省当时是伪满境内蒙古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伪满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以"五族协和"的欺骗口号，将这一地区的蒙古族改成"满洲国民"，对其进行了奴役统治。但由于兴安北省与外蒙接壤，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一地区一直不放心，唯恐当地蒙古族人民受到外蒙的策动，起来反抗日伪的统治。因此，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尤其是对蒙古上层社会的控制一直很严，这项活动，主要由海拉尔宪兵队担任。1936年的凌升事件，则是海拉尔宪兵队监视、控制蒙古族的开端。

1936年5月，海拉尔宪兵队刚成立不久，宪兵军曹川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街上逮捕了1名因醉酒而泄露了军事机密的蒙古族青年，这名蒙古族青年声称他有省长凌升的密令。吉濑将他押到分队审讯后得知，以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为

首的一些人，正在筹划着“呼伦贝尔独立运动”，准备在兴安北省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蒙古民族独立。① 海拉尔宪兵队根据这一意外收获，开始了对凌升等人的侦察，不久即将情况全部搞清，于是派海拉尔宪兵分队长北川三郎大尉专程去新京关东军司令部作了报告。由于凌升是伪满的要人，溥仪皇帝的亲戚，在伪满建立过程中，又立下过汗马功劳。对他的处理将影响到日本对伪满的政策，因此，关东军司令部专门对其进行了研究，最后由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批准，决定对其进行镇压。于是1937年4月12日，由海拉尔宪兵队将凌升等人逮捕，24日押往新京南岭处死。这件事在关东宪兵队中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认识到对蒙古族的控制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对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责成海拉尔宪兵队，加紧对蒙古族、特别是上层社会进行监视，严防与外蒙联络，从事民族独立一类的活动。

日伪时期，海拉尔宪兵队管区还居住着2万多名白俄，分布在三河、满洲里、扎兰屯、博克图、牙克石等地，其中90％以上聚集在三河地区。

三河位于海拉尔以北大约180公里的地方，在西部国境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是关东军对苏作战的前哨阵地。这一地区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是白俄聚集区，19个村庄中有1万9千多名白俄，是当时东北仅次于哈尔滨的第二大白俄聚居区。1933年苏联农业改造实施后，这一地区又涌进了4 000余名不愿去集体农庄的白俄，使这一地区白俄的

① 关于凌升被关东军处死的原因说法不一，本书所述仅取一家之说。

成分更加复杂化。伪满成立初期，关东军曾对这些白俄抱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他们是“继承着外贝加尔哥萨克的传统，有着强列的反共意识”，是抵御苏联影响的屏障，因此未曾加以防范。1934年以后，随着日苏关系的日趋紧张，关东宪兵队也开始对这一地区注意。经初步调查发现，这些白俄很多人与苏联境内的居民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秘密往来。关东宪兵队从防谍的角度出发，担心这一往来被苏联利用进行间谍活动，于是开始侦察。结果从中查出了一名叫奈斯·米亚诺夫的苏联间谍。他是1933年从苏联越境进入三河的“白俄”。当时宪兵对他审查时，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并大肆进行了攻击。由于他反苏、反共的出色表演，蒙蔽了日本宪兵，被日伪方面录用为伪满警察。

奈斯·米亚诺夫在受审中交待了他的间谍活动，并供出了在三河地区白俄中的其它十余名苏联间谍。对此关东宪兵队极为震惊，1934年4月，慌忙在三河设置了宪兵分遣队（归齐齐哈尔宪兵队海拉尔分队管辖），重点在这一地区开展防谍活动。1935年9月，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后，三河地区被确定为侦察苏联间谍和中共地下活动的重点，东条英机特别命令齐齐哈尔宪兵队，要在三河地区重点侦察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及通苏分子的活动情况。于是三河分遣队从1935年冬季开始，选出100余名白俄作为重点，开展了侦察，结果发现19名有重大通苏嫌疑，遂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作了报告。1936年在“六·一三”大逮捕中，海拉尔宪兵队也将这19名白俄逮捕。

在审讯中，由于一名白俄经不住宪兵的残暴酷刑，供出："三河地区的白俄，正在组织突击队，要与苏联取得联系，准备旧历7月24日暴动，袭击日满军及政府机关"的情况，海拉尔宪兵队十分惊慌，连忙与当地日本驻军联系，在三河地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搜捕活动。结果又有108名白俄被捕，不久其中的32名所谓主犯被送到伪齐齐哈尔第三军管区军法会审，被判处了死刑，其余者也都被判了无期徒刑和有期长刑。

关于"三河突击队"事件的真伪，当时在日伪内部就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宪兵在审讯中，屈打成招，望风捕影制造的假案，有人也提出证据不足。但海拉尔宪兵队还是从控制白俄的立场出发，将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从这件事开始，海拉尔宪兵队对三河地区的白俄，一直采取着严密监视，控制的政策。

其二，围绕对苏作战阵地进行防谍活动。

根据关东军"东攻西守"的对苏作战部署，关东军设在西部国境的兵力要比东部国境少得多。这一地区在1938年以前，仅由相当于1个旅团的骑兵集团防守，"诺门坎事件"期间，增加到了1个师团，"诺门坎事件"后，又增加到1个军（相当于2个师团）。尽管关东军在这一带不断增派兵力，但还是远远达不到抵御苏联进攻所需要的兵力。关东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提出了"以坚固阵地为依托，以海拉尔为中心独立对苏进行防御战的设想"，设想在日苏开战后，即使滨洲铁路海拉尔段被炸毁、兴安北省与后方失去联系，关东军在海拉尔地区也能以有限的兵力，与苏军进行长

期的持久战，牵制西线苏军的行动。"关特演"期间，关东军还曾设想，开战后关东军先在东部国境出击，捕捉苏联远东红军决战；西部以海拉尔和牙克石两个阵地为主，由第八国境守备队和第6军固守3个月，待东部决战取胜后，主力回师西下，再到西部与苏军最后决战。

根据关东军的这些对苏作战设想，关东军在海拉尔和牙克石等地修了大量的作战阵地。海拉尔阵地称"第八国境阵地"，其规模相当大，构造也异常坚固。该阵地由5个地区阵地组成，分别设在海拉尔市的周围。在每个地区阵地的前沿，还修筑了大量的野战阵地，并配备了众多数量的火炮等轻重武器。守备第八国境阵地的第八国境守备队，有相当于1个联队的兵力，是关东军最大的一个国境守备队。

牙克石的永久阵地是"诺门坎事件"后开始修筑的，这个阵地大量的碉堡群都修在大兴安岭的山中，该阵地有牙克石、免渡河、乌奴耳、兴安4个核心阵地，1944年以后，由关东军第6军守备。

在海拉尔宪兵队管区，除海拉尔、牙克石两个大阵地群外，在博克图等地，也有大量的野战阵地。上述这些阵地，在日伪期间修了很多年，每年都从关内和伪满各地运去大量的劳工和战俘。对这些劳工和战俘的管理，及围绕这些阵地的防谍，乃是海拉尔宪兵队的头项重要任务，为此，海拉尔宪兵队曾在免渡河、兴安、海拉尔等地，专门设置了宪兵分遣队和分驻所，直接负责对阵地的防谍和监视劳工。

其三，配合哈尔滨特务机关，操纵指挥对苏作战的谋略部队。

关东军在西部国境的作战构想中，除指望以海拉尔、牙克石为中心的碉堡群对苏军进行持久的防御外，还指望利用大兴安岭特殊的地理条件与茫茫的林海，与苏联开展变幻莫测的游击战，与大量的碉堡群相配合，共同弥补西部国境缺少兵力的防御体系。根据这一设想，哈尔滨特务机关曾在海拉尔宪兵队管区的三河、修里坎、吉拉木图、牙克石、扎赉诺尔等地，很早就设置了谋略活动据点，对白俄、蒙古族及大兴安岭山区的鄂温克族进行谋略活动，企图利用他们在开战后，配合关东军对西部国境的守备，与苏联红军展开长期的游击战，牵制苏军进入东北平原。此外哈尔滨特务机关还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以蒙古族为主的矶野部队和白俄为主的浅野部队①及以鄂温克族人为主的鄂温克部队。为配合哈尔滨特务机关对这些人的操纵、监视、海拉尔宪兵队曾向这些部队派去数名配属宪兵，协助其活动。

其四，制定屠杀对策，随时准备在海拉尔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屠杀。

“诺门坎事件”后，由于关东军在大兴安岭山区修了以牙克石、乌奴耳为中心的作战阵地，为防谍和管理起见，关东宪兵队又将博克图分队（包括扎兰屯分遣队）从齐齐哈尔

---

① 矶野部队也称53部队，“关特演”期间编成，最初属伪满洲国军序列。1944年夏关东军将其改为关东军第2游击队，直属哈尔滨特务机关指挥。部队内日系军官全部改为哈尔滨特务机关嘱托，蒙古族士兵改以日本兵补身份服役，主要任务是准备在西部国境与苏联开展游击战。

浅野部队是1936年末以哥萨克人为主编成，“关特演”期间被分设在海拉尔、横道河子、松花江沿岸等地，主要是准备用于对苏谋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入准备对苏进行游击战的训练。海拉尔地区白俄部队的人数大约在200人左右。

宪兵队划到海拉尔宪兵队，使海拉尔宪兵队的编制增为海拉尔、博克图、满洲里3个分队，及三河、免渡河、扎兰屯、扎赉诺尔、牙克石等数个分遣队，人数增至为215人。

“关特演”开始后，海拉尔宪兵队为作好战时对内镇压的准备，根据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命令，结合管区内特殊情况，又制定了“全队非常时期防卫措施”。当时海拉尔队的总任务有以下10项，即：

1．密切配合国境警察，对出入该地区的人进行盘查，发现可疑者立即逮捕。

2．从防谍的立场出发，加紧对该地区的信件进行检查。

3．加强对部队、军工厂工人思想动向的监视，防止发生谋略破坏活动。

4．加强对邮电、铁路、一般工厂工人的监视，查其动向，防止其破坏活动。

5．取缔室内外一切集会活动。

6．侦察通苏、反满抗日分子，并根据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规定，作好开战时的处置准备。

7．加紧对日满官吏进行监视、侦察，及时掌握其思想动向。

8．搜查苏联间谍活动的器材，重点是无线电发报机。

9．搜查爆炸物，防止破坏。

10．加强对海拉尔地区和大兴安岭地区防御工事的防谍。

194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遭到沉重打击在东北转入

全面对苏防御后，海拉尔宪兵队根据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命令，又制定了战时防卫计划，其中规定：

满洲里宪兵分队，战时配合伪满外交部驻满洲里办事处，占领苏联领事馆，扣押领事馆外交人员，没收文件；海拉尔宪兵分队对海拉尔市及扎赉诺尔发电厂进行重点警备，防止破坏。在苏军进入海拉尔地区前，由本部派人协助将扎赉诺尔发电厂及煤矿彻底破坏；在满洲里、海拉尔、嵯岗、扎赉诺尔等地，同时执行“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计划”，对登记的“战时有害分子”进行镇压。

1945年8月初，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编成，海拉尔宪兵队本部被撤销，文件及一切设施移交给齐齐哈尔宪兵队接管，海拉尔、博克图、满洲里3个分队大部人员被编入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第5大队保安中队，3个分队降为分遣队。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满洲里分遣队10名宪兵带着2挺机枪参加了防止苏联红军的行动，结果全部被苏联红军消灭。海拉尔分遣队及本部45名宪兵，在苏联红军突破满洲里防线后，与关东军作战部队一同进入了海拉尔第八国境阵地第二地区阵地负隅顽抗，结果27名被击毙，余部在8月18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随作战部队放下了武器。

后　记

明年是“九·一八”事变60周年，谨借这本揭露日本法西斯肆虐东北小著的付梓，告慰半个世纪前那些倒在日本法西斯屠刀下的冤魂。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吉林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鼓励；幸赖中央档案馆、吉林档案馆、辽宁档案馆、黑龙江档案馆、伪皇宫陈列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等单位的协助；承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的前辈、学长、同仁、好友张辅麟、孙文范、陈辅林、高书全、霍燎原、孙继英、王庆祥、李力、郭洪茂、吕兵、易全金、苏晨辉等各种形式的关怀、支持、帮助和鼓励；张辅麟老师和吉林省物资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刘杰同志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顺致诚挚的谢意。

作　者

1990年孟冬